

追捕老纳粹纪实

〔奥地利〕西蒙·维森塔尔 著

淑琴 张 峤 译

时 波 校

北岳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晴

封面设计：赵晋山



ISBN 7-5278-0416-4

1-396 定价：4.20 元

追捕老纳粹纪实

〔奥地利〕西蒙·维森塔尔 著

淑 琴 张 峤 译

时 波 校

北岳文艺出版社

追捕老纳粹纪实

[奥]西蒙·维森塔尔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16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4,100册

*

ISBN 7-5378-0418-4

I·396 定价: 4.20元

引 言

人到80还写书，必会告诫自己，这是写最后一部书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必然会格外细心，构思下笔一丝不苟。然而我，自1945年来，数以百计的案件从我手中经过，我多么想将它们的来龙去脉、起因结果一五一十地写成书啊。的确，对我来说，每一个案件都是重要的。譬如说吧，我想起了普热梅希尔犹太人区的司令约瑟夫·施瓦姆贝格，我是在阿根廷搜寻到他的踪迹的，他因杀害了成千上万条性命，理所当然地被判处了死刑。然而，象其他许多案例一样，他的案情未被写入本书，否则这部书恐怕会比现在的厚3倍。我只能叙述某个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有的是因为追寻搜索异常困难，有的是由于罪犯或罪行特殊，还有的是因为至今对我们来说仍有其重要意义。

本书所陈述的，要我的追缉活动中最有声有色的部分——这不等于说，某些声色欠佳的方面无足轻重。

我完全明白，此书的出版商首先要求的是可读性强的故事情节——可是我认为，首先要考虑的是亡故者和恶贯满盈的罪犯。

这类著作还有另一个问题：它给人的印象是，书中描绘的卓著业绩似乎都应归功于我；书中介绍的失败挫折其责任似乎也应我一个人承担。造成这种印象的部分原因是我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写作方法，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工作的特殊性，

出于安全考虑，我不能随随便便地公开合作者的姓名。读者不难想见，我之所以能从巴拉圭获得极其机密的情报，绝非是我有什么顺风耳和千里眼，而是多亏了活跃在当地的某个人的努力。如果道出此人的姓名，或者扼要地说明一下他搞到这个情报的方式，我将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不过，我仍然要借这最后一部著作提供的机会，向在我工作中助过我一臂之力的部分人致以深切的谢意。我知道读者对此无甚兴趣，但是我已到了这样的年纪，我想借此书的几页版面表达一下心情，告诉他们我有他们这些人为朋友，心里是多么高兴。

我首先想到的是奥地利人，其中有犹太人社团已故主席伊凡·哈克尔博士和他的后任保罗·戈洛兹。在天主教徒中，我最亲密的朋友要数已故的作家兼哲学家弗里茨·黑尔，多亏了他，我对犹太人同基督教徒的关系才有了深刻的认识。我跟红衣主教弗朗茨·柯尼希也曾多次切磋过这个问题，他承认数世纪以来，天主教会对于犹太人屡犯罪过。象他这样坦诚认错的天主教要人尚为数不多呢。每当奥地利掀起反犹太人的喧闹时，红衣主教柯尼希总是据理相劝，循循疏导。

在布鲁诺·克赖斯基总理恶毒攻击我的时候，在有人依仗着某个非法的议会小组千方百计地要把我赶出奥地利的时候，有两名新闻记者给了我特殊的支持，他们是《侧面报》的彼得·米夏埃尔·林根斯和《信使报》的阿尔弗雷德·佩尔莱特，后者眼下在奥地利电台供职。奥地利的抵抗运动也挺身而出，反对针对我的流言蜚语。在奥地利人把克赖斯基视为近乎善良的上帝的时候，这个运动这样做，其领袖、社

会民主党人布鲁诺·切马克是要有极大的勇气的。尽管有这么多人向我伸出热情的手，我仍曾感到自己在克赖斯基的奥地利十分孤独。在那种时刻，我就告慰自己，在别的国家我以前有过——现在依然有——比在奥地利多得多的朋友，他们都是热心人。

在我女儿和外孙们生活的以色列，同样有许多朋友。我首先要提到的是以色列档案馆馆长、艾希曼诉讼案总检察官吉迪恩·豪斯纳、以色列档案馆科学主任基尔米兹博士和我40年前就结识的新闻记者蔡姆·马斯；我的文章和书都由他译成希伯来语出版。

在说完以色列的朋友之后，我要立即提一提在联邦德国的友人，我的感情是真切的。首先要介绍的是海因里希·京特尔特和阿道夫·科尔劳茨，他俩在第三帝国统治时期救过我的命，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只有我的钦佩之心才能与之相比拟。我的工作使我还结识了许多德国人，他们都是我的挚友。最重要的一位德国朋友是共和国派驻巴登—符腾堡州首府斯图加特的检察官罗尔夫·西希廷。不过，我还想列举中央调查局负责调查路德维希堡纳粹党滔天罪行的一大批合作者。我之所以旗开得胜，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该局的帮助，特别是多亏了吕克尔博士和施特赖姆检察官的协助。

已故出版商阿克塞尔·凯撒·施普林格也给了我极其友好的帮助，他对犹太教和以色列的态度历来赢得我的敬意，尽管他的批评有时显得颇为激烈。至于赫尔穆特·科尔总理的好意，我在此书的好些段落中都有所提到。

1963年，我参加了成立不久的国际抵抗运动和集中营联盟，这为我结识该联盟主席、比利时将军阿尔贝·居里斯创

造了条件。这个组织里有一大批人博得了我的敬意，在此我想提及这样几位：秘书长于贝尔·阿兰、法国抵抗运动女杰玛丽-玛德莱娜·富卡德、丹麦上校比雅克·绍、联邦德国上校沃尔夫冈·米勒和巴黎圣母院前讲道者里凯神甫，后者是我在茅特豪森集中营的难友，他表现得十分勇敢。

1965年，我认识了夏尔·隆萨克，当时他是“蒙迪歌剧”通讯社驻巴黎的主任，是他敦促我撰写有关我工作的第一部书《杀人犯隐藏在我们中间》的。从那以后，他对我的关注已不再局限于我的文学创作；这种合作渐渐地铸成了火一般炽烈的友谊。在我这最后一部著作里，谨向夏尔·隆萨克深表敬意。

向我们的办事处提供资助的人不计其数，我向所有这些表示极大的感激之情。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帮助孕育出了互敬的友谊。举个例子说，我们设在林茨的办事处每月都收到伊斯拉埃尔·西尔贝舍恩博士寄来的款子，正好清付办事处的邮费和电话费（后来，我从联邦德国补发给我的退休金中拿出一部分来支付这两项费用），这样该办事处才得以维持下来。

在过渡时期，犹太人社团协会和维也纳祭祀协会将我们维也纳办事处的一切费用包了下来。与此同时，我们从荷兰方面也获得相当丰厚的资助：汤姆·罗思、西蒙·斯佩杰和汉斯·雅格布斯在那里建立了“维森塔尔基金会”，得到大批赞助费，政府免除了基金会的一切税款。25年来，我们每月都收到从荷兰寄来的汇款。可惜的是，基金会的创始人和主席A·施滕佩尔斯于去年离开了我们，他再也看不到这些文字了。他的继任是鲁德荣教授，这是位遐迩闻名的历史学

家、帝国文献研究所前主任，我同他也是多年的莫逆之交。另外，该研究所副所长本·西耶斯一直是我的参谋和私交。令人惋惜的是西耶斯也在几年前去世了。谁也填补不了他留下的空白。

我的感激之情不仅仅属于几位荷兰朋友，它是属于整个荷兰人民的：我认为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象荷兰那样关注过我的事业。我格外感激荷兰通讯社驻维也纳记者尤勒斯·胡夫，他始终全神贯注地关心着我的侦查工作。虽然许多荷兰人——其中就有胡夫——不理解我在瓦尔德海姆^①事件中的态度，但我们的私人友谊丝毫未受到影响。

美国的“杰威什文献中心”跟荷兰的“维森塔尔基金会”属同一性质。该文献中心获得的捐赠，同样享受免税的权利。该中心的发起人和首脑赫尔曼·卡茨，将设在纽约他公司里的一间办公室交给中心支配。多亏杰威什文献中心的慷慨资助，我们在大西洋彼岸进行了几次耗资巨大的调查侦缉活动，成绩卓著。如果没有中心提供的经费，我们的活动只好半途而废了。同样，为得到特雷布林卡城的司令弗朗茨·施坦格尔跳伞地点的情报，需要付7000美元，我们从纽约方面获得了这笔款项。赫尔曼·卡茨于1977年逝世，他的律师和纽约办事处的共同创始人马丁·罗森接替了他的职务。我的家人几乎已被纳粹杀尽，没有留下什么亲戚。有一天我向马丁推心置腹地说，我的一个宿愿是选择一个新家。如果可以的话，我将选他来做我的弟弟。

①瓦尔德海姆，联合国前秘书长，现任奥地利总统。有人拿出证件证明他在德国纳粹军中服务过。——译者

果然，我们成了兄弟。

我的第一个美国朋友是位士兵。他叫雅各布·卡茨曼，是1945年结识的，那是茅特豪森集中营刚解放不久的事。当时他负责管理获释了的犹太犯人。我和我妻子同雅各布的友谊经历了40年的沧桑，一直延续到今天，其间因工作关系，我们曾聚过几次：雅各布担任过犹太工人运动联合会的总书记，后来又被选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执行局成员。目前，他在纽约各民办大学给青年讲课，努力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大屠杀的情况讲给年轻人听。

多年来我在美国结交了许多朋友，我还想举出其中两个人来：我的律师马丁·门德尔松和杰里·本德，前者是华盛顿人，后者在芝加哥。他俩对我有求必应，全力支持我的工作。

最后，我还想说一说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洛杉矶中心，它的研究课题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我之所以有如此殊荣，那是犹太教士马尔文·希尔、罗朗·阿纳尔和授业座^①贝尔兹贝格的学员们的美意。最近10年来，加利福尼亚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一直进行着情报工作，支持多项科学计划，着重致力于美国青年的工作。它促成了电影《种族大屠杀》的摄制，该影片于1983年荣获奥斯卡最佳文献片金像奖。

1987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参众两院一致决定拨款500万美元，创建“宽容纪念馆”，由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管理。而我认为叫“残忍纪念馆”这一名称要更为合适些，因为馆

^①授业座系犹太教教育机关，专门传授《塔木德》。二次大战后，授业座师生迫于纳粹的残害，纷纷逃往英格兰、美国和巴勒斯坦等地。——译者

内展出的许多图片都是一幅幅残忍的景象。

不过，陈列馆的一部分展品显示了抵抗运动，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期，该运动也没有平息过。我是乐观主义者，我认为残忍只能在一时一地占据上风，而最后的胜利属于宽容。

西蒙·维森塔尔

1988年9月 维也纳

又及：我还要向我的秘书罗莎-玛丽娅·奥斯特拉和玛姬·格雷塞尔表示谢意，感谢她俩在我撰写此书期间给我的帮助。

序 言

西蒙·维森塔尔其人

彼得·米夏埃尔·林根斯作

我的出版商们都曾建议我撰写我的回忆录。不知道回忆录这个名称是否适合于这部著作，因为读者将会看到，书中写到的有关我私生活的情况实在太平淡无奇了：我结婚成了家，有一个女儿，还有几个外孙——对我来说，他们就是我的一切，但对读者来说，他们不会引起任何兴趣。如果说我的一生有什么引人入胜之处的话，那仅仅是指在民族社会主义^①统治下的那一段生活：在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中我幸免于难，我努力保持着对死者的回忆。

年已80的我是活着的最后几个见证人中的一个。我只是以这种身分来撰写这部书的。

我请老友彼得·米夏埃尔·林根斯为我写几页文字，作为此书的序言。他长期工作在我的办事处，无疑是最了解我的人中的一个。如果让我说一

①“纳粹”系德文“民族的”和“社会主义”两个词缩写的音译。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

说自己的看法的话，他写的文字大体上是合乎分寸的。

西·维

他还在世，但“追捕艾希曼的猎手”就已成了千万百姓有口皆碑的人物：他不再只是条汉子，而是成了人们寄托激情的伟人。当然，这种激情在奥地利和德国与在诸如法国和美国等其他国家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自由世界把西蒙·维森塔尔视为伟大的正义者，那么他的大多数奥地利同胞却把他当做一个无情的复仇者。维森塔尔是在国外最受尊敬的奥地利人中的一位：他曾5次获得荣誉博士的称号，是荷兰奥朗日—纳索骑士团勋位、意大利共和国勋位和法国荣誉勋位骑士勋章获得者。联邦德国授与他大十字勋章，美国政府向他颁发了国会金质勋章。这个单子尚不齐全。然而在奥地利，数十年里他一直为人们所遗忘。心怀不良的人们（他们激烈否认这一点），把一位在维也纳市鲁道夫广场或萨尔茨托大街的一个狭窄办公室里忙于整理案卷的老人，描绘成追猎纳粹分子、毫无仁慈之心的面目可憎者。他的变化不定的合作班子被抬举成“一窝密探”，真有点受宠若惊。他的“文献中心”——在许多年里只是靠富裕的美国犹太人的慷慨才存在了下来——竟也成了同外国势力狼狈为奸、拥有无穷财源的“机构”。当他的无数劲敌都不敢说维森塔尔在捕获艾希曼的过程中没有起丝毫作用的时候，有人竟然将“追捕纳粹的猎手”的光辉业绩说成是神作用的结果，归功于一个叫詹姆斯·邦德的犹太人：他可以启开世界上看守最严的保险柜，他的柜子里塞满了秘密文件，他可以在地球的

任何一个角落里无情地出击，云云。

据说神灵（不管是“诸神”还是“魔鬼”）的本领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的。

其实，奥地利人谁也不愿意弄明白，西蒙·维森塔尔究竟是怎样的人。这位复仇之神大有被贬为常人中一员的危险。

把维也纳城选为新的故乡的这个人，出生在奥匈君主帝国东部边陲小城布卡克（这个城镇也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①家族的摇篮——维森塔尔的岳母还是弗洛伊德家族中的一位小姐呢）。大部分犹太人在以基督教为主的环境里生活，或恰恰相反在犹太人居住区长大的。而在布卡克城里，犹太人占了居民总数的一大半：他们约有6,000人，而波兰人只有2,000，乌克兰人仅为1,000。因此，这些犹太人对自己的价值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在布卡克，犹太人不是末等人（这个位置是留给乌克兰人的）。尽管波兰实行着全面的种族歧视政策，但在布卡克，做一名犹太人是十分自豪的。

同忍气吞声已成为第二本性的其他犹太人相反的是，维森塔尔在第三帝国遭到的皮肉之苦，远不象帝国给他的侮辱那样深深地刺伤他的心。他作为一个犹太人，从未产生过厌恶本种族的念头，另外，他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中的一员，他维森塔尔是个普通的犹太人，绝不盛气凌人。

在他家里，如同在布卡克城所有的犹太人家里一样，人们是虔诚恭顺的，同时也染有一丝当时开始复苏的东方奇特

①弗洛伊德（1856.5~1939.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译者

的神秘主义色彩。

加利西亚^①是出色的犹太教教士们的故乡。

犹太教教徒不是神甫，而是贤人，这一阶层是司法方面的最低一级审理者。几乎历来生活在比自己更强大的种族之中的犹太人必须细心地防止内部争纷。他们恪守父辈们严格的性道德（这种状况导致了弗洛伊德暴怒），同样，他们的司法观也是严格和刻板的。维森塔尔常常说起，他小时候的一天，有人把他领到一间屋子前，窗后坐着一位男人。几年来此人不讲一句话，食物也吃得很少。人们把这个男人称为“静默者”。从前，“静默者”家里发生过争吵，他对妻子吼道：“你可以焚烧了！”当天夜里，一场大火不知怎的烧了起来，把“静默者”的家夷为灰烬，妻子死于火海。“静默者”在犹太教教士面前忏悔，后者罚他不再说话，永远坐在那里为自己的罪过祈求饶恕，直到去世。

西蒙·维森塔尔一直对公理持有神秘的看法。他深信——但又说不出别的什么道理——每一个生灵中，谬误和赎罪是相互抵消的。他常说：“生活中一切都有代价。”

谬误是不能否认的，只能用赎罪来弥补过错。这就叫做“报应”。

维森塔尔有一杆极其灵敏的秤来掂量“过错”和“赎罪”。重要的不是罪行的大小，而是它的性质。

他认识一个人，在他看来此人比许多杀人犯更罪大恶极，可是此人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他只是写了些明信片。他是林茨铁路线上一名警察，娶邮电局的一位女职工为妻。

^①加利西亚是东欧的一个地区，原属波兰。——译者

后者的血管里四分之一的血属犹太人。尽管他俩的婚姻受到一定的保护，但他执意闹离婚。分手之后，他就开始给她写明信片，每天都写，一天10封，每封信都充斥着辱骂人的言词，还附上一些从报上剪来的仇视犹太人的文章。明信片是不装信封的，邮电女职工的所有女同事都看到了信上的脏话。战争结束后，维森塔尔为这个女人弄到了一张纳粹主义受害者的证明。为此她只提供了一个证据：需两人才抬得动的一只箱子，里面放着数以千计的明信片。

“这是名副其实的酷刑。我希望那个男人每天每天都受到良心的责备。”

同德国和奥地利公众舆论的想象恰恰相反，维森塔尔总是一丝不苟地将所有的行为放到当时的具体背景中去分析。在他看来，一个临时拉去充当行刑队队员的人杀害了10名犹太人，其罪恶比一个没有任何命令而主动虐待囚徒、并使之手脚残废的人要小些。党卫队曾打过他无数次耳光，但都没有茅特豪森集中营里一名波兰书记官在他获释数天后给他的一记耳光那么深深地伤害了他。“那是排犹主义行径，他完全明白希特勒是怎样虐待犹太人的。”

美国人命令这位书记官向维森塔尔公开道歉，当波兰书记官伸出手来想在全体囚徒面前跟自己的受害者握手时，维森塔尔拒绝了对方，义正辞严地说：“我接受你的歉意，但我不能把手伸给你。”

西蒙·维森塔尔不轻易原谅人（这一点跟公众舆论对他的印象倒是吻合的）。这种固执不能说明他内心的态度。维森塔尔聪明过人，对过错极其敏感，因此不会轻易捐弃前嫌。他的言行举止都受感情的支配：维森塔尔不白白送人一

个原谅，只有对方认错补过后，他才同意原谅人。

原谅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维森塔尔的脑海里，他亲自说过，自己的“过去是抹杀不了的”。在他的优秀著作《太阳之花》中，他描述了战争期间他遇到的一次意外事件，不禁使他略有自责地提出了原谅这个问题。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他在一家军队医院工作。一天，一位修女叫住他，将他领到一位濒死者房间里。

正在同死神搏斗的人是个党卫队队员。他抓住维森塔尔的手，开始忏悔起来：在死神折磨下，党卫队员惶恐不安，向维森塔尔交代了自己对犹太人犯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滔天罪行。坦白之后，党卫队员恳求默默坐在他床头的这位从前的犹太囚犯宽宥他。维森塔尔站了起来，拂袖而去。

过不多久，维森塔尔探望了死者的母亲，面对这位一无所有的女人，他对其儿子的罪行只字未提。

同样的情况可以引起不同的反应：战后，在波兰，一大批从前的集中营囚徒又被关了起来，原因是他们在新的专制统治下拒绝沉默。一些人——其中有一名妇女——被判处死刑。1946年，她在监狱内关押死犯的牢房里等待受刑。

一天，人们把她和另一名女犯带去洗澡。那女犯就是臭名昭著的女看守、奥地利女人玛丽娅·曼德尔，她从前是比克瑙市奥斯威辛集中营女牢里最残暴的人。

玛丽娅也已被判处死刑。

两个女人一丝不挂地站在喷嘴下淋浴，谁也不看谁。

蓦地，玛丽娅·曼德尔走近她，只对她说了这样一句话：“您能原谅我吗？”

后来获得赦免的波兰女人是这样描写她当时的反应的：

“我们两个赤条条的女人，都在等待死神。我知道玛丽娅·曼德尔虐待过的人听不到我的回答。于是我对她说：‘可以。’”

维森塔尔知道她的这一回答。直到今天他还没有把握，自己是否已经正确地解决了原谅这个问题。正因为没有丝毫把握，他在《太阳之花》中增写了一个调查记。在调查过程中，他要求那些在他看来是伦理道德权威的人评判一下他的行为：他是对了，还是错了？

这是一场大辩论，有关文章占据了法国等国家各大报纸的好几个版面，但最后没有结论。

维森塔尔认为在一名挪威农家妇女给他的信中终于找到了结论：“您应该叫他祈求他的上帝原谅他。上帝会原谅的。”

维森塔尔本人不再是恪守教规的教徒。他那一代的许多犹太人在多年的同化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摒弃了父辈的信仰。可是维森塔尔仍坚守着犹太教的所有道德准则，因此，他依然为自己是犹太民族的一分子而自豪。

同样，在他看来犹太复国主义——还有一些人硬栽到维森塔尔头上的所谓世界性阴谋——不过是个历史现象而已，即犹太人找到一个祖国的希望而已。这个希望已经在以色列国的建立中得到实现，“诚然，今天应该为它寻找新的形式。”

布鲁诺·克赖斯基也是一个不守教规、没有复国思想的完全被同化了的犹太人。可是跟克赖斯基完全不同的是，维森塔尔仍怀着极大的同情注视着本民族的信仰和主义。在他看来，这信仰和民族主义是犹太教的精髓之所在，自从离开

埃及^①，经过中世纪的大屠杀^②，直到奥斯威辛集中营，信仰和民族主义始终决定着犹太人民的共同命运。

“做个犹太人，就是做个受迫害的幸存者。这些幸存者的总和形成一个整体。自从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要想脱离犹太人的共同命运，那是不可想象的。”

为说明这段话，维森塔尔举了一个美国犹太青年的例子。此人在不可知论的影响下长大，战后千方百计地在自己内心唤起祖先们的信仰。“在他们的遭遇之后，我愿尽一切努力使自己感到同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必须了解上述背景，才能理解维森塔尔同布鲁诺·克赖斯基之间的冲突。维森塔尔在这部书中详细地陈述了这个冲突。他淡淡地说：“克赖斯基同犹太人民的命运决裂了。在我看来，他是个开小差的人。”

死里逃生

加利西亚地区犹太人的特殊命运深深地打上了沙俄残暴的反犹太主义的烙印；布卡克小城挤满了在俄国发生的集体迫害下最后时刻逃生的犹太人。比较而言，徒有讨厌疏离犹太人这个美名的奥匈君主帝国——尤其是皇帝本人——在别人眼里成了犹太人的保护伞。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把哥

①据《圣经·旧约》记载，公元前13世纪，以色列人不堪忍受埃及的残酷奴役，在摩西率领下离开埃及，到达西乃山。——译者

②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只因一个犹太人跟凶犯有牵连，无端的谣言挑起了俄国200多个城镇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译者。

萨克人引进了布卡克城。维森塔尔的母亲带着两个儿子逃到了看上去能确保犹太人起码的安全的维也纳城。

西蒙·维森塔尔进了维也纳博伊尔勒大街小学，在那里念了两年书。

父亲从商，但被抓去当兵，在俄国火线为奥地利捐躯。

1917年，俄国人撤离加利西亚，许多离井背乡的犹太人——其中有维森塔尔一家——返回家园。突然间人们宣告加利西亚成立“西乌克兰共和国”，可是后来又为波兰人占领，直到波苏战争的爆发。

每星期或几乎每星期，小城布卡克都要被波兰或苏联某一方占领一次。军队的残暴唯有彼特留拉^①的骑兵的凶狠才能与之比拟。一位乌克兰人喝醉了酒，拔出大刀砍伤才12岁的小西蒙的大腿，皮肉翻开，露出白骨——西蒙一生都带着一道长长的疤痕。从此，一个念头支配着他的所有行动：兽性不是某个民族的特权。

维森塔尔越是竭尽全力引起世界关注奥地利和德国战争罪犯，他越是小细谨防在所谓上帝的选民眼里给这两国人民打上耻辱的记印。

一天，他在以色列战士们中的一个基布兹^②发表演讲说，奥地利青年或德国青年既不比以色列青年优秀，也不比他们蹩脚。他的话引起了公愤。

维森塔尔在维也纳的以色列人中间遇到的仇恨，部分原

^①彼特留拉（1879.5~1926.5），乌克兰社会党领导人。1920年4月与波兰国家元首毕苏斯基缔约，支持波兰人的反苏战争。后为复仇者刺杀于巴黎。——译者

^②基布兹为以色列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组织。——译者

因是他以同样的毅力追捕党卫队员和在第三帝国时期双手沾满血迹的犹太人。“难道不应该一视同仁吗？”1961年，在审判艾希曼的时候，东柏林的一位观察家——一个叫弗里德里希·考尔的人——口吐狂言，攻击西德，接着，在一次一度陷入混乱的记者招待会上，维森塔尔取消了这位观察家的发言权……

克赖斯基指控曾在半打集中营里受过折磨的幸存者维森塔尔是什么盖世太保的密探。

是的，维森塔尔大难不死，这确实是个奇迹。应当知道，他能逃脱强暴的死神之手，那是一系列罕见的偶然性相结合的结果，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他为何感到命运要求他为死者干点事。

维森塔尔的苦难征途始于1941年6月希特勒侵略苏联。一周后，最后一批俄国人逃离了已出现第一批德国军人的利沃夫。德军是乌克兰辅助部队引来的，后者庆贺他们的凯旋，在城里杀了3天3夜。6,000名犹太人死于非命。

1941年7月6日下午，躲在地窖里的西蒙·维森塔尔被发现。人们把他押到了布里吉德基监狱，同狱受苦的有百来名律师、医生和教员。犹太人接到命令面壁排成数行，双手反剪在后颈上。他们每人身旁摆着一只木箱。一名乌克兰人从前排左起开始屠杀。两名助手随即将死尸装入旁边的木箱里，然后抬到别处去。屠杀延续了整整一个下午。

突然，钟声四起，喊声震天：“晚祷啦！停止啦！”

杀戮到此停住。最后一个死者离维森塔尔仅10米之遥。

他记得接下来出现一道强烈的光，一个人用波兰语对他说：“维森塔尔先生！您在这里干什么？”他转身一看，说

话的人是从前的一位工头，名叫博德纳尔，身穿便服，胳膊上套着乌克兰辅助警袖章。“我必须在今天夜里就把您带出这里。”

博德纳尔告诉乌克兰人，他在被捕的犹太人中发现了一名苏联特务，他要把特务押到国土警察局局长那里去。其实，他把维森塔尔带回了家（心想乌克兰人不会马上来搜查他的家）。

这就是第一个奇迹。

不久之后，真正的德国部队开来了，他们不那么喜欢缓和。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家门，统统住到犹太人居住区去。维森塔尔同妻子一起被送到了附近的雅诺夫斯卡集中营。

他母亲留在犹太人居住区。

1942年中，维森塔尔夫妇被征调到东方铁路局保养处干活。这一段经历给一位奥地利人捕风捉影地攻击他们提供了机会。此人宣称，他掌握着“耸人听闻的”文件，可以证明西蒙·维森塔尔“为德国人卖命才保全了自己的命”。

维森塔尔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用很多篇幅叙述这段时期：他妻子被送进一家机车工厂，磨光黄铜零件。至于他，他负责在从敌人手里缴来的机车上绘制皇家鹰徽和卐标记^①。

是年5月，盖世太保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布拉格遇刺毙命。报复性措施笼罩着整个占领区，犹太人被驱赶到波兰的各个集中营。

8月间，在利沃夫，党卫队将一批犹太老妇装进一列

^①卐系希特勒的纳粹党的标记。——译者

军用货车。西蒙·维森塔尔的母亲当时63岁，她也被推上了车。她死在贝乌泽茨毁灭性集中营里。事隔不久，维森塔尔妻子的母亲被乌克兰辅助警察击倒在自家楼梯上。

维森塔尔在铁路局修理厂干活，行动略为自由。他利用这点自由试图救出妻子：他同波兰抵抗运动战士取得了联系，答应如果他们帮他妻子逃走，并提供假证件的话，他就向他们提供车站地形图（他们准备炸掉车站）。

双方就此达成了协议。

但维森塔尔只是在停战数月后，才在十分传奇的气氛中重新找到了妻子^①。

今天，他们生活在维也纳郊外的一幢小屋里。他们的独生女波琳卡生于1946年。“世上谁也没有象我们这样渴望有个孩子。”

①据他们所能得到的消息判断，各人都深信对方已经去世。1945年6月，琪拉决定返回划归苏联的利沃夫。当她抵达克拉科夫后，不期遇上她同维森塔尔的一位共同友人，此人刚接到西蒙·维森塔尔的一封信，信中告诉他琪拉已经去世。经过一系列周折，琪拉·维森塔尔终于将一封信寄到了丈夫手里，不料丈夫不久前摔折了踝骨，只好托友人费利克斯·韦斯贝格带着必要的证件去波兰把琪拉接回奥地利美国占领区。途中韦斯贝格丢失了证件和琪拉的地址。他在克拉科夫向当地犹太人委员会陈述了全部情况，请求西蒙·维森塔尔的妻子琪拉·维森塔尔跟他联系，以便一起回林茨她丈夫那里去。3位女人前来见他……韦斯贝格从未见过琪拉，只好一一询问她们，然后从中选择一个，深信被选的就是琪拉。他在黑市上为她买了张通行证，然后带她回林茨。就这样，西蒙和琪拉·维森塔尔于1945年末久别重逢了。

现在，波琳卡已经结婚成家。维森塔尔3个外孙在以色列海滩上阳光下玩耍的照片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当初要是有人告诉我，我会有如此幸福的一天，我准会说他是疯子。”

琪拉·维森塔尔仗着自己一头金发，才得以潜入地下活了下来，当时西蒙靠着在学习建筑技术时学到的绘图本领，正在铁路局的工厂里绘制标记和燕尾旗。

布鲁诺·克赖斯基一本正经地指责西蒙“资敌”，此乃确有其事。不过应当指出，决非是西蒙·维森塔尔帮助了德国兵，恰恰相反，是两名纳粹党党员主动帮助了他。

维森塔尔干活的东方铁路局保养工厂里有一位德国人，名叫海因里希·京特尔特。维森塔尔的顶头上司阿道夫·科尔劳茨检查员也是德国人。这两位德国人都是纳粹党党员。可是他们在波兰生活期间，对本党越来越持批评态度。一天，科尔劳茨甚至当着维森塔尔的面嘟哝说，他为党卫队的行为而感到耻辱。

在他们的工作范围内——除征用来的囚徒外，他们手下还有50来名德国铁路员工——他们尽量照顾好犹太人。在第三帝国时期，官方没有正式指示强迫任何人殴打犹太人，向他们脸上吐唾沫，或饿死他们。

可是到了1943年4月20日，地狱之门打开了：拂晓时分，有人前来找维森塔尔和他的3位伙伴，京特尔特和科尔劳茨怎么劝阻也不行。党卫队要用犹太人的生命来庆贺元首的生辰。

被点名要去的牺牲者约20来人，他们必须站到大家所说的“羊肠小道”里去，那是一条宽2米的过道，两侧围有铁

藜藜。在过道的终端，是一个沙坑，受害者顺着过道向沙坑鱼贯而去。

西蒙·维森塔尔有生以来第二次等待死神的降临。现在，他象医院里的病人一样等着喊“下一个！”（他在本书第一章描写了当时的痛苦不安）。

可是，他又一次死里得生，而且只有他一个人幸免于难。因此，一种犯罪感一直令他忧心忡忡，但这同克赖斯基对他无中生有的指责完全是两码事。“为什么幸免者是我呢？”40多年来这个问题经常不断地纠缠着他的良心。“在数以千计的人惨遭杀戮的时候，为什么我幸存了下来呢？”这次赦免同他的神秘的正义感是背道而驰的：他可没有为活下来而求过人。

这种犯罪感是我们解开维森塔尔追捕活动之谜的钥匙之一：将杀害兄弟们的凶犯缉拿归案，以此来为命运的一次次恩典作一个弥补性的解释。

维森塔尔这次幸存，多亏了德国人的帮助，他们都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人：科尔劳茨奉京特尔特之命，火速来到集中营，向监狱当局要回他的“画家”。理由：必须把一块很大的白底标语牌上的卐字画完，下午庆祝活动等着用呢。

人们把维森塔尔从“羊肠小道”里领了出来，把他带回了工厂。他画的那个标语牌写着这样几个大字：“我们感谢元首”。

1965年，维森塔尔的女儿波琳卡结婚的时候，“追捕纳粹的猎手”特意邀请海因里希·京特尔特光临婚礼，同贺新禧。

上述两位纳粹党党员给他的恩典，给西蒙·维森塔尔留下的印象，可与其他纳粹党党员对他的残酷虐待所留下的印象相比拟，甚至可以说前者对他的触动比后者要深得多：

“他们握有证据，足可证明我经历了第三帝国的考验而没有弄脏自己的手，他们证明了集体负责的思想是谬误的。”

人们（起码说奥地利的人们）常常把他视为集体负责这一主张的辩护士。其实，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反对这种观点，有时是口头，有时是用文字来反对，从获得解放起就开始了战斗。想要找到一篇维森塔尔不抨击这一观点的演讲或文章，那是徒劳的。

一些以色列宗教徒曾多次对维森塔尔说，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永远是不清白的人。尽管维森塔尔平日里很少引用经文，但每当他听到那些教徒的话时，总不厌其烦地劝他们读一读《圣经》，并强调指出：亚伯拉罕^①同上帝的全部斗争和所多玛与蛾摩拉的毁灭^②的寓言，充分证明集体负责的观点的荒谬：只要一小部分人主持正义，足可阻止毁城。

维森塔尔个人起码结识过两位正义者——他知道这样的正义者还大有人在。

战争结束不久，维森塔尔还在美国人手下工作，犹太人中间纷纷传言说，一个名叫贝克的党卫队下级军官在达豪拘

①亚伯拉罕系希伯来人的祖先，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三种一神教均推崇的古代圣人。——译者

②所多玛与蛾摩拉系《圣经》所载两个著名的罪恶之城，其址在今以色列境内死海南端附近利桑半岛以南的浅水之下。据说这两城因罪大恶极而被“燃烧的硫磺”焚毁，实际上可能是地震时石油和天然气喷发燃烧的结果。——译者

留所等待受审，可是此人对待囚徒们的态度历来是无可指责的。维森塔尔闻讯后放下手里的所有工作，搞到了一系列证词，证明贝克的行为是无可非议的。人们根据他提供的证据，释放了贝克。

1943年，当党卫队开始处理最后一批犹太劳工时，科尔劳茨鼓励西蒙·维森塔尔逃跑。“您还等什么？”这位纳粹没有再说什么，给他的画师发放了通行证，说是让他去城里买颜料等绘画用品。科尔劳茨还派一名神经脆弱的乌克兰辅助警察陪他前去。这位警察不太熟悉那个地方。维森塔尔进了文具纸张商店，转眼又从另一个门出了店。就这样他得救了。

维森塔尔后来得知，科尔劳茨主动要求上了前线，他觉得他的岗位应该在那里（他始终没有彻底放弃纳粹党的信念）。在大战尾声之际，科尔劳茨战死在柏林。

从商店脱身的维森塔尔遇上另一位犹太人，便一起到了朋友家。朋友住的是一幢破旧的房屋，底楼的地板铺在沙子上。他们掀起几块木板，在沙土里挖了一个掩体。陌生人靠近屋子时，他们就揭开木板，钻进藏匿处，朋友们立即在木板上放一张笨重的标本桌。在那个时期，最安全可靠的地方是墓地……

1943年4月的一个夜晚，他们住所旁的大街上打死了一名德国士兵。警笛齐鸣，党卫队队员和便衣警察在这条街区挨门逐户搜寻凶器。结果凶器没有找到，却发现了西蒙·维森塔尔。

他第三次认为自己定死无疑。

第三帝国的大多数受害者对集中营里的苦难是记忆犹新

的，而维森塔尔印象最深的是越狱的经历：最担心的是随时随地会被敌人发现。就连人们听到的寻常的脚步声也会引起他心惊肉跳。

在许多问题上维森塔尔是可信的。然而，尽管他一再声明，追捕老纳粹的指导思想并非为了复仇，但无可否认的是，他常常将他从前的刽子手们逼到了他当初那样的境地：他的存在就足以叫他们心惊肉跳，不得安宁，纵然躲到天涯海角，仍然杯弓蛇影，妄自落魄，惶惶不可终日。维森塔尔在本书中讲到他们中的一个人，由于吃不消长期的神经紧张，最后宁愿自杀了事。

1943年4月15日，西蒙·维森塔尔的精神崩溃了：在被押送去盖世太保办公地的途中，他取出藏在衣服里的一张刮脸刀片，割断了自己的血管。

盖世太保立即将他送回监狱医治，给他吃特别的饭菜，想把他养得胖胖的，然后处死。

但是，当时的局势一片混乱，往往会给死犯带来生的机缘：一架飞机突然在萨皮埃哈大街上空被击落。一声巨响，盖世太保所在地乱作一团。维森塔尔趁着滚滚烟尘和一片慌乱穿过院子，混进一群正要转移的犹太人中间，他们一起上了一辆卡车，等待出发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雅诺夫斯卡集中营。

集中营司令弗里德里希·瓦尔佐格纵队长热情接待维森塔尔，把他作为“常客”介绍给伙伴们，象对待回头的“浪子”一样对待他。

“你一定会以为我将把你连同其他囚徒一起枪杀，是吧？”司令官稍停片刻后接着对维森塔尔说道：“在这里，

我要谁死，谁就得死。去吧，回到你的木屋去。我免去你的劳动，赏你双份饭菜。”

没有经历过这个年代的人，难以相信命运中会有这样的巧事。然而，只要读一下从希特勒制造死亡的机器中逃出来的所有犹太人写的回忆录，那是不难找到类似事件的。苦海余生或魂归地狱，都是同一暴虐的意志。党卫队横行跋扈、执掌人类的生杀大权，在接连屠杀数以千计的无辜之后，有时会“大发慈悲”；是杀是放，都取决于党卫队专断的决定。

一天，正当数百万人死于战乱的时候，第三帝国的一个委员会竟然向奥斯威辛集中营派来一个小组，应一位女囚徒家人的要求，调查她的健康状况。柏林派来的一名女官询问年轻的女犯是否承认元首乐善好施，女犯点头同意，两小时后竟奇迹般地获得了自由。

纳粹党的历史学家也许可以利用这种事证明，奥斯威辛集中营关押囚徒的时间是由德国有关方面严格控制的。

维森塔尔以这种不可思议的方法摆脱了死神，受到了赦免。这一次倒是有一条正经的理由：党卫队需要有人供他们监视。

那段时期，利沃夫已经处于大炮的猛烈轰击之下。闲散的党卫队员都要被征调到前线去。在这种情况下，跟维森塔尔一起侥幸活下来的34名犹太人顿时变成了监视他们的200名党卫队队员的护身符。瓦尔佐格无疑已经想到了他们一旦落入俄国人之手将会是怎样的下场，因而对犹太人说，他们跟党卫队队员们可以组成“一个大家庭”。党卫队员们指望赶快

躲到斯洛伐克森林中去，等待战争的结束。

正当德军在前线作最后挣扎、浴血奋战的时候，瓦尔佐格手下的党卫队员们带着一小队饥肠辘辘、半死不活的人寻找避身处。他们中一部分人徒步行进，一部分人乘坐战士们遗弃的车辆；这支离奇古怪的队伍朝西边走去。

1945年初，红军已经布兵格罗斯-罗森。犯人们必须赶到克姆尼茨去。从那里人们将他们装上火车，押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去。

1945年2月3日，人们开始了朝相反方向的大逃亡：3,000名在押犯被装上了敞篷卡车，开始了通向奥地利茅特豪森的转移。

犯人们全身冰冷，挤成一团，绝无跌落车下之虞。当车队于2月7日抵达茅特豪森的时候，离开布痕瓦尔德时的3,000人已冻死大半，只有1,200人仍然活着。

其中就有西蒙·维森塔尔。他的体重只剩下50公斤了，立即被分在B牢区，即“死犯牢房区”，换句话说，那里关着的犯人已经无力干活，气息奄奄，只等一死了事。

1945年5月5日，天蒙蒙亮，他踉踉跄跄地出了B牢区——“我自己也不明白是哪里来的力气下地走路的”——迎接第一辆美国装甲车。

昔日的囚犯占领了集中营的司令部。其中一人后来成了波兰的部长，他叫卡西米尔·鲁西内克。维森塔尔到秘书处找他，请他发放通行证。这位波兰人象其他集中营里的许多职员对待犹太人一样，给了他一记耳光。这记耳光比3年来党卫队对维森塔尔的种种虐待更深地刺伤了他。“战争结束了，还在打犹太人。”本书第二章写到，维森塔尔后来向集

中营的美国负责人告了一状。他跨进了门上挂着一块牌子的房间，牌子上写着：“战争罪审理局”。就这样西蒙·维森塔尔成了“战争罪审理局”的合作者。

成为猎手

维森塔尔在该局刚干了几天，就有人推开了他的办公室的门：一名党卫队员出现在他的面前。

维森塔尔本能地双手下垂贴紧裤缝，毕恭毕敬地站了起来，不过他立即把视线挪开，象鄙视一位下等人似的。他如同从前在押时那样小心翼翼地慢慢扭过头去。他见到的情形叫他惊讶，叫他不忍目睹：来人全身颤抖，害怕得丧魂落魄。

维森塔尔的脑海里，日耳曼超人依然是执掌生杀大权、支配他人命运的形象，因此他一下子认不出站在面前的党卫队员。“就好象要兔子相信，猎人害怕它。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明白，在某些情况下，所有的人都是相似的。那家伙害怕的样子跟躲在隐匿处的犹太人被发现时的恐惧是相同的。”

囚犯们在集中营看到的党卫队员们的形象，同这些党卫队员被捕、被审讯、被判刑时的态度之间的天壤差异，往往会使人发生判断错误：甚至是这些党卫队员的受害者也难以相信，面前站着的这些人就是从前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的杀人狂。

如果今天审判面前的这位党卫队员，谁也不会想象在用最野蛮的手段宰杀无辜时他竟大显身手过。

可是，战争刚刚结束，铁证如山，毋庸置疑：当西蒙·维

森塔尔在检查一名浑身颤抖的党卫队员的文件包时，发现了一张照片：那上面一个青年男子悬吊着，绳子竟是系在他的睪丸上。

维森塔尔有生以来第一次差一点扑向那位党卫队员。不需审讯，也不必追究他该负多大的责任，这张照片已说明了一切。

美国军官们拦住了他。

维森塔尔的顶头上司是位上尉，名叫塔拉库齐奥，是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大学的国际法教员。这位教师给维森塔尔讲解如何在法律上追究纳粹罪行的知识，当时懂这些知识的人还不多。塔拉库齐奥循循善诱，详细讲解，教导他谨防原始的复仇心理，摈弃一切形式的扩大化。塔拉库齐奥郑重地说：“唯有法律才能医治无政府时期留下的创伤。”

毋庸置疑，没有人能比维森塔尔更理解这句话。他的内心一直骚动着人们停止执行保护个人不受专制迫害的法律时所产生的痛苦感情。

维森塔尔不想复仇，他要求执法。战争刚结束的几年里，许多犹太青年突击队员和老战士跑来敦促他报仇雪耻。

“把名字告诉我们。把住址告诉我们。我们来处理！”维森塔尔一连几小时说服他们改变主意。他认为，要彻底摆脱古老的复仇法则，受害者必须将复仇的愿望公诸于社会，然后将整个社会置于既定规章——即通过法庭寻求真理的规章——之下，尊重法庭任何形式的裁决。

“人们会问你们：你们跟纳粹分子有何区别？他们杀人，以为这是他们的权利。你们的行为跟他们的一模一样。”

“可是，他们杀戮了几百万无辜。我们杀的是百来名罪人。”

“我同意这是个区别。不过，我衷心呼吁新社会的到来，在那个社会里，人们将认为这一点区别是不够的。”

维森塔尔的谆谆说理，锲而不舍，终于说服了渴望复仇——人人都会理解这种渴望——的人们。他在《杀人犯隐藏在我们中间》这部书里举了一个例子。一位杀人犯多亏了维森塔尔才免遭复仇之刀。

事情发生在1947年赎罪日^①前一个星期。阿德蒙特兵营遵守教规的犹太人希望按照传统形式庆祝他们最重大的节日，要知道他们已多年没有好好过这个节了。男人们需要祭一只公鸡，女人们要祭一只母鸡。

于是，他们带着解放者赠与的罐头食品和巧克力到周围地区去换鸡。

那天，有两名犹太青年走在去阿德蒙特的路上。这两位犹太青年一个叫梅尔·勃里茨，另一个叫穆什斯·库索夫斯基，他俩用自己掌握的仅有的几个德语单词跟人做黑市交易。

可是，农民们十分贫困。大多数人劝他俩去别家试试。其中有一位农民的话钻进了他们的耳朵：

“到那边试试看。那里有一个大农户，起码有2,000只鸡。可是你们很可能会吃闭门羹。那人连犹太人的画像都不

^①赎罪日系犹太教最隆重的节日，定在犹太教历提市黎月（公历9、10月间）初十，届时犹太人请求雅赫维赦罪以重沐其恩泽。《圣经》称赎罪日为安息日。——译者

敢看。看来那是个纳粹要犯。”

两位犹太青年顿时把赎罪节忘得一千二净，扭转身拔腿便向林茨跑去。维森塔尔当时的办事处在林茨市。

“应当逮捕艾希曼。”

“你们怎么认为那人是艾希曼？”维森塔尔问道。

“那家伙有2,000只鸡，还憎恨犹太人，是个重要的纳粹分子。为何不会是艾希曼？”他俩振振有辞，反问道。

维森塔尔在书中嘲笑了这种古怪的犯罪信念。其实，这一信念同他自己的思想方式大同小异：某种神秘的信念告诉他，他一定会找到正在追寻的人。这种坚定信念来自与生活一样神秘的信念。任何事情都非偶然之结果。在维森塔尔看来，某个晚上翻阅某个案卷，这是命运的指示。失败也是命运的指示。应当为另一项使命作好准备。

维森塔尔正在法兰克福追寻一个叫舒尔兹的人。他翻开电话簿，发现了舒尔兹这个名字，其妻子名为海德龙。维森塔尔立即坚信，终于抓到了寻找许久的人。一般说来，事实总是证明他是正确的。

所有优秀的犯罪学家和新闻记者都需要这种神秘的巧合。必须深信某条线索的可靠性，才会穷追不舍。

犯罪学家仔细搜集材料，最后只导致一个似是而非的疑问的情况是少见的。维森塔尔他们的工作方法恰恰相反：先是感到疑问，然后才仔细查阅材料。当然不能排斥预感，但是要用事实来检验预感。提出疑问时要有事实为依据，要做到心里有数。

维森塔尔在这方面显露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才能。

战后最初几年，维森塔尔的预感显然是以坚实的材料为

基础的。每当警察根据他的怀疑采取行动时，很少有抓不住真正罪犯的。

赎罪节前夕，维森塔尔带着伙伴们到离阿德蒙特兵营2公里之遥的盖晓恩。他在喂着2,000只鸡的农舍里找到的不是艾希曼，而是弗朗茨·穆雷尔。

作为维尔纽斯县警察局前副局长，穆雷尔对8万名立陶宛犹太人惨遭杀戮一事负有严重的罪责。

维森塔尔为审讯穆雷尔搜集和准备揭发材料，其中有一篇证词出自一个名叫雅各布·布罗迪的人之手：一天，党卫队员们在维尔纽斯县城犹太人居住区入口处集合了两队人，一侧是布罗迪在内的有劳力的人，另一侧是即将被处死的人，布罗迪7岁的儿子达尼埃尔就在一队人中间。两队人正在静等时，孩子在人群中钻来钻去，试图到父亲身边来。

一名德国兵见此情景，朝孩子开火。

雅各布·布罗迪后来在一系列照片中认出，这名德国兵就是弗朗茨·穆雷尔。

如今，穆雷尔在他的阿德蒙特农舍里过着宁静的日子。可是当初情况并非如此：穆雷尔被捕过，并由英国人转交到了俄国人手里（维尔纽斯今天划入了苏联版图），1949年他因杀害了“苏联公民”^①而被判了25年监禁。

1955年，苏联根据协议，保证遣返全部战俘，包括诸如穆雷尔那样判了刑的，不过，奥地利得保证审判这些侨民。实际上，回国的穆雷尔回到了一直很兴旺的农庄后，成了奥

^①苏联从来不承认犹太人受害者，只承认杀害的是“苏联公民”。

地利民众主义党党员，而且还当着一位政府成员的面被任命为当地农业法庭庭长。

维森塔尔看完这个材料暴跳如雷。在他看来——在某些情况下，民众似乎同意他的看法——释放一名刚关了7年的罪犯，那是不能容忍的。可是，当局正在竭力为老纳粹们张目，为它们的仁慈向维森塔尔解释说：俄国的牢狱比奥地利的监牢严厉三倍。这样算起来，穆雷尔已坐了21年牢。即使奥地利的法院判他无期徒刑，他坐20年牢后也会获得释放的。维森塔尔拒绝接受这条十分奇怪的法律。负责此案的报告员立即打官腔说：穆雷尔是个自由人，除非有新的罪行才能重新研究他的案子。

追捕纳粹罪的猎手们是幸运的，他们几乎总能发现新的罪证：绝非是有人说的“杜撰”罪行，而是因为象穆雷尔这样的人，双手沾满了血，真正的困难倒是确定其罪行的范围。

维森塔尔叫来了17位亲眼目睹过穆雷尔杀人情景的证人。

司法部毫无反应。尽管国内外许多人强烈要求惩办，但老纳粹依然逍遥法外，一拖就是几年。

在艾希曼诉讼案之后，维森塔尔决定采取一种新的方法，即诉诸公众舆论。有人常指责他的这一做法，说什么这样做只能使亲者痛。

1963年，即穆雷尔从苏联返国近10年之后，司法部门才开始过问他的案件。一个审判团在格拉茨组成。

雅各布·布罗迪出庭作证。

开庭第四天，布罗迪和维森塔尔同坐在格拉茨的“索

恩”旅馆。

“看来穆雷尔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坐在旁听席第一排，根本不把证人放在眼里。”布罗迪说道。

维森塔尔点头表示同感。

“我向您保证，当我到达证人席时，他们就笑不出来了。我来此地不是作证的，而是为了采取行动。”布罗迪慢慢解开上衣，抓住插在腰带里的一把长刀的柄，继续说：

“穆雷尔当着我的面杀害了我的儿子。今天该由我当着他妻儿的面杀死他。”

维森塔尔想的是他看过的全部证词，他多年来头一次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克制了自己，然后对布罗迪说：

“用他们的手段我们是达不到目的的。如果您要杀死穆雷尔，那您也成了杀人犯。”

布罗迪不理解。他想的仍然只是报仇雪恨，他的眼前又浮现出儿子和杀害他儿子的人的形象，暗自咬牙说，只有一条惩罚的办法：杀死穆雷尔。

维森塔尔想起了他的亲爱的小女儿。他哽咽着说：

“布罗迪先生，当我看到有关您宝贝儿子的不幸的证词时，我也流泪了……”

雅各布·布罗迪听了此话将长刀扔在一旁，不禁嚎啕起来。第二天，他在法庭上用嘶哑的嗓音发表了证词。几天后，审判团宣布判决：无罪。弗朗茨·穆雷尔在雷鸣般的欢呼声和雨点般的花瓣中离开法庭。

1963年，奥地利最高法院撤销了这个判决。从那以后，维森塔尔一直没有停止过呼吁重新开庭审判。可是检察院永远埋葬了这个案子。

主持正义

维也纳进行着一场诉讼，事情又显得荒谬得离奇：人们看到，西蒙·维森塔尔第二次扮演了为被告纳粹分子的生命安全充当卫士的角色。

受维森塔尔保护的人名叫弗朗茨·诺夫卡，新闻界给他起的外号叫“死亡调度员”。在部队长期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即使是最原始的交通工具——的时候，诺夫卡竟然能周复一周地搞到火车，把第三帝国四面八方的犹太人运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去。

维也纳的法官们对他的案情审理了3次：第一次判他8年徒刑，第二次释放了他，第三次判他9年徒刑。服刑6年后，鉴于他“表现良好”，提前释放了他。

过了一些时候，从英国来了位55岁的犹太作家，在鲁道夫广场找到了西蒙·维森塔尔的办公室。此人是个单身汉，孤儿，父母亲早先被装上了诺夫卡的火车运到奥斯威辛去了。作家身上带着武器，郑重地说：“需要有人采取行动。不能允许奥地利人让诺夫卡坐6年牢就放了他。世界都会承认，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可是，“追捕纳粹的猎手”西蒙·维森塔尔为纳粹罪犯辩护说：既然他赎了罪，他有权活下去。“复仇不能也不该是伸张正义的手段。如果我们想有别于纳粹分子的话，我们应当接受法院的决定，即使我们认为这样的决定是可恶的、不公正的。假如您坚信诺夫卡是个杀人犯，那么您怎能打算自己去做杀死诺夫卡的凶手呢？”

这条基本原则说明了维森塔尔为何如此小心谨慎地办事，在不征求有关合法当局的意见的情况下，从不擅自行动，即使有跌入官僚主义泥潭的危险也在所不惜。当他得知一个新的事实、一份新的揭发材料、或一条新线索的时候，他总是有条不紊地先报告维也纳内政部有关部门和设在联邦德国路德维希堡的“调查纳粹党罪行司法行政中心”。

也许有人会不无恶意地说，他在一切问题上唯当局之命是听，然后公众舆论又把功劳记在他的名下。这里举一个维森塔尔活动的典型例子：专门记录大屠杀情形的以色列档案馆告诉维森塔尔，它将一份有关俄国某地发生的屠杀的证明材料移交给了路德维希堡调查纳粹党罪行司法行政中心，据说一些奥地利人参与了那些屠杀罪行。维森塔尔将以色列档案馆的信的复印件送呈奥地利内政部，并建议向路德维希堡要一份有关材料的副本。对于维森塔尔的这个要求，路德维希堡指出，它还没有接到奥地利人对这个问题的任何调查报告。维森塔尔将路德维希堡的信函的复印件送达以色列档案馆，同时询问奥地利当局，为何对德国方面的调查不感兴趣。事情就这样延宕着。西蒙·维森塔尔进行的著名的“特务活动”，其实只不过是同优柔寡断的办公室主任们、不学无术的档案管理员们，或同始终要求“更多细节材料”的态度迟疑的机构展开的一场无休止的笔墨仗。

说实在的，维森塔尔的功绩并不在于他锲而不舍地追寻纳粹罪犯，而在于他起码30年来用不间断的通信方式，阻止了奥地利当局一劳永逸的放弃搜捕纳粹罪犯的活动。

搜寻战争罪犯的工作从一开始就跟其他棘手的活动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吧,发放纳粹主义受害者证件,特别是努力帮助遭受迫害而四散欧洲各地的人返回家园,阖家团聚。

当新来的部队接替目睹过当初兵营情况的盟军时,他们简直认不出昔日受迫害的人们了。美国人对第三帝国怀有特殊的偏见:他们原先想象中会遇到桀骜狂暴、任性野蛮的人,但是他们见到的人工作起来跟他们美国人一样努力,而且还知道淋浴设备和抽水马桶这些先进文明的无可否认的标志。这样的人不可能用犹太人的头发来制作床垫,这是不可想象的事。其实,在他们眼里,西蒙·维森塔尔比许许多多德国前军官们更为陌生,因为这些军官曾为美国反间谍局服务过。

美国人着眼的是未来,而西蒙·维森塔尔正忙于处理过去的事,美国人同维森塔尔之间的鸿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他同那些“绝无排犹思想的善良的人”的一名优秀代表进行了一次友好谈话之后,他们就正式决裂了(那些美国人自认为没有排犹思想)。维森塔尔的新任上司埃塞克斯先生接替了塔拉库齐奥上尉的工作,他到任不久后对犹太族合作者笑容可掬地说:“你是个聪明的家伙。”他停了片刻接着说,“象你这样的人在美国那一边很容易功成名就。我告诉你一件事:在我们眼里,有红灯管制交通,其余的一切都掌握在犹太人手里。”

维森塔尔蓦地站了起来,一声未吭出了办公室。

数星期后——1947年初——他向当局宣布,他成立了“犹太文献中心”。

“情报网”

我们要谈的是西蒙·维森塔尔真正拥有一个“情报网”的短暂时期：30来名死里逃生的犹太人从各个不同的集中营走到一起，帮助维森塔尔汇集关于纳粹罪行的情报材料。

资金少得可怜：他的合作者们以从前的集中营在押犯的身份为他工作，眼下仍在原集中营里住宿就餐。至于每月约50美元的邮费和电话费，由日内瓦的犹太人律师阿隆·西尔贝尚慷慨解囊。

情报网的组织十分简单：在每一个集中营派驻一个人，配给一台打字机和一些纸。这个人把被押的人一个个叫来，让他们叙述自己的遭遇。这样收集到的材料汇总起来，分析整理后列出地点、事件、人名等清单，至今仍然是维森塔尔档案室中的关键材料。在地方当局陷入混乱，不知从何着手的时候，维森塔尔就复印一份材料，寄给有关机构。当时除了他的情报网外，没有任何机关处理此类事情。就这样犹太文献中心渐渐地名扬全欧洲，它的唯一出版物受到人们的欢迎。

随着在押犯们不断回国，维森塔尔的30名合作者不久就各奔前程了。可是名声已经远扬，全世界都知道奥地利有一个叫维森塔尔的人，正在追查纳粹罪行，人们可以给他写信，他则有信必答。

从这个角度看，维森塔尔永远支配着一个国际情报网，其规模比克赖斯基等人指责他时所描绘的那个情报网还要大。生活在世界各个角落——从以色列到南美州，从波兰到土耳

其——的希特勒政权的受害者和敌人都是西蒙·维森塔尔潜在的合作者：通过通信进行合作。

他们的信封上有时只写这样几个字：寄奥地利，维森塔尔。

维森塔尔的大部分时间用来拆阅信件：他从中摘取检举材料或某些线索，然后转交给有关当局。他的工作得益于他的惊人的记忆：他可以背出两年前偶然在一张名片上看到的电话号码。他能够开列出参加大规模游行的人的名单，说出他们当时的穿戴。尽管他每天要写20来封信，收阅的信比这还要多，但是几年后他能背出某封信中某几段话，并能立即指出这封信放在哪个档案柜里。

不过，乍看起来此人不爱整理房间：他的办公室里到处堆满了剪报、书、复印件和信，多好的女秘书也难以为他整理出头绪来。尽管如此，他仍要求伙伴们能够有求必应，随时拿出他要的材料来。如果谁要是面对堆积如山的资料面有难色，他就会暴跳如雷。他立即亲自动手，在材料堆里摸上一两次，要找的材料便出现在他的手里。由此可见，具有魔力的“猎手”形象决非是毫无根据的杜撰。这种才能亦是他取得辉煌业绩的唯一秘密，因为所有有关机构所掌握的“材料”远比维森塔尔的多，但成就少得可怜。另外，有关机构还拥有一批训练有素的司法警察，而维森塔尔的“特务们”都是业余兼职者，他往往从熟人中雇用合作者。如果一位朋友跟他说，一名大学生假期里想挣点学费，维森塔尔“办事处”就录用这名学生。他的女秘书也是登广告招聘来的。

正如伦敦警察厅刑事部简直连一个普通的警察局都不如一样，维森塔尔的“情报中心”和他的“特务网”都是名不

副实的。不过，行政部门的档案材料整天在睡大觉，而维森塔尔那里的材料却能得到充分的利用。“档案材料象快速冷冻物一样，只有解冻后才能使用。”

维森塔尔的大脑能够随时将所有储存起来的信息建立有机的联系。当一位退休教授从纽约写信告诉他，一个被伙伴们称为“京特”的家伙向一群集中营在押犯开过枪。维森塔尔读完信后立即想起，战后有人发现过一个新纳粹分子的营地，那里有一个叫京特的人吹嘘自己在东方建立过多么显赫的功绩。同样，维森塔尔只是在某个地方看到过属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卫队的一位党卫队员的名字，就马上想起10年前审理利沃夫大屠杀案件时听到过这个人名。某个证人提起的某人的职业、出生地或口音等情况，会永远铭刻在维森塔尔的记忆里。他可以象电脑一样随时让这些信息显现在脑海里。

正因为他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他无法象大多数人（和受害者）那样将以往的恐怖情景深埋在心灵深处被遗忘的角落里。那一幕幕回忆不管有多么痛苦，随时都会在心灵里浮现。维森塔尔的记忆被人称为感光板式的记忆：他无法忘记过去。

电脑的任何一点电能过载都会自动引起新的程序的出现。同样，维森塔尔脑海里经常浮现的恐怖阴森的情景，有时会交融成一部电影，连他自己也无力经受这一幅幅画面在脑海里接踵重现。今天，他还时常在深夜嘶吼着惊醒。

维森塔尔不能，也不愿忘记他所经历的事和所了解的一切。那些等待死神到来的人的面容，他至今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那些跌落在张着血盆大口的万人坑里的人的面孔，他怎能从脑海里抹去呢！他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呀！

人们到维森塔尔的办公室见他，向他倾诉内心的痛楚。

然而尽管岁月流逝，他的热情仍不减当年，人们为之而震惊。听到如诉如泣的话语，他禁不住潸然泪下；他的同情仍是深沉的好恶感的结晶。

总而言之，这是他取得赫赫业绩的又一个秘密。他不是在做案，也不是在处理案卷，而是在体验材料中所描述的一个个命运。战后向政府有关当局提供材料的见证人得到的是一份谈话记录。然而在维森塔尔办公室，他们为事实作证。前来同他谈话的人——老纳粹不在少数——感到多年来压在心头日益沉重的负担顿时化解了，良心上一下子轻松了。

他可以跟某个人畅谈一整天，而这个人的证词也许对他的调查毫无意义。他曾同来访者一起失声痛哭——这样主人与客人都会感到轻松些。

维森塔尔不喜欢追抚往昔。可是与众人不同的是，40年过去了，他仍然抹不掉印在脑海里的死者的形象，无法象忘掉一场恶梦一样忘掉那些难友。他们的形象常常浮现在他的脑海，正象他自己呆过的集中营永远铭刻在他的心头一样。

在别人的记忆渐渐淡漠的时候，他却在不断地回忆过去。他有一个文件夹，里面塞满了那个年代留下的极其惨不忍睹的照片，他经常拿出来看看：“它们提醒我为何活着。”

心理分析学家们把他当成受虐狂。可是，这不正是历史上同情他人痛苦的人们的共同特点吗？

引 言
序 言

1. 几度临难却生还…………… (1)
2. 报仇雪耻未为晚…………… (7)
3. 邂逅相遇竟是怨…………… (16)
4. 糖精行动建奇功…………… (26)
5. 盘根错节赦德萨…………… (37)
6. 行家里手葬异域…………… (50)
7. 寻踪觅迹数万里…………… (60)
- 附：天涯海角捕凶犯…………… (81)
8. 以尸论价甚荒唐…………… (100)
9. 逃犯求婚遭冷遇…………… (111)
10. 杯弓蛇影难得宁…………… (122)
11. 生死不明悬疑重…………… (133)
12. 销声匿迹无影踪…………… (150)
13. 冥顽不化千秋罪…………… (161)
14. 道高一尺魔高丈…………… (166)
15. 花柳病人希特勒…………… (167)
16. 阴差阳错一场空…………… (171)
17. 和蔼可亲女魔王…………… (178)
18. 张冠李戴错上错…………… (206)
19. 改头换面罪难逃…………… (219)
20. 托洛茨基死他乡…………… (227)
21. 红十字会护凶犯…………… (233)
22. 官司一场枉定罪…………… (265)
- 译者的话…………… (279)

1. 几度临难却生还

1944年7月中旬，苏军推进到利沃夫。在我们被关押的集中营里，可以清晰地听到战斗的喧嚣：每晚11时左右开始轰城，这轰炸愈演愈烈，党卫队员们只好放弃了望台，躲进掩体。

我们中身体状况尚好的人见此情形，决定伺机越狱。我们选定7月17日夜为行动的时刻。不出所料，11时左右大炮开始轰鸣，我们趁着漆黑的夜幕冲出木棚。我的身体极其虚弱，勉强能站立起来。如果没有劳拉的搀扶，我想我是无法走动的。劳拉也是个犹太人，她有一位姐姐，别人都以为她是波兰人，我后来就躲藏在她家里，跟劳拉和她的姐夫约瑟夫·布施生活在一起。不久我们发现，重新关进了我早在1943年逃离的雅诺夫斯卡集中营。

我们摸黑且探且行，劳拉扶着我的手，生怕我落在后边掉队。我觉得跑到铁蒺藜围栏的地方用了许许多多时间。我们的人数相当多，但谁也没有发现我们，也未听见我们的声音，因为大炮的隆隆轰鸣掩盖了任何其他响声。至于党卫队员们，有的已经钻进了掩体，来不及逃离了望台的，也一个个抱头卧地，隐蔽自己。要知道，留在后方的党卫队员一般说来都不是勇敢者。

我们中一个人——我记得是莫尔道厄——用钳子在铁蒺藜围栏上剪出一个缺口，刚好够一个人钻过。当然，最好是打出一个更宽的通道来，但大家的神经都不太坚强，在这紧张的情况下考虑不了那么周全。于是，我们一个接一个艰难地爬出缺口。劳拉是第11个，她帮我从狭窄的缺口钻出去。可是哨兵发现了我们的行动，立即向我们开枪：“快跑！快！”我向已经在围栏外的劳拉和其他人吼道。接着，我使出浑身的力气以最大的速度返回我的木棚。

大炮停止吼叫，看守们把我们叫出牢屋，命令我们列队等候点名。党卫队员们抬来两具尸体放在我们面前，那是我们的同伴，在越狱时被击毙的。连同死者，在押的人总共是27名。我们深信，几小时后，我们就是27具尸体。

我们是这个即将撤退的集中营中最后一批在押犯。看守们已经遭到了惨重的损失，但了望台里的党卫队员的人数仍然是我们的两倍。他们把机枪瞄准我们，让我们走进两行铁蒺藜围着的“羊肠小道”，小道的末端是大坑——犯人们在倒毙之前自己挖的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走运的，因为我已不是头一次走进这“羊肠小道”了：一年多前，我曾在一队犯人中走向这样的墓穴。突然，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果然有人在找我：原来是东方铁路局修理厂的监工头科尔劳茨要我回去画东西，就这样救我于死亡的边缘。现在我又站在走向死神的队伍里。我们中有几个人支撑不住自己，蹲在坑边不动：昏厥了，或者是害怕了。还有一些人竟哭了起来。

战争结束，数年已过。那一天跟我站在一起的伊萨克·勒曼向我回忆说，当时我曾安慰过哭泣的人，并对他们说，

不要痛苦，虽然我们活不长了，但战争已经胜利，我们是胜利者。我也许还说了些哀婉动人的话，但是已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勒曼的回忆叫我大为吃惊。

也许当时说话时我的思绪早已不在那里，而是飞到我妻子身边去了。我不知道她的下落，连她是死是活也不知道。说的话并非出自我意识，就象教堂里人们喃喃祷告一样，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说的究竟是什么。

党卫队员们一直把枪口对准我们。不一会儿，一名军官走过来命令别动队开枪。

我们等了几个小时，不惊也不慌：在集中营，我们的时间就是用来等待死亡的。集中营已经乱作一团。关押在第三帝国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只能对一件事坚信不疑：等待的结果是死亡。

已是上午10点。我们站不住了，一个个躺在地上。党卫队员们也不来干涉，就好象人们在绞刑架下赏给死犯最后一支烟一样，他们都舒舒服服地坐在坑边休息，坑里已有数百具尸体，上边草草地覆盖了一层土。这里露出一只胳膊，那里翘着一条腿。我记不起当时我们心里究竟是什么滋味。突然，党卫队纵队长瓦尔佐格走了过来。也许给我们带来了某种解脱：他可能会下令开枪，终于结束这生与死之间的煎熬。也许恐惧会象中风一样占据我们的大脑，使我们忘掉这尘世的一切。我也说不清……命运之神是仁慈的，它给行将死去的人送来了神经错乱、昏厥，或者干脆叫他们失去知觉。也许那种时刻太叫人痛苦了，因此后来我们都不愿意追忆这段时光，我们的感情和思绪拒绝反映那时的情绪。我们等着瓦尔佐格的命令——“开枪！”——以便在恐惧的烈

火中把自己烧成灰烬。

“加利西亚警察和党卫队首领卡兹曼决定饶你们一条命。”瓦尔佐格说道，“你们回集中营去，以后随部队一起撤走。我们要炸掉这里的仓库和弹药库，不让它们落入俄国人之手。在此之前，你们每个人都要带上想带的东西。我们要走很长的路，你们需要备好干粮。”

我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也许是——我们既担心这一点，又希望如此——我们都已发疯。一切都是我们胡思乱想的结果，“羊肠小道”，在公共墓穴旁的等待，以及整个集中营和那个时代都不过是幻想中的事。也许是我们已经一命呜呼，而死后仍有思想，我们可以想象自己已经得救。我认不出集中营的路：我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神色慌张地踉跄而行，天旋地转，不可捉摸。周围的景色模糊不清，时而隐现在远处，时而渐渐靠近，最后又渐渐隐去。我简直象个酩酊的醉汉，已不再属于我自己，我从外界来审视自己。我们终于恍恍惚惚地抵达集中营所在的山丘，懵懵懂懂地进了食品储存室准备干粮，就象被施了催眠术的人一样机械地服从命令。

我在一个架子上抓起一只白铁盒，跌跌撞撞地回到木屋。我身边的一位伙伴拿着一只圆形大面包，而另一个则把一棵白菜紧紧地抱在胸口。看得出来，他们的神志比我的要清醒些。突然，一名党卫队员走到我们跟前。他年轻瘦削，帽子斜压到耳朵下，指着我手里的铁盒问：“喂！你在那里藏着什么好东西？”我打开一看，是一把五颜六色的糖果。党卫队员命令我将糖果盒放在地上。他身上也背着东西，是一桶汽油。他慢慢地打开桶盖，品尝着他将对我的恶作剧的

快意：他在糖果盒里注入约半公升汽油。“愿你感到这糖果的味道会更好。”这时我如梦初醒，回到了现实之中。

在集中营里，我已不是第一次遇见这位党卫队员。有人说他是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名叫里希克。他身边几乎总是带着一条德国狼狗，让它去咬饿得半死不活的囚犯，从中取乐。象他这样的人，一定对今天早晨免我们一死这件事憋着一肚子的火。他们一定会把此举说成是软弱的表现（事实倒确实如此），根本不能同意让我们一天早晨就陡升到人的行列；我们这些犹太人直至那时一直是爬在树上的松鼠，可任人们随意杀戮。当里希克不能杀人时，他总感到缺了什么东西似的六神无主。

数小时后，我在木屋前又见到了他。他带着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名儿童向我们走来。我们以为他们是来同我们集合的，可是他们匆匆走了过去，消失在厨房后边。

从那边传来了几声枪响，一会儿，里希克独自一人走了回来，其神情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仿佛只是击毙了3只松鼠。受害者是一对犹太夫妇及他们的孩子，他们早先躲在一个波兰人家里，被人告了密。正当俄国军队开进利沃夫的时候，警察将他们押进了集中营。其余的事就交给了里希克处理。

20几年后，我和检察官罗尔夫·西希廷到斯图加特。我见到一个犹太区和利沃夫党卫队员的名单。一个名字在我眼前跳跃，引起了我的注意：“维克托·里希克，苏台德地区德国人”。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立即向卡尔斯巴德及周围地区的苏台德德国难民机构打听——毫无结果。又过了一年，西希廷得到消息说，里希克的母亲

还活着，生活在德国，他自己很可能流亡到斯堪的纳维亚某个国家去了。人们果然找到了老妇，询问她——自不待言，结果依然是徒劳一场。最后我亲自带着里希克的照片率领几位朋友飞到了瑞典。我查阅了各大城市的所有电话簿，又一次白费精力。那时的瑞典，报纸刊登了不少有关他的文章，指出他酷爱狗，他身边肯定又养了一只德国狼狗。有关德国狼狗的饲养者的情报雪片似地飞到我这里，那些养狗者都是无辜的好人。一丝一毫里希克的消息也没有。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深信里希克一定生活在瑞典，冒名活得好好的。究其渊源是我自己希望他依然活着：为的是能够重新找到他。找到他又是为了看一看他的脸，看看一个能够杀死几天后自由之门就要为之敞开的3个生灵而眼睛眨也不眨的那个家伙的脸。

2. 报仇雪耻未为晚

要是在大街上相遇的话，我真认不出他来呢。真的，自从我们在茅特豪森集中营初次见面以来，40个春秋过去了。如果不是他经常在报上见到我的照片的话，他从我面前走过根本不会看上我一眼。

“我常常向孩子们说起您。”他说话的声调就象当初我跟他说话时一样战战兢兢。“我向孩子们叙述人们将您架到我在茅特豪森的办公室来的情形。现在我仿佛依然看见您站在那里，站在我面前，就好象昨天发生的事似的：两个人架着瘦骨嶙峋的您，身上挂着的褴褛布片，在您周围飘动。您在用眼睛说话。”

这眼睛，我当时的眼睛……一天我偶然得到一片破碎的镜子，我第一次照见了眼睛：在一张皮包骨的呈三角形的脸上，所能见到的只是这双眼睛，那张嘴成了一个开口的伤疤。

“他好不了啦。”我听见译员对美国军官们说。可是，我不仅决心要好起来，甚至还要说话。正是为了这一点我才拖着疲惫的身子从我的木屋来到美国司令的办公室里，几天前，这间办公室的统治者还是德国司令齐雷司呢。我在两位难友的搀扶下来到这里，其中一位是医生，他紧紧地支撑着

我，不让我跌倒脑袋着地。人们拖过一把椅子放在我身后，然后小心翼翼地扶我坐下，把我的双臂搁在面前的桌子上。其实，支撑我的人并不费力，我的体重连50公斤也不到。我艰难地缓过气来后，终于开口了：

“有人打了我。”

“谁？”

“监狱的一位书记员。”

“一名党卫队员？”

“不，一个囚犯。”

我面前的美国军官困惑地注视着我。他心里一定在想：瞧这个穿过地狱的人，虚弱得勉强能站住，竟然为了一记倒霉的耳光翻过山丘前来告状。打他的人根本不是纳粹分子。他不理解：正因为第三帝国已经崩溃，那耳光才叫我格外受不了。因为我已决心永远不再让任何人动我一根毫毛，永远不。

40年后，我又出现在这位美国军官面前。人们在洛杉矶为1945年解放军举办了一个晚宴。作为某集中营的美国司令，理查德·塞贝尔上校应邀赴宴，我以茅特豪森集中营在押犯的代表身份出席宴会。1945年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敢握他的手亲吻。可是这一天，我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理查德·塞贝尔上校曾命令那个打我耳光的书记员作出解释，以此向我说明权利和正义在营内得到了恢复。他无意中帮助我在我的生活中注入了新的意义：为犹太区我的伙伴们，为集中营里我的难友们伸张正义，向凌辱、拷打过他们或杀害了他们的人讨还血债。

这个决定不是朝夕间作出的，它是一个漫长过程的结

果。尽管从前看守我们的人一个个都逃的逃，抓的抓，我们仍然生活在集中营里，依然每天都有伙伴去世。除了那些难以救治的人死去外，还有一些正在受到救援的人相继离开人间：美国人分发了罐头食品、肥肉、咸牛肉，这对习惯于每天只享受400卡路里的人来说实在是太丰盛了。饥肠辘辘者向食物猛扑过去，但在地狱中劫后余生的人恰恰倒毙在天堂的大门口。

又得挖掘新的墓穴。我躺在集中营的床上，透过窗子看到美国兵把一批批身穿百姓服的人领进营来。他们是纳粹罪犯，美国人命令他们掩埋尸体。这些人没有勇气看一看面前的惨状，不肯触摸赤裸的死尸。他们戴上手套，一闻到充斥集中营的腐烂臭味就恶心。好些年里他们一直生活在集中营附近，他们闻着焚尸炉喷散的刺鼻的烟气，他们看见由皮包骨的人们组成的长长队伍出发去干活；在附近的客店里，他们听到喝醉了酒的党卫队员们大声吹嘘以往的罪恶业绩。现在，他们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来凑近我们，试图告诉我们：他们什么也不明白，他们发誓之所以加入纳粹党，完全是被迫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他们心里从来都是厌恶希特勒的。其中有一位老党卫队员甚至吹嘘说，他数月前就知道他那个街区的神甫偷听英国电台，而一直没有告发他。再过一年，这位党卫队员还可以把自己说成是一名货真价实的抵抗战士咧。

我第一次发现这些人骨子里是些懦夫。他们非但不敢正视自己的罪责，反而抵赖，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到头来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犯了罪。

我们中谁也没有多大兴趣答理这些家伙，不过起码有一

件事是清楚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对我们的遭遇不会吃惊，他们将怀疑这样的遭遇会是真的。

每位劫后余生者都是见证人，而且有义务出来作证。

总而言之，这起码是死里逃生的犹太人的义务。我自己留得一条命，而那么多的人——比我更有才华、更加聪明、更为正直的人——却惨遭非命，这件事常常使我感到命运的不公正。为了取得良心上的平衡，我必须为死者主持公正。

于是，我去找塞贝尔上校，要求他准许我坐到美国人努力解决几乎不可解决的“战争罪”问题的办公室里去。在那里工作的大部分军官都很年轻。他们为自己的发现而惊愕，难以确定责任和罪过。有些人勉强能区分党卫队员和普通德国士兵。不过，他们在努力理解。他们运用法治国家的方法去分析荒谬绝伦的不公正的国家。他们仔细检查分析，倾听各方意见，记下各次谈话。这是一项旷日持久的艰难的工作，当然，许多罪大恶极、老奸巨滑的罪犯可能会漏网，但这种审查方式使人恢复了对权利的信心。我对那些青年军官感激不尽。

我在那里坐了好几个钟头，听他们谈话。一位军官对我说话了，他询问我的职业、家庭情况，问我出生在哪里，尽量跟我说些宽慰人心的话：“您首先去疗养院住一段时间，把身体养好，然后回波兰您的家，您要重建家园。”

“我的家？”我不禁问自己，“我的家”在何方？“家”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是家庭，朋友，屋子和父母吗？这一切我都没有了。没有一个亲人活着，甚至连供我去哭泣凭吊的墓地都没有。家人和朋友的坟墓就在我的心中，只要我活着，它们的坟墓就将永远构成我自身的一部分。对我来

说，波兰只是一片废墟。我怎么去那里生活呢？我亲手盖起的屋子跟其他房屋一起坍塌了。象我这样一个离井背乡、四处漂泊的人已失去了生活的一切根基，这种人用不着家园。

“我想我永远不再建立家园喽。”我慢条斯理地说。我当时知道，我永远不会重操旧业了。我有了新的爱好：为活在我心灵深处的亡灵们继续活下去。我必须去“战争罪审理局”工作。

一辆卡车从林茨运来一车衣服，大家把衣服卸在一间木屋里。这些原先准备撕成破布的衣裳，是从纳粹的社会救济会仓库里搞来的。这就是我们的头一批便服。我选的衣裳长短正合适，至于肥瘦……裤腿肥得可以穿进两条腿，幸好我找到了一条旧皮带，把裤子束在腰里，形成了数不清的褶儿。

在去分发衣裳的木屋的路上，我看见草地里有一个东西在闪光。我蹲下去一看，是块碎镜片：它的大小刚够照我的眼睛和鼻子尖。这双眼睛后来就一直印在塞贝尔上校的记忆里。在此以前的几个月，我曾画过几次自己的眼睛，我在随便捡来的纸上用铅笔头画过我的脸：那是一张瘦得呈三角形的脸庞，上边并排着两只眼睛，下边是尖尖的下巴。可是当时我没有看见自己的脸，因为我们没有镜子。我抚摸过这张脸，又注视了难友们的脸：他们都有相似的眼睛。

我头一次可以安安静静地端详自己的脸，我很少见到这么可怕的面庞。于是我暗想，我的这副样子，哪个办公室的人都不会要我，到战争罪审理局去定会吃个闭门羹。无论如何我要想法变得好看些，千万不能叫人们感到我马上就会一命呜呼，必须叫他们看到我活得很好。

翌日，我去吃饭，在木屋前看见一张别人扔弃的红色包装纸。我喜出望外，当时没有风，我弯腰不费力气地把纸捡了来。第三天早晨，我对着镜子用红色包装纸擦脸，邻床的伙伴出神地看着我。他是比利时人，正等卫生队的车把他送回去。不知他能否经得住路途的颠簸。

“你要去见未婚妻？”他问我。

我回答说，不知道这未婚妻会不会令人满意。我怀着喜悦的心情诉说了自己的计划：我要去战争罪审理局工作。

比利时人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个机构。我向他介绍了一番，我的激情感动了他：“很好，为我们大家好好干，为活着的人也为亡故者好好干。”我从他脸上看出，他怀疑自己也许不久就要成为亡故者中的一员。

“你会治愈的，阿尔贝。”我想了一下又对他说，“你家里人会好好地伺候你。在回家之前，把你的地址告诉我，日后我去看你。”

阿尔贝不以为然，可是他还是勉强地笑了一下：“可以。你不要再这么化妆了，你这个样子不能到外边去。最好还是去洗把脸。”

他没有错。我在小木桶里设法洗去脸上的红颜色。结果相当令人满意。

“维森塔尔，您怎么啦？有人打您啦？您的脸通红通红的，连下巴颏也是红的！”

我在曼恩中尉的办公室，想参加一次对老党卫队员的审讯。可是我的这副模样叫我窘迫不已。

“不，不，谁也没有打过我，是我自己弄脏的，就是这样。明天就不会再有红颜色了。您能等我几分钟吗？”

“可以，半个小时吧，请便。”

最近10天来，我甚至有了一块手帕。我用它蘸了水，开始使劲地擦脸颊和脖子。然后我把注意力放在由两名军警刚刚押进来的一个党卫队员身上。尽管他一再抗议，军警们仍拒绝解除他腕子上的手铐。

“请到这边来，维森塔尔。”中尉问我，“您刚才想跟我说什么？”

“嗯……您解放了我……您救了我的命。可是这条命，我不知道如何派上用场。我不为任何人活着，也没有人跟我一起生活。我看到了您在这间办公室里做的事，我很想跟您一起干。我想这会给我的生活注入新的意义。我在各种集中营、犹太区和盖世太保的监狱里度过了4年，见过许多事情，我有极好的记忆力。我可以帮您找到罪犯，向他们提切中要害的问题，审讯他们。我不问您要工资——这对我来说是证明我还活着的一个方式。”

我使出了全身解数去说服中尉。他只向我提了一个问题：

“体重是多少？”

我撒了谎：

“60公斤。”

“看不出。请不要误解，您首先需要的是恢复体力。”

他向我投来一丝微笑，以缓和当时的气氛。

“我能再来吗？”

“当然可以。”

“在这里见到的情形有助于治愈我的病，它比任何灵丹妙药都灵。我不会腻烦的。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当然明白。可是，您何不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写出来呢？这对您有好处。”

“您的意思是要我写一封信？”

“为何不呢？我感到这是个好主意。”

“这信该寄给谁？”

“我的上司，集中营司令塞贝尔上校。”

这下我可有事干啦。我象先前设计建筑图那样构思我的信。我先打腹稿，以便做到纲举目张。信中谈到的人，我尽量把忆及的有关情况一一写清。我知道我要叙述的人和事，任何一点情况都会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说，我写到了一个铁路员工的地址，指出此人当着我的面杀死了一名老妪。这地址是铁路员工亲自在我劳动的车间里写在一个寄给他家里的小包裹上的，我看见后记了下来。至于另一些人，我大体上知道他们来自什么地方。集中营里的一些雇佣者和在押犯同党卫队员有联系，从他们那里我打听到了党卫队员们的情况。我没有忘记这些情况。在犹太区也一样，人们知道看守们的来历。在我同死神玩捉迷藏的4年里，我的脑海里刻下了许许多多情况。渲泄这些情况并将它们用文字记录下来时终于来到了。

我坐在木屋前的阳光下，手握铅笔纸枕膝，边想边写，记下一系列姓名和事件。关于我呆过的每个集中营，我都要写上好几页，题材都是一个。在一大沓信纸上我写了91个人名，必须向这些家伙清算血债，方解我伸张正义之渴。

3天后，信写完了。我是用波兰文写的，没有副本，因为手头找不到复写纸。数年之后，当我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看到我的信的英文本时，我发现译文是相当准确的。

几天过去了，我又去见曼恩中尉。他已经看完了我开列的名单。我问他：

“现在您愿意要我吗？”

“当然喽。”他肯定地说道，“您早已为我们工作了。”

3. 邂逅相遇竟是怨

1947年初，上奥地利州政府将林茨市哥德大街63号临时办公楼中的一间屋子交我使用。我的邻居名叫瓦西尔·斯通西基耶，这位医生占两间屋子，负责帮助乌克兰难民的组织工作。他一见我马上过来作自我介绍，告诉我他从前在莫斯蒂一维埃尔基小镇行医。他跟德国人发生了点麻烦，德国人就先是发落他去利沃夫，然后又让他去奥斯威辛，最后又让他去茅特豪森，确切地说，他最后进了附近的埃本塞集中营。总而言之，他在集中营里呆了3年半多的时间。

这席谈话令我吃惊，因为我还是头一次遇上乌克兰政治犯。一般说来，乌克兰人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德国人一边，同他们沆瀣一气。尤其是乌克兰警察，自从1941年6月末7月初德军开进加利西亚后，他们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这些人大多数在苏联的辅助警察队中干过，当苏军于1939年占领这块地方的时候，他们所依靠的力量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即农业劳动者、农民和工人，他们的思想较接近苏军。后来，苏军撤退，不到24小时，这些辅助警察又投靠新的主人，为纳粹党人效劳，甚至成了他们最忠诚的助手。

诚然，反对苏联人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大有人在。不过，这种对立恰恰把这部分人推入了德国人的怀抱，他们希

望借德国人的力量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十分明显，早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前，他们就跟纳粹有来往，因此，他们早就知道德国人正在暗中策划着什么。正因如此，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及时地逃到了德国人占领的波兰，然后又随德军返回祖国，向共产党报仇。

至于组成这个地区上层阶级的犹太人，乌克兰人历来对他们恨之入骨。就在1941年6月22日德军入侵前几天，人们听到电台用乌克兰语宣布，加利西亚很快就要解放，希望居民们“不要用鲜花来欢迎我们，而要用犹太人的头来迎接我们。”

由德国人匆匆武装起来的乌克兰辅助警察，有时只要从蓝黄两色的袖章就能辨认出来，他们在加利西亚构成了德军和党卫队的先头部队。他们竭力执行的使命就是召集起犹太人和波兰知识分子，交给纳粹，后者只需尽举枪之劳便可把这些无辜者斩尽杀绝。

鉴于乌克兰人同德国人有如此紧密的关系，集中营里出现乌克兰人就成了件不寻常的事情。为数寥寥的乌克兰囚犯其罪行一般都是触犯了德国人入侵时确立的经济法：比如说，秘密酿酒，或私下屠宰牲口。想到这些，我便决定利用跟斯通西基耶医生初次见面的机会，约他聊聊。我们果真聊了，但是在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聊的。

一天，一对夫妇来看我。他们的名字分别叫阿道夫和安托瓦妮·魏勒。他俩正在寻找幸存下来的亲属，希望看一下我的办事处接到的从解放了的欧洲四面八方投来的难民名单。我们按老一套乘此机会询问他俩在占领时期的生活和幸存下来的情况，问他们是否还记得迫害过他们的人的姓名。

就这样我们得知，这对夫妇跟斯通西基耶是同乡，也是莫斯蒂—维埃尔基镇人氏。这个波兰小镇当初有1,500名犹太人。1939年俄国人开进那里时，他们让一名乌克兰人当镇长，将地方乌克兰辅助警察交镇长指挥。从那以后，乌克兰辅助警察以反犹排犹出了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辅助警察是德国政策的预兆，他们搜捕乌克兰和波兰的民族主义者，以及犹太人。6月22日，德军发起攻击，苏联人来不及撤除监狱，于是便消灭囚徒，连审讯都不进行……

德国人巧妙地利用了这种背景。他们刚到不久，本可以放任乌克兰人随意“肃清”犹太人3天。奇怪的是，苏联人扶植的镇长销声匿迹一个短时间后又露面了。他回到镇公所，但这一次打的是德国人的保护伞：“此人是斯通西基耶医生，一个排犹反犹的铁杆分子。”

这个名子显然使我一怔。我急忙请魏勒夫妇详细谈谈他们了解的这个人的情况。事情比我最坏的怀疑还糟糕：阿道夫·魏勒告诉我，斯通西基耶不仅放纵乌克兰辅助警察倒行逆施，而且还亲自参加了一系列残酷的活动。“我们听说，他仗着手下的警察，端了数十个犹太人的家，将他们押进附近的一小片林子，即巴布卡森林里。他强迫犹太人挖坑，然后让他们排立在坑边。乌克兰人开枪扫射，直到所有犹太人倒在坑里为止。据说斯通西基耶从树林返回时，他从头到脚都沾满了血迹。”

那么，如果这位斯通西基耶真是我的邻居的话——看来是可能的，一是这个名字实属罕见，另外我从一开始就本能地怀疑此人——他又是怎样进入德国集中营的呢？

魏勒夫妇同样掌握着这段历史的内情：德国人在莫斯蒂

—维埃尔基镇有一个重要的战利品仓库，那里堆放着这个地区苏联人仓惶撤走时丢下的武器。城镇司令官约翰·克鲁帕兼管这座仓库。这位奥地利中尉向我们表明，就连德国士兵也能安守本分，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危难时必须做出自杀这样的壮举来，而是要有分寸，在关键时刻能保持冷静，能开动脑筋就行。

克鲁帕忍受不了人们虐待在他的仓库里干活的犹太人。德国有一条命令，强迫犹太人劳动，克鲁帕认为光凭这一点就应该让犹太人吃饱，合情合理地管理他们。他有时甚至走得更远：当得知党卫队或押送队纠缠和殴打进仓库的工人的消息后，他以城镇司令的身份立即下令禁止这么做。他是有法律根据的，一条法律——从理论上——规定，必须正确地对待劳动者，即使对强迫劳动者也是如此。

正因为这一点，斯通西基耶恨死了克鲁帕。他决心利用手中的——或者说他捞取的——一切权力来搞掉犹太居民。于是他命令乌克兰辅助警察把所有失去劳动力的年迈的犹太人抓来，见一个抓一个，不要留情。他把这些老人押进一间紧挨犹太教堂的小木屋，教堂也是木板搭的。他放火烧了教堂和小木屋。1944年俄国人进驻这里的时候，在灰烬里发现了许多烧糊了的骨骼。因自己能干活而免遭屠杀的全体犹太人懂得，唯一的生路是逃走。但出逃成功者寥寥无几，魏勒夫妇逃出来了，到利沃夫隐匿了起来。他们故乡的其他逃亡者后来向他俩叙述了斯通西基耶跟克鲁帕的冲突的结局。

斯通西基耶对城镇司令官的亲犹态度十分恼火，向上司告发了后者“优待犹太人”。甚至有人说他上书加利西亚新总

督拉施，提出了“清洗”莫斯蒂—维埃尔基镇的必要条件。

人们对克鲁帕立案调查。但中尉没有失去冷静。他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指出，他的责任是卓有成效地管理好仓库，尽早筛选和保护好有用的物资，其中最重要的是保管好武器。为此他需要犹太工人，需要身强力壮、能够长时间坚守岗位的人，因为接连派来新手会花费他许多时间去训练他们。这份工作属于战争的一部分，因此他注意犹太人的良好待遇。德国军队的调查委员会对这个回答表示满意。这说明就是在德军内部也存在几种态度：调查委员会完全可以相信斯通西基耶，审判克鲁帕。调查小组的某些成员最后完全弄明白克鲁帕确实在保护犹太人（要晓得德军内部同其他地方一样，风声是传得很快的），这不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们也不会不去否定这一点。不管怎么说，克鲁帕是自由的，并下定决心要摆脱斯通西基耶。他返回办公室3天后，提议他的敌手“前来媾和”。斯通西基耶果然来了，走进房间，很尴尬地等对方让座。室内只有他俩。克鲁帕后来讲述当时的情况时两眼炯炯发光，他说：他给了斯通西基耶两记耳光，然后撕下自己的肩章和上衣的两颗纽扣，大声呼喊他的勤务员前来帮忙：“这家伙向我扑来，”克鲁帕吼道，“他撕坏了我的军装，他辱骂德国和我们的元首！”勤务兵们立即擒住斯通西基耶，把他交给了利沃夫的盖世太保，后者不分青红皂白将他押进了那个城市的集中营。

“这件事象点着了的导火索很快就传开了。憎恨德国的人不久就知道了此事的来龙去脉。这事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传奇故事，当然添枝加叶的成份不是不可能的。”阿道夫·

魏勒最后说，“可是，主要的情节是真的。”

“你们今天还能认得出斯通西基耶吗？”我立即问

道“当然喽，我们曾倒霉透顶地经常同他打照面。那时离现在并不太久。”

在一旁洗耳恭听的魏斯曼秘书做了详细的记录，随即把夫妇俩的揭发打了出来，然后念给他们听。魏勒夫妇签了字。我们的谈话持续了约一个半小时，结束时已是上午11点钟。我桌上有一份电话单子，其中有全国难民组织的电话号码。我呼叫了乌克兰代表团，郑重地请斯通西基耶医生赶紧到我办公室来一趟，说是有件东西要给他看。

斯通西基耶答应5分钟后到我这里。

我请魏勒夫妇进旁边屋子稍候，到时我会叫他俩的。

就这样，斯通西基耶一生中第二次糊里糊涂地跌进了陷阱。我问他：

“您真是莫斯蒂—维埃尔基镇人吗？我很想知道这个地方的犹太人的遭遇。您能否告诉我？”

“可惜的是我什么也不知道。”斯通西基耶回答说，“纳粹分子1942年逮捕了我，把我关在利沃夫集中营。接着我又被转移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和茅特豪森集中营。我总共在集中营呆了近4个年头。”

“战争结束后，您为何没有回家？”

在这个问题上，斯通西基耶照样有一个现成答案。

“回加利西亚吗？谢天谢地喽，布尔什维克不比纳粹好多少，您是知道的。”

我向魏斯曼递了个眼色，他随即推开通往隔壁房间的

门。魏勒夫妇走了过来。

“您好，大夫。”阿道夫·魏勒连声说道，“是的，是的，就是您，这不会错的。”

斯通西基耶瞪着眼睛看着魏勒，惶恐失措。

“我们挨过来了。”魏勒接着说，“可爱的格莱歇也挨过来了。他把莫斯蒂—维埃尔基镇的事全讲给我们听了。我们知道他们为何将您发落到集中营去。我们知道您同克鲁帕的全部争执。”

斯通西基耶顿时失去了冷静。

“什么？是格莱歇告诉你们这些的？瞧，还是我亲自释放他的呢！你们说的这个人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要不是我……他也许早就一命呜呼了。”

斯通西基耶再也不可能回驳咄咄逼人的原告，只好说他们造谣中伤。

我给林茨警察局挂电话，把这里发生的事告诉他们，然后又把签了字的揭发材料给他们送去。一小时后，斯通西基耶大夫被铐走。第二天，《林茨日报》详细报道了这场“惊人的逮捕案”。我十分欣慰地看到，这篇文章同时赞扬了克鲁帕中尉大无畏的人道主义。我暗下决心要找到克鲁帕，向他表示谢意，一旦需要我，我愿随时提供帮助。

正是多亏诸如克鲁帕中尉这样的人，我才能忍受现今在奥地利的的生活。克鲁帕中尉的例子告诉我们，不应该忘记，可敬可佩的人还是有的。然而，斯通西基耶事件应该叫某些喜欢陶醉于昔日胜利美国人收敛些：斯通西基耶被捕刚3天就获释回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喜不自胜地跑来嘲弄我，用奚落的口吻对我说：魏勒夫妇的告发顶个屁，因为美

国人根本不相信他们的话。

我真的不理解。那夫妇俩的揭发既具体又准确，是无可辩驳的。于是我去见林茨反间谍局负责人，此人同我关系甚密。战争刚结束那会儿，我曾在那个局里工作过。

“您怎么能释放斯通西基耶呢？”我开门见山地问。

我的对话者显然无意辩论。斯通西基耶案根本不关反间谍局的事。医生是一家美国机构的骨干情报员，该机构设在哈拉什大街16号。有关人士名叫布朗伯格，少校军衔，唯一有资格向我提供情况的就是他。

我登门拜访布朗伯格，显然事先反间谍局通报了他，因此他正在等我。在我看来，布朗伯格领导着一个情报机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斯通西基耶的确为他工作。在那个时期，美国便衣常常出现在难民营，想方设法打听东方土地上的情况。起初我们谁也不明白他们究竟想干什么。但斯通西基耶显然抢先了我们几步……

“是您让人逮捕了斯通西基耶？好嘛，我让人把他放了。”布朗伯格笑容可掬地欢迎我，口气象是在谈一件世上最普通的事。

“少校，我们有证人的揭发，证明此人亲手杀害过许多人。”

“也许是的。”布朗伯格用另一种语气说，“可是我的职业是收集情报。至于谁向我提供，那是次要的。”

布朗伯格用极其冷淡的口吻同我说话，仿佛眼里只有国家利益，司法方面的考虑似乎统统都是幼稚无谓的。他掌握着许多情报和事件，而他面前我这位无知瘦削的犹太人是不该知道的。后来我常常寻思，斯通西基耶究竟在哪方面有利于

美国人：的确，战争时期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集中营里度过的，从未到过东部火线。无疑，他善于应变，就好象从前在俄国人继而又在德国人面前那样巧于讨好，随时准备反目成仇，牺牲自己的伙伴。眼下，设立一个接待乌克兰人的中心，从同胞那里收集美国人感兴趣的情报，这正是他投机之所在。在我看来，任何一个有才能的人，也都能干得跟他一样出色。不过，我总觉得这里边有一种隐晦的同情心把他与头面人物联系在一起：在布朗伯格看来，斯通西基耶在办事效率和服从命令方面堪称楷模。这些长处使他的杀人癖显得微不足道了。

我无可奈何了，只好在反间谍局的一位朋友面前用苦涩的口吻抱怨自己在布朗伯格那里遭到的惨败。我对他说：

“我知道胜利都归功于你们，我也知道如果你们不解放我们，那么我们谁也不会幸存下来。我永远永远感激你们。可是有件事我不明白：你们准备保护一名杀人犯，仅仅是因为他对你们有用。请相信我，他能提供给你们的所有情报同他犯下的罪行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当你同双手沾满鲜血的人握手，你也就弄脏了自己。”

我的朋友不能也不想同我辩解，他对我说：

“昨天的盟友不再是今天的盟友。你会看到时代的变化是飞速的。人们需要德国人去反对俄国人，优秀的德国人可不多啊。”

不过，仿佛是在批判自己的这番话，他给了我一个可去申诉的地址：格蒙登城堡，那里的一个机构比布朗伯格的更为高级，我随时都可去陈述，那里的人也许更善于理解人。事实确实如此，在格蒙登我得到的是值得称道的彬彬有礼和

亲热和蔼的接待。经过几道由奥地利或美国警察把守的岗哨后，我受到一位热情的年轻人的欢迎。他似乎必须向我表明他的一片诚意——招待我共进午餐。

“谢谢。”我告诉他，“我不饿。我要求您的是帮助，以便申张正义。”

我的对话者并不为此而窘迫。他从头至尾笑盈盈地叫我述说斯通西基耶案件，包括我同布朗伯格见面的情况。接下来我等待他的反应。反应是友好的，使我有理由寄予希望：他们将处理斯通西基耶问题。这是我最后一次听见美国人谈此案件。

我在回家途中至少还打算找到克鲁帕中尉。我把凡能找到的电话簿统统拿来，我的伙伴们将所有叫克鲁帕的人找出，逐一给他们挂电话。下奥地利州科尔诺伊堡一个女性嗓音回答说：

“抱歉，我不能把丈夫的情况告诉你们，他一直作为战俘关在苏联。”

我随即写信给苏联高级专员斯维利多夫将军，他同时又是盟军委员会驻奥地利的苏联代表。在信中我列举了克鲁帕的种种功勋，请求将军尽早释放这个人。

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无疑，斯通西基耶正带着美国人给的新身份证生活在美国或加拿大。

当时已是冷战初期，盟国又有新的当务之急要处理。

4. 糖精行动建奇功

那是1947年底的事。我接到上奥地利州安全部头头、内阁参事鲁佩特斯贝格的电话，他告诉我有一位官员要造访我，打听党卫队分队长维克托·内格勒的情况。

第二天，我又接到一个电话，这一次是反间谍局的埃廷格先生打来的，他也注意上了维克托·内格勒。

这个游戏一再重复着：我接到安全部门的报告，要求我提供一个叫约瑟夫·乌尔班的情况，真是无巧不成书，反间谍局也向我了解这个人。

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重大案子正在酝酿之中，一场较量正在奥地利人跟美国占领军之间展开。这次搏斗涉及到一些老纳粹，他们不光是战犯，更是依然扮演着一定角色的政坛人物。这是眼前大混乱的唯一可信的解释。

内阁参事鲁佩特斯贝格在这场拼图游戏中已经掌握了好几块七巧板。譬如，他知道德国纳粹的施蒂里亚区区长西格弗里德·乌伊贝雷特已带着假护照经意大利逃往南美或近东；同时还得到情报，1947年中，维也纳国家印刷局里的一系列身份证件神秘地不翼而飞了。人们知道这些材料的编号，并开始怀疑这些证件在乌伊贝雷特的潜逃中起了作用。

人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追查。一天，一个从前有过不法行为的叫克雷斯雷特的人被捕，他出示的身份证其号码正好在丢失证件的号码范围内。警方对他进行了严厉的审讯，正告他其他持假证者都已落网，并已全部招供。被捕后的第三天，他坦白交代了。警方第一次听到格拉茨一位工业家的名字：特奥多尔·祖策克。

过了许久，国家警察局终于查明，这位工业家是一个纳粹地下组织的头目，该组织盘根错节，结构复杂；有一个“军事部”和一个“政治部”。政治部的代号叫“索尔贝”（“争取欧洲秩序社会运动”），宗旨是竭力恢复纳粹党的政治影响。1947年，纳粹分子们果真蠢蠢欲动，开始慢慢地抬起头来。他们不是不知道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因而以为——不无道理——可以在他们中打入一个楔子，加深他们的分歧，制造分裂。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有这样一个同样是不无道理的想法：占领军撤走之后，他们可以出来填补留下的政治空白。在奥地利，他们还有66万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党卫队和冲锋队^①留下的“老干部”，加上这些人的家属，他们拥有的潜在选民是不可掉以轻心的。

暂时说来，纳粹分子当然已经被剥夺了公民权。可是，他们想利用这种政治上无法律地位的特点暗中为未来培养干部。日后事态发生变化，这些精英将建立和领导一个新纳粹党。

祖策克的地下组织的“军事部”，其责任是保护从盟军

^①冲锋队又叫挺进队、褐衫队，系德国纳粹党的准军事组织，1921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建立。——译者

拘留所，特别是从英军的沃尔夫斯贝格兵营、美军的格拉森巴赫兵营中逃出来的纳粹前领导。祖策克支配着一系列联络员，他们不仅有许多假身份证，而且还有假护照。由此可见，内阁参事鲁佩特斯贝格的怀疑是有道理的：追缉中的纳粹区长乌伊贝雷特就是通过这个渠道搞到假护照的。

关注潜逃方式的人是相当多的，因为大战刚结束不久，纳粹分子成了严厉镇压的对象，奥地利司法机构对自己的使命十分认真。主要有两种人列入搜捕名单上：一部分是在盖世太保、犹太区和集中营干过事的，一般说来他们被指控犯有杀人罪；另一部分是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或其他纳粹组织中任职的，以及参与了德奥合并^①的准备工作的人。此外一部分主要包括在德奥合并前非法参加纳粹党的人，要被判以叛国罪。这些人容易发现，因为他们的党员证号码在6,600,000以内，这系列号码均是1938年3月13日编定的。任何一位其党员证号码低于这个数字的都可被视为非法入党，因而也就是叛国罪。

诚然，这种方法并非是万无一失的，这是因为在战乱时期，一些机会主义者——为数不少——千方百计地走路子，希望搞到一张其号码低于上边那个数的党员证。只要有两位证人证明，某某人的生活境遇严重地违反法律，以致于他不敢在早些时候提出加入非法的党，其实他的心早已是属于这个党了，这样，这个人就能搞到低号码的党员证。在一个有钱就能搞到汽车牌照的国家里，上述办法往往是行得通的。

^①德奥合并指1938年至1945年法西斯德国吞并奥地利的阴谋计划和活动。——译者

有了低号码证，不仅脸上光彩，而且在分配从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财物和配给不动产、住房以及瓜分犹太人商店时，都会得到优待。

1945年后，搞了一次冷水澡：这些狡猾的家伙竭力向当局表白，他们不是1938年前非法入党的，而是后来走门路弄到那些党证号码的。当局一般又叫他们请两位证人——叫做“肃清纳粹影响”的证人——来说明情况。他们多数人仍然请从前的证人来作证，因为这些人是他们最信得过的。一系列复杂的、有时后果严重的手续——因为如果被定为叛国罪，那就得倾家荡产——使得许多人乞求有关机构从司法和经济方面提供援助。

至于那些列入被追缉的杀人犯名单中的人就更是如此。

祖策克的地下组织肩负着双重职责：它既是为未来准备党的干部的学校，又是为昔日的党提供救助的组织。这些使命都要求它拥有雄厚的经济手段。当时，内阁参事鲁佩特斯贝格的合作者们仅仅知道纳粹分子有这笔资金，但它的来源跟特奥多尔·祖策克的角色一样神秘莫测。

国家警察局突然得到一份有关一位法国军官女伴的机密情报，这个女人有一个悦耳的名字，叫玛丽翁·德·科斯塔，其真名为玛丽娅·阿普法尔特，原籍索尔巴特哈尔^①。在纳粹统治下，她在德国和法国反间谍部门扮演过暧昧的角色，战后投入了法国阵营。玛丽娅·阿普法尔特从此得到允许，乘莫扎特快车法国包厢每周在瑞士和维也纳之间往返一次。这样她就可以避免奥地利刑警的检查。可是有一

^①索尔巴特哈尔为奥地利蒂罗尔州城市名。——译者

天，当她在维也纳车站下车时，被捕了。经检查发现，她的行李里装着一笔巨款和一大包糖精。正是因为这包糖精的缘故，国家警察局调查时定名为“糖精行动”。

在审讯期间，玛丽娅·阿普法尔特承认她是为其哥哥效劳的，哥哥是位前党卫队高级军官，叫她在维也纳市中心雷塞尔公园黑市上销售值钱的糖精。随后人们发现，老纳粹们的组织有此类非法销售网好多处。比如黑市老手们在南斯拉夫出售缝衣用的针；萨尔茨堡的警察逮捕了一个向俄国人提供从德国走私来的滚珠轴承。这些非法交易之所得都汇聚到一个钱库。据玛丽翁·德·科斯塔招供，这个钱库由一个名叫阿蒙·格特的人管理，他住在格拉茨。

阿蒙·格特是特奥多尔·祖策克的莫逆之交。

格特被捕，受到了旷日持久的审讯。人们第一次对老纳粹潜逃系统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摊开奥地利地图，将纳粹罪犯逃遁的路线一一标出，最后呈现在眼前的是类似蛛网一样的图案。

蛛网选择的中心点就是格拉茨。它的蛛丝向林茨、萨尔茨堡、因斯布鲁克和维也纳辐射，然后又分出好多条支线，通向福拉尔贝格、意大利和德国。这些线路上布满了转换站，“缺吃少穿者”凭口令可以到转换站搞到假护照和新的身份证。一支支集体运输队从转换站出发奔赴各个边境地区；最后，当地向导将亡命者送往意大利或瑞士。

警察局的便衣向上奥地利州散开，监视各地接头地点。最肥实的猎物落入了林茨刑警队的网。林茨刑警队里有几名坚定不移的反纳粹的青年警察，他们极其精明能干，勤于职守，善动脑子。其中一位叫莱奥·迈尔，就是后来以奥地利

观察员身份列席对艾希曼审讯的那一位。前几年他带着上校警衔退休了，利用年轻时在林茨的那段经历，他创作了一大批侦探小说，和十分引人入胜的间谍小说。林茨事件是侦探小说的好题材：林茨的警察们发现，一些行迹可疑者经常光顾一家咖啡店，他们一进该店就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来不见他们再从里面出来。

迈尔（这期间我同他建立了友谊）提醒我注意这家奇怪的咖啡馆。我在里边呆过几次，每次都坐好几个小时，但什么异象也没有发现。林茨的警察比我走运：一天夜里，打烊前，警察们向咖啡馆发起进攻，发现在笔直的梯子下有第二个出口；他们撞开一道紧闭着的门，在地窖里发现一所设备完善的印刷厂，在油墨未干的身份证旁，他们缴获了一部分从维也纳偷来的文件，和一些警察局、当地政府的图章。

“印刷厂经理”叫胡戈·勒斯纳，当场被擒。过不了多久，特奥多尔·祖策克也落入法网。

接着便是一系列逮捕，其中有我的两名“老对手”维克托·内格勒和约瑟夫·乌尔班。内格勒是他们一伙的“思想家”之一，恬不知耻地自称为“特伦克·德尔·潘杜尔^①”。被判刑不久，他成功地逃到了西德，一些忠实朋友在那里接应。乌尔班的案情比较复杂。我发现他曾是党卫队情报局六处成员，在布达佩斯工作过。对此我并不吃惊。相反的是，他同美国情报部门显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倒叫我有点意

①这个名字借鉴了弗朗茨·冯·特伦克男爵之名。男爵生于1711年，卒于1749年，奥地利的潘杜尔兵（即匈牙利步兵正规军）司令。

外。我深信，他从未停止过为他从前的伙伴服务。

内阁参事鲁佩特斯贝格邀请我旁听对乌尔班的审讯。我的出现似乎迫使他立即亮出自己的王牌——他炫耀不休的关系：“我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是合乎情理的，你们可以询问雷斯策·卡斯特纳，他是我的眼线。”

卡斯特纳当时是以色列政府高级官员。乌尔班抬出他来，无疑是想叫我难堪。事情确实棘手，我不得不致函卡斯特纳，问他是否认识约瑟夫·乌尔班（为谨慎起见，我在信里附上乌尔班的照片一张）。

杳无回音……

两年以后，以色列发生“卡斯特纳诉讼案”：某个叫格林瓦尔德的人指控卡斯特纳大战期间同纳粹狼狈为奸。卡斯特纳反控这是诬蔑。这场官司应当查明真相。于是我把乌尔班的材料转给法官，后者问卡斯特纳为何对我的信装聋作哑，不予回答。卡斯特纳说，他记得当时无暇顾及此事。格林瓦尔德败诉，可是有意思的是，他只被象征性地处罚了1以色列镑。

几年后，卡斯特纳遭到暗杀身亡，凶手是以色列一个地下组织的成员。

显而易见，这是乌尔班案件的延续。这家伙在奥地利新老纳粹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始终是个谜。毋庸置疑，美国人的保护伞历来荫蔽着他。他们似乎偏爱昔日第六处的成员们。他们确实录用了党卫队威廉·赫特勒，此人现今还生活在巴特奥塞，享受着退休校长的待遇。象赫特勒一样，乌尔班使美国人相信，他们这些人从前在党卫队情报部工作时，派过一些特工人员去巴尔干，并且如今他们仍同特工人员保

持着联系。后来发现，这是个弥天大谎，但在40年代末，谎言于他们十分有利。

那个时候，人们逮捕了特奥多尔·祖策克周围的200来人，这些人情况极其复杂，其中有里加地区犹太区第二司令爱德华·罗希曼，他有一笔杀死3.5万犹太人的血债（我在本书专设一节陈述此事），另外还有奥托·勒希，他后来出任奥地利社会党的部长。

勒希从前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党员、特赖斯基兴纳粹党纳波拉精英政治学校的教官，正在格拉茨归侨协助会工作。他被捕时人们在他家找到一只上了锁的小箱子，里面放着许多身份证和好几张名单。勒希一口咬定不知道里面放的是什么，因为箱子是一位陌生人寄放在他家的。由于缺乏证据，人们释放了他，不过他被监禁了8个月。

罗莎·约赫曼为奥地利的解放斗争而曾被关押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她来为勒希辩护作证。出生在社会民主党员家庭的勒希据说受当时内政部长黑尔默之派遣，打入老纳粹分子内部，物色对象，以组织第四个党。此种企图确有其事，战后的政局可以解释：在争夺纳粹党人的选票过程中，社会民主党已开始明显地落后于保守党。在战争和集中营的折磨下，他们曾提出这样的口号：“把纳粹赶到西伯利亚去！”当时纳粹党的正式成员被剥夺了公民权，但他们还有亲属在：兄弟姐妹、父母配偶绝大多数人投了社会民主党的反对票，换句话说投了支持保守党的票。后来，社会党承认犯了策略错误，采取了强有力的立场，主张赦免党从前的全体党员，同时箠之以收归国有的企业经理的肥职，因为奥地利社会党没有足够的能人去担负那些责任。可是，集结在奥

地利人民党内的保守派在大选中依然保持微弱的多数票。这就说明为什么当时的内政部长、社会党人奥斯卡·黑尔默，想要挑动难以直接争取到社会党事业中来的老纳粹分子建立他们自己的党。这个新党会使人民党失去纳粹们的选票，也许还能彻底分裂整个资产阶级阵营。奥地利社会党希望借此成为国内第一大党。

只有在这个未来的第四个党同奥地利社会党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在必要时同它结成联盟的情况下，上述战略才能带来好处。强行推行这一观点的人就是奥托·勒希。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常常同他谈论当时的会谈和事态。当他振振有辞地告诉我，他渗透祖策克的组织仅仅是为了上述观点，而绝对没有帮它办过什么事的时候，我多半是相信他的。

然而，勒希出任部长一事造成了相当微妙的局势：作为内政部长，他成了1948年逮捕过他的一些警察的上司。不过应当承认，他是一位出色的行政官员，其业务能力和工作热情是他的历届前住所望尘莫及的；另外还必须看到，他曾同新纳粹主义活动作过极其顽强的斗争。我们这些在1947年反对过祖策克之流的人常常自问，他是否真正明白当初他被卷入的那场危险的游戏。

祖策克的组织并不为向逃亡党卫队员提供假证件而满足，它还向从前的弗拉索夫^①的旧部提供假证件。这支旧部

^①弗拉索夫（1900.9～1946.8），苏联军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被德国人俘虏后叛变投敌。1946年6月被引渡给苏联，经审讯后被处绞刑。——译者

由投降德军的俄国人组成，其中不少人成了盟军的俘虏，有的还带着家眷。根据英苏协议，他们被交还给了苏联，不经审讯就被处以死刑。一些仍然留在卡林西亚英国战俘营中的弗拉索夫的旧部宁愿投入冰冷的德拉瓦河自尽。这件事传了出去，英国人的行为激起了延绵不绝的抗议。弗拉索夫旧部的最后一批军人因此被集合到关有大批纳粹分子的沃尔夫斯贝格监禁营。祖策克的组织成功地帮助俄国人逃出监禁营，给他们弄来难民证件，送他们到了德国。

设在巴登的苏军司令部很快就得到了这个情报，因为苏联特务网早就在英、法、美管区建立了自己的触角。他们很久以前就知道，一个庞大的地下纳粹组织正在形成。但苏联人决定不把他們得到的情报转告给奥地利当局和盟国，因为没有比“新纳粹复仇支部”更能为他们效劳的了。他们竭尽全力帮助这些支部：在俄国的战俘营里，苏联情报部门通过所谓的“反法课^①”成功地策反了原德军的部分士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人摈弃了一种信仰，接受了另一种信仰，成为打入特奥多尔·祖策克组织的理想的苏联特务；他们积极建立上述支部，确保共产党的最后胜利。强大的纳粹组织的诞生将有助于将民主的奥地利钉上耻辱架。但是“糖精行动”不利于这一战略。

特奥多尔·祖策克、阿蒙·格特和胡戈·勒斯内因重建纳粹组织而被判处死刑。这个判决后来改为终生监禁。实际上只监禁了3年，他们3人就全都获赦了。

他们的组织被国家警察彻底摧毁了。这是给予最大的国

①疑为反法西斯课程之意。——译者

际逃亡网唯一的重大打击，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逃亡网被命名为敖德萨。

5. 盘根错节敖德萨

可以肯定，特奥多尔·祖策克的合作者们在老纳粹骨干分子的潜逃一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只要看到纳粹骨干分子人数在数千以上，战后这些人人都要转移到阿拉伯国家或南美才有安全感这一点，就立即会明白，祖策克的组织只不过是一条重要锁链上的一环而已。

1947年，我十分注意将了解到的纳粹分子潜逃路线仔细画在地图上。这样，我发现在德国有一个类似延绵在奥地利的转换站网。网络的路线都穿过相同的几个德国城市：不来梅、法兰克福、奥格斯堡、斯图加特和慕尼黑。各条路线的归宿点是巴伐利亚阿尔高地区中心部位的一个中世纪小镇梅明根。接着，一条条新的路线又从小镇辐射出去，其中有一条伸向康斯坦茨湖畔的林道，然后又分成数条支线，或通向奥地利的布雷根茨，或延伸到瑞士。主干道离开梅明根后，径直通往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然后折向布伦内罗山谷，进入意大利。后来我才得知，纳粹分子将这条由北向南的通道命名为“B—B”轴线，因为它连结不来梅和意大利港口巴里^①。潜逃路线从该轴线起始，伸向西班牙和阿拉伯各

①在外文中，不来梅为Breme，巴里港为Bari，各取其第一个字母，故称B—B轴线。——译者

国，绝大部分越洋延伸至南美洲。在这些国家里，亡命者需要用身份证，几件案子告诉我们，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搞到所需证件。同时，对他们来说在异国建立新生活也易如反掌：不管他们在哪里落脚，地位最高的那些逃犯一住下来就会有人送来巨额资金，他们可以藉此做生意，去大企业中占据要职，需要的话可以贿赂地方当局。

只有一个规模极大、效率甚高、资金特别雄厚的秘密组织才能担负如此重任。为此，战争的最后几年里，就已经有人开始精心筹谋，采取了某些必要的措施，因为1945年后，纳粹分子在德国绝无可能展开这么大规模的经经活动。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事：有关领导人一旦明白自己的失败已成定局，他们必定会加紧将战争中缴获的钱财转移到国外去。

1946年春的一天，一位美国军官背着一个大口袋走进我的办公室，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深蓝色的厚文件夹，告诉我们，这是他从著名的奥地利海水浴疗养地巴特—伊希勒附近的埃本塞监禁营里一个名叫凯特尔的上校那里搞来的。象美国人一样，我只是匆匆浏览了一下那些材料，它们没有提供与杀人犯有关的任何信息。里面谈的尽是钱的问题。许久以后我才明白，顺着钱这条线索，往往可以抓到凶犯。

可是在那个年代，我只是把一笔笔帐视为令人好奇的新鲜玩艺儿。最奇怪的材料是一份德国某些企业主一次秘密谈话的记录，这次谈话于1944年8月在施特拉斯堡的红房子饭店进行。一群德国工业家和金融家，背着对最后胜利仍然信心十足的希姆莱^①和希特勒，聚会分析局势，他们已经懂

^①希姆莱（1900.10～1945.5），德国纳粹政客，第三帝国的第二号权势人物。最后服毒自杀。——译者

得，给他们带来极大好处的这场战争输局已定。他们中有煤矿大王埃米尔·基多夫、钢铁大王弗里茨·蒂森、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的格奥尔格·冯·施尼茨勒、古斯塔夫·克虏伯·冯·博伦和哈尔巴赫，以及科隆银行家库特·冯·施罗德。这些先生在1933年带头伸开双臂欢迎过希特勒，现在又带头鄙夷抛弃他：即使民族社会主义应该继续存在下去——这是红房子饭店与会者们的最殷切的心愿——，也应该是推行没有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

这次会议的主席阐明了一个简单的观点，如果这个观点出自普通百姓的话，那将是宣扬失败主义，是要问斩不饶的。会议主席指出：

“德国失败于法国战役，所以，德国工业必须作好失败的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准备战后展开一场经济战役。为此，我们每一个人应当寻求建立与外国企业的接触与联系，不过应当以私人身份行动，切勿引起怀疑。此外，还需在政治和金融方面进行准备，以便战后大量借款。但这还不够：工业家们还应当随时准备向被迫转入地下的党提供经费。”

事实上，德国的工业家们很早以前就开始慢慢地向外国转移资金了。他们最喜欢瑞士和西班牙银行家，不过从这个时期起，他们也把巨笔款项移到阿根廷去。

资本的移动一方面以建立挂名无实的企业的方式进行，另一方面通过名义上的代理人经办。多年之后，我遇见一位前党卫队区队长的遗孀，她告诉我一件十分奇怪的事：1944年秋，即战争结束前6个月，党卫队的高级军官前来拜访她的丈夫，询问他在德累斯顿银行的帐号，并要走两张签了名

的空白支票。战争结束后，所有银行接受盟国控制，在任命纳粹分子的财产管理人的时候，这位区队长吃惊地得知，他名下有两个帐号：一张写着1.2万马克，另一张上写着260万马克。那1.2万马克是他个人的积蓄，另一笔钱大概是他的上司给的。在这个例子中，他的上司们的计划失败了，因为他们的钱成了被控制的财产。不过我们可以设想，纳粹头子们可以通过代理人把大笔款子安全地搞到手。种种迹象表明，施特拉斯堡会议的参加者成功地设法使他们的顶替人——尤其是生活在国外的代理人——把钱放在可靠的地方。另外，此类活动都是精心组织的，与会者们还决定，将有关文件“装在密封的器皿中埋入阿尔卑斯山脉的几个湖底”。

假如我细心查阅一番这些文件，进而思考一下它们的蕴涵，那么我早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存在着一个逃亡网。因为施特拉斯堡会议记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党的领导明白，德国失败之后，党的最重要的领袖们很可能会被判为战争罪犯。因此我们采取了一切措施，将党的几位重要领袖隐蔽在德国各企业中，让他们担任“技术专家”职务。党准备拨给企业家们巨额资金，帮助他们在战后去国外组建秘密组织；不过，党相应地要求由它来掌握转移到国外的资金，以便在失败后扶植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帝国的诞生。

这一文件在两个方面极其重要：一方面，它表明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拥有的巨额资金完全可与各大工业企业的资金相抗衡；另一方面它还告诉我们，该党尚未把这笔巨金转移到国外，这是与企业家们所不同的。

可是，该党是从哪里获得这笔资金的呢？答案十分简单：纳粹分子们不只是杀人犯，而且还是盗窃犯。

我认为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这样可以永远堵住德国和奥地利一些人的嘴，他们把大屠杀说成仅仅是杀戮狂的表现。北欧民族在欧洲大陆的优越地位出了问题，但不仅如此，那些邻国的艺术瑰宝不会不使纳粹们动心，他们会干出偷盗的勾当来。同样，他们的目标绝对不是将犹太民族斩尽杀绝了事，而且还要掠夺该民族的财富，洗劫其住宅，直至将死在毒气室内的犹太人的金牙敲下来据为己有。

纳粹领导人都是穷凶极恶的盗贼，善于敛取巨额钱财。请想一想吧，在萨尔茨堡抓住马丁·博尔曼^①的前副手冯·胡梅尔的时候，他正带着500万美元金币晕倒在田野里！

离那片田野东侧几公里之遥的地方就是富施尔城堡，以前的主人是里宾特洛甫^②（现在那里是一家豪华的旅馆）。一位农民在城堡旁挖出一只箱子，里边放着几公斤金子，这位诚实的农民将金子交给了警察局。再往东走十来公里便是奥塞兰德，战后有人在那里发现了多得惊人的金币，可是并没有象那位农民那样诚实地全部上交。

戈培尔^③将施蒂里亚西北的奥塞周围地区命名为“阿尔

①博尔曼（1900.6～1945.5），纳粹德国副元首（1942～1945），希特勒最亲密的助手之一。大战结束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缺席审判，以战犯罪处以死刑。——译者

②里宾特洛甫（1893.4～1946.10），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长，1945年6月14日在汉堡被捕，由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译者

③戈培尔（1897.10～1945.5），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的宣传部长。1945年5月1日，他与妻子杀死自己的6个孩子，然后自杀。——译者

皮纳要塞”，纳粹的许多领导人确实以为那是个一劳永逸的避风港。1944年圣诞节后，他们把家眷送到要塞里，还运去了一箱箱战争中掠夺来的财物。1944年初，这个地区有1.8万人口，战争结束时竟有8万人。甚至连原籍为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纳粹合作者们也列奥塞兰德山区迷人的木屋式别墅里来寻找避身地，为居住在上司的近旁而自豪。帝国中央保安局头子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①就住在阿尔托斯的一幢房子里，阿道夫·艾希曼则带上他的IV B₄军参谋班子来到这里，立即挖坑，埋藏22只包着铁皮的木箱，里面放着文件和金子。

人们比艾希曼本人更关注那些箱子，后来正是这些箱子提供了发现他的线索。

党卫队领导历来细心谨慎，1945年3月后，这些头头们把运到这个地区来的财物仔细清点造册。其中只有一张清单落入美国人之手：这清单一一写着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从柏林运到阿尔托斯的帝国中央保安局的全部财产，而且明确注明它们的价值：50公斤金条、50箱金币金物，每箱重100公斤；200万美元，200万瑞士法郎，5箱宝石首饰，和价值超过500万金马克的珍贵邮票。

1945年5月头几天，德国银行的一个特别小组——专门负责管理来自集中营的缴获物——将几箱“金牙”发运至奥塞。

^①卡尔滕布鲁纳（1903.10～1946.10），奥地利纳粹党人，奥地利党卫队头目。德奥合并后被任命为奥地利保安局长。1946年10月1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他绞刑。——译者

纳粹分子还在阿尔托斯盐矿里存放了从全欧洲掠夺来的艺术珍品，其价值超过几千亿马克。纳粹们曾打算炸掉全部无价的艺术瑰宝（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等国最大的博物馆里的最重要的艺术大师们的油画），以免让它们落入他人之手，然后再将此野蛮行动的罪责栽到盟国头上去。可是这个计划被抵抗运动战士们识破，纳粹们的罪恶企图最终遭到幻灭。

1945年5月9日，“阿尔皮纳要塞”失陷——拉尔夫·皮尔逊少校带着5名美国士兵，乘一辆坦克和一辆吉普攻破它。此后，四散逃命的纳粹头目们费尽心计，企图把埋在那里的以及传说中被扔在250米深的托普里茨湖底的财宝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维也纳老姬克里斯特勒·克利太太在阿尔托斯有一所房子，她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深夜，一些人跑到她的花园里来刨地。她不敢动弹，翌日晨，她依窗细看，发现一系列长方形的大坑，十分明显，那些人从花园挖走了箱子或保险箱。

农民约瑟夫·普赫尔在一个垃圾场发现两只金属箱，打开一看，里边是10,167枚金币。

今天，人们还常常从托普里茨湖打捞到箱子，不过，传说中的党卫队的财物至今下落不明。人们曾发现一大批假英镑，但这不等于说党卫队的财物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只能说知道其下落的人已经及时地将它拿走了。

在这方面我们只了解某些个人的几次尝试。譬如说，1946年后，托普里茨湖畔突然出现两个陌生人，他们从湖底捞出一箱印制假美元的木模。1950年6月，一队法国潜水员在阿尔托斯湖下找到12只金属箱。时隔许久，美国人发现，

上述所说的法国人(当时他们出示的是法国身份证)其实都是德国人。某些寻宝者为自己得到的情报或为自己的某种感觉付出了生命。举例来说,在附近的托特斯-格皮尔格悬崖,人们发现了设在托普里茨湖的德国海军一个研究中心的两名前雇员的尸体。1955年,在一个崖脚下,人们又发现一名为这个机构工作的德国人的尸体。1963年10月5日,慕尼黑青年阿尔弗雷德·埃格纳受雇于两位同胞,在湖里潜水时丧命。其中一位同胞是前党卫队头目,名叫弗赖贝格尔,大战期间在瑞士充当间谍;另一位同胞叫施密特,1962年因非法交易金币而跟当局有过麻烦。阿尔弗雷德·埃格纳淹死后被搁浅在沙滩上,人们在岸边找到了他的衣服,发现钱包里有1905年的金币。

很有可能,党卫队真正的财宝根本就没有藏到托普里茨湖。该湖水深惊人,确实是个安全可靠的地方,但同时也为日后打捞沉入湖底的箱子造成极大的困难。

然而今天,这个地方的人依然谈论着隐藏的财宝,一些人的浪漫主义欲望把公众的兴趣引向了湖边。

有人估计,纳粹分子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隐匿起来的财物总计为40亿金马克。

是谁支配这些钱呢?是谁掌握着签过字的凭据,可以从瑞士、西班牙,或阿根廷银行提取这笔巨款呢?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是第三帝国遗留下的不解之谜中的几个谜。据说就这个问题留有6份单子,其中2份委托给了已知的银行机构。另有2份掌握在1946年组织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逃亡网的人手里。

出于偶然的机会，这个网刚织成或者说刚织成不久，我就知道了它的存在：在纽伦堡审判期间，我结识了一名德国反间谍机构的前成员，他是美国朋友介绍给我的。种种迹象表明，此人跟他以前的伙伴们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因而消息十分灵通。

“纳粹骨干分子是怎样隐匿起来的？”我问道。

“敖德萨这个名字能使您想起什么吗？”他反问道。

“一个很美丽的城市^①。”我有点尴尬。

一连4个小时，汉斯（我后来一直这样称呼他）把他所了解的有关敖德萨（前党卫队队员组织）的情况一五一十地给我介绍了一番。这一组织于1946年才出现，那时候大批前纳粹骨干分子已经被关在战俘营或拘留所里。他们通过某种方式同逍遥法外的伙伴们取得联系，后者组成了拯救战俘委员会。在提供人道主义帮助的幌子下，这些委员会写信给前党卫队队员们，与其建立联系，特别是为其筹集资金。这一切都是在盟国的眼皮下公开进行的，而盟军对这些活动的目的毫无察觉，反而认为不能禁止社会向纳粹分子提供人道主义帮助。委员会得到天主教的有效支持，天主教似乎猛然间想起了自己的仁慈的义务。如果说在纳粹统治下天主教没有为战俘们干什么事——为集中营里的囚徒们干的事更少——的话，那么到这个时候，它似乎要一反常态，十分卖力地为战俘营里的罪犯们大干一场，以弥补先前的过失了。在许多场合，教会的支持已远远超出对拯救战俘委员会的施舍这个范围，到了庇护罪犯的地步。譬如，一条主要的潜逃线路就是

^①苏联有一个敖德萨市。——译者

奥地利同意大利之间的“修道院通道”。

罗马天主教徒，尤其是方济各会修士帮助敖德萨把潜逃犯从一个修道院转移到另一个修道院，直到把他们交给罗马的卡利塔斯组织手里。最著名的转移站是罗马的维亚—西西里亚方济各会修道院，它成了纳粹罪犯名副其实的转运大本营。这个隐匿地的负责人是位主教，来自格拉茨，名叫阿洛伊斯·胡达勒。此人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吹嘘说，得到他的“人道主义帮助”的第三帝国的官员不计其数。

我们很难捉摸这些教徒的动机。其中许多教徒无疑是误解了天主教对他人仁爱的原则，另外还有一些教徒也许在希特勒横行期间对犹太人表示过同样的大慈大悲。事实也确实如此，在罗马的8,000名犹太人中，4,000人从第三帝国活了下来，其中部分原因是教会的庇护：他们中的大多数躲进了修道院，数十名犹太人甚至隐匿到了梵蒂冈。

不过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教会不是铁板一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教徒和修士把希特勒视为基督之大敌，他们对犹太人履行了天主教仁义仁爱的义务，另一部分教徒和修士却把纳粹分子视为维持秩序的力量，是同道德败坏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所必不可少的。前者在大战期间掩护了犹太人，后者在战后庇护着纳粹分子。

起初，大部分逃犯走不来梅—巴里轴线，最终到达罗马或热那亚。这些路线上设有许多中转站，相互间隔约40公里，每站一般由3个了解下两站情况的人管理。逃犯们隐名埋姓地赶路，穿越奥地利和德国的分界线没有什么难以逾越的困难。美国军报《星条旗报》都由为美军服务的德国百姓用卡车运送，一路上畅通无阻。行走在慕尼黑同萨尔茨堡之

间的高速公路上的这些卡车在边境上一般不停车，因为人们对这些车子十分熟悉。假如军警心存疑虑，查看车厢时，见到的也只是一捆捆报纸，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一堆堆报纸后边是屏息蹲着的人，当然也不会怀疑卡车司机竟是敖德萨的成员。

靠着我向萨尔茨堡反间谍局提供的情报，人们拔除了这条逃亡路线，卡车司机们也纷纷落网。可是，此类路线还有十多条。

我只知道曾经有一个组织成功地将大批逃犯经奥地利转运到了意大利。这个组织叫布利莎（希伯来语中为“逃亡”之意），它将大批犹太难民从意大利各港口运到了巴勒斯坦。

上述两种完全不同的组织有时竟使用相同的转换站：比如说意大利有个城市叫梅拉诺，它附近开着一家小旅馆，一批批纳粹分子和犹太人竟会同时秘密地在此过夜，各自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犹太人住在二楼，纳粹分子在底楼。他们都接到命令，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动。

不过，敖德萨还有另一条路线，万无一失，极其安全。这条路线经过奥地利的福拉尔贝格，充分利用法国占领军漫不经心的态度。鉴于陶醉于漂亮的母语中的法国人固执地拒绝学习别国语言，法国占领者对周围的事一无所知。地扼奥地利、德国和瑞士之间交界处的福拉尔贝格，因而成了德国全境逃犯们的“乐园”，他们从奥地利的布雷根茨出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越过瑞士边境。

当然，奥地利和瑞士的某些警察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再说，逃犯们一般都有合乎要求的护照，敖德萨在所有

部门和行政机构都有自己的人，他们能偷取一切必要的表格和图章。老纳粹为受雇于各占领军参谋部而使用的手段无耻到令人咋舌的地步。我深信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总有办法博得军官们的信任：发型、走路时后跟敲击地面的方式、温顺地低头哈腰的样子，都表明灵魂上的某种共性。美国人在高个子、金发蓝眼的德国人面前往往会容易上当，因为他们酷似电影中的美国军官，象得简直以假乱真（其实，真正的美国军官很多是矮个子、棕头发、原籍是意大利）。特别调查局最近才透露了中央情报局在战后招募的老纳粹人数，这些人的唯一素质便是从希特勒之流那里精心学到的反共思想，特别调查局同时还公布了有关东方的所谓情报数量。美国人似乎很健忘，这些家伙曾为阿道夫·希特勒卖过命，他们的手上往往依然血迹斑斑。

我常常在想，美国人在拉丁美洲重犯他们当初在奥地利和德国犯下的错误：他们依然信任最可恶的法西斯分子，只要这些人公开说一声反共，并表示喜欢自由经济和可口可乐就行。

大战之后，纳粹罪犯随时都乐意推崇自由经济，爱上可口可乐。可惜的是这丝毫改变不了他们的本质。有一个纳粹分子很快就适应了新的时期，在哈达德·赛义德这个假名的掩护下，在帮助逃犯方面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不久他成了奥地利的一位赫赫有名的实业家，怀揣叙利亚护照周游列国，组织从慕尼黑或林道到布雷根茨的转运工作。陪他旅行的人都有合法的护照。他们从布雷根茨出发，穿过几公里外的瑞士边境线，然后再跳上去苏黎世或日内瓦的头一班列车，接着从那里登上飞机，直飞近东或南美。

我同驻在布雷根茨的奥地利警察局的一名便衣详细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在这方面干不出什么名堂来。他说：

“那些家伙手里有完全合乎要求的证件，而且一般来说，他们只是过往客人，来去匆匆。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那么法国人干些什么？”我问他。

“什么也不干。”便衣警察悻悻答道。

我最终发现了在哈达德·赛义德假名掩盖下的那个家伙的真实身份：他是一名前党卫队纵队长，敖德萨的领导人之一。他在西班牙的布拉瓦海滨为前党卫队头目和党的骨干分子提供美丽迷人的度假村，从中发了横财。他还在乌拉圭为在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也无安全感的人准备了别墅。

随着对敖德萨内幕的不断了解，我越来越明白为何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盟国才听说敖德萨。原因就在于这个网是名副其实的“行家们”的杰作。所谓“行家”，就是纳粹党原先的非法成员、保安部门的成员、前特工人员，和在第三帝国政府里大显身手扬了名的人。他们象组织灭绝人种的大屠杀一样驾轻就熟地组织着杀人凶手的外逃。

我在调查过程中遇到了一个人，他在上述两种组织工作中显示出非凡的才华：党卫队区队长瓦尔特·劳夫。

6. 行家里手葬异域

众所周知，纳粹分子以日耳曼典型的组织性把大屠杀当作一个工业问题来筹划执行。用武器这个传统工具进行杀戮，很快就暴露出它的效率极低。每个受害者起码要消耗一颗子弹，从屠杀的规模来看，所耗费的资金十分可观。此外，直接动手杀人，要求有一批非常熟悉有关技巧的人。这是因为即将丧命的人常常惊恐万状，执行死刑的人员若训练无素，就会束手无策，难以完成任务。于是，刽子手中间以酒壮胆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其中有些神经特别脆弱的人干脆自杀了事。在东线后方开设第一批死亡室的干预团突击队队长奥托·奥伦多夫，千方百计地想解决这个问题，下令“不准任何个人处死另一个人……”而是相反，应该“好几个人一起射杀”，以避免个人责任。在后来受审期间，奥伦多夫招供说：“有些队长要受害者躺在地上，然后用一颗子弹射击脖子致死。但是我不赞同这个方法。”有人问他为何不“赞同”，奥伦多夫坦率地答道：“因为这样做，对死犯和死刑执行者来说都太严酷了。”

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更省钱、对执行使命的人来说“心理上不那么难以忍受”的杀戮方式。主意来自医务人员：在哈泰因、哈达马尔、宗南斯泰因等专门机构进行的无痛苦死亡的

研究过程中，毒气显示了它的优势。它的杀戮效力极高，而费用极低，同时在心理上不会象其他杀戮手段那样给医生和看护人员带来诸多问题。另外，杀戮使命的骤增，迫使人们放弃为机动小组设立为数有限的固定毒气室的计划。在发明携带式搅拌机之前，德国人的创造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设计了一批移动式杀戮机。

大家知道，安装在卡车车架上由马达转动的搅拌机相当出色地满足了一系列经济要求：人们可不必在固定的场所准备水泥，而是随时随地都可拌制水泥；运输的时间并没有浪费，因为一路上进行着搅拌，到了工地可直接将水泥灌入坑内。毒气车的出现以同样出色的方式解决了杀戮犹太人的难题，尽管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极其分散。人们再也不受某个固定点的束缚，可以在任何地点进行屠杀。运输途中的时间不是浪费，因为这个时间已经变成了工作时间，卡车一到陈尸坑，将尸体倾入坑内就万事大吉。

跟移动式水泥搅拌机同一原理，毒气卡车的马达也是一物两用的：它发动汽车，途中又将排放出来的毒气引入卡车厢内，“旅客们”在里面慢慢中毒窒息而死。

奥伦多夫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陈述了这套杀人系统的“优越性”，他的话是令人震惊的：“从外表看，一切都很正常，这样在装入受害者的时候可避免任何惊恐；人们可以在离刑场和离用枪械、绞刑架杀死的人被埋葬的地点最合适的距离外装卡车；司机及其助手的心理就不会那么紧张，因为马达声淹没了奄奄一息者的嘶吼。”奥伦多夫的这番话并不能为他个人的创举增添什么光彩，反而道出了他的朋友党卫队区队长瓦尔特·劳夫的发明创造之真相。

劳夫生于1906年，起先是海军军官。由于跟一名女大学生勾搭，风化法庭命令他离开海军。这次丑闻非但没有损害他的事业，恰恰相反，他却因祸得福。帝国中央保安局局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早先也是出于同样原因被撵出海军的。他们臭味相投，一见如故，1939年第一次见面就打得火热。海德里希任命这位前海军上尉为保安局二处处长，负责技术事务。

劳夫依仗这一身份，辅之他与帝国中央保安局运输部负责人弗里德里希·普拉代勒的密切合作，装配成功毒气卡车。在这方面，他借鉴了无痛苦死亡机构的初步研究成果。该机构对经济问题是不关心的，他们采用化学成分很纯的整块碳来致人死亡，这碳必须置于金属储存器中。这方法耗资巨大。劳夫和普拉代勒采用汽车排出的废气作试验，效果欠佳，但很经济。总而言之，如果有一个儿童因脑子或肺叶的抵抗力强而未被毒气窒息，卡车司机随时都可以补他一枪托，以弥补毒气之不足。

卸下车内尸体的速度也是研究课题之一。一个专门研究小组主张装配“快速卸尸机”：该小组提出，这样的装置采用自动倾倒的原理，一次倒出50至60具尸体，可大大节约时间。

另外，还从柏林高勃沙夫特工厂订购了密封车厢（我们找到了厂家同劳夫之间的全部信函）。

由劳夫直接控制的一个专门小组一直在考虑如何改进这种毒气车。1942年6月5日，一个名叫“尤斯特”的人在写给他头头的信中提出好几条技术改进措施，使得每辆车每平方米可容纳9至10人。下面这段话需要多读几遍，才能琢磨出

其中之含义：“1941年12月以后，”尤斯特写道，“我们用这种方法靠3辆车处理了9.7万人，车子运转良好，没有任何故障。”

我是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研究纽伦堡诉讼案中的一些材料时，才第一次读到上述这段话。多方命运之神启示下的偶然机会，我有幸数次前往意大利追寻加利西亚总督奥托·韦希特尔博士的踪迹，他成功地逃出了意大利。我得到消息说，帮助他潜逃的那个组织受一名党卫队区队长领导，此人就是劳夫，即“毒气卡车”的发明者。由此可见，敖德萨头目跟这名区队长实际上是同一个人。

劳夫是身兼这两项使命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了解意大利。早在1942年末，希姆莱和卡尔滕布鲁纳（海德里希死后此人成了他的新领导）就委托他将突尼斯的犹太人押送到意大利，然后将他们分别关进各个种族灭绝营。劳夫被任命为突尼斯党卫队警察局局长，他向上司保证，一定杀死3,000犹太人。人们出了重金，他才同意减少这个数目。但是，他最后只交出了120个犹太人，其余的全部被杀死。

隆美尔^①在埃及阿拉曼战役中惨遭失败，劳夫只好离开突尼斯。刚到罗马不久，他就被任命为米兰党卫队警察局局长。墨索里尼失败后，德国人接管意大利，劳夫趁机建立私人关系网，待有朝一日加以利用。罗马的奥地利主教阿洛伊斯·胡达勒将他引进了宗教界同情分子中间。这样的关系后来派上了大用场：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劳夫被捕，关押在意

①隆美尔（1891~1944），法西斯德国元帅，1940年组织“非洲军团”。因参与1944年7月暗杀希特勒事件，被迫自杀。——译者

大利里米尼附近的一个战俘营里。胡达勒主教及其朋友们施加影响，很快就使劳夫获释。接着，胡达勒亲自负责将劳夫送到米兰一个安全的地方。毒气卡车的发明者，立即着手为他的伙伴们组织人们所说的“罗马大道”。在纳粹德国的所有卫星国——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新的领导实行了大规模的搜捕，首当其冲的乃是前纳粹分子，从斯洛伐克赫林卡^①卫队成员到匈牙利的“箭十字党^②”队员，无一漏网。鉴于这些人都是顺良的天主教徒，梵蒂冈设立了一批援助团奔赴各地帮助他们。劳夫通过胡达勒主教同上述援助团接上了头，随时提醒对方，不要忘记他的伙伴们。

逃亡者身无证件，在梵蒂冈和红十会的协助下，人们给他们搞来了临时身份证。接着，梵蒂冈为他们弄来去南美——主要是阿根廷——的签证。

启程之前，逃亡者们一般都躲进修道院里逃避法网，最主要的是罗马的维亚—西西里亚方济各修道院。上船的地方是巴里或热那亚。人们提供给逃亡分子的证件往往是由朱塞佩·西里大主教的秘书从红十字会搞来的政治犯护照。从意大利到南美洲这段路程的运送工作由卡利塔斯组织负责。显然，该组织并不知道，它护送的逃犯一大部分绝对不是克罗地亚、斯洛伐克或匈牙利人。

可是，对这样一个组织来说，光有教会当局的同情是不

①赫林卡（1864.9～1938.8），斯洛伐克天主教司铎，斯洛伐克自治派领袖。——译者

②箭十字党系匈牙利的法西斯组织，活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期间。1945年2月苏军占领布达佩斯，把箭十字党赶出匈牙利。——译者

够的。它还需要钱。因此，瓦尔特·劳夫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筹措资金。

为此，他主要依靠一个战后逃到意大利来的人，他叫弗里德里希·施文特，生活在南蒂罗尔的梅拉诺市附近拉贝尔堡，拥有的经济手段几乎是无限的。请看他是怎样发财的：众所周知，纳粹分子在好几条战线上作战，经济已经开始崩溃。在“伯恩哈德”行动期间，希姆莱让人印了大量假钞票。一方面，这些假英镑（人们后来在托普里茨湖还发现了几箱）给英国货币带来了损失；另一方面，纳粹分子成功地把假英镑换取了一定数量的真英镑，由此搞到了不少外汇。这次活动是货币伪造史上最成功的一次。

作为帝国中央安全局首领的海德里希（后任为卡尔滕布鲁纳），他同时又是1923年建立的奥地利国际警察组织的头目（战后这个组织里活跃着一定数量的纳粹骨干分子，他们保护了潜逃中的伙伴，而不是努力侦缉）。战争期间，奥地利国际警察组织将伪造货币者的名单交给了他，后来又移交给了卡尔滕布鲁纳。纳粹分子借着名单将货币伪造者中的能手集中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不久又把他们转移到上奥地利的雷德尔-齐普夫，让他们印制假英镑。赝品逼真，以致在战后英国人宁愿收回全部钞票，发印新版英镑。

弗里德里希·施文特受党卫队的委托，将一部分伪钞换成真的外汇。据说他相当出色地完成了使命，自己也捞到了好处，因为战争结束后，他成了腰缠万贯的巨富。劳夫知道这段往事，特意登门拜访了他的老友，并毫不客气地警告他说，老朋友们不明白，为什么在他们过着战俘营的铁窗生活、或者躲在修道院里快要饿死的时候，他却趾高气扬地在

城堡里养尊处优。

不管怎么说，施文特最后还是让劳夫分享了他的财富，甚至还为他将大笔钱寄到了南美。施文特跟许多纳粹分子一样逃到南美洲，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办了一家企业，还成了克劳斯·巴比的合伙人。

劳夫留在了意大利，直到1949年。一天，他被意大利游击队抓获，但他用高价买回了自由。据说他还向游击队提供了意大利法西斯党的一部分档案，这些资料是墨索里尼垮台时他弄到手的。

可是，他在意大利失去了安全感。

1954年初，我听人说他去了厄瓜多尔的基多。我甚至知道他的邮政信箱号码，但这对我毫无用处，因为劳夫从不亲自去取信件。不久，他得到邮政局一位职员帮助，此人为他设了一个新的信箱，代他取邮件，直接送到他手中。后来，劳夫离开了厄瓜多尔，到了智利，成了一家罐头厂的老板，或者起码说是这个厂子的合伙人，住在阿雷纳斯角。

1955年，他向联邦德国申请退休金。

可是在审讯艾希曼不久，德国开始认真地对待纳粹罪行。1960年，我将劳夫的地址通告了公共事务部，该部立即发起了攻势。卷宗送到了汉诺威检察院，随即又从路德维希堡中央服务局搞到了所有必要的文件。就这样，检察院于1963年向智利提出引渡的要求，所附的主要材料就是那封提到“处理了9.7万人”的信。另外还有劳夫的部下弗里德里希·普拉代勒的口供和高勃沙夫特车厢厂的订货单。

可是劳夫真走运：在智利，杀人罪有效期为15年，当圣地亚哥最高法院审理他的案件时，离犯罪的时间已有18年。

于是，引渡的要求被 3 票反对 2 票赞成而拒绝。汉诺威的一名去智利审讯劳夫、听取驳斥普拉代勒口供的预审法官返回时深信，只有在智利出现新的政府的情况下，人们才能抓回前党卫队区队长劳夫。

8 年后，风向终于变了：社会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出任智利政府首脑。8 月 21 日，我向智利驻维也纳大使贝纳达瓦教授提交了一封致阿连德的信。我在信中提请他注意劳夫案件。阿连德十分客气地答复了我，但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要得到满意的结果极其困难，因为最高法院已经裁决了此案。我建议将获得智利国籍的劳夫驱逐出境。此事要是在另一个国家，司法环境不一样，办起来也许会方便得多。不等阿连德回答我的第二封信，那里便发生了政变，社会主义政权被推翻，总统不幸丧命。

1975 年，瓦尔特·劳夫离开阿雷纳斯角，迁到智利的圣地亚哥省，住在拉斯孔德斯市洛斯波索斯街 7243 号，在那里又开了一家企业：海洋航行公司。他还设置了新的信箱，号码为 14120。我对这个信箱的情况十分清楚，因为我的一位德国朋友最终博得了劳夫的信任，他甚至可以抄录劳夫的全部信件。这样，我弄到了这位逃亡网前组织者的大部分信函内容，得到了一系列令人好奇的情况。比如：希姆莱的私人副官卡尔·沃尔夫想请一位名叫海德曼的“提刀人”（《明星》报记者）帮忙写一本关于战争时期的书，他曾征求过瓦尔特·劳夫的高见。

瓦尔特·劳夫开始出名了。多年来，我的简报和汇报帮他扬了名。在此情况下，政坛反对派对他发生了兴趣。杂志连篇累牍地介绍他，说他曾在智利迪纳——秘密警察——里

担任过顾问的职务。我怀疑迪纳用得上他……

1983年，我得到里根总统的接见，他问我他是否可为我做些什么。我要他在劳夫案件中助我一臂之力。里根向国务院发出指示，后者要我送去全部有关材料。结果是杳无回音。

同科尔总理的会晤倒是有了些结果，不过我是后来才清楚这一点的。我向他讲了劳夫案，他答应同司法部长一起研究一下重新提出引渡的可能性。

我认为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创造一种气氛，迫使智利总统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乌加特无法拒绝引渡的要求。洛杉矶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皮诺切特总统收到了发自美国的10万张明信片，寄信人要求取消劳夫的智利国籍。这场运动起码有一个作用，即促使人们把聚光灯对准劳夫，但是并没有收到具体效果。应当找到办法直接向智利政府交涉，向它证明引渡劳夫只会于政府的形象有利。在一段时间里，我甚至打算同皮诺切特的儿子取得联系，他当时正顶着假名在智利驻美国的外交代表处供职。我们中心的主任、犹太教士马尔文·希尔认为，最好是同他的私人朋友、智利驻洛杉矶总领事谈，此人也许会听取我们的意见。

希尔的想法不错。总领事对我关于智利声誉的谈话并不十分在意，但我的某些轻微的夸张似乎触动了他的心弦：我对他说，依我看如果皮诺切特继续向全世界表示，他的国家把毒气卡车的发明者、“处理”过9.7万犹太人的罪犯奉为上宾的话，那么美国的大批勇敢者将会决定断绝同智利的经济往来。

皮诺切特的儿子冒着假名驻在美国，这在美国人眼里肯定无助于改善独裁者的形象。

这番谈话比暗示那么多受害者更有用。第二天，总领事给我们中心送来了皮诺切特的参谋长辛克莱将军一份电报的副本，电报称：联邦德国提出的引渡劳夫的要求将受到欢迎。

我立即通知汉诺威的兰德格拉夫检察官。在西德科尔总理亲自过问下，公共事务部准备好了新的逮捕证。该证于2月21日颁发，立即译成西班牙文。5月16日，一位特使将译本连同引渡申请书一起送到圣地亚哥。

两天前，即5月14日，我们获悉劳夫不久前已死于心脏病。

他的葬礼在圣地亚哥举行，他在南美洲的朋友们以向希特勒致敬的方式一直送他到了墓地。

他们的人数仍然相当多，但有些人——而且并非是无名之辈——没有出席葬礼，其中有里加犹太人区司令爱德华·罗希曼、佐比博尔毒气室看守古斯塔夫·瓦格纳，和他最亲密的朋友、特雷布林卡灭绝人种营司令弗朗茨·施坦格尔。

阿道夫·艾希曼也没有参加殡葬队伍。

劳夫成功地帮助了这些人逃出德国，但他们犯了大错误。我巧妙地利用了这些错误。

7. 寻踪觅迹数万里

艾希曼的错误在于他的家庭观念太强：他希望同妻子尽可能保持正常的关系；他坚持参加家庭的各种节日活动；他要求孩子们在其身边生活。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好的资产者，一个完全正常的男子，一个十分合群的人。

他之所以要为600万犹太人的死而良心不安，并非因为他天生就会犯罪，而是他希望为集体服务的结果，他在履行自己的职务时总是全神贯注、全力以赴的。如果当时有600万茨岗人或600万左撇子，他也同样能用毒气杀死他们。如果希特勒没有命令他消灭犹太人，而是叫他把这个民族运到巴勒斯坦去，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国的话，他同样会为此而卖命。

这不是个嗜血成性的狂人，而是个杰出的行家里手。一些穷凶极恶、丧心病狂的杀人犯不可能有合作精神。人们难以将这些狂人纳入某个组织，因为他们迟早会把咄咄逼人的凶器指向组织内部，造成自相残杀的局面。

肆虐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业余杀人犯同活跃在美国的黑手党的专业杀人犯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此：“家庭”成员有足够的合群精神，来避免内讧；黑手党的骨干分子组织屠杀，

而自己不动手弄脏自己，杀人这个任务留给刽子手去干，其中一些人是名副其实的暴虐的疯子，我们把他们称为典型的凶手。不过，这些杀人犯有足够的理智，决不杀红眼，也决不以杀人取乐。

这些人冒着极大的风险。

纳粹杀人机器其结构可同黑手党相比拟：关键岗位由专人占据，这些人把杀人视为一个专门的组织问题。凶杀只是组织内很低层的人的事。就是在这一层人中，并非所有成员都动手，比如说，一名党卫队员要是一时高兴动手屠杀，那是会受训斥的。

典型的杀人犯其特点是感情生活紊乱。而艾希曼的感情生活是完全正常的，他对周围的人怀有正常的情感，可是一涉及到他的“使命”，他就变得冷酷无情。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参与集体屠杀。

战争刚刚结束，我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时，还不理解上述区别。当初我正在追寻“单干的杀人凶手”：我要找到曾经当着我的面凌辱、殴打、杀害过人的凶犯。里希克是我寻找的典型的党卫队员，我对艾希曼尚不感兴趣。

再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对他的角色的重要性始终认识不足。他的姓——没有名——列在犹太代办处^①开的第一类战犯名单里，姓后有这样一句话：“盖世太保中央机构的高级官员，在犹太事务局供职。”只是在我的战略服务局局长奥马拉向我说明，艾希曼在盖世太保中领导负责一切

^①犹太代办处，全称以色列犹太代办处，代表世界犹太爱国主义者组织的国际团体，1929创立，总部设在耶路撒冷。——译者

犹太人事务的机构之后，我才开始把他的姓名写进我的记事簿里。

林茨战略服务局在朗德大街36号。我住的房子离服务局只两幢房之遥，是转租来的。一天晚上，我正查阅卡片，二房东施图尔姆太太走进我的房间，象往常一样站在我的身后从我的肩头看卡片上的字。

“艾希曼！”她脱口惊叫，“可以肯定，他就是党卫队将军艾希曼，专门管犹太人！您知道他父母的住处就离这儿几步远吗？在32号。”

这是我获得的第一条具体的线索，如果我机智巧妙地顺这线索走下去，艾希曼在战后就会马上落网，我们也就省劲多了，但也有一个弊端：艾希曼的诉讼很可能会湮没在当时对战犯的无数起审讯中间。当然，他肯定无疑会被判处死刑，但我们不敢肯定能够来得及真正查明他在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中扮演的角色。人们会满足于几个人的证词进行判决，因为今天我们拥有的档案材料当时还分散在半个欧洲。

这样，艾希曼的名字就会象其他名字那样平淡无奇，不为人注意。从这角度看，我还要为自己当初的无能而庆幸呢。

第二天，战略服务局两名成员搜查32号内艾希曼的家时，我没有在场。艾希曼的父亲交代说，他的儿子是党卫队成员，战争结束时没有回过家。他得到有关艾希曼的情况是几个月前的事，那时艾希曼在布拉格。

其实，艾希曼早就离开了布拉格，到了萨尔茨卡梅克特的阿尔托斯，因为有规定，第三帝国的奥地利骨干分子必须撤退到这个“阿尔皮纳要塞”去。艾希曼没有任何理由不去

那里。他不是出色地完成任务并坚持到底了吗？他不明白自己为何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连卡尔滕布鲁纳这样的人也不欢迎他。

他想见见妻子。于是她在阿尔托斯的菲舍恩多尔夫街8号租了一间屋住下，村子里的人都知道她丈夫来找过她。

那个时期我在老纳粹中已经有出色的情报员了，我的一位合作者得到的消息证实我的情报是准确的。

的确，我们只要坐上吉普，带上两名卫士，就可能抓获艾希曼。

但是，我们却跟反间谍局交涉，该局在阿尔托斯附近的巴特奥塞有一个办事处。不料反间谍局又去同奥地利宪兵联系。两名宪兵出发，到了38号，而不是8号。这个地方当时充斥着老纳粹，结果在38号抓住了另一名战争罪犯：躲在38号的是党卫队纵队长安东·布尔格^①。宪兵在他家发现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兵器库，所有武器全被缴获。

于是，美国人决定亲自到8号去。阿道夫·艾希曼不在家，接待他们的是一个名叫韦罗妮卡·利布勒的女人。她说，她是艾希曼的“前”夫人，1945年3月她在布拉格同丈

①安东·布尔格是艾希曼参谋部成员，特雷西恩城副司令。他在奥地利犯了一系列罪行，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希腊也劣迹累累。他被捕后关押在美军格拉森巴赫营里。我在那里当着一名美国上尉的面询问过他有关艾希曼的情况。他证实5月4日在奥塞见过艾希曼。

1947年6月18日，布尔格逃出格拉森巴赫兵营。我于1949年发现了他的踪迹，他再次被捕，这一次落入了奥地利警察之手。可是他又成功地逃出维也纳监狱。我追住他的线索不放，直到1956年。这线索在联邦德国断了。

夫分手，然后又恢复了做姑娘时的姓氏，还说打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她于4月15日到达阿尔托斯，先是住在“海洋旅店”，然后搬进“花园旅店”，最后租了菲舍恩多尔夫街这所房子，想把3个孩子——克劳斯、迪特尔、霍斯特——接来。

在我看来，这段故事没有什么意义。于是我亲自到了阿尔托斯，跟“花园旅馆”女店主玛丽娅·布赫尔聊天。她则求之不得，向我倾诉憋在肚子里的怨愤。她对我说：其实利布勒太太住在她家时并非独居，丈夫也在，来时穿着笔挺的党卫队制服。一天夜里，他撬开她亡夫的衣柜，挂上他的一件制服。事先不征求一下主人的意见，事后也不赔偿损失。这叫什么房客！

我把这次谈话讲给艾希曼—利布勒太太听，但她仍不肯松口，一口咬定自从在布拉格离婚以来，她再也没有见过丈夫。

这件事中唯一确凿的情况是，战争接近尾声时艾希曼在布拉格活动过。后来他的参谋部撤退到了捷克的布德魏斯市，最后搬回奥地利。

起码有一点是值得一提的，即艾希曼从此被列进奥地利追缉部门的名单上，而且人们渐渐发现他的累累罪行是多么严重。他的名字不断地出现在纽伦堡审讯的各个文件里。一切关押犯人的命令似乎都来自他，他是灭绝人种的机器运转的主要负责人。

在纽伦堡，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来研究他的信件：信中他要求拨款，建立新的毒气室；有的信还写着他对各种杀人手段的意见；有的则与商讨运送死尸有关。渐渐地我对阿道

夫·艾希曼有了某种认识。当然，当时他赋予我的印象已不是坐在办公桌后边埋头整理一串串数字的罪恶的官僚，而是一位亲手策划灭绝人种的大屠杀的罪魁。我终于明白，务必找到艾希曼，跟这一使命相比，迄至那时我们做的一切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大约就在这一时期，在公众的脑子里，我的名字开始同艾希曼的名字不可分离。在林茨，人们称呼我“艾希曼的维森塔尔”，各种情报如倾盆大雨一般向我泻来。可是我还缺乏经验，不善于在堆积如山的谎言大话中剔出宝贵的情报。我能弄到的唯一珍贵的材料是艾希曼摄于1934年的一张照片，是我的合作者马努斯·迪阿芒从这位纳粹将军的一位前女友那里骗来的，后来艾希曼逮捕证上的照片就是这一张。

我们脑海里终于有了我们所追寻的人的脸形。我们还没有他的其他照片。他父亲告诉我们，阿道夫基本上不照相。真难以相信，可这是事实。

种种迹象表明，艾希曼是有意干出那些令人发指的事，因此，人们总有一天要同他算帐。在干坏事方面，他很象是一帮职业歹徒的“头儿”：他的臭名也是无与伦比的。他只向同伙谈论自己的所作所为。比如说1944年秋，在布达佩斯，他曾向党卫队区队长威廉·赫特勒提纲挈领地介绍了他的行动：“处死的犹太人约600万——可是这是个国家机密。”我曾经怀疑过，艾希曼会在妻子儿女面前提及这个数字。他们听了又会有何反应呢？艾希曼—利布勒太太怎么能够跟一个因杀戮几乎同奥地利全部人口相同的人而受到良心谴责的凶犯一起生活呢？她是认为人们对他的指控纯属捏造？还

是觉得灭绝犹太人是个崇高的使命？

大概这两种可能都不会发生。她必定坚信，丈夫只是尽“责任”而已。

至于这个“责任”究竟是什么内容，艾希曼太太大概是不感兴趣的。这是我所能找到的对于她的行为的唯一解释，这行为就是竭尽全力为艾希曼潜逃成功而奋斗，接着便是努力为重新回到他身边去生活而斗争。在干这一切的时候，她装做他已经死去的样子。

1947年底，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韦罗妮卡·利布尔到过巴特—伊希勒州法院，“为了孩子们的利益”，申请其丈夫的死亡证。当时，奥地利和德国的所有法院淹没在此类申请书之中。数以千计的妇女因丈夫在战后没有返回而需要死亡证，来申请她们和孩子们的抚恤金，或者为了自己重新嫁人。法院以极快的速度处理这些申请，因为当时根本无法展开调查。让女人们遂愿，此乃上策矣。

我明白一张艾希曼的死亡证意味着什么：他的名字可以从被追寻者名单中划去，有关当局放弃任何官方的调查。

我请求这位美国朋友、巴特—伊希勒州反间谍局局长史蒂文斯立即同法官联系，法官极其爽快地将手头的材料告诉了史蒂文斯：布拉格蒙利卡大街22号一个名叫卡尔·吕卡斯的人以自己的荣誉担保，在1945年4月30日布拉格战斗中，他亲眼看见艾希曼中弹毙命。

史蒂文斯向法官解释说，“死者”无疑是人们最迫切需要找到的纳粹战犯之一。法官同意推迟研究这个案卷。

我派人去布拉格调查，获悉：卡尔·吕卡斯娶了一个叫玛丽娅·吕卡斯的女人，此人做姑娘时名叫玛丽娅·利布

尔。

她是韦罗妮卡·利布尔的妹妹。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史蒂文斯，他立即转告法院。艾希曼死亡证的申请遭到了拒绝。

这一并不辉煌的决定，无疑是我对查清艾希曼案件的一个重大贡献。坦率地说，在林茨和在菲舍恩多尔夫街真正的“猎捕犯人”活动中，我都没有干得这么精彩过。话得说回来，艾希曼案只是开场和尾声有点象“猎捕犯人”。中间那段时期主要是做枯燥乏味的情报——重要的情报和无足轻重的情报——收集工作，最后才做出一系列相对来说卓有成效的决定。

我是一名锲而不舍的追踪者，可我从来不是优秀的射击手。

1948年春，我终于摸清了艾希曼的行动轨迹：1945年4月28日，他从布拉格出发，于29日抵达布德威斯，5月1日到了埃本塞，这是位于巴特—伊希勒的一个小镇，是他同他的参谋部成员见面的地方。可是艾希曼没有在埃本塞耽搁，好几个证人说，他们于5月2日在阿尔托斯见到过他，他在那里一直滞留到5月9日。

接着，他在美国拘留营寻求庇护：在那里比躲在一所偏僻的屋子里还要隐蔽得多。他路过上巴伐利亚州罗森海姆附近的贝恩多夫拘留营，到达克姆纳滕营，然后又到了上帕拉蒂纳特的夏姆拘留营。该营的德国职工鲁道夫·沙伊德还记得这位普普通通的在押犯：1945年6月，一名党卫队长官前来找沙伊德，要求把他的名字艾希曼写进营内的名单，实际上，他就是党卫队区队长艾希曼。“这个名字当时没有引

起我的注意。因此我回答说，他爱叫什么就叫什么，这与我无关。”

沙伊德最后发现了美国人指责艾希曼的原因，便于6月30日报告了反间谍局。

可是，阿道夫·艾希曼的消息也十分灵通：当天晚上，当他所在的建筑工程小组返回拘留营时，他失踪了。

他在德国北部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然后在佐林根市叔父家住下。艾希曼家族确实诞生在这个地区，他自己是在3岁那年跟父亲离开此地迁居到林茨去的。

一天，几位英国官员前来询问其叔父，艾希曼由此断定上路远去的时刻到了。他又回到他感到最安全的地方：奥西兰德。

这是游击队的典型做法：潜匿在一个人地两熟的地方，可以得到一部分民众的同情和帮助。

当然，还有别的原因促使艾希曼躲到奥塞来：那里有他埋在地下的金子。

好几名证人说，艾希曼最初于5月出现在那里，在别人的帮助下，他从阿尔托斯湖捞出22只金属箱，然后运到远处的布拉哈尔姆。那些箱子里有文件，还有“金牙”。

总之，艾希曼的妻子和儿女一直住在菲舍恩多尔夫街8号。虽然难以证实，但我确信他从来没有跟妻子断过联系，就在艾希曼夫人的来往信件受到检查的那个阶段也是如此。他们的挚友遍天下！再说，纳粹分子当时已经有一个地下组织，掌握着一个严密的情报网。这个组织的重要性本身恰恰构成了一个威胁：大批老党卫队队员知道了艾希曼的藏匿地。

当时，我的合作者中有一个人能够出没于老党卫队员中间。他曾经是德国军队的一名指挥官，我终于使他相信，他跟集中营里的杀人犯毫无共同之处。后者是些刽子手，利用战争把坏事做绝。只是出于偶然的机遇，才使这些人也穿上了他那样的军装。这位指挥官于是自告奋勇地帮助我寻找杀人犯，以便证明并非所有的德国军人都是纳粹分子。反过来，老党卫队员对身穿军装的人却本能地有一种好感。因此他可以同他们商量问题，他们会跟他推心置腹地交谈。就这样我们获悉，艾希曼也已成了党卫队员们厌恶的对象，就连纽伦堡审判时所说的“罪恶组织”的成员都不愿意被人同精心策划了数百万人的大屠杀的人相提并论。当然，谁也不会告发艾希曼，但是谁都会毫不犹豫地告诉德军指挥官，艾希曼藏在奥塞地区，而且还得到一些人的支持。

事实上，纳粹地下运动“迪斯皮纳”（“蛛网”）的中心机构设在离奥塞不远的格蒙登。施蒂里亚州还有一个十分活跃的组织，即著名的“七星社”，宪兵们搞错门牌而抓到的安东·布尔格同该组织关系密切。总之，纳粹们的两个组织——“蛛网”和“七星社”——都附属于特奥多尔·祖策克的组织，后者的机构设在不远的格拉茨。所有地下组织汇合成一张敖德萨依存的网，使敖德萨的运转达到极佳的地步。这张网的存在为艾希曼造成了安全感，而且这种安全感已经明显地压过了我们的“网”给他造成的恐惧感。

谢天谢地，他太低估了我们。

1949年12月20日，奥地利警察局一名高级官员前来造访，同我一起分析情势。我俩均深信艾希曼正潜匿在奥塞一带。警官甚至怀疑他住在格隆德尔塞，这个地方与阿尔托斯

湖只有一个小山丘之隔。他的推测与几个月前我的人告诉我的观察结果不谋而合。我手下的人报告说，他们看见一辆牌照为上奥地利州的麦赛德斯黑色轿车开进了格隆德尔塞，接着该车又到了阿尔托斯，在艾希曼夫人家菲舍恩多尔夫街8号门前停住。从车里走下一个穿雨衣的男人。此人在作了短暂的逗留后匆匆离去。

很明显，我的来访者拥有的情报来源比我的更为准确。他在第二天又来拜访我，并告诉我说：“我们得到消息，艾希曼想在阿尔托斯的家中过新年之夜。我们将给他设下陷阱。”

警官建议我参加这项行动。真是无巧不成书，12月31日是我的生日，还有比参加这项行动更能叫我高兴的嘛！

可是，正是在这个决定性阶段我犯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错误：我要一名在我办事处工作的以色列青年陪我同去。我们的追寻工作使他高兴得忘乎所以，我怕不带他去，他也会暗中跟着我。

我们在12月28日出发，在巴德奥塞的“约翰大公”旅馆住下。天气寒冷，时间显得格外漫长。我要我的青年朋友尽量不在附地方散步，尤其不要跟任何人谈话。他大概认为这些禁止仅仅与这次行动有关，因此不到大街上去闲逛，但进了一家夜总会。他对人家说他刚从以色列来，几位姑娘十分吃惊。

12月31日，我找到我的警官朋友。他带来了6名警察，这些人都会埋伏到艾希曼夫人家附近静等，当时我们没有搜捕证：在等待下手的时候，他们在周围各家旅馆观察动静。

天寒地冻，冷气逼人，我们决定回旅馆沏杯热茶暖和暖

和。我推开饭厅大门，看见一群又说又笑的人：角落里的年轻人一个个张大着嘴听我的以色列人讲述他那个国家的军队的光辉业绩。

我的伙伴强压着内心的怒火，悻悻地说：“要是有人知道一名以色列青年来到此地，那么很可能……”

“10点已过，”我打断他的话说，“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但愿如此。”警官一脸愠色。

我们离开旅馆，径直去找离得最近的警察，他端坐在一家小客店里正在安静地饮着啤酒。“所有的人都都在谈论巴德奥斯的以色列青年。”他喃喃道。

警官朝我看了一眼，仿佛在说我是个职业登山运动员，但经不起劝说，带着业余爱好者去登山，而后者穿的却是草底帆布鞋。我诅咒我的青年朋友，接着又诅咒我自己。

已是深夜11时正，如果艾希曼想在午夜前赶到家里的话，他必须马上离开格隆德尔塞。

我们等着，等了好久好久。最后，在格隆德尔塞监视的警察跑过来向警官耳语几句。警官默默地听了一阵，然后叫警察跟我重复一遍。警察慢慢地一字一顿告诉我：“大约11时半，格隆德尔塞街上出现了两个人，天色相当暗，但在积雪的映衬下我清楚地看出了他们，我离他们约150米。我躲在路旁的树后。突然，来了另一个人，是从格隆德尔塞方向来的，他朝他们俩喊了几句。他们收住脚步，同来人说了些话，然后3人蓦地跑了起来，转眼就不见了。”这番话就好像是我的一篇罪状。

警官反倒设法安慰我：绝对不能说是我的合作者的不慎

行为惊动了艾希曼。再说，我们发现了，这已是不小的成绩。警官留下两名警察监视，并说他们会抓到他的。但我清楚，他纯粹是在向我表示好意。对他来说，这是一次事业的失败。而对我来说，这是一次人类的灾难。

一星期后，我得到消息说，所有追寻中断了，因为艾希曼已在该地区消失。

在后来的年代里，我所得到的有关艾希曼的情报寥寥无几，而且都是专搞耸人听闻的新闻报刊上的传言。据说有人在开罗见过他，他曾在大马士革会见过从前的伙伴，他正在为阿拉伯人组织一支德国军团。这一切在我看来均属于虚乌有，因为一个不愿意照相的人肯定会力求不给人留下话题，也不会引起新闻界的注意。

再说，世界上还有其他猫要逮：那是冷战达到顶峰的年代，这冷战导致了朝鲜真枪真炮的战争。在欧洲，美国人终于明白，联邦德国是个起码同英、法一样重要的盟国，也许是一个更为可靠的盟国。因此，人们反仇为友，向从前的敌人套近乎。美国的战争影片不再诅咒嗜血成性的魔鬼，而是颂扬勇敢的军官，他们命运不佳，盲从了一位疯人。

面对这种变化，阿道夫·艾希曼的形象淡化了……

每当我对美国朋友提起这个案子，他们总是耸耸肩膀叹气道：“我们有别的事要干。”

1951年初，一位在敖德萨有不少朋友的反间谍局成员告诉我一些有关艾希曼逃跑的模糊情况：一个克罗蒂亚委员会帮他通过“修道院通道”逃到了罗马。他是1950年夏末抵达罗马的。这个委员会由克罗蒂亚合作政府首脑安特·帕韦利希

从前的支持者领导。艾希曼在罗马的某所修道院找到了隐匿地，大概有人给他搞到了护照。他需要护照去申请赴南美的签证。”

这个情报无疑是最最重要的。美国人和以色列人都宣称，艾希曼躲到了近东。我的情报员深信他已在南美落脚。当时，敖德萨的所有船队都驶向巴西和阿根廷。

情报员的这一推测在我看来是最有道理的。

我只有一个希望：得到更多更详细的情况。这个希望又一次建立在艾希曼的强烈的家庭观念上。我坚信他一定会设法同他依然生活在阿尔托斯的家眷取得联系，并争取尽早让他们回到他身边。

我做好了长期等待的准备。

我又从另一种渠道听到人们谈论他：1951年秋，我在办公室接待一个50上下的瘦长男子，他十分潇洒，举止温文尔雅。他微微向我欠身致意，立正后将身份证递给了我：他叫海因里希·冯·克利姆罗德，代表维也纳一个前党卫队队员小组，这些队员长期以来以钦佩的心情一直关注着我的工作。他十分明显地试图在我们之间确立一种“平起平坐”的气氛：我俩都是“行家里手”，只是阴差阳错的结果，我俩才分属势不两立的两个阵营，但从一定的高度来看，我俩之间的共同点是主要的。“您的兴趣同我们的兴趣在一个问题上交汇相吻了：您想找到艾希曼，为的是审判他；我们也想找到艾希曼，为的是他的金子。我感到合作追寻只会对双方都有利。”

可是怎么可以合作呀！这些衣冠楚楚的先生想的是如何找到艾希曼的走卒们从被害的犹太人嘴里敲下的金牙。为此

他们随时准备跟一名犹太人合作，并愿意把他们从前的同伙交出来。当然，这位同伙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那是一份肮脏的勾当，不是他去干，就是冯·克利姆罗德先生干。我们只好达成君子协定。“我们掌握着艾希曼潜逃的许多情况。比如说我们知道两名教徒——韦贝尔神甫和贝内德蒂神甫——帮助他逃走。我们知道他躲藏的嘉布遣会修道院。我要承认，我们不知道艾希曼现在用的名字，可是我们在南美有许多朋友，他们都急于要帮助我们。您对这些见面礼有何看法？”

我想冯·克利姆罗德永远不会明白我为何拒绝了他。他一方面满足着我的“理想主义”——当他发现他的“事业心”这条理由不能奏效时常常采用迎合我的“理想主义”的办法——，一方面又显得不能理解，为何理想主义不能适应一切手段。

我本想建议用我个人的钱去换取他在艾希曼案件中对我的帮助。可是，把从我的被害兄弟们嘴里拔下来的金牙转交给他，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个名副其实的亵渎。

我猜想，在他的个人词汇里恐怕是没有“亵渎”、“耻辱”等词儿的。他极其沮丧地离开了我的办公室。

光阴荏苒，转眼便是6个月逝去。我再也听不到人们谈论艾希曼。一天，我在阿尔托斯的一位熟人突然告诉我，艾希曼一利布尔夫人及其孩子们失踪了。她在学期中间把几个儿子从学校领了出来，人们没有发现他们到奥地利或德国的某所学校注册的线索。房租当然还在按月交纳，家具仍放得好好的。但邻居们很快就猜到了事实真相：艾希曼太太打算

在某一天离开这个国家。无疑是去了南美洲，据一些传言说，她去了巴西。

多亏奥地利的一位男爵，我得到了比较详细的情况，这是我常去的集邮俱乐部里结识的一个朋友。一天，他邀我去他府上看他的邮票，谈话间我们说到了纳粹统治时期。他当初曾在卡纳里斯海军上将领导的反间谍机构干过，他的天主教徒和君主主义者的倾向使他历来疏远纳粹分子。

当我向他推心置腹地说起多年来我的一个目标时，他蓦地站了起来，说道：

“我确实感到有一个东西要给您。”

他朝一摞书和材料走去，从中抽出一封航空信，告诉我：

“这是一位战友的来信。他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为庇隆总统工作，充当教官。我们一直信来信往，一天我问他是否见过我俩的共同朋友。他的回信您会感兴趣的。”

他把信递给了我，叫我看最后一段文字。

我读着信，不禁惊呆了。

“我见到了猪猡艾希曼，就是处理犹太人的那个家伙。他住在离布宜诺斯艾利斯不远的地方。他在一家水力机械厂工作。”

这时我明白我再也不能单枪匹马地干了。纳粹们在阿根廷拥有十分强大的势力。在这个国家艾希曼感到可以高枕无忧地生活。我不再是他的对手。

我同以色列驻维也纳领事阿里·埃歇尔商议，他建议我将手头的全部有关材料整理出一份摘要来，提交给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我在这个文件中介绍了我所知道的，从艾希曼的

性格到男爵提供的一切最新情况中的主要情报。另外我还附上艾希曼的笔迹和早先弄到的他的照片。

我将该文件一式两份，一份寄给纽约的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主席纳胡姆·戈尔德曼博士，另一份送给以色列驻维也纳领事馆。

我没有得到以色列方面的任何回音。

两个月后，我收到来自纽约的信。一个叫卡尔马诺维茨的犹太教徒以戈尔德曼的名义在信中告诉我，他们收到了我寄去的材料，但又指出，如能把艾希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详细地址寄去，他们则不胜高兴。我复信说，如果能寄来旅费和报销500美元的垫款，那我立即就可以派一名合作者去阿根廷。卡尔马诺维茨犹太教徒来信说，他们无法支付这些费用。另外，美国联邦调查局告诉戈尔德曼博士，艾希曼正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

那个时期，美国犹太人无疑忙于其他事情。不再有人对艾希曼问题感兴趣：以色列人忙着同纳赛尔^①作斗争，而美国人又被跟苏联的冷战搞得焦头烂额。我又成了单枪匹马的斗士，身边至多只有几个象我一样的疯子。1954年3月，我关闭我的文献中心，把所有文件仔细地分类装箱，寄给了设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档案馆。

我留下的只是艾希曼的案卷，我也不知道为何这么做，因为当时我已决心再也不干这一行了。

①纳赛尔（1918.1～1970.9），埃及总统，现代最有影响的阿拉伯领导人之一。1970年9月28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年仅52岁。

——译者

5个春秋匆匆而过。1959年4月22日，我象往日一样翻阅林茨日报《上奥地利新闻》。最后一页刊登着一个讣告，一个叫玛丽娅·艾希曼的女人去世（这是阿道夫·艾希曼的父亲的第二个妻子），讣告中有死者家属的名单。我漫不经心地浏览一遍，“维拉·艾希曼”这个名字叫我浑身一怔。人们在讣告里是不会弄虚作假的：韦罗妮卡·利布尔恢复了自己的姓名，她无疑认为这是唯一合法的姓名。不管她到哪里，她总是阿道夫·艾希曼的妻子。

我派了一个人去艾希曼夫人的母亲家，后者认为这里边扯谎是不可能的，总归有一点真实的成份在里头。她告诉我的人，她的女儿在南美洲，嫁给了一个叫“克莱姆斯”或叫“克莱姆特”的男人。

我把这个情况转给了以色列人，他们有能力查证。一段时间后，他们告诉我，艾希曼夫人跟一个德国人姘居。以色列人甚至知道这个男人叫里卡多·克莱门特。

我却认为，此人就是艾希曼，这是确定无疑的，讣告可以为证。由此可以断定，艾希曼的几个儿子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在父母身边。向德国使馆一打听，我的怀疑被证实了：他们都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在那里登了记（使馆的一位雇员后来向我解释，他们不能怀疑这些孩子就是臭名昭著的阿道夫·艾希曼的儿子！）

余下的就是查证里卡多·克莱门特的身份。又一个讣告为我提供了机会：1969年2月，艾希曼的父亲去世。《上奥地利新闻》刊登的死者家属名单中再次出现其儿媳的名字：维拉·艾希曼。

很明显，艾希曼家族的家庭观念使他们忘记了要小心行

事。我一度希望阿道夫·艾希曼回来奔丧。我雇了两名新闻摄影记者，要求他们躲在一座坟茔或一棵树后，用远摄镜头将送葬的人统统照下来。当天晚上他们就把照片送来了：照片上好几个人象阿道夫·艾希曼。他们是他的兄弟埃米尔、罗伯特、奥托、弗里德里希。后边3位我早已认识。我还从未见过埃米尔，他是从法兰克福特意赶来的。

就缺阿道夫。

可是这一家人如此相象，使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我翻出从前从他在林茨的女友那里弄到的旧照片，同艾希曼兄弟们的照片一一对照。我发现其中一张完全可以被视为年轻的阿道夫·艾希曼的照片，时差为30年。这是他弟弟奥托的相片。

这时我终于明白，为何有这么多的人认为在世界各地遇见过艾希曼：人们把他同其兄弟混淆了。谁要是手中有奥托·艾希曼的照片，谁就肯定能认出阿道夫来，尽管他更名为里卡多·克莱门特。

这时，以色列大使馆通知我，有两位以色列青年要来找我。他们一到林茨，就向我索要了葬礼上拍的全部照片，随即便消失了。

1960年5月23日，星期一，达维·本·古里安^①在以色列国会宣布，阿道夫·艾希曼已经被捕，正掌握在以色列人手里。

翌日，我接到以色列档案馆的电报，内称：“请接受我们对您的辉煌功绩的祝贺。”

^①本·古里安（1886.10～1973.12），犹太政治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之一，以色列主要缔造者和首任总理。——译者

在此案中我的真正功绩是什么呢？我在人们不愿回忆或者已经忘记犹太人的悲剧的年代里，迫使人们常常忆起这一悲剧。在审讯艾希曼之后，再也无人怀疑这个悲剧的严重性：艾希曼的交代本身就完全驳斥了那些企图否定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存在的人们。最后，这场审讯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了纳粹的死亡机器的运转及其罪魁们的作用。从此世人知道了“罪恶的官僚主义者”这个概念。我们终于明白，要杀人，无需做一个穷凶极恶的狂人，只要对某个“元首”唯命是听、竭力效忠就可以了。杀人凶手并非都是合群的人，何况他们最好不要是合群者。做一名优秀的杀人犯，即一名效率高的杀人凶手，应当同社会打成一片。

在审讯艾希曼期间，我坐在一名美国记者旁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叫戈尔登——，法官问被告，是否感到有罪。

艾希曼作了否定的回答。

“法官应当向他提这个问题600万次。”我向邻座耳语道。这句话被刊登在美国好几家报纸上。我认为它高度概括了这类审讯的全部问题。人们几乎不可能用仁慈的办法对待种族大屠杀。

在一段时间里，象好些国家那样，奥地利出现了一场关于刑法作用的大辩论。司法部长克里斯蒂安·布罗达——我后面还要谈到他——认为刑法只能有一个目的，即让犯人重新进入社会生活，如果真是如此，何必还要审讯阿道夫·艾希曼。他早已出色地进入了阿根廷的社会：他有职业，过着受人尊敬的资产者的生活，这是位优秀的父亲。他将那么多的

犹太人推进毒气室，可以一点风险都不担。

在一次电视辩论中，有人问布罗达部长，既然刑法的唯一作用是让犯人重新进入社会，那么为何要判决艾希曼呢？司法部长哑口无言了。按照他的理论，人们应当让所有的纳粹罪犯在阿根廷、巴西、乌拉圭或巴拉圭的别墅里安逸地生活。

也许人们起码可以指望他们的良心是不安的。不过我怀疑艾希曼会受到内疚的折磨。在审讯期间，只是在第45天，人们才听到他说了一句暴露他内心某种颤动的话：“我应当承认，今天我把消灭犹太人视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罪行之一。我们应该竭尽全力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我不知道此话是发自肺腑，还是他的律师为避免死刑而提示他说的。其实这并不重要；他终于这么说了，我感到高兴。

在奥地利进行的另一场审讯期间，特雷布林卡灭绝人种的集中营司令试图引起法庭的恻隐之心，说什么由于缺乏押人的地方，他才被迫用毒气杀戮犹太人的。此人名叫弗朗茨·施坦格尔。

我抓住此人的方式揭示了老纳粹们所谓的“良心悲剧”的真相。

艾希曼在南美的落网和以色列特工人员将他偷渡出阿根廷的经过，极富传奇色彩，记者艾森伯格、兰多和丹在合著的《摩沙迪》一书中作了绘声绘色的描写。特将这一章详细摘录于后，以飨读者。

附：天涯海角捕凶犯

1957年秋末。

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查哈拉镇上一间普通平房的卧室里，一群特工领导作出决定，集中一批摩沙迪的超级特工人员，捕获阿道夫·艾希曼。

摩沙迪首脑伊塞·哈雷尔是个矮个子，他是以色列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他花了一整夜的时间研究了有关这位纳粹领袖的案卷。

在合上最后一页案卷之前，哈雷尔就已确信，艾希曼不仅是主要的纳粹战犯之一，而且他的主要职责是消灭犹太人。

“在屠杀我的犹太教友的一切活动中，”伊塞·哈雷尔得出结论说，“他是最高权威，是他指挥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

大战结束时，阿道夫·艾希曼并没有象其他高级纳粹官员一样，被盟军逮捕，也没有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审。他巧妙地逃脱了这一厄运，在德国隐藏了4年，做了库姆巴赫的一名伐木工。

多亏一些纳粹同情分子的帮助，他得以逃到意大利的热那亚，在那里方济各会的一名修道士给了他一份假护照，他最后来到了阿根廷。

后来，他的全家也来到南美找到了他。在与家人团聚后，艾希曼认为，顶着他的假名里卡多·克莱门特已万事大吉，他可以高枕无忧了。仗着他多年在德国警察中学到的一

手，他成了隐匿自己踪迹的老手。多方的朋友和不少高级人士协助他在自己周围筑起了一道保护屏障，在南美洲的德国同伙还建立了一个情报网，稍有风吹草动，便向艾希曼和其他在逃的纳粹分子报警。

但是，战争结束后12年零6个月，一份无比重要的情报落到了联邦德国黑森州总律师鲍尔手中。这份情报证实，艾希曼依然在阿根廷的某个地方活着。鲍尔秘密地将此消息告诉了摩沙迪。因此，“矮个子伊塞”通宵未眠，仔细地研究了有关阿道夫·艾希曼的一切情报。

这位摩沙迪的领导人完全意识到事情很棘手。艾希曼很可能是借着假名隐藏下来的，他的身边全是朋友，要在那种环境下将他捉拿归案，绝非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情。

然而，伊塞·哈雷尔却为自己定下了一个更难达到的目标。

鉴于艾希曼在纳粹的大屠杀计划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伊塞决定，一定要生擒逃犯，并把他遣送到以色列来，接受一个犹太人法庭的审判。

这实在是比登天还难。

可是，伊塞·哈雷尔并非平庸之辈。摩沙迪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他的贡献比任何一个大人都大。

当伊塞告诉本·古里安总理，他要找到艾希曼，并把他生擒后带到以色列来受审时，总理一秒钟都没有犹豫，就批准了这次大胆行动。总理知道，伊塞就象是一条獒狗，他一旦拿定主意，就再也不会改变。难怪本·古里安曾这样说过：“他是犹太人的温斯顿·丘吉尔。”

“参加这次艾希曼行动的，都是自愿报名者，”摩沙迪

的这位领导说，“我选的人并非因为他们有冒险精神，而是因为他们的内心都有这样一个坚定信念：捕获这个万恶的罪犯是执行祖国和人类所赋予的神圣使命。”

伊塞亲自到了阿根廷，组织了这次行动。为了租汽车、旅馆和公寓，为了确定撤退的路线，他不惜花掉几万美元。

那时正值盛夏之际，伊塞颇费周折才从以色列航空公司搞到一架不列颠式飞机，往返于大西洋两岸，专门用于运送罪犯到以色列。

无数特工人员得到指示，暂时放下其他一切工作，警察和军队里的许多专家也协同行动。他们花了好几个星期，对这次行动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都作好了应变的准备。

万一阿根廷当局当场抓住以色列的特工人员，伊塞·哈雷尔准备不顾自己部下的反对，挺身而出，为这次非法行动承担全部责任，保护自己的部下。

伊塞对他的小组进行了各种极端艰苦的训练，一次又一次地检查，直到确信手下的人员能够保证这次行动的成功为止。

逮捕艾希曼，这已成了伊塞·哈雷尔日思夜想、梦寐以求的目标。如果需要的话，他将动用摩沙迪的一切力量。

50年代末，使伊塞·哈雷尔相信艾希曼依然活着的第一件事完全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一天，一个名叫尼古拉的21岁的小伙子，开始追求一位迷人的犹太姑娘。姑娘的父亲是位盲人，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北郊的污秽肮脏、坑洼不平的奥利沃斯区。

尼古拉是艾希曼生在德国的3个孩子中的一个，他公开

地用自己的真实姓名。虽然眼瞎，但却多疑的犹太老人把这个情报传到了联邦德国，一次“泄密”又使这一情报送到了摩沙迪的手中。

于是，伊塞的特工人员来到了奥利沃斯区，严密地监视着查卡布科街4261号。这户人家的周围有高高的栅栏，还有一个精心整修的花园。

但是，凭着逃亡者敏锐的嗅觉，艾希曼已经感到了某种异常现象。于是，他再也不到那儿住了。

他带着战后离开德国与他团聚的妻子悄悄地离开了查卡布科街，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伊塞是个锲而不舍的猎人。

伊塞的特工人员把艾希曼的档案背得滚瓜烂熟。这些档案详细地记载了艾希曼的过去，描绘了他那沙哑的嗓门，连他的结婚日期也没有漏掉。他们到处出示艾希曼在战前拍摄的穿着党卫队装服的照片。

就这样，一些支离破碎的奇怪的情报好不容易一点一点地拼凑汇拢起来了。

原来，艾希曼是用一份国际红十字会的护照进了阿根廷的，护照上的名字是里卡多·克莱门特。艾希曼的妻子靠着一个老纳粹分子组织的帮助，找到了她丈夫。夫妻团圆后，她又生了第四个儿子。艾希曼曾开过一家洗衣公司，但公司后来破产了。

两年过去了，没有一点消息。

线索断掉了。

逻辑和理智都已命令该放弃这次侦察。而且，摩沙迪的力量有限，还有许多重要的间谍活动要进行。

然而，伊塞·哈雷尔却是个与众不同的人。

他那猎手的本性不允许他半途而废，并且进而增强了他的信念。艾希曼决不会逃脱法网。

负责这次行动的摩沙迪的领导人认为，找到艾希曼的唯一办法，就是利用这个纳粹分子的唯一弱点：他对家庭的热爱。

摩沙迪特工人员溜到了德国。在德国，艾希曼家里有一些远亲，甚至还有一些被人遗忘了很久的老关系。但是所到之处，特工人员碰到的都是沉默。然而，正是这种充满敌意的沉默告诉了伊塞，艾希曼确确实实地活着，他在世界的某个地方生活着。

摩沙迪的追捕者认为，通过艾希曼的家庭，就能抓住这个纳粹分子。这个想法是很有道理的。

一天，他们找到了艾希曼的正在工作的三儿子。他们在好几个星期里一直跟踪着他。最后，他无意中把他们引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另一个区，这个区紧靠雷孔基斯塔河的一条支流。

现在，围猎开始了。

艾希曼很快就被认了出来。他和他的妻子以及几个孩子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圣费尔南德区一座孤零零的砖房里。

特工人员从各个角度把房子偷拍了下来。花园没有栅栏，墙壁没有粉刷等详细情报送到了特拉维夫。

在以色列，当人们得知前纳粹首脑人物目前的寒苦处境时，都感到某种意外。艾希曼的房子，四周常受水涝之害，屋内既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

人们很怀疑，也许里卡多·克莱门特不是艾希曼。何况

他最后拍的照片一点也不清楚，而且还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拍的。

特工人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认出了真正的艾希曼了吗？

答案送来了。

送来的是肯定的回答。

“绝对没有任何疑问。”

加里巴尔迪胡同的房子是以艾希曼的妻子的名字租的。

1961年3月21日，终于搞到了最后证据。这天，是阿道夫·艾希曼和维拉·艾希曼的银婚纪念日。黄昏时分，在离加里巴尔迪胡同那间砖屋100来米远的地方，停了一辆汽车，从里面钻出一个长着一只大鼻子的人，此人前额宽阔，头顶光秃，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

他手中拿着一束报春花。

他慢慢地走近了屋子，跨过了权作花园栅栏的铁链，把手中的花送给了热烈欢迎他的妇人。这对夫妇的最小孩子，一个8岁的小男孩，平时总是穿着破烂衣衫，或者干脆一丝不挂，现在却打扮得特别漂亮。

不一会，从紧闭的窗户中透出了一盏油灯的亮光，不时从里面传出一阵阵笑声。

纳粹战犯艾希曼正在自己的家中。

关于他的身份的最后一点疑云消散了。

在离布宜诺斯艾利斯9,000公里远的摩沙迪总部，伊塞·哈雷尔合上了案卷，回家去了。他用不着对丽芙卡赫说什么，妻子从他那焦虑的神态就感到正在发生什么重大事情。她明白，丈夫立即就要“出去几天”了。

伊塞·哈雷尔已经对总理本·古里安解释过，逮捕艾希

曼是摩沙迪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艰巨的任务。他认为，他亲自领导这次行动是至关重要的，完全必要的。

总理根本不想提出什么异议。他完全明白，他的獒狗就要咬住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猎物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能使他不做他要做的事。

于是，总理明智地批准了伊塞·哈雷尔的计划。

将要参加这次行动的最后阶段工作的每一个人，都是伊塞·哈雷尔亲自从他那些优秀的特工人员中选拔出来的。所有被选中的人都曾经跟随过他们的上司到国外执行过任务。所有的人都曾在阿拉伯国家或其他地方出生入死地工作过。现在，他们都准备再冒一次生命危险。他们的忠诚可靠是绝对的。

负责准备全部文件及假护照的是沙隆·达尼，他正忙于为艾希曼准备证件，以便在把他逮捕后，能够让他顺利地在阿根廷“失踪”。

伊塞挑选的另一名成员，很久以前就发过誓，要为他的姐姐报仇。他的姐姐和3个孩子一起被纳粹分子杀害了。

当伊塞问他是否愿意亲自抓住艾希曼，并把艾希曼制服时，他顿时泪如泉涌，连连回答：

“您只要注意不让我下手过猛就是了。”

还有一名特工人员早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当时英国驻意大利的军队里服役时，就参加过处决纳粹分子的行动。他唯一的遗憾是，人们分配给他的任务是担任后援，他不能第一个抓住艾希曼了。

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为了解决所有必要的文件、飞机、签证、免疫证等问题，摩沙迪在某个欧洲国家的首都建

立了一家小规模旅行社。

为了不给别人造成这是以色列派遣的有组织的别动队这样的印象，摩沙迪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预防措施。因为这次行动万一失败的话，那将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阿根廷人要是发现由以色列特别派遣的一些人践踏了他们国家的主权，闯到他们的首都带走一个人的话，他们一定会很恼火的。

事实上，伊塞·哈雷尔也的确没有其他办法了。

他完全明白，如果把阿道夫·艾希曼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情况告诉阿根廷警方的话，就不敢担保艾希曼不会受到惊动，更不用说会受到审判了。

从1961年初起，别动队的成员开始向布宜诺斯艾利斯进发。他们分别来自各式各样的国家，到达的日期、时间也都各不相同。

以色列航空公司同南美洲没有联系，这就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然而，命运之神对伊塞·哈雷尔露出了微笑；阿根廷邀请以色列派出一个官方代表团和其他国家一起参加阿根廷独立150周年纪念活动。这可为摩沙迪的首脑提供了一个梦寐以求的好机会，他可以乘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不列颠式飞机去阿根廷了。这架飞机的机组成员和飞机上的官方代表团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竟成了摩沙迪的掩护人。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终于停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埃塞萨机场上。

为了麻醉俘虏，别动队配备了一名医生，另外还配了一名特工部门的女间谍充当家庭主妇，再加上其他一些辅助人员，这就组成了一支捕获艾希曼的特殊队伍。

别动队找了几十处住房都不满意，最后租下了几间“可

靠的房子”。他们还租了相当多的汽车，为了不引起外人注意，他们经常换着乘。

各种先进的工具和全部必需的食品都早已储存好了。

5月11日，别动队下手了。

整个行动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的。

两辆汽车等待着那位老纳粹党卫队军官。第一辆汽车的发动机罩打开着，司机和他的助手在摆弄着发动机，好象在排除机器故障。

夜色朦胧，气候凉爽。车内前后排座位间，一个人躺在地板上，他在等待着，随时准备一跃而起。

在离这辆汽车30米远的地方，停着另一辆汽车，司机似乎也在琢磨着为什么汽车发动机不肯转动。

在守候艾希曼的小组成员中，气氛越来越紧张：里卡多·克莱门特没有在惯常的时间回家。

这时，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在汽车前停了下来，自称是汽车装置的专家，愿意提供帮助。但他受到了极其粗暴的对待，于是，他只好趁着夜色离去了，一边走一边低声嘟囔着：“这些人真粗野。”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艾希曼在干什么呢？难道自卫的本能已使他预感到危险了吗？他病倒了吗？还是发生意外了呢？

突然，在朦胧的夜色中，他们看见克莱门特正走进加里巴尔迪胡同。

一道强烈的灯光直射到他的脸上，把他照得眼花缭乱。刹那间，有人冲过去把他按倒在地，老纳粹分子大叫了一

声。在他还未来得及喊救命之前，好几个人拽胳膊抱腿，把他塞进了一辆汽车，他的头被紧紧地夹在一位摩沙迪特工人员的两膝之间。

人们把他的手脚全捆了起来，在他的嘴里塞进了一团东西，又给他戴上了一副黑眼镜，使得他无法认出对他下手的人。这时候，千万不应该让他知道，人们正把他带往什么地方去。

现在，他躺在汽车的地板上，躺在摩沙迪特工人员的脚下，身上蒙着一层布。

艾希曼听见的仅有的几句话，是用德语说的：“你要是敢动一下，我们就把你干掉。”于是，他便一动不动地躺着。后来他承认，他一开始就知道进攻他的人只能是以色列人，如果他试图反抗，或者试图逃跑的话，以色列人会毫不犹豫当即把他处决。

艾希曼被捕后不到一小时，已被放到了一张钢丝床上，一条腿被捆在床柱上。

他被关在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另一端的一间屋子里，这是一处孤零零的寓所。人们脱去了他的衣服，此刻，他穿着一件崭新的睡衣。

正如他的主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材料，在他的腋下，找到了一块刺花的伤疤，这是纳粹党卫队队员为了标明他们的血腥组织而刺的记号。

身上刺的号码已经消失了。艾希曼后来解释说，战后，他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被美国人关押过，他用刮胡子的刀片刮去了刺花号码。

他左眉下的一块伤疤为他的身份提供了新的佐证，他的

肋部和左肘上都有一些伤疤，这是战争期间一次车祸留下的纪念。

使他的看守极为吃惊的是，艾希曼表现出了合作的态度。他已失去了穿着耀眼的党卫队军官服的威风，他那被一些低头屈膝的奴隶所簇拥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他已给吓坏了，神经极为紧张。他断断续续，悲怆地供认：

“我的纳粹党党员的号码是889895。”

“我的党卫队号码是45326和63752。”

“我的姓名是阿道夫·艾希曼。”

以色列特工人员简直难以置信，这样一个面貌善良的人，这样一个卑躬屈膝、唯命是从到令人肉麻地步的人，竟会是那些险些征服全球的纳粹党党魁之一。更使他们吃惊的是，艾希曼不停地用希伯来语背诵犹太教最神圣的祷文之一。

他解释说，他是从一位名叫劳·贝克的犹太教教长那儿学的希伯来语。

老纳粹分子在这间屋子里待了整整一星期。

他的看守帮他梳洗，给他刮脸，甚至他上厕所时，看守也一刻不停地盯着他。在他住的屋子里，电灯日夜亮着，唯一的一扇窗户已用黑布遮了起来。在停车房里，一辆汽车随时待命出发，万一这间房子被艾希曼的朋友或警察发现的话，他们能迅速撤退。

伊塞·哈雷尔希望绝对肯定，他的囚徒是真正的阿道夫·艾希曼。他一连几小时亲自审问艾希曼，盘问他的生平，从各个角度不断地重复着他的提问，以便确信他面前的人不是一个冒牌货。很明显，这俘虏非常紧张。当他想到他的看守

就要把他杀死时，他甚至到了近乎惊恐万状的地步。

有一段时间，他拒绝食用人们给他端来的饭菜，害怕这些食物中有毒。他一再要他的看守当着他的面先尝一尝这些食品。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也同样是一种考验，因为，艾希曼出现在他们的眼前，这就使他们想起了往日的梦魇。这个外表可怜的俘虏，就是昔日的那个“超人”，就是那个以骇人听闻的日耳曼式的效率组织了对他们的兄弟、姐妹、父母、祖父母，以至整个种族的大屠杀的“超人”。

对于伊塞的特工人员来说，看守艾希曼是一项非同一般的任务，这决非是防止囚犯逃跑或自杀的例行公事。他们的神经犹如绷紧了的小提琴弦一般紧张。

他们中间就是最刚强的人，也要不时地离开屋子，到户外走上一会儿，让自己紧张的神经松弛一下。

这些冷酷无情的间谍，在他们所执行过的任务中，都曾杀过人，但此刻却不得不双手捂着自己的脸，好在不测之时让难以控制的泪水偷偷地流淌。

但愿艾希曼拿出点人样来。或者说他应该象人们对这位“优秀民族”的高级代表所期待的那样，多少总该有点自信和傲气吧！

但是，艾希曼却偏偏不是这样，他奴颜婢膝，想方设法取悦他的看守。

结果，在困难的等待时期，摩沙迪首脑的最大忧虑之一，竟是如何维持他的人马的士气。

伊塞·哈雷尔意识到，他部下的意志快垮了。于是，他便采取了一种轮流值班制，让他们每人都有一天假日。在休

假的这一天，他们都被请出去如同普通的游客一样参观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领略这个动人的南美洲国家的首都风光和它那怡人的气候。

艾希曼每日的食物一般是汤、鸡蛋、烤鸡和土豆。为艾希曼准备饭菜的那位女特工人员承认，她曾经想毒死这个人，因为他是杀死她的种族中那么多人的死神。

但是，严厉的纪律从未松懈过。伊塞非常清楚这一点。他选择这些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曾在每一个人的档案中仔细地研究过各人在执行任务时的表现。

摩沙迪的首脑说过，当他的目光第一次停留在艾希曼身上时，这位俘虏既没有使他愤怒，也没有使他感到讨厌。他一分一秒也不允许自己的情绪影响下一阶段——返回以色列——的细致的准备工作。

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不列颠式飞机将于艾希曼被捕后的第九天，即5月20日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不列颠式飞机的返航日子是不可能提前的，否则就会引起阿根廷当局的怀疑。

伊塞·哈雷尔早就料到，在党卫队军官失踪后，艾希曼的家人是不会马上向警方报告的。这是因为在世界各国，做丈夫的往往会一连几天“忘记”回家。对这类家庭小悲剧，警方一般是不介入的。

倘若艾希曼的家人不得不承认这是一起绑架事件，那么他们就必须向警方说清楚里卡多·克莱门特实际上是一个不同一般的人。这样一来，艾希曼的名字就会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就会在全世界掀起轩然大波，很可能还会促使艾希曼的绑架者立即处死他。

老纳粹分子的家人的所作所为完全和摩沙迪首脑的推测一模一样。他们向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所有医院和诊疗所打了电话，查询艾希曼是不是出了意外事故。就是没有报告警察当局。

他们请求友人和同情者给予帮助。

伊塞·哈雷尔相信，其他老纳粹分子知道自己也受到侦缉，因此是不会为艾希曼帮任何忙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为了保命都逃之夭夭，隐藏到南美洲大陆的各个角落里去了。

有一些人甚至逃到了欧洲，因为他们深信，逮捕当年希特勒的这位亲信的复仇者一定也在追捕他们。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些追捕者是谁。只有以色列人能够进行这样一次行动，到南美洲来抓住了他们的同伴。

艾希曼的儿子尼古拉后来说：“其他纳粹分子，即我父亲的朋友们，就象变魔术一般突然消失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去了乌拉圭，在那里更安全些。此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

在艾希曼被捕的时候，以色列黑名单上的另一名高级纳粹分子约瑟夫·门格勒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得知艾希曼出事后，他便立即隐匿起来了，使伊塞·哈雷尔的希望落了空。早先哈雷尔曾计划这一次也能把他捉拿归案。

把艾希曼带出阿根廷的方案经过了周密的考虑和仔细的准备。

一位摩沙迪的同谋住进了当地的一家医院，原因是他在一次所谓的“车祸”中得了“脑震荡”。他的一位“亲戚”

——此人就是摩沙迪别动队的那位医生——每天都去看望他。这位亲戚教病人应该如何向大夫叙述他的症状，目的是要病人表现出他的智力状况每天都有缓慢的改善。

5月20日上午，病人的情况已经相当令人放心了，医生便允许他出院。他们给了他所有必要的医疗证明，而且，应他的要求，还发给了他一份允许他返回他的祖国以色列的许可证。

病人一出院，便把这些文件交给了摩沙迪的特工人员，特工人员在这些文件上换上了艾希曼的照片，写上了他的个人特征。

此时，老纳粹分子已经完全屈服了。他签署了一份文件，承认了他的真实身份，并声明他随时准备去以色列接受审判。“我是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发表这个声明的。我得到了保证：不对我进行任何威胁，我将得到法律允许的诉讼救助。我希望能够使我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

不久，在拉姆拉监狱的牢房里，他又补充说：

“我的被捕是以绝对正当的方式进行的，整个行动的组织 and 准备工作都堪称典范。劫持我的人特别小心，不让我的肉体受到任何一点伤害。我完全有资格对此发表我自己的看法，因为我对警察部门和特工部门的工作有相当的经验。”

这种吹捧性的言词并没有使摩沙迪的特工人员感到特别高兴。

然而，阿道夫·艾希曼的这个证词还是写进了以色列特工部门的历史档案，如今在特拉维夫，人们可以查阅到这些材料。

伊塞·哈雷尔一生中最难挨的时刻，莫过于艾希曼接受

海关和护照的检查，以及通过机场警戒线的那一时刻了。

伊塞把他的指挥部设在机场餐厅的一张饭桌上。这天进出餐厅的有几百名士兵、警察和机场工作人员。如果他们知道这位坐在桌旁的安详的小矮个子，一整天都在发布命令，听取从早到晚进进出出的特工联络人员的报告的话，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在伊塞身旁，就在阿根廷当局的眼皮底下，一位专家正在为几张假护照作最后润色，检查这些证件是否已经妥帖地盖上了他口袋里的阿根廷政府的官方印章。

与此同时，特工人员细心地给艾希曼梳洗了一番，给他修了面，让他穿上一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制服。别动队的医生用一根特制的针给他打了一定剂量的麻醉剂，使他对周围所发生的事完全失去知觉，却可以在两个人的搀扶下继续行走。

这位囚徒所表现的合作态度是那样真切，以致他竟然提醒周围的看守们，他们忘记了给他穿上一件制服。他对他们说道：“这很容易引起怀疑，因为我穿的衣服和别动队其他成员的不一样，他们都穿着制服。”

3 辆汽车开到了机场管理处门口。

艾希曼在第二辆汽车里。

第一辆汽车里的人狂笑着，放开嗓门唱着歌。有点尴尬的司机对机场的卫兵解释说，他的同伴们过多地享受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夜生活，竟忘了今天晚上必须上自己的飞机离开此地。

看着这帮人中某些人的模样，卫兵们笑着说，他们肯定驾驶不了飞机啦。

“这没有关系，”司机回答说，“他们都是些后备机组成员，在飞机上可以大睡一觉。”

双方都挤了挤眼，卫兵便让3辆汽车驶进了机场。

卫兵甚至用手指了指躺在第二辆汽车后排座位上的3个人，叫他的同伴们看看他们是什么样子。

显然，布宜诺斯艾利斯把他们迷住了。

这个机组人员中两名身强力壮的人架着艾希曼上了飞机的舷梯，把他塞进了飞机。当机场的一名官员把一盏雪亮的聚光灯对准不列颠飞机时，真叫人捏一把汗。

艾希曼进了飞机几秒钟后，就坐到了靠窗的一个头等舱位上。

在他的周围，坐满了“机组的其他成员”，他们一个个佯装呼呼大睡。

遵照伊塞的指示，飞机驾驶员减弱了机舱这一部分的灯光，以防机场官员可能最后一次检查飞机。

尽管机上的俘虏有一份伪造得十分逼真的以色列护照，还有绝对正式的医生证明，但摩沙迪的首脑还是不愿冒任何风险。

为了寻找艾希曼，阿根廷人可能已经进行了一场全国规模的行动，要晓得艾希曼的失踪已经是第九天了。

摩沙迪的特工人员一个接一个地通过了海关检查和护照检查。一切进展顺利。伊塞·哈雷尔最后一个通过了检查，最后一个上了飞机。当他在自己的位置上入座时，他的邻座和他都紧张了起来：透过舷窗，他们看见一队官员神色慌张地朝飞机的方向飞奔而来。

然而，飞机马达已开始轰鸣，不列颠式飞机颤动着向起飞

跑道滑去。

半夜零时5分，不列颠式飞机终于起飞了。

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那队向飞机跑来的阿根廷官员有何贵干。

年轻的新闻记者尤里·丹坐在兰布莱塔号滑艇上，凝视着古老的雅法港，泪水禁不住顺着两颊往下淌。这位初出茅庐的《晚报》记者，当一次极好的可以出名的机会放在他面前时，他却把它白白放过了。

“一定要弄清楚他们是怎样处理艾希曼的尸体的。”子夜刚过，报纸总编辑阿利·迪申切克就生硬地对尤里·丹下了这道命令。

他首先赶到了拉姆拉，这是英国人盖的监狱，离特拉维夫30公里。在那儿他一无所获。突然，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际：到最近的基督教徒住宅区里的公墓看看。他真恨自己早没想到这一点。但是他照样一无所获。公墓里一片宁静。

当朝阳的光辉开始照耀在美丽的雅法港的城墙时，年轻的记者明白他的期限快到了，可是他仍一无所知。他恼羞成怒，鲁莽地径直去敲高级警官以色列·戈德曼的大门。

这时，他的手表正指向清晨5点。

“你想干什么？”警官愤怒地问道。他两眼布满血丝，还没有刮脸。

“我想知道你们是怎样处理艾希曼的尸体的。”记者怯生生地答道。

“快给我走开！我无可奉告。”警官粗暴地说。

象所有的优秀记者一样，年轻人毫不气馁，警官前脚进

了屋，他后脚跟了进去，一直尾随到了洗澡间。

尤里·丹非常惊奇自己没有赶出门外。此时，他感到戈德曼心烦意乱，想向什么人倾诉倾诉。

警官卷起袖子，用一把刷子和肥皂仔仔细细地洗起前臂来。

“这个婊子养的，骨灰全粘在我皮肤上了，”警官骂道，“正当我们往海里倒骨灰时，呼地刮起了一阵风，骨灰全刮到我们脸上了。”

“我没能摆脱这个鬼差使。”

原来如此，他们已经火化了阿道夫·艾希曼的尸体，并把骨灰倒入了大海。1962年5月底，以色列的一个法庭将他判处了死刑。

“那么，他是怎样被处死的？”

“绞死的。”

“人们为他的尸体准备了一个专门的焚化炉。我们将他的骨灰装进一个盒子，便动身来到了雅法港，上了一条船。这船一直带我们到了公海，我们把骨灰倒了。我就是刚从那里回来的。”

“现在，请别再打扰我了。带着你的消息去吧。”

阿道夫·艾希曼，纳粹的刽子手，曾以一种神使鬼差般的高超手段，策划了对希特勒时期集中营里的600万犹太人的大屠杀，如今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8. 以尸论价甚荒唐

弗兰茨·施坦格尔是仰仗敖德萨的帮助成功地在南美住下的纳粹要犯之一。

我是在接触一份党卫队高级军官受勋名单时，第一次看见他的名字的。名字旁边还有用铅笔写的批语：“第三帝国秘密。原因：心理负担。”十分明显，这句纳粹术语的意思是：特雷布林卡司令受勋是因为在灭绝人种的大屠杀中建立了殊勋。我怀疑此事会构成他的一种“心理负担”。1970年5月，当他终于走上法庭时，他向法官解释了他的真正的“负担”是什么。他说，在某些日子里，押送给他的犹太人达到1.8万名，他必须在当天让车箱空空的返回。由于他没有足够的地方让所有这些人住下，他只好将他们统统杀死。

这种责任在“赖因哈德行动”负责人奥迪洛·格洛博克尼克送交给帝国中央安全局的一份文件中得到了证实，那是特雷布林卡、佐比博尔和贝乌泽茨灭绝人种集中营当局向柏林的帝国中央安全局运去的“财物”登记表。请看：

——25车厢女人头发

——248车厢衣裳

——100车厢鞋

——22车厢内衣

- 46车厢药品
- 254车厢地毯、毛毯
- 400车厢各种日用品
- 2,800,000美元
- 4,000,000英镑
- 12,000,000苏联卢布
- 140,000,000波兰兹罗提
- 400,000只金表
- 145,000克金戒指
- 4,000克拉的钻石，每颗均在2克拉以上
- 120,000,000兹罗提的各种金币
- 数千条珍珠项链

奥迪洛·格洛博克尼克签字

纳粹分子不只是杀人犯，而且是盗贼。

1943年末，这个地区已无人可杀：波兰最后已经被荡涤干净，犹太人已统统被扫除无存。

如同黑手党头子在刽子手完成任务后把刽子手们杀个干净，以期杀人灭口一样，第三帝国的头子们也决定消灭他们的杀人专家们。弗朗茨·施坦格尔被送到了南斯拉夫前线，那里生还的希望很小很小，因为铁托的游击队员是不留俘虏的。在特雷布林卡焚尸炉里焚烧过80万活人的人，也要被自己的头目们“焚烧”了。

可是，少数几名士兵成功地逃回了家，施坦格尔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是在战后不久找到他的，当时其子女和在奥地利韦尔斯当教员的妻子都在他身边。他并没有躲藏起来，因为躲藏反而会引起注意。作为前党卫队纵队长，他处于“自

动被捕状态”，美国人把他关进萨尔茨堡附近的格拉森巴赫的“马库斯·W·奥尔”拘留营。

他小心地掩盖自己的特雷布林卡司令的身份，而且在格拉森巴赫两年间一直守口如瓶。但是到了1947年，施坦格尔的处境突然恶化：奥地利当局在哈泰因堡人员名单中发现了他的名字。

哈泰因位于上奥地利，在茅特豪森集中营附近，是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堡。它同林堡附近的哈达马尔、萨克森的宗南斯泰因和勃兰登堡马尔希的格雷费内克堡构成四大“医疗所”，是第三帝国传授杀人技术的地方。

起初，“消灭不配生存者”计划交由维尔茨堡大学精神病学教授维尔纳·海德博士主持。（这位教授起码要对10万人的死负责。海德于1962年被捕，当时用的假名是萨瓦德博士，后来畏罪自杀。）今天，每当我听说医生们又考虑用无痛苦死亡，或者他们的行话叫“死亡解脱”的方式来对待某些患不治之症者的时候，心里就感到恐惧。获得大学文凭并不能保证不犯心理变态或虐待狂病——在哈泰因堡工作的医疗组的行为证明了这一点。

人们在哈泰因堡也开始谈论“不治之症”，接着又押来精神失常者、低能者和老人。人们很快就判定，所有患有某种精神障碍的人都是“不配生存者”。生的权利和死的权力就这样用近乎法律的形式来判断。T4专家^①们从医院取来病人的病历，借此作出裁决。病历下画个叉，就算判了死刑。

^①此系代号，T₄为无痛苦死亡行动，此名因该行动的领导中心所在地柏林蒂尔加滕街4号而所得。

一个专门小组将处以无痛苦死亡的人集合起来，押到附近的“医疗所”。起初，人们注射毒液将他们杀死。

但并没有就此罢休。在第三帝国竭尽全力寻找杀戮犹太人的办法时，海德里希意识到“医疗所”可以成为理想的培训实验中心：在哈泰因或哈达马尔验证了的，可以在特雷布林卡或奥斯威辛大规模应用。实验室设在哈泰因堡的地窖里，直通一个小焚尸炉。哈泰因堡的负责人克里斯蒂安·维尔特上尉在那里第一次用毒气杀死病人。他们的死亡过程都有精确的记时，并拍有照片，底版送到柏林。后来我见到了被迫拍照的人，是他让我知道了哈泰因的存在。

1941年，维尔特上尉调走了，接替他的是弗朗茨·施坦格尔。

尽管奥地利当局掌握的有关哈泰因的情况还极少，但施坦格尔的名字被写上了逮捕证，他离开了美国人的拘留营被羁押了起来，准备接受林茨州高级法院的审讯。那个时候，犯人要去做清除炸毁的房屋瓦砾，建筑房子。施坦格尔被分配在一队犯有轻罪的人中间干活，那里的看管相对来说比较松懈。

1948年5月30日夜里，他没有回牢房，而且谁也没有发现他逃跑。当人们发现时，谁都没有大惊小怪。美国人的各个机构都未得到通知，我在很久后才得知，施坦格尔已不在监狱了。我设法弄到他家庭的情况，邻居们告诉我，施坦格尔于1949年5月6日带着几个女儿离开了奥地利，去向不明。

事隔许久以后，施坦格尔在接受审讯时交待了他潜逃的主要经历。他在格拉森巴赫期间得知，最要紧的是设法抵达罗马。只要到那里，他就可以得到一个宗教组织的帮助。耶稣

教徒可找总统海涅曼^①，天主教徒则可在奥地利主教阿洛伊斯·胡达勒那里找到庇护。这些情报是千真万确的：胡达勒果真为施坦格尔搞到一份红十字会的护照，德国神学院日耳曼教务会向他提供了一个工作，以便他继续寻找潜逃的机会。

胡达勒于1976年在格拉茨发表了题为《罗马日记》的回忆录，吹嘘自己在1945年后将主要的慈善活动服务于纳粹党老党员和老法西斯主义者身上，尤其是服务于所谓的“战争罪犯”身上；说什么依靠手中的假护照，他将大批罪犯从“刽子手”的屠刀下拯救了出来，帮他们逃到幸福安乐的国度里。

施坦格尔逃亡6周后，到了叙利亚，开始为妻子和女儿们的出逃做准备。施坦格尔夫人决定从瑞士走。她在伯尔尼弄到了去叙利亚的签证，随即就消失了。

这期间人们弄到了关于特雷布林卡灭绝人种集中营的准确情况，弗朗茨·施坦格尔就成了追捕中的纳粹要犯之一。要是施坦格尔一直留在叙利亚的话，他会象伙伴阿洛伊斯·布龙纳一样安度时光。可是1960年艾希曼在阿根廷落网一事，在纳粹分子中间引起了一定的恐慌。他们不管生活在什么地方都失去了安全感。此外还需指出，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抓获艾希曼的人是谁。这个行动是对国际法的公然侵犯，但以色列政府宣称此事与它毫不相干。因此，艾希曼被捕不久，当以色列档案馆邀请我谈一谈在调查过程中我扮演的角色时，档案馆馆长库博维博士建议我闭口不谈我同以色列大

^①海涅曼（1899～1976），德国政治家，1969～1974年间任联邦德国总统。——译者

使馆的定期联系，对以色列情报部门的显著作用也只字别提。

我接受了这个建议，缄口不提以色列情报部门。这可大大损害了情报局长伊塞·哈雷尔的利益，难怪他对我极为不满，甚至在他1971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也只字不写我的作用。没有关系……

在那个时期，即1960年春，笼罩在艾希曼被捕事件上的神秘色彩刺激了新闻记者们的想象力，他们竞相猜测，越说越玄。譬如，德国一家杂志说，艾希曼是被一个生活在以色列与叙利亚交界处的德吕兹部族的亲以色列人掳到以色列去的。这个凭空杜撰的故事足以使施坦格尔惶惶不可终日。不久，一位德国记者告诉我，施坦格尔已经离开大马士革，溜之大吉了。

我从档案分类柜中取出他的卡片，把“大马士革”改为“去向不明”。

1965年12月，我在维也纳就哈泰因、哈达马尔、宗南斯泰因和格雷费内克“杀人学校”举行记者招待会。我向记者们指出这些无痛苦死亡实验机构同各集中营进行的大批屠杀是有联系的：在这些机构里学会忍受焚尸时的气味的人，肯定能在灭绝人种的集中营领导岗位上步步高升。

弗朗茨·施坦格尔的生涯是个典型的例子。

一个月后，我在办公室里接待一个不修边幅、衣衫槛褛、外表令人讨厌的人的来访。谈话期间，他从来不正视我一眼。有的时候，出于巧合，人是可以貌相的：“我的来访

者告诉我，他曾是盖世太保里的人。显然，他同其他许多盖世太保分子一样，“什么坏事也没有干”。“我能怎么样呢？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一个承担后果的人。”

我的舌头痒痒的，真想对他说，如果真有承担后果的无名小卒的话，我肯定也是小卒之一。他吞吞吐吐，显然有话要对我说，我请他讲下去。也许他知道什么重要的情况。

“我在报上看到了那件事，弗朗茨·施坦格尔的事。正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人，战后才有人向我们这些无名小卒找麻烦。每当我找到一份工作，人们总会知道我从前干的事，我就会被推出门外在街上流浪。”

“我想您大概什么坏事也没有做吧？”我反问道。

我看到我的对话者眼睛里闪露出愤怒，但旋即又恢复了已经成为他第二性格的奴才相。“大人物们，施坦格尔之流，艾希曼之流，他们要什么支持就能得到什么支持。人们帮助他们潜逃，给他们钞票和证件。而我，谁帮助我呢，您看我的这件衬衣和外套。没有工作，没有钱。连喝一杯的钱都没有。”

然而他吐出一股股酒气证明，他说了假话。

“您知道，”他见我默不作声，又开了腔，“我知道施坦格尔的躲藏处，我可以帮您把他逮住。施坦格尔没有帮过我的忙，我为何要庇护他呢？”

他斜眼看我一下，继续说道：“不过，我可不能为您白干。”

他一到这里我就看出了他的用心。“要多少？”我问道。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人，此人在艾希曼案件中曾主动提出要帮助我，条件是要我帮助他找到我的被害兄弟们的金牙。

“2.5万美元。”

“您完全可以要价200万。我没有这笔钱。”

来者准备跟我讨价还价。

“好嘛。我可以付您一笔钱……施坦格尔戕杀了多少犹太人？”

“永远也搞不清他指挥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时，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大约70万人吧……”

他思索了片刻，作了一番心算。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但似乎又“闭得紧紧的”，以致于我扫他一眼时他一点反应也没有。突然，这双眼睛象自动记录报警箱铃声大作一样眨巴起来。“每个死人我要价一美分，这就是70万个一美分……等于7,000美元。少3倍……”

我双手紧紧按住办公桌，强忍着没有狠狠地给他几个耳光。同时我在心里闭上了眼睛，就好似他刚才那个样。我再也不想见到他那张脸。慢慢地，我非常缓慢地恢复了镇定。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司令、有70万条犹太人命案的凶手，比这个令人作呕的蠢家伙重要得多。他在等我的答复，显然在考虑如果遭到我的拒绝，他将找谁交涉。

“今天我不能付你钱。”我终于松口了，“不过，如果你的报告能使我派人抓住施坦格尔，你会得到那份钱的。”

“谁能担保您说话算数？”

“没有人，要是你不满意，门就在你身后……”

“好吧，好吧……不必生气嘛。我这就告诉您施坦格尔在什么地方干活。但我不晓得现在他叫什么名字。刚才谈好的交易还算数吗？”

“当然。我听着呢。”

“我首先希望您写份保证书。”

我拿起一张名片，在背面写下这样一句话：“如果所提供的情报使我抓住弗朗茨·施坦格尔，我保证向持有这张名片的人付7,000美元。”

我的对话者小心翼翼地将名片放入提包。可他仍未满足。他还要求我保证不查明他是何许人。

为了抓住弗朗茨·施坦格尔，我值得下这个保证。

经过这番开场白，来访者终于提供情报了：

“施坦格尔眼下在巴西圣保罗干活。他在大众汽车公司当机械师。”

千真万确，不消几个星期我就搞到了施坦格尔的地址。林茨州高等法院对他的逮捕证依然有效，奥地利要求引渡他。

天晓得出于何种原因，巴西警方想等到狂欢节结束后才逮捕施坦格尔。但警方从1967年2月中旬就开始监视他的寓所了。两名警察化装成电缆工，在他家对面挖沟道。天气酷热，他们敲他的门要水喝，并借此机会，暗中检查施坦格尔是否有武器。在他们看来，武器是杀人凶手必备的工具。

他们看到的是一位诚实者的寓所：厨房柜橱上挂着一些小布巾，墙上钉着一个带耶稣像的十字架，于是报告上司，施坦格尔不会用武力反抗。

2月27日，圣保罗警察局长亲自到了奥地利驻里约热内卢大使馆，浏览了一遍奥地利提出逮捕和引渡施坦格尔的申请书的葡萄牙文译本。每一页文字都代表着数千起杀人案。

警察局长于当天返回圣保罗，第二天一早就派人下手了——事先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因而后来他受到批评。3名

警察带了一位摄影记者来到圣保罗的一家医院，出示证件后，要一位护士给大众汽车厂打电话，转告施坦格尔先生，他的女儿出了车祸，住进了医院，请他立即到医院来。

大众汽车厂果真用扩音器广播了这条消息，半小时后，施坦格尔出现在医院门口。

摄影记者拍下了他被捕的镜头，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刊登了这张照片。

后来我才得知上述详情。是在去美国途经阿姆斯特丹时，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的。

应当承认，在南美一个国家出色地抓住一位纳粹罪犯，这件事令我吃惊不小。

我离开阿姆斯特丹之前，同一些国家的朋友取得了联系，请他们组织从前集中营里的犯人到巴西驻各国的使馆前示威游行。另外，我又同联邦德国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政府的司法部长诺伊贝格尔博士商量，请联邦共和国也提出引渡的要求；我又向波兰纳粹罪行调查委员会作了相同的交涉。

可是十分明显的是，美国可以施加最大的压力。我一到纽约，就要求见前司法部长、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请他出面干预。肯尼迪当着我的面把巴西驻华盛顿的大使叫来，用肯定的语气说：“现在的问题是伸张正义，惩处骇人听闻的罪人。巴西如今有机会得到数百万人的友谊。”这些话本来可以说得很严肃很生硬。

巴西政府考虑到了自己的安全，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在舆论压力下，同时也是在许多人的干预下，它满足了联邦德国的引渡要求。

回到维也纳，我接到一名德国公证人的传呼，他手里掌握着我的那张名片。我在纽约时已经把早先那笔奇怪的交易告诉了朋友赫尔曼·卡茨，他从纽约给我汇来了7,000美元。

1970年5月13日，经过长期准备的审讯在西德杜塞尔多夫开庭。施坦格尔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我只是尽自己的职责而已。”他认为这是合理的、站得住脚的理由。

1970年12月22日，法庭宣读判决书：无期徒刑。可是施坦格尔在狱中没有呆多久。他于1971年6月28日死去。不久后，他从前的挚友古斯塔夫·瓦格纳探望他的遗孀，向她求婚。

他这样做，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为我抓住他提供了线索。

9. 逃犯求婚遭冷遇

1978年5月间，我在纽约至阿姆斯特丹的飞机上翻阅着《纽约每日新闻》。一条简短的花边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报纸说，4月20日一批老纳粹分子在巴西圣保罗省依塔利亚塔城的蒂尔饭店庆祝阿道夫·希特勒元首诞生89周年。

我尽力想象庆祝活动的情景。11年前，我几经周折终于在圣保罗挖出了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司令弗朗茨·施坦格尔，他最亲密的挚友古斯塔夫·瓦格纳不是也有可能躲在巴西吗？

还在施坦格尔担任佐比博尔灭绝人种集中营司令的时候，瓦格纳就成了他的左右手。后来，他又成了施坦格尔的后任库尔特·弗朗茨的副手。据集中营死里逃生的人揭发，瓦格纳是这个凶残地狱中最暴戾的魔鬼之一。他力大无比，只要在精疲力竭的囚徒的心口打上一拳或将他扔在地面，就足以置囚徒于死地。

我们从好几个渠道得到情报说，瓦格纳在巴西，我甚至掌握着他的巴西身份证的副本。但是，所有的官方机构都声称，要抓住他比登天还难。

我想象得出他在蒂尔饭店跟老纳粹伙伴们一起为希特勒干杯的情景；我似乎看到他同他们谈笑风生，议论他们共同

度过的那个不平凡的年代，各自列数杀了多少多少犹太人的情形；我甚至仿佛听到瓦格纳对他们说：“是的，不过，我是亲手杀死他们的，这要更棒些。”

我深信瓦格纳一定参加了这次奇特的仪式。会不会有哪家报纸发表一张照片来证实我的猜测呢？

早在1967年，我就有可能找到瓦格纳的踪迹。可是要在南美洲监视某个人，必须要有钱。然而早先，为调查弗朗茨·施坦格尔，我们把所有资金都拿了出来。那时，我还未筹措到必要的钱。

比起那些杀人如麻、恶贯满盈的“罪恶的官僚主义者”来，瓦格纳是个更能轰动公众的人物。瓦格纳是人们想象中的凶杀犯。

从体格上说，他的样子就象连环画中所描绘的党卫队员那样：膀粗腰圆，手掌巨大。1939年他被派往林茨附近的哈泰因，参与“无痛苦死亡行动”。

他被分配在焚尸小组。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伙伴，即后来的哈泰因实验中心司令、党卫队区队长弗朗茨·施坦格尔。他俩建立了友谊，形影不离。后来他们一起高升，把在哈泰因学到的知识用于“赖因哈德行动中。”

施坦格尔被任命为佐比博尔灭绝人种集中营司令，升为副手的瓦格纳则负责监视后来改建为毒气室的所有房屋。鉴于他平时说话下流粗鲁，上司认为他特别适合于管理“特殊苦役犯”——在囚犯中选出的犹太劳工——他们专门为党卫队员们干活。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份有用的快乐差使，但对瓦格纳这类人来说，又是令他时时生气的苦活计：他不能就地枪杀一名犹太劳工，必须等犹太人得病或弱得无法劳动

时才能下手。因此必须告诉那些犹太猪猡，他们之所以还活着，那是从实用主义考虑的结果，时间不会太长的，这也不会改变他们缺乏基本价值的本质。说服他们的最佳手段是用脚——而不用拳头——教训之。当然，纳粹们最后总是要杀他们的，但也从来不放机会去凌辱这些缓刑的死犯。审讯艾希曼时的证人多夫·弗赖贝格说，特殊犹太苦役犯上工时必须哼着歌。20年过去了，他仍背得出歌词：

哦，主啊，还我们摩西，^①

让他引导他的教友们

走向希望之乡^②。

让水如昔日那样分流，

让水涌成道道大墙，

当犹太人贱民

统统进入墓坑的时候，

哦，主啊，请关闭活门，

所有人民将永久安宁。

鉴于那流水不听使唤，瓦格纳亲自动手，全力以赴：每间毒气室容纳100名犹太人，他同施坦格尔一起监视着这一切顺利地迅速进行。

天有不测风云，但瓦格纳会努力使意外事故不影响每天处理的死尸数目。他把设法偷跑的人、不听从命令的人和躺在地上爬不起来的人一一拉出队伍，亲手结果他们的命。

①摩西，《圣经·旧约》中古代犹太人首领、先知，率在埃及为奴的犹太人迁出埃及，遇回迦南。——译者

②希望之乡系《圣经》中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迦南地方。——译者

瓦格纳继续留在那里，而施坦格尔于1942年夏被任命为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负责人，那里的实验范围要比佐比博尔集中营的大得多。

施坦格尔的继任者弗朗茨对集中营的指挥明显地不如前者：1943年10月，犹太劳工知道纳粹很快就不需要他们了，自己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于是揭竿而起。他们袭击看守，杀死集中营副司令约瑟夫·尼曼，逃进了森林。党卫队员立即追击，抓回了一部分，但难以阻止一些人永远恢复其自由。一名从战俘营转押到佐比博尔集中营来的苏联犹太军官，组织了这次暴动，并成功地逃了出去。他的揭发对瓦格纳来说是最最致命的。

暴动后不久，整个集中营被解散，最后一批囚徒被杀害。看守人员调到意大利，瓦格纳在那里又见到了朋友施坦格尔。他俩一起投奔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完全由他们那种本性的人组成的队伍。下面这件事绝非偶然：已经升为德里雅斯特党卫队警察局长的奥迪洛·格洛博克尼克，不愿意让长期忠心跟随其后的人落入同盟国手里，进而交待过去的问题。于是，格洛博克尼克便把这些“知情者”派到前线。一般来说这些人是难以活着回来的，因为南斯拉夫游击队见德国兵就杀，不留俘虏。

就这样，一大批杀人凶手都被他们的头目送到前线去了：特雷布林卡、佐比博尔和贝乌泽茨灭绝人种集中营的监察员克里斯蒂安·维尔特和佐比博尔集中营的司令弗朗茨·赖希莱特纳都被游击队员击毙。

不过，瓦格纳和施坦格尔很走运，接到了熟门熟路的使命：他们被派往南斯拉夫阜姆附近的阿尔布岛和阿巴集亚，

侦缉死里逃生的所有犹太人，并将他们集中起来押送到苏萨克集中营去。一些犹太人在苏萨克处死，另一些人不久在里齐拉迪—桑萨巴灭绝人种集中营里惨遭非命。（起码有一个奥地利人在那里工作，他叫恩斯特·莱尔施，在派到这个集中营之前，他曾参加过“赖因哈德行动”。完全是因为奥地利司法部门无动于衷的缘故，此人在里齐拉迪的确切角色一直没有搞清楚。）

战争接近尾声时，德国人炸毁了里齐拉迪，消灭自己的罪证。瓦格纳和施坦格尔逃到了奥地利。从此他俩亦步亦趋，形影不离。他俩一起被关押在格拉森巴赫，然后又同时被转押至林茨监狱。他们又同时离开劳改队，逃出了监狱，同去罗马找到了主教胡达勒，然后一起途经贝鲁特和大马士革，逃到了巴西。

几年后，当我开始追寻施坦格尔，画出他的逃亡路线时，一个情报员交来红十字会向古斯塔夫·瓦格纳提供的护照的副本。这样我们才清楚战争结束时他的模样。我从未完全断过他在巴西的踪迹和线索。我得知他经常从这一群德国人中间转移到另一群德国人中间去，从不在一个地方久呆。只要有巴西证件，穿越巴拉圭边境是没有困难的。所以，确定瓦格纳的准确落脚地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警察不给配合，每次都回答我说没有找到他。

施坦格尔案件使得对瓦格纳的调查退居次要位置。施坦格尔在狱中死去两年后，我结识了一对曾在圣保罗遇见过施坦格尔夫人的夫妇。施坦格尔夫人愤怒地向这对夫妇讲述了一次奇怪的遭遇：一天，她突然发现古斯塔夫·瓦格纳站在她家门口。他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为她的丈夫去世而向她

表示慰问，甚至当场向她求婚。

她愤怒地断然拒绝了对方，把他推出了门。施坦格尔可能从来没有把他的过去向妻子和盘托出，她不仅向奥地利夫妇说了许多瓦格纳个人的坏话，还抨击了他的活动。她说：

“我丈夫是个安分守己的务实的男人，他历来是尽责的。”她在解释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司令的责任时说：“他从未打过囚徒，他至多只是呵斥了这个或那个在押犯。可是这个瓦格纳，大家知道他是位虐待狂，谁都怕他。这家伙竟敢来见我，要求娶我！”

这次奇特的谈话发生在1975年下半年，这说明瓦格纳那时还在巴西，或许就在离圣保罗不远的地方。

在我看来，他这样的人没有参加蒂尔饭店希特勒生辰的庆典活动，真不可思议。这是因为瓦格纳喜欢热闹，决不放弃任何机会来抛头露面，炫耀自己。比如说，他告诉朋友们，他曾参加过1936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标枪比赛。可是在任何体育竞赛的记录单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记录簿中，我们都没有找到他的名字。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仗着身体的高大欺负过赤手空拳的囚徒们，而且在结果奄奄一息者的性命方面他是从来不手软的。

蒂尔饭店无疑是吹嘘这些伟绩的理想场所。总而言之，我必须弄到有关此次活动的详细情况。一个偶然机会帮了我的大忙。我在以色列的一次逗留期间，结识了一位巴西记者。他名叫马利约·奇马诺维奇，《巴西日报》派他在以色列采访。我问他：“你工作的那家报馆有这次聚会的照片吗？”他的回答是令人鼓舞的：这次活动持续了3天，许多记者都到场，他一有可能就向我提供所掌握的材料。我回到

维也纳后不几天，他就给我打电话说，他不仅有一张把在场的人都拍摄得一清二楚的大幅照片，而且还弄到了一张请帖，那上面有来宾名单。

我请马利约乘第一次航班来维也纳。

我急匆匆浏览了一遍名单：没有古斯塔夫·瓦格纳。不过照片上很可能有他——他也许用假名伪装了起来。我用放大镜检查照片：还是没有古斯塔夫·瓦格纳。

我只认出了一个老相识：曼弗雷德·勒德尔，职业律师，联邦德国一个地区性新纳粹旅游团的领队，我在一系列诉讼案中同他打过交道的。眼下勒德尔关押在斯图加特监狱里。他是1982年6月18日被判处13年徒刑的，罪名是纵火罪和爆炸凶杀罪，受害者两人。在这方面，他的事例驳斥了蒂尔聚会印在请帖上的座右铭：“我们不是昨天的最后一批人，我们却是明天的第一批人。”

尽管“有所发现”，我还是感到无限丧气。原来我完全相信瓦格纳必定会出现在蒂尔饭店的来宾中，以致于我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历史的确偏离了它的常规流向。

然而，一气之下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将纠正命运。

我不敢肯定我的计划能象我们常说的那样百分之百的“可行”，即完全合法。可是我觉得，佐比博尔集中营杀戮15万犹太人以及巴西当局的行为说明，我有理由采取行动。这是我心灵深处的呼声。马利约随时准备向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为避免把他置于微妙的境地，我没有向他直说，我故意告诉他一个假消息。我在照片上的客人中随便选了一个长着

扇风耳朵的人指给他看，并说：“你瞧，这就是古斯塔夫·瓦格纳。他完全公开地出席巴西的希特勒生日纪念活动，而谁也没有注意此事。如果你的报纸发表这条新闻，警察就再不能为自己开脱了，否则他们在世人面前将永远威信扫地。那时，他们就只好交出这个人。十分明显，巴西警察知道他在哪里。”

马利约满口答应了下来。《巴西日报》果然在头版宣布，在蒂尔饭店希特勒生辰纪念会上拍摄的一张照片上，西蒙·维森塔尔认出了杀死15万人的责任者之一、佐比博尔集中营副司令。电台转播了这条消息，全巴西都收听到了。警方不能无动于衷，立即做出合情合理的反应：被我误指为古斯塔夫·瓦格纳的人提出强烈抗议，据理指出这是个错误。这样，警方硬着头皮也得把古斯塔夫·瓦格纳找到。

古斯塔夫·瓦格纳为警方免除了不少苦劳：长期的躲躲藏藏弄得他疲惫不堪；每打开一张报纸都有他的真实照片和寻人启示，那照片同红十字会为他提供的护照和巴西身份证上的一模一样，旁边还有他的姓名，这使他终日惶恐不安。最后他向当局自首了。

他的最后一个机会是矢口否认：在佐比博尔干过这个事，实他是不否认的，但据他说，他负责的只是构筑木屋。再说，这个集中营里没有死一个犹太人。

可是，传播媒介手里掌握着他这样一个极好的主题，怎么能轻易放过。在离圣保罗900公里的戈耶纳城，斯坦尼斯拉夫·斯马雅茨纳尔从报上看到瓦格纳被捕的消息和这位党卫队员的照片，一眼就认出了他是在佐比博尔集中营对他施用酷刑的打手之一。斯马雅茨纳尔是这个集中营仅有的几个

幸存者中的一位，他14岁起就被关进该营，他为人极其机灵，终于逃出了毒气室。如今，他得知逮住瓦格纳的消息后，立即飞抵圣保罗向当局作证。从前在集中营里经常面对面的这两个男子，今天又在警察局里见面了。

“怎么样，身体可好，古斯？”斯马雅茨纳尔问道。

瓦格纳朝他打量片刻，神态困惑，最后终于认了出来。

“是的，是的，我还记得起你。是我把你从车队中叫出来的，是我救了你的命，你知道这一点。”

“是真的。”斯马雅茨纳尔把话一转，说道，“但你没有救我姐姐的命、我妈妈的命，更没有救我父亲的命。在说到救我之命的同时，你就承认了你知另一些人正在走向死亡。”

瓦格纳哑口无言了。当局已经明白，他说的佐比博尔集中营里没有死一个人这句话是不真实的，他是那些掌握着囚徒们生杀大权的人中的一个。

这位外籍巴西人被关进了监狱，等待引渡。

然而，引渡到哪个国家呢？他参与了奥地利的无痛苦死亡行动，但他的大部分罪行是在波兰犯下的，另外他参加的是德国军队，死在他手里的人大多又是犹太人。在这种情况下，我首先报告了以色列司法部长塔米尔，不到24小时以色列就提出了引渡申请。但是希望不太大。奥地利早已对瓦格纳发出了两道逮捕令，这是合乎手续的，因为他在哈泰因和佐比博尔犯了罪，可是我明白，奥地利人从来没有急于交涉引渡事宜。至于波兰，它当然也提出了引渡的要求，但希望更小，因为瓦格纳一到这个国家必处死刑无疑，这种惩罚远比巴西准备对他的宣判重得多（在此情况下，引渡的要求一般总是被拒绝的）。只有西德的杜塞尔多夫检察院才拥有充

实的证据和完全合法的权利进行交涉。

这至少是我们个人的想法。可是，1979年6月，巴西利亚最高法院作出裁决，驳回所有引渡申请。德国申请书的葡萄牙文本中有一个打字上的错漏：德文本中写的时效法已从“1947”年起停止生效，而葡文本中译成了“1974”年。

根据巴西法律，瓦格纳的罪行早在1974年前就失去刑事时效了，因此他是自由的。

德国驻巴西大使发现了译文错误，立即向最高法院交涉，要求改正文件中的错误。人们回答他说，需要等拿到司法当局决定的副本后再说。

几个月过去了，司法机关的书面决定迟迟没有送达大使馆。当德国大使馆向最高法院提出复审请求时，连瓦格纳的影也找不见了。

巴西人断然地永远拒绝了引渡。

在拒绝的同时，巴西承认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样，巴西在犹太人脑子里留下了很不友好的印象。

不过，古斯塔夫·瓦格纳又一次拆当局的台：在羁押期间，他的心脏病发作过多次，曾试图自杀过。经过医院长期治疗后，他不久就离开监狱恢复了自由，可他又珍惜自由。在好几个月里，巴西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揭露他在佐比博尔实施的恐怖体制，同时还公布了证人们的揭发材料。就这样，他求职无门，众叛亲离，连德国侨民们也给他吃闭门羹。到了1980年10月初，他在一处偏僻的农舍里悬梁自缢了。

我寻思，在死前那几秒钟里，使他一直良心不安的数以万计的死者的灵魂是否纠缠着他，他会不会是被自己严重的

错误折磨致死的？莫非他被人追捕得精疲力竭，对隐匿躲藏的生活感到厌倦不成？爱德华·罗希曼也是这个下场。此人我从来没有抓住过，但他的死无疑是最惨的，那是见到自己的影子也要躲避的人的下场。

10. 杯弓蛇影难得宁

我从未听说过他，但他告诉我他是位作家，还是位遐迩闻名的作家，好几部作品已被搬上银幕。为佐证其说属实，他把弗雷德·齐纳曼签署的一封信递到了我面前，内称：弗雷德里克·福尔西斯先生是位才华横溢的作家。齐纳曼要求我支持福尔西斯。

“在哪方面我可帮助您？”我看完介绍信问来者。

这时我发现，福尔西斯对我的了解，远远超过我对他的了解。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您的全部著作，”他饶有兴味地说，“我特别为您对敖德萨逃亡网的种种发现而震惊。我想为此写一部书，当然还要搞一部电影。您知道这将是一部极好的电影脚本。”

“您要我干什么？”

“提供历史背景。虽然这是部恐怖电影，仍然要求全都是事实。一切都应当是发生过的。”

我寻思片刻。要我合作写东西，这已不是第一次，但迄至那时为止，合作的都是严肃的书，或资料性质的著作。假如我因参加一部纳粹罪行的惊险电影创作而卷入影视界的话，我很可能会威信扫地。我抱歉地说：“对不起，恐怕我

难以相助。”可是福尔西斯还没有把话说完：“我把已写好的剧本概要留下，请您浏览一遍，也许您会改变主意的，好吗？”

“很好。”我回答说。我们商定第二天再见面。

当天晚上，我读了福尔西斯的剧本梗概，它讲的是一位德国战犯逃亡的故事。一个念头突然闪过我的脑海。

这故事同我处理的一件很老的案子有关，即爱德华·罗希曼案。我得到有关他的第一批情报的时间是1946年12月8日，而且仅仅是他的一份简短的履历：罗希曼，1908年11月25日生于格拉茨，战前是酒类推销员，后受雇于一家酒吧，接着又在叙利亚一家酒精厂工作。他声名狼藉，从那时起就跟纳粹分子打得火热。后来他在第三帝国时期发迹，成为里加犹太区第二司令。担任这个职务后，他起码要对3,800名犹太人惨遭杀戮负责，死者中有800名未满10岁的儿童。他还负责把不计其数的犹太人押往奥斯威辛灭绝人种集中营。1960年公布的材料将他的受害者人数增加了许多。人们指控他屠杀了2,000名失去劳动力的犹太人，他组织了从拉脱维亚的杜纳莫恩德出发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战俘队伍。根据现有的材料作最低的估计，死在他手里的人约达3.5万，他应受到良心的谴责。

战争结束不久，象有关大批纳粹战犯一样，有传言说罗希曼已经被捕处决，但毫无证据。

然而在1947年，罗希曼突然露面了，活生生地出现在格拉茨他家中。他立即被捕。当时人们没有追究他在里加的累累罪行，而是指控他参加了一个新纳粹组织。他是特奥多尔·祖策克的朋友，是后者组织的“索尔贝”即争取欧洲秩

序社会运动的成员。祖策克的一大批同伙——不论是新的还是老的——都于同一天在格拉茨及周围地区被捕，爱德华·罗希曼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那个时期，我同奥地利警方的关系相当密切，因此不久就听说了这次搜捕。我立即采取行动，报告美国人，里加第二司令在偶然之中落网了。如果他们不想冒奥地利人释放他的危险的话，最好是赶快过问此事。美国人听取了我的建议：他们通报了英国人，因为当时的格拉茨在英国占领区内。美国人要求将罗希曼交给他们。

起初，罗希曼并不十分惊慌，因为他认为人们只怀疑他有新纳粹主义活动，何况一起被捕的还有200来名伙伴。可是有一天上午，当一名军官和一名士兵前来找他，要把他押往德国达豪去时，他顷刻明白了面临的危险：奥地利纳粹分子们十分了解，设在从前达豪集中营里的美国军事法庭是十分严厉的。

人们坐火车押解罗希曼。在格拉茨至萨尔茨堡途中，他有足够的时间思考面前的处境。火车在哈莱因站小停，他请求上厕所，这本来应该引起看守的警惕，因为一般说来，火车靠站时是不能使用厕所的。可是，英国士兵只满足于在门口守着，谁料罗希曼趁机从窗口跳上路轨，消失在沉沉的冬夜之中。

几分钟后，英国士兵砸破厕所的门，立即拉响警笛。开始奔跑的火车紧急制动，但已经离站数公里了，尽管刚下的大雪上留着明显的足迹，结果仍未找见逃犯。后来罗希曼招供说，他一动不动地在雪地里躺了一夜，以免留下痕迹。他等到翌日上午才去寻找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帮他逃离了那

里。报纸只字未提罗希曼潜逃一事，因为英国人不愿意让人知道他们的愚蠢。我是在询问达豪当局案情进展时才听说此事的。

十分明显，当时已无望抓回罗希曼。

数年后，我得知他离开哈莱因后，到了亡命中的纳粹分子的一个集结点，即上奥地利同萨尔茨堡之间的边境小镇奥斯特米廷。多亏老纳粹之间互相转告的口令，他在那里证明了自己的身份，接上头后在一座砖窑里躲了15天，等待地下组织下一车队到来时越过意大利边境。他到了意大利后，象所有同伙一样在罗马的维亚—西西里亚方济各修道院里藏了起来，得到胡达勒主教的庇护。卡利塔斯组织驻罗马办事处策划他向阿根廷的转移，并负责全部费用。当他踏上阿根廷的国土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马约别墅住了下来。

罗希曼之所以选择阿根廷，是因为他妻子的父母（维特梅尔家族）住在那里，他觉得可以指望他们的帮助。如胡达勒运送出去的所有逃犯一样，罗希曼怀里揣着假护照：现在他名叫弗里茨或弗雷德里克·韦格纳，他就是顶着这个名字在阿埃洛斯旅行社供职的，后来跟一个叫施特姆勒的人一起合办了一家木器厂。

1955年，他娶自己的女秘书伊尔姆特劳德·舒贝特为妻，尽管他在格拉茨有妻儿。

他的合法妻子通过维特梅尔家族闻知此事，报告了奥地利当局。

就这样，爱德华·罗希曼，又名弗里茨·韦格纳，因重婚罪于1959年受到追捕。

只是又过了一年，当局才因为他在里加的罪恶活动，签

发了第二道通缉令。

我们不断得到罗希曼的消息，甚至还了解到他的假名。但当时我们失去了他的踪迹。1958年，伊尔姆特劳德·舒贝特离开了他，回到了德国，汉堡一家法院解除了他们的婚姻。

至于罗希曼，有人说他已到了巴西。

在好些年里，寻找杀死3.5万名犹太人的凶手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1972年夏天，正当我们束手无策的时候，弗雷德里克·福尔西斯作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跟我讲述他的关于敖德萨的写作计划。

书和由此改编的电影主人公是个假设的罪犯，取名贝格曼。此犯为逃避我的追寻，试图在敖德萨的帮助下销声匿迹起来。故事写得满不错，很贴近事实，可读性极强。它把贝格曼写成一个四面楚歌的人，从来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连续住上几天，老是在东躲西藏，疲于逃命。

这倒给了我一个念头。我对福尔西斯说：“我准备帮助您，条件是您给贝格曼一个名副其实的纳粹罪犯的特征，让他象真人一样存在，在敖德萨的帮助下确实逃之夭夭了，如今顶着假名生活在南美的某个地方。我知道有人会指责我接受您的建议而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但如果我这样做会有助于我们抓到那个家伙，我准备冒这个险。”

“维森塔尔先生，您刚才那番话就是我著作的前言。”福尔西斯高兴地对我说。

于是，我俩开始埋头研究罗希曼的案卷。鉴于我对里加和凯泽瓦尔德集中营发生的事不甚了解，我介绍福尔西斯跟维也纳古董商弗里茨·多伊奇联系，此人曾被从维也纳押往

里加。多伊奇为他业已取名为《敖德萨》的书提供了一切必要的详细情况。

福尔西斯同我保持着联系，把写好的章节逐步交给我看，然后一起讨论。有一次，我又向他提了个建议：我要求他补充一个情节，使罗希曼在他的旧友中身败名裂。福尔西斯立即加了一段，写他笔下的逃犯在逃跑时杀了一名德国军官，占据了该军官在一条外逃船上的位置。

最后只有一点令我不太满意：我认为贝格曼的逃亡应该同罗希曼那样是成功的，因为我想借此要求公众帮助我抓到罗希曼。可是在影片中，贝格曼被捕了，被处死了。

电影编导告诉我，绝对不能在连续两个小时的电影里，让观众看到一位穷凶极恶的罪犯作恶多端，而最后的结局是任凭他逃走。应该有个“愉快的结局”。散场后观众走出影院时，应当满意地认为，正义总是会胜利的。

我充分理解他们的意见：这就是生活与电影之间的区别。

另外，编导建议由我亲自出演自己的角色，我将得到一笔十分可观的报酬，可是我不愿意在影视界中卷得如此之深。于是，我的角色交给了以色列演员施穆埃勒·罗丹斯基。人们在他脸上用去了几吨重的化装膏，他看起来才有点象我。还有一点，罗丹斯基要比我矮小得多。因此在整部电影里，他始终坐在办公桌后边。

这张办公桌跟我的不一样，那上面有足够的空地方摆纸写字。

书和电影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敖德萨》一书被译成了17种语言出版。同名电影于1979年在纽约问世，全世界都

放映了它。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盘算是极其正确的。尽管电影中那位纳粹分子最后被处决了，但我们还是收到观众们的大量来信，都说曾在什么地方见过此人。

这时，一对美国夫妇在玻利维亚桑塔克鲁兹餐厅的一群德国人中认出了他。这两位美国人耐心地等到所有客人散尽之后，径直朝他的桌子走去，给他斟上一杯香槟酒。

他们把这只杯子仔细包好，寄给了我。信中写道：

“罗希曼还活着，您在杯子上可取到他的指印。”

我们果实验明了罗希曼的指纹，因为他在格拉兹被捕时人们取过他的指纹。这里边只有一个漏洞：美国夫妇看见的那个人不象爱德华·罗希曼，但象《敖德萨》里的主要演员马克西米利安·舍尔。

此外，象他这样的人，人们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遇到过数十次。实在走运的是，马克西米利安·舍尔本人从来没有被人阻拦过。

正当我认为自己的如意算盘彻底打错了的时候，我设的圈套开始发挥作用了，而且发挥作用的方式完全出乎意料：这影片引起了罗希曼在南美的旧友们的注意，无疑也引起了罗希曼本人的注意。

我是从一位德国演员那里听说此事的。他随剧团到拉丁美洲德国侨民及其机构中去巡回演出。这些活动是联邦德国文化协会为侨居国外的德国人组织的，演员们往往下榻在德国人家里，这样他们可以感受到今天那些家庭里的气氛。在好多家里，墙上还挂着希特勒、希姆莱和其他纳粹领导人的像，人们谈论逃亡纳粹分子时的口气，就象其他地方的人们

谈论被迫害者时的口气一样。奇怪的是，不仅在战后逃亡的纳粹分子们中有这些倾向，甚至连战前的移民也亦然：他们把祖国理想化了，用各种美德将它装扮起来，至于第三帝国时期的事，他们简单地一笔勾销了事。一位德国老侨民在同汉斯（我给那位演员朋友起的名）讨论时这样说道：“一位德国人会杀死妇女和儿童，这是不可思议的。这等事只会发生在生活在这里的原始森林里的野蛮人中间，而不可能发生在我们那样有教养的人民中间。”

人们向他们解释说，这些罪行确有其事，而且已经审理了无数个案子。他们则回答说，这是胜利者在行使权利。如果德国人打赢战争的话，报刊上的文章、书籍和判决，则完全是另一种腔调。

在世界的这块地方，第三帝国的最凶恶的凶杀犯经常麋集在一起，大批德侨认为所谓几百万犹太受害者完全是同盟国杜撰的，或者是犹太人自己编造出来的。

无怪乎这么多亡命的纳粹罪犯能够在他们的侨胞那里得到隐匿和支持——大部分侨胞都是些十分正直的人。有一天，我曾经把阿根廷称为“最后希望之角”：纳粹罪犯可以在那里找到最后的隐匿处，德国移民们则竭力维持着这样的希望，即纳粹分子不是人们描绘的那种杀人凶手。

在这种气氛下，《敖德萨》描绘的罗希曼，为在出逃的船上搞到一个位置而杀死一名德国军官，这个罪名其分量很重。我的朋友汉斯在德国侨民中多次听人说：“这家伙是个猪猡！他应当逃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不是抢占别人的位置的理由呀！”罗希曼，特别是在妇女们中间，威信扫地了，原先她们准备原谅他充当了里加犹太人区的第二司令，

可是他的重婚罪使他遭到了众人的唾弃，

种种迹象表明，从前的伙伴们纷纷抛弃他了。

我们得知，“他的”电影在南美放映，以及“他的”书在各家书店出售之后，他就不断地搬家换地址，在同一地方至多只住几星期。尽管他跟马克西米利安·舍尔不尽相象，但抬头即见的电影海报告诉他，那个人就是他自己。人们议论的是他，走出影院的观众们脑袋里想的也尽是他的逃亡和罪行。

他哪里知道，涌向我们的有关他的情报，实际上都是观众们想象的结果。他害怕大街上打量他的人、饭店里同他擦肩而过的人、商店里请他稍许耐心地等待片刻的人。要是这些人报告警察该怎么办？任何一位德国朋友都可能成为他的犹大^①，为被他“杀害”的那位德国军官报仇。

罗希曼成了电影中那位四面楚歌的人。

1977年夏，阿根廷警察局接到一份准确无误的情报，罗希曼于7月1日在藏匿处被捕。德国大使馆立即向德国司法当局报告消息，3天后，德国司法当局提出了引渡申请。阿根廷同意引渡。他们只是要求把所有材料译成西班牙语，在60天内送给他们。

报纸刊登了这个消息。德国侨胞界大风骤起：面对引渡罗希曼的要求如此迅速地被接受的现实，他们纷纷怀疑自己会不会遭此命运。

德国侨民在阿根廷有极大的影响：1977年7月5日傍

^①犹大系《圣经》中出卖耶稣的耶稣信徒，此名已成为叛徒的同义词。——译者

晚，监狱的门向罗希曼打开了；他被释放了，条件是立即离开那个国家。

当局向报界宣布，被捕的人不是罗希曼，政府重新发表声明，从未接受过德国方面的引渡申请。它至多只是同意过问这一请求。

德国侨民平静了下来。

可是，惟有爱德华·罗希曼寝食不安。出狱那天，他到汽车站买了张去巴拉圭的汽车票。19个小时后，他在亚松森高速公路终点站下了车。他身边只有一只小提箱，放着一些日常用品，皮夹里仍然夹着阿根廷护照，还是弗雷德里克·韦格纳那个名字——当局在释放他时将护照等证件还给了他。

我得到的一些可靠的情报来自巴拉圭警方，他们告诉我，罗希曼还是惶惶不可终日。他借居在首都胡尔巴街德里奥斯家，总是提前10天付食宿费，既没有来信和电话，也无访客找他。其他房客说他是神经质的、内向的、不可捉摸的人。有时候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连几天读着什么东西，不跟别的住客交谈。

两个星期后，即7月25日，他突然晕厥。德里奥斯夫人和儿子将他送到一所大学的诊所治病，他说他叫拉蒙·内雷亚，从乌拉圭来。他的病情稍有好转，便出院回到胡尔巴街膳宿公寓。他照样付帐，同时明显地流露出搬家的意图。可是心脏病发作，完全把他打垮了：他又被送进了医院，于8月10日至11日夜里去世。

战争期间在里加、眼下生活在亚松森的一位犹太人认出了拉蒙·内雷亚，即弗雷德里克·韦格纳其人。他确实就是爱

德华·罗希曼。一些陌生人用塑性炸药炸毁了这位证人的房子。

一周后，两名巴拉圭记者给我送来死者的指纹和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人虽已去世，但仍然是一副被人追寻得无路可走的窘样。

指纹同1947年12月31日爱德华·罗希曼在格拉茨被捕时采取的指纹完全吻合，一切错误均可排除。

可惜的是，在一系列同类案例中，有的根本无法辩明死者的真正身份。最著名的例子是约瑟夫·门格勒案——我的最新情报使我怀疑他已去世。

11. 生死不明悬疑重

对待纳粹战犯的死讯务必持极其谨慎的态度。没有比用自己的死讯来掩护自己继续活下去这个手法更高明的了。阿道夫·艾希曼是这样干的，海德—萨维奇博士或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米勒也是如此。

因此，我对此类讣告历来持怀疑态度。这里边还有一个心理现象：我们越是希望战争中的刽子手统统死去，就越想在战后把他们活着找到。他们在享受死的权利之前，必须先受应有的惩罚。

我忍受不了这样的主张：让凶手在战后宁静地生活，安度晚年，在睡梦中悄悄死去。也许正是出于这种情绪，加上希特勒确已死去，因此我们总希望他的副手马丁·鲍曼还活着。这样还有一个人可供我们向他算总帐。

世界各地严肃的目击者都说看见过鲍曼。一些受过其害的人认出了他；新老纳粹分子把他尊崇为他们的秘密领袖；一些报刊则用重金购买他答记者问的假文稿。

我深信他还活着，并收集到了有关他的大量情报。

这是些有关一个幽灵的情报：1973年，法兰克福检察院验证一具尸体的残骸，一系列特征表明死者是鲍曼。另外，陪同他逃离总理府小型掩体的施通普费格尔博士也已被清楚

地验明正身。

我翻阅我们有关鲍曼的全部资料：9大本材料，总共为2,000多页。我想弄明白，这一大堆错误的情报在这些年里是怎样积累起来的。我想这里有4个原因。

1. 战火刚熄灭，纳粹分子们需要一个活着的鲍曼来证明他们的口号“我们会回来的”的正确性。于是就编造出了鲍曼坐潜艇逃至南美的传奇说法，甚至有人还不断地认出他来，直到把这个海市蜃楼般的景象挪到近东。今天这类谣言仍未绝迹。它们的根据是战后发现的海军情报部的一份无线电报，说什么这份电报是鲍曼于1945年4月22日发给他在上萨尔茨堡的副手胡梅尔的，内称：“同意撤到提议中的南部海外去。”

直到70年代，我才得知“南部海外”这个提法同南美洲毫无关系，它指的是慕尼黑南边的一个火车站。

2. 在冷战期间，一名活着的鲍曼对东方集团反联邦德国的宣传有极大的好处，该集团把联邦德国说成是“纳粹主义和复仇主义的避风港”。随着德国同东方各国一一签约，上述好处就自行消失了。

3. 全世界的报纸杂志随时准备为一星点鲍曼的消息付出巨款。一些令人可疑的情报员和耍嘴皮子的人做了笔好生意，把新闻记者们引入歧途，说什么鲍曼生活在某个“丛林中的城堡”里。这种说法刺激了公众的好奇。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明星》画刊的编辑们甚至面对一位中间人同意出巨款购买鲍曼的答客谈话全文，而且还愿意掀起一场反以色列宣传运动。

4. 鲍曼的体格十分一般。在随便找来的50名德国人

中，总有一人象他象得真伪难辨。每当这样的德国人出现在南美，总会引起一阵猜测和议论。甚至还逮捕过一个人，此人的模样跟鲍曼完全相象，就象1945年他最后一张照片上的那个形象。可是那个时候，鲍曼的年龄恐怕要比被捕者大20到30岁。

上述分析如今使我确信法兰克福检察院的观点，即在发现自己无望逃走的情况下，鲍曼已于1945年5月2日至3日夜里自杀。

鉴于我在鲍曼问题上出了差错，我久久自问，提出我对约瑟夫·门格勒之死的怀疑是否是严肃之举。可是恰恰在门格勒问题上，我坚信这种怀疑是合情合理的，即使这里边有我希望听说他还活着的不合理的成分也罢。我重新考虑了奥地利前奥斯威辛集中营在押犯联盟主席、曾在门格勒手下当过犯人的女医生伊拉·林根斯的话：“我想今天我可以毫无复仇之心地重新见到当时我遇见过的其他所有人。当然，我希望他们受到惩罚，可只是为了执法，而不是为了个人的满足。但门格勒这个人，我想我会要跑到法庭上去扭断他的脖子的。”

说这番话的女人如今已高龄80整，众所周知她是个有分寸的人。她是最早谅解和宽宥纳粹党党员的人中的一个。可是，她曾亲眼见过门格勒的勾当，尤其是1942年中在比克瑙妇女集中营发生流行性伤寒病时他的所作所为。

大家知道，这种由虱子传播的最终导致脑膜炎的病在波兰的各个集中营里致死的人数，要比纳粹的毒气室里丧命的人数还要多。这是因为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病人难以维持

心脏的功能，因此伤寒病一般都是致命的。刹住这种病蔓延的唯一办法，是进行彻底全面的消毒，消灭虱子。

可是，囚徒中的医生们不敢告诉门格勒，蜷缩一团的病人得的是伤寒，因为他们知道门格勒会立即把这些病人送进毒气室。

集中营里的工作人员明白，得这种病的人治愈率至多是十分之一。另外，就连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工作人员也一样，他们都有一条界线不愿意逾越，即不愿意做决定他人生死的人。

因此，在押犯中的医生们内心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如果他们不报告，他们就不能要求进行消毒，尽管门格勒完全清楚集中营内闹的是什麼病；假如不进行消毒，那就意味着更多的妇女染病。

门格勒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虱子代劳了。

可是转眼间一些看守也病倒了。虱子可区别不了雅利安人的宝贵脑袋和犹太人或波兰人的卑贱脑袋。一些党卫队员一命呜呼了，良好的食物和充足的药品都救不了他们的命，纵然有医生的精心治疗，伤寒还是致他们于死地。

门格勒被迫采取行动了。

他把犹太人牢区的所有女犯押进了毒气室。牢区腾空后便可消毒。这样，虱子被消灭后，其他牢区的妇女就可以迁入消过毒的牢区，以此循环，最后消灭了整个集中营内的虱子。

这个行动无疑拯救了数千名非犹太犯人。

伊拉·林根斯把门格勒描绘成一个勤于职守、智力超群的优秀医生。他除了拥有医学博士学衔外，还有慕尼黑大学

颁发的哲学博士学位。他甚至在集中营里也花大部分时间进行专业研究，课题是双胞胎妊娠。几乎所有的人都听说过他那超出人们想象力的实验。

门格勒是个狂热分子，他是虔诚地认为种族歧视理论有其根据的人中的一个，他希望将来能确立金发蓝眼的匈奴族的地位。

可是，他自己的形象并不完全象匈奴族人。他的身高不超过1.74米，左眼轻微斜视。从他在奥斯威辛干起，他就开始秃发。令他越发恼火的是，他发现有些孩子长得不快。一名从前的在押犯告诉我，一天，门格勒在墙上钉了一些长短不一的钉子，借此测定孩子的身高同年龄是否相称——不相称者被立即送进毒气室。

在门格勒亲自动手杀人时，他采用“药物”下手，工具是干净无菌的注射器。出于对科学的好奇，他给人注射羰基、汽油或空气。还有人告诉我，有一天，他用刺刀尖挑穿了一个孩子，可是我认为此人也许搞错了人。门格勒的裤褶总是烫得那样笔挺，皮靴锃亮发光，手上戴着洁白的手套，他不是愿意弄脏自己手的人。他留给自己的是更为崇高的使命：注射、下命令、或选择送给死神的囚徒。是的，他刚愎自用，绝不会干出这样下流的杀人勾当来。

他对执掌生杀大权的绝对主人的角色十分满意：他站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戒备森严的城垛上，趾高气扬，威风凛凛。

伊拉·林根斯记录的他挑选出来的病人的名单具有一个特点：凡没有希望很快就能重新干活的女病人都被挑出来送进毒气室。在押的医生们试图改变她们这种命运，为病情最严重的人也作出相当乐观的诊断。可是门格勒识破了这一

点。为刹住这种做法，他宣布一条纪律：每位医生给所有病人开个名单，在每个人后边写上自己的诊断和预测。如果医生估计一位病人要3周后恢复，此病人就被送进毒气室。在最大限度的3周期限过后，他就认为所有的病人都已治愈，病人们就应恢复劳动。换句话说，病情仍然很重的人只有死路一条。

约瑟夫·门格勒是个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党卫队员。遗憾的是，他不是象阿道夫·艾希曼那一场重大诉讼案的主角，否则全世界都会注意他的审讯，因为世人都想要知道，当场执行艾希曼从办公室发出的命令的人是啥样子。

他们两人互为补充：艾希曼加快了灭绝人种大屠杀的速度，因为有人向他下了这个命令；门格勒则深信无疑，应当消灭犹太人，要是没有犹太人，那就没有必要存在奥斯威斯集中营。

人们长时期里不知道艾希曼的下落，与此相反的是，人们却几乎始终知道门格勒躲在哪里。1945年，他从奥斯威辛回到了故乡京茨堡，在多瑙河畔的这个小城过着宁静的生活，直到1950年。本世纪初，他父亲在小城开了一爿农机厂，后来发展成为世界规模的大企业，叫做“卡尔·门格勒父子”公司。战后，该企业收买了阿根廷的“KGSA农机公司”50%的股票，将它改为专售德国拖拉机的子公司。这样，即使在流亡期间，约瑟夫·门格勒也不觉得孤独。

1950年，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被追寻的老纳粹名单上。他的一些旧友和老部下——比如他从前的司机——交待了他在奥斯威辛参与过的种种罪行。这使人感到战后对纳粹

罪犯的调查缺乏协调和配合。伊拉·林根斯在《恐惧的囚徒》一书中详细记述了门格勒的罪行，该书早在1948年初就已面世了。但它是在英国出版的，而门格勒所属的检察院却在布里斯戈的弗里堡。至于西德路德维希堡的纳粹党罪行中央调查局，在1959年才成立。因此只能寄希望于某个法院。

门格勒在联邦德国真正开始感到危险，那是战争结束5年以后的事。

显然，他是消息灵通的：1951年，他走上了通向意大利的雷斯亨帕斯—梅拉诺通道。到了热那亚，在敖德萨的帮助下他划船抵达西班牙，不久又上路直奔南美。1952年，他怀揣一系列假护照进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化名弗里德里希·埃德勒·冯·布赖滕巴赫，以医生身份落了脚。

1954年，我的朋友、奥斯威辛集中营国际委员会秘书长赫尔曼·朗拜因得知门格勒的住址。德国当局要求引渡，但是阿根廷说找不到他。1959年这种情况又重复了一遍。当初，我的一名情报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现了门格勒的踪迹，他在我的要求下将下面地址转交了德国大使馆：布宜诺斯艾利斯，维桑特-波佩FCNGBN区，维利-奥蒂兹路970号。1960年1月初，波恩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发出第二个紧急引渡要求。阿根廷人再次拒绝：国家检察院于1959年12月31日宣布，指控门格勒的罪行与其说是“刑事性的”，倒不如说是“政治性的”。

拉丁美洲的所有国家从来不引渡政治犯。这条规定不仅仅出于那里当政的“实力人物”对德国纳粹制度的同情，而且也是南美一个老传统的结果：世界的这块大陆政变迭起，因此常有这样的情况，昨天还在台上的政治家今天突然

要到邻国去避难。这样，南美各国政府把避难权神圣化了，因为每一个总统都知道，说不定哪一天自己也要乞求避难权。

拉丁美洲的政治家们显然都不愿意为引渡大屠杀的罪魁之一而创下先例。门格勒利用了这一点，曾一度公开使用自己的真名实姓生活在那里。

1959年9月，他得知德国政府要求引渡之后，暂时躲到了巴拉圭，不到一个小时，他根据该国政府第809号法令，加入了巴拉圭国籍，取名何塞·门赫莱。不久他返回阿根廷。不过他感到还是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安第斯山脉下濒海的巴利罗切住下好。许多有钱的老纳粹在这个离智利边界一箭之遥的山区拥有别墅。如果阿根廷变得不那么可靠，他们可以到智利去过安逸的日子。

但是庇隆的继承者们统治的阿根廷提供着一切必要的安全：德国的引渡申请书被遗忘在抽屉里，一句解释的话也没有。正因为如此，以色列人在艾希曼案件中才决定采用绑架手段。

这一冒险事件触动了阿根廷人，他们决心表明，不再为引渡老纳粹罪犯制造任何困难。于是，他们在1960年6月发出了“何塞·门赫莱”的逮捕证。

可是，门赫莱又不见了：就在艾希曼被绑架那天，他就逃之夭夭，穿过了巴拉圭边界线。

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这位医生的朋友遍天下。他们极其审慎地忠诚地为他效劳，以致于他竟然能够返回京茨堡为父亲奔丧，在一群英国女青年寄宿的膳宿公寓里住了好几天。

许多人认出了他，但谁也没有告发他。当时负责追缉门

格勒的检察官拉恩在不久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京茨堡的所有居民仿佛是一群有攻守同盟的阴谋分子。京茨堡市长赛茨博士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直到人们查明他是门格勒家族的公证人，他才哑口无言。前市长米夏埃尔·策厄特迈埃尔对一名瑞士记者说：“在这个城市，谁也不会说什么，尽管他们知道来龙去脉。”

在这类事例中，我不禁怀疑这些人的行为是否完全受理智支配，他们是否真的知道——并相信——门格勒在奥斯威辛曾将数十万人送进了毒气室；他们是否真的知道——并相信——他杀死过孩子，唯一原因是这些孩子太小；他们是否真的知道——并相信——他在数以千计的人的心脏里注射过毒液，将他们一一致死。如果在京茨堡见过门格勒的人真的知道这些，但又拒绝揭发他的话，我倒真的担心，希特勒的悲剧总有一天会在这个城市里重演。

奔丧结束之后，门格勒回到了他在南美的新的祖国。他当然很乐意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但逮捕令尚未撤销，于是他又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落了脚。巴拉圭在各个方面都很投老纳粹们的心意。在200万人口中，3万人是德国籍的。该国总统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将军本人就是巴伐利亚一骑兵团军官的孙子。尽管斯特罗斯纳出生在巴拉圭，他却依然保持着日耳曼人的许多特征：举例说，他的卫队由“大魔鬼^①”组成，他们采用德国军队的鹅步走路。

1962年7月，波恩政府要求巴拉圭当局对住在亚松森市

① “大魔鬼”是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的卫队绰号，由高个子普鲁士人组成。

富尔赫尼科-莫雷纳街S07号的何塞·门赫莱作一调查。几个月后收到了答复：“门赫莱是巴拉圭公民，没有犯罪前科。”

1962年，我得到消息，门格勒的妻子在苏黎世附近克洛滕市施维姆巴德大街9号租了一处小屋。她丈夫无疑想回来看望她。我要求我的私交、国民会议成员维尔纳请瑞士警方监视门格勒妻子的访客。她的家族十分富有，却住在离机场不远的地方，这是很奇怪的。这样的选择决非是毫无考虑的。

我想弄个明白，便派一个朋友化装成保险公司代理人去拜访门格勒夫人。他成功地闯进了内室，但没有发现任何男人活动的痕迹。门格勒夫人显然是独居此处的，至少眼下如此。

总之，不管她究竟有何考虑，反正她丈夫不会有时间回来找她啦，因为瑞士人的行动准则是，医治您偏头痛的最佳药方是割掉您的脑袋。他们驱逐了门格勒夫人。她到了意大利的梅拉诺，住在维亚公园街2号。

一直等到1979年，我在洛杉矶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帮助下，才终于成功地迫使斯特罗斯纳总统抛弃门格勒：巴拉圭不想同在此案中全力支持我的美国全体参议员为敌。

他的政府一开始采取否认门格勒是巴拉圭公民的做法。可是这与一个叫亚历山大·冯·埃克施泰因的男爵1961年在法兰克福的谈话背道而驰。埃克施泰因当初承认，他同另一名德国人、一位名叫维尔纳·容的商人担保，门格勒在巴拉圭已安家5年，准备获得新的国籍。这次谈话足以使美国参议员们深信不疑，因此，斯特罗斯纳不得不供认不讳。

1979年春，我的案头增加了一份新材料：我获悉门格勒

之子罗尔夫——他是柏林一家公司的董事——准备到巴西去。

如果他想在那里会见他父亲的话，那么他准是跟亡灵有约会。

因为有消息说，门格勒于1979年2月7日在离圣保罗不远的浴场游泳时淹死了。

外界直到1985年6月5日才得知门格勒的死讯。我还要晚一天，因为6月5日我正坐在从阿姆斯特丹飞往纽约的飞机里。当我抵达肯尼迪机场时，黑压压一大群记者将我团团围住，问我对此消息有何想法。我粗略地打听一番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怀疑：“这是我追寻他的踪迹以来，门格勒第七次死亡。”

一进旅馆，我又得到了新的情况：法兰克福检察院接到一份情报，说是可以在门格勒家族企业的代理人汉斯·泽德尔迈尔那里，找到有关约瑟夫·门格勒的主要材料。检察长克莱因向法院申请搜查证，结果遭到了拒绝。克莱因又向上级机关交涉，几星期后才得以搜查泽德尔迈尔家：人们果真发现了来自巴西的信，证实门格勒已于1979年2月7日去世，葬于圣保罗县的安布公墓里，墓碑上刻的名字为沃尔夫冈·格哈德。

发现此信的日子似乎可以证明信的内容的真实性。因为如果是门格勒自己制造的死亡假象的话，理应尽快宣布他的死亡。反之，人们同样可以认为，在1985年宣布其死亡亦有其道理，这样或许更能使人相信，他确实在1979年就去世了。果然如此，后一种办法看上去更能令人信服。

我询问德国当局，是否监视过泽德尔迈尔，是否经常监

听他的电话，或检查他的信件。他们根本没有往这方面想过。

然而，人们知道泽德尔迈尔一直跟门格勒保持着联系，甚至还同他见过面。同样，胸前挂满勋章的德国军官鲁德尔上校成了斯特罗斯纳的朋友，负责巴拉圭警察局，他是门格勒的朋友和保护者之一。他确保着门格勒跟泽德尔迈尔之间的联系，同门格勒也见过一次面。我把这些情况报告了检察长弗里茨·鲍尔。

弗里茨·鲍尔早在1964年就给我写过复信：“我们知道，泽德尔迈尔以前同约瑟夫·门格勒见过几次面。不过我们不知道6星期以前是否有过会晤。泽德尔迈尔就此问题已经向检察院作过说明；我们是否可再作一次尝试？”

由此可见，当局并非不知道泽德尔迈尔是通向门格勒的链条上的主要一环。

1971年，负责门格勒案件的法兰克福预审法官冯·格拉泽纳普查访全世界，试图弄清问题。他询问过泽德尔迈尔。可是门格勒家企业代理人十分谨慎，说什么只是于1961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同门格勒见过一面，讨论了一些问题。这是撒谎，检察院不会不知道这一点。然而预审法官犯了一个错误：他忘了让泽德尔迈尔发誓。泽德尔迈尔从前对门格勒的效劳无疑是非法的，但在德国刑法典里，对非法活动的追究年限为5年。

因此，法律奈何不了泽德尔迈尔。不过我得承认，司法机关一刻也没有停止监视他。1984年，美国特别调查局的尼尔·谢尔前来看我，向我打听门格勒的情况时说：“门格勒案件的关键是泽德尔迈尔，他受到法兰克福检察院的严密监

视。”

我们历来认为，检察官们起码跟业余侦探们一样精明。可是积40多年之经验，我变得不那么天真幼稚了。

不管怎么说，我怀疑当局是通过这位泽德尔迈尔得知门格勒去世之消息的。这个案子的全部进程——获得绝密情报、搜查、讣告——在我看来未免有点太无可指责了。

这时法医们进入角色了。人们把葬在安布公墓里的“沃尔夫冈·格哈德”的尸体挖了出来，请几名最杰出的专家验尸。他们是美国马里兰大学法学人类学教授埃利斯·克利、参加过约翰·肯尼迪总统验尸工作的指纹专家洛厄尔·莱文、美国特拉华法医实验所所长艾利·哈梅利、俄克拉何马大学法学人类学专家克莱德·斯诺、芝加哥科克-孔蒂医院X光透视部主任约翰·菲茨帕特里克和处理门格勒案的警方机构美国马歇尔中心的莱斯利·卢卡什。

3名德国专家和几名巴西人也参加了安布墓地死者的解剖化验工作。

从泽德尔迈尔家搜出的信件看，门格勒是在博赛一家陪同下在某个湖畔远足时身亡的。博赛一家原籍奥地利，博赛先生是前党卫队队员。按博赛所述，出事时他不在场。走在前头的博赛夫人忽然听到门格勒呼救，她赶紧往回跑，眼睁睁看着老人在湖水里挣扎，手足无措。等她终于将他救上了岸时，他已经断了气。

第二天夜里，博赛夫人为死者弄来了棺材和鲜花。

殡葬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事件：公墓负责人希望按习惯开一下棺材迅速查看一下。可是，送殡者没有答应。

后来，巴西警方询问博赛夫人和门格勒寄宿过的斯塔梅

尔一家。警方希望查清，门格勒取“沃尔夫冈·格哈德”这个姓名的原由是什么。博赛夫人的解释是可信的。象博赛家一样，沃尔夫冈·格哈德本人是奥地利人，他出于信仰愿意帮助门格勒。于是，在回国之前，他把自己的身份证留给了门格勒。然而，他比门格勒要年轻16岁。这也是送殡者不允许公墓负责人开棺验尸的原因所在，否则很可能会发现，死者比身份证上的年龄老得多。

真的沃尔夫冈·格哈德不久死在格拉茨，死因至今不明。

虽然博赛和斯塔梅尔两家的交代是可信的，但仍然显得牵强：年近70的门格勒为何在朋友们已经远去的情况下继续独自一人在湖中游泳呢？一个女人怎能将一具男尸拖上岸来呢？要是悲剧发生在岸边，要是门格勒的脚还够得着湖底，他就根本不会溺死，除非心脏病突然发作。如果他离岸的距离远得足使他淹死，那么，把他拖上岸来的博赛夫人一定有强壮的体格。

专家小组的报告结论使这片疑云荡然无存：出墓的骸骨同德国司法当局交他们使用的门格勒医疗档案的比较表明，“可以肯定地说”，安布墓内的死者确实是约瑟夫·门格勒。

于是，巴西发表公报，宣布门格勒去世。当然，有些人——主要是受过门格勒迫害的人——仍有狐疑。

至于我，我盲目地相信如此杰出的专家小组的判断。对鲍曼之死怀疑错了的我，本能地害怕重犯错误，不敢再怀疑门格勒的死。

我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即使我接到一系列情报员的来

信，他们声称在巴拉圭看见门格勒还活着也罢。要晓得鲍曼死后，也曾有数十名证人声称确实见过鲍曼还活着……

法兰克福检察院也收到了此类信件，检察长克莱因并不因鲍曼案件而畏首畏尾，他看完那些信后心情比我的还要激动。我问他何时宣布门格勒去世的消息，他不肯作肯定的答复。有关门格勒仍然活着的报告依然不断送来，只要没有人出来否定这些报告，就不能宣布门格勒已去世。一位女牙科医师声称，她的材料表明，门格勒曾于1979年4月到她那里治过牙，那时离所传中他的死已有两个月。巴西警方曾声明，这份证词站不住脚，可是进一步了解女牙医的证据材料，那是很有意思的。

至于我，则完全相信门格勒已经死了，直到有人告诉我下面一件事为止：1982年，即所传门格勒死后的第三年，门格勒的侄儿和后妻的儿子卡尔-海因茨（门格勒第二次结婚时娶了其兄弟的媳妇，即卡尔-海因茨的母亲）和门格勒的心腹汉斯·泽德尔迈尔会见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生、门格勒的朋友汉斯·米尼希博士。早在1947年，米尼希同好几名党卫队头目一起受到过波兰克拉科夫地区一家法院的判决，他们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罪行受到了追究。只有他获得了释放。

卡尔-海因茨·门格勒和汉斯·泽德尔迈尔跟米尼希讨论的问题同上述法律追究只有一点间接联系。他们想知道，假如约瑟夫·门格勒被送上法庭，他早先做的那些实验和所参与的挑选送入毒气室的人等活动会不会受到追究，他会不会被判刑。

我这里写的绝非是道听途说的流言蜚语。米尼希、卡

尔-海因茨·门格勒和泽德尔迈尔在这个问题上受过审讯，他们对这次密谈供认不讳，但又声称那完全是在理论上作一番推测而已。

显然，作这样的推测并非绝对不可能。可是我们毕竟要问，做为一家大企业的经理卡尔-海因茨·门格勒这样的大忙人，为何要请汉斯·泽德尔迈尔陪他到他俩从未拜访过的米尼希家中去呢？何况谈论的又是些纯理论问题。

心头的狐疑一旦萌生，我就静下心来仔细地重新研究专家们的报告和证人们提供的关于“沃尔夫冈·格哈德”之死材料。我特别认真地研读了当初人们对专家小组的结论的批评报告。圣保罗的记者本·亚伯拉罕在他的著作《门格勒案件》中列举了一系列当时为人们疏忽了的细节，而在今天，应当以新的眼光来分析这些情况。其中有这样一个情况：医生们发现，尸体腮骨上有一个洞。专家们认为可能是棺材上的一颗钉子造成的。美国驻圣保罗总领事、前华盛顿大学牙科学教授塔奇则认为，门格勒或他的牙医很可能用针剔洗过牙槽，因此弄坏了骨头。

从死人躺在棺柩里的方式和钉入钉子的位置来分析，钉子留下小洞的理论是离谱的。

本·亚伯拉罕提出的另一个疑点是关于门格勒的体高：从党卫队档案来看，他身高为1.74米，当然，头发和脚底的肉也包括在里边。被挖出来的骸骨恰巧也足有1.74米，但是不包括椎间盘、头发和脚底的肉。

当然，党卫队当初测量的体高其精确度是可以怀疑的。

另一个令人迷惑的因素同葬仪有关。在所谓的门格勒去世的时候，他身上有颁发给一位52岁男子的证件。而1979年

2月7日，他应该是68岁。博赛夫妇说，正因为这一点，他们才拒绝公墓负责人开棺验尸。不过，按传统，死者入殓前人们总要给他穿好衣裳。但后来挖墓开棺时，棺柩内没有一块布片，也没有钮扣和鞋。

我们还可以举出博赛夫人谈话中的一些漏洞，这些漏洞不仅仅同门格勒被淹死有关。比如说，人们吃惊地听她说，在“沃尔夫冈·格哈德”溺死那天晚上到葬仪那天早上，即仅仅几小时内，她就为死者弄到了棺材和鲜花，这是绝对来不及的，因为办这些事她都必须赶公共汽车。

当然，这仅仅是几点令人奇怪的细节，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引起人们怀疑专家权威们的判断。就是在今天我也不敢断言他们搞错了。然而我认为，汉斯·泽德尔迈尔、卡尔-海因茨·门格勒同米尼希博士的密谈是个严重的迹象：“它更多地说明门格勒还活着，而不是证明门格勒已经死了。”

检察长克莱因至今未能证明我错。眼下官方始终没有宣布约瑟夫·门格勒已死亡。

我认为这就等于说，我应当继续调查、分析有关门格勒仍然活在巴拉圭的各种目击材料。如果地球上有一家法院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您是怎样将自己的行为同敦促您帮助他人的希波克拉底^①的誓言统一起来的？”那时我将感到由衷的高兴。

^①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前377），古希腊医生，被誉为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誓言据说是出自希波克拉底之手的医学道德准则，一直被医务人员视为行为指南。——译者

12. 销声匿迹无影踪

这是在押医生伊拉·林根斯一天面对奥斯威辛-比克瑙烟气缭绕的焚尸炉向集中营的大夫罗德提出的问题。罗德回答她说：如果有人得了阑尾炎，就要把坏了的阑尾切除，尽管这样做会给他痛苦；这是个生与死的问题——“犹太人恰恰就是欧洲的发了炎的阑尾”。

每当我把注意力转向犯罪的纳粹医生，我都能发现一些狂热分子。我很难设想艾希曼这样的人会具有医生的心肠，如果希特勒愿意的话，艾希曼完全可以把犹太人流放到马达加斯加去，就象将这些人送进毒气室一样不费吹灰之力。选择医生这个职业，一般均出自帮助他人这个心愿，不管这种帮助有多大。只有一种强大的心灵冲动才能把这种心愿倒过来，即把一名在平时为弱者打针、竭力挽救病人于垂危之中的医生，改变成手举毒针置人于死地的杀人凶手。

然而，这种例子并非罕见。医生们在第三帝国制造死亡的机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集中营里，他们不满足于选择试验死亡的对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随时准备亲自动手杀人。他们确定实施“消灭不配生存者”计划的“科学基地”，撰写具体鉴定，在战争爆发前就在哈泰国或哈达马尔“医疗所”参与了大屠杀。但是，在所有精神病医院——其

中有的名声很好的医院——流行的手段简直叫人不堪设想。比如说在维也纳的施泰因霍夫医院，人们用注射毒液的手段杀死过数百名残疾儿童。在那里工作过的汉斯·格罗斯医生，今天仍然是某些法院的精神病专家。

看来，在心理上似乎要比想象的更容易把同死亡作斗争的医生职责跟致死的决定统一起来。当我听说令人敬佩的杰出医生尤里乌斯·哈克塔尔教授赞成给患不治之症者提供“死的解脱”的时候，我又考虑了这一点。他把“死的解脱”看作为一种同情措施：为病人免除痛苦，为别人免除看到这种痛苦的惨状。然而，撇开这种无痛苦死亡的新方式在法律上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不谈外，哈克塔尔的道德立场是令我吃惊的。这立场表明，他自己也准备给病人开致死的药方，或注射致命的药水。

我认为有一种天生的、约定俗成的禁律，不允许我们采取这类行动。即使我们明明知道这种行动在这里无疑可以使病人得以解脱，我认为并要重复指出，我们也难以这么做，因为心理上有障碍。

可是，哈克塔尔教授要求自己 and 同行们冲破这条禁律。这叫我惊讶不已。我不喜欢不加考虑的盲目比较，但至少说这种理论早已为第三帝国的一些医生所提出：医学伦理学要求，为避免更糟糕的事情发生而不惜杀人。第三帝国的医生们所说的更糟糕的事，是德国的犹太化和遗传病的蔓延。

今天，我象当初一样不安地看到，相当多的医生竟然同意探讨这类理论。

没有哪一行的从业人员（教员除外，不过要保持在公立学校的位置，他们别无它路可走）象医生们那样深深地

陷入民族社会主义魅力的泥潭之中：在1933年后的德国以及1938年后的奥地利，几乎50%的医务人员成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党员。

我不知道在第三帝国时期犯过杀人罪而被判刑的医生的确切比例，但我敢肯定，这个比例一定是很高的。

医生们在政治和人道两方面如此堕落，部分原因也许是德国和奥地利医务界特有的不问政治的倾向。有人说医生不会跌落到政治的最低层，也不过问丑陋的政治争纷，医生应该超然于任何纠纷之外。可在这同时，社会又把医生视为“白衣天使”，今天仍持这种看法。要指出的是，许多医院实行的是军事体制，等级极为森严：大老板在峰端，病人在谷底。因此就产生了精英观念：如果说上帝握有生死大权的话，那么“白衣天使”为何不能拥有相同的权力呢？

最后，由医生同病人间关系的性质决定，后者必须听任前者的摆布，医生是权威的象征。在自己周围确立正常的权威也许是一个优秀医生的心理品格，医生有了权威，病人只要听见他的说话声，或者感到他的手在触摸自己，就会相信手到病除。医生这个职业要对人们同样也有魅力（在这一点上我看不到任何贬意），这种现象也可说明为何在第三帝国统治时期，有这么多的医生用自己的权威为死神服务。最后还要指出，“健康”这个概念本身就隐藏着将一切作为“疾病”显露出来，进而弃之如敝屣。医生们几乎必然具有的过于看重“健康”的倾向，很容易使他们对疾病的危险大惊小怪。目前在艾滋病问题上的争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第三帝国极其重视它心目中的健康问题，竭尽全力企图彻底消除它眼中的一切疾病。

在第三帝国看来,犹太人的血和“外国人的”血,是“有病的”血。

接下来我要谈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请阅读此书的医生们不要将此视为我对他们的侮辱。不过我认为,在救死扶伤的强烈愿望同加快死亡步伐的愿望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这是精神分析法的一大发现,该发现跟外科职业有特殊的联系:外科医生应当有技术用手中的手术刀切开活人的体肤。为此他必须有一丝残忍的冲动,而本人根本就没有意味到这一点。我毫无谴责这一冲动之意。恰恰相反,我要强调指出,这种冲动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外科医生并不是伤害别人(这一冲动也许会促使他伤人),而是在帮人治病。我们大家都知道,要是没有这类现象,我们的社会也许就不可能生存下去。警察比一般人更注意犯罪,精神病科医生对精神病绝不会陌生。我自己在工作中也服从于一种特殊的心理结构。因此,在我写到医生比任何其他行业的人更屈从于一丝残忍的倾向之时,我绝无指责医生的意思。不过我要再次强调,第三帝国的残忍达到了可怕的地步,使得医生们的那一丝冲动发展到毁灭人类而不是服务于人类的程度。于是,一些也许可以成为杰出的外科大夫的医生开始解剖活人;一些对双胞胎妊娠抱有完全合法的兴趣的医生,开始研究将烧红了的针刺进母腹时,双胞胎的反应是否不同;一些在医治子宫癌方面作出有益探索的医生利用自己的技术,在完全健康的妇女身上做子宫切除术。医生对病情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关注,从此变成了哈泰因实验中心内医生们面对毒气中毒奄奄一息者产生的病态好奇。

在我被关押于茅特豪森集中营里的时候，我曾多次听人谈论一位医生，此人似乎可典型地说明上述问题。医生阿里贝特·海姆离开集中营的医疗岗位后，到前线当了一名临床大夫，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一位在茅特豪森集中营充当过他的手术助手的在押犯作证说：一天，从荷兰押来一车队犹太犯人，站立在集中营的广场上等待点名。党卫队医生仔细地检查所有年轻人，命令他们张嘴，查看他们的牙齿。医生最后选定两个犹太青年，和颜悦色地请他俩同意接受一次绝无害处的小小外科手术。

作为交换条件，他答应恢复他们的自由。

两位被选者以为自己吉星高照了，满怀信心地跟医生到了医务室，脱去衣服，其中一个躺到手术台上，另一个在一旁等候。

医生给青年人打了麻药，切开其胸腔和腹部，用他的话来说，为的是“观察活人的内脏”。“我第一次看到活人的胃是怎样活动的。”

接着，在助手惊恐的眼神下，海姆大夫拿起手术刀象解剖一具尸体一样将青年人的器官一一切下。心脏割除之后，他就叫人将尸体抬走，叫第二位“病人”进来。他又给这位青年仔细地做了准备工作，象一名优秀的学生在证明自己的灵巧。接着，他很快地切了几刀，将器官一一取出。这一次，青年人的口腔在初检时引起了大夫的兴趣，因此解剖后他的牙被统统拔除。最后医生在青年人的心脏里打了一针，彻底结束了可能残存的生命气息。

这位嗜好解剖的党卫队医生亲手切下了这两具尸体的脑袋，然后把支离破碎、鲜血淋漓的肉体送进焚化炉。他只是

让人给他留下脑颅，仔细蒸煮，把所有软部刷去，因为他要把颅骨留作纪念。牙齿齐全的那个颅骨从此一直摆在这位党卫队医生的办公桌上。据说另一颗颅骨被他馈赠给朋友了。

我还听说了另一件同样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一名12岁的犹太男孩躺在手术台上，此时他比其它许多青少年头脑要清醒得多，他知道人家要杀死他。他双手合十于胸前，大声祈祷，同父母亲诀别。

海姆大夫细心地听着孩子的话，象是在说服孩子必须割除扁桃腺似的，极其和蔼地向孩子解释犹太人为何必须死绝。他说犹太人是世界痛苦的责任者，尤其是这场战争的责任者。

向受害者说明他的屠杀的道德根据之后，医生在孩子的心脏里注射一针毒液，将孩子置于死地。

我是此事发生数年后关到茅特豪森集中营去的。我住的是死犯区，早已关在那里的囚徒们向我叙述了这位医生的行为，他的彪形体型令囚犯们害怕。

我很晚才闻知他的大名：阿里贝特·海姆，原籍奥地利施蒂里亚州拉德克斯堡，生于1914年6月28日。父亲是宪兵队监察员。家庭——海姆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妹——后来迁至格拉茨市。阿里贝特·海姆于1935年参加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当时此党尚处于非法地位。希特勒上台之后，他又当上了党卫队员。他在格拉茨大学听过医学课，为他后来的“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38年，市议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推迟了格拉茨大学更名要求的审理程序，这个要求希望把格拉茨大学改名为阿道夫·希特勒大学。从那以后，凡在政治上不坚决支持新体制的教授、助教和合作者，统统

被一一排挤掉。

法律系举办了“种族权利研讨会”，神学系被解散，医学系增设了党卫队医学协会。该学会由党卫队区队长汉斯·克特尔领导，它不仅教授医学知识，而且还灌输军事纪律，首先是灌输纳粹党一切必不可少的原则。克特尔的副官丁医生——人家也称他为丁一舒勒——后来成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医生，他利用囚徒进行伤寒试验。他的试验为党卫队医学协会和医学系解剖室提供医学和物质帮助，特别是提供了供解剖的尸体。

1945年5月，大学里还陈放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屠杀的44具囚徒的尸体。

阿里贝特·海姆就是在这样的医学系接受训练的。他把自己在集中营里的活动看作为业务进修：他知道身为军医，他将经常施行紧急手术，切除受伤的四肢。他的事业心要求他为此做好准备，即割除健康人的胳膊和腿，掏取活人的五脏六腑。

整个故事中最可怕的因素也许是在于海姆医生带着忠诚的军医、无可指责的能人等荣誉从战场上回来后，他的伙伴们甚至证明他挽救了一大批生命。在他的生涯中只有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茅特豪森集中营等几个短暂的插曲，或许还可以说，生于一种偶然性，他才有机会象酒醉之后一样让潜在的兽性和残忍的冲动发泄了一下。

在战争的其余时间里，他先后担任过布拉格党卫队医生、阿道夫·希特勒卫队连医生和党卫队诺尔师医生。他还一度担任党卫队中央局主任医师。他的军籍簿上记录着他到过丹麦、荷兰、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

亚、比利时和法国。1945年4月25日，他作为诺尔党卫队山地步兵师“党卫队上尉和军医官”被捕，他装扮得那么平庸，以致在1947年被释放了。

1948年，我们在曼海姆重新找到了海姆医生，当时他成了妇科医生——天晓得他是在什么地方学到这门专业的——并娶了一位同事为妻。夫妇俩后来搬到巴登巴登，他又开了业，诊所的生意相当兴隆。1958年，阿里贝特·海姆在柏林蒂尔加滕区买下了一幢出租楼，里面有34套房，每月收房租约7,000马克。

司法机关这个石磨运转十分缓慢，一直等到1962年，在收到大量控告材料后，才发出了海姆的逮捕证。9月13日，警察敲响了他巴登巴登的公寓的门。可是，海姆医生不知去向。有人——迄今仍不知道是谁——事先通知了他，鸟远飞了。

我同斯图加特法警交换的材料，尤其是海姆亲自认真登记的死亡记录簿表明，他在茅特豪森“活动”期间，该集中营死亡的人数达540人。

海姆医生依然活着。在好些年里他依靠柏林市蒂尔加滕区那幢房子的租金生活，这是公开的：他的代理人是海德尔堡财务顾问保罗·巴尔特和法兰克福律师弗里茨·施泰纳克尔，此人也是约瑟夫·门格勒的律师，直到传说中他去世为止。约翰·埃克特——著名的德罗斯特公司代理人——受委托管理那幢楼房。

阿里贝特·海姆的姐姐、在法兰克福市附近的比希赫拉格出嫁的希尔德·巴尔特夫人同消息灵通、行动谨慎的代理人圈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她每个月都来蒂勒-瓦尔滕贝格

大街28号收房租，转给她的弟弟。

警方对她和生活在格拉茨的海姆的另一名姐妹做了许多工作，试图查明她们的兄弟的下落。自不待言，这样的努力失败了：作为直系亲属，两个女人可以拒作交待。

至于说与此案有牵连的其他人是否也享有此权，我认为值得司法界好好争论一番的。

不管怎么说，我于1977年企图从经济入手，在海姆案子中打开一个缺口。税收法似乎可以助我一臂之力。房租都是交给巴尔特夫人的，如果她不把这钱交给她弟弟，她就必须纳税。因此，她应当向税务检查部门出示证明材料，证明已经把钱交给了弟弟。在我看来，税务检查部门可以请阿里贝特·海姆到机关来消除人们在税款上对他姐姐的怀疑。如果他姐姐不能证明他还活着的话，这种怀疑是理所当然的。

柏林税务检查机关同意了我托朋友捎去的这个建议，而且这个建议是完全合乎法律的。因此，检查机关请巴尔特夫人证明其弟弟还活着，并要求其弟弟亲自出面证实。

出面证实的不是阿里贝特·海姆，而是他的税务顾问保罗·巴尔特，他出示了委托人签了字的税务申报单。税务检查官对签字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施泰纳克尔先生送来了一盒录音带，里面录着海姆医生的声音。

这两位先生自认为这样做是符合自己的职业义务的。

1978年10月18日，我给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司法部长约亨·福格尔博士写信，希望他关注此案中的问题：在平时，税务顾问和律师应当严守职业秘密。可是，以我对法规的理解，我认为这一原则只有在他们代表这一权利时不违返法律和税务法的情况下才有效。

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不能说他们的出面是正常的。鉴于他们的关系复杂，这些人的做法实际上是保护了阿里贝特·海姆，使他掩盖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逃避法律的监督。

我写道：“必须同巴德尔^①那帮律师作比较。人们谴责他们保护了一个犯罪组织，谴责他们知道被通缉的人们藏在哪儿。人们不能否认，在集中营里干过的党卫队员们同样属于一个犯罪组织，作为集中营里的医生，海姆大夫是这一组织的成员，他的罪行远比巴德尔那帮人的更可怕。”

因此我认为施泰纳克尔的行为是蓄意犯法。

1979年4月5日，我向法兰克福律师协会提出对施泰纳克尔先生的指控。1979年4月6日，我又向检察院提出了指控。

可是，党卫队的罪行在联邦德国明显地不如巴德尔那帮人的罪行那么引人注目。8月，人们通知我们，不再追查下去。

我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我知道柏林一直实施着四方管辖制，该制度规定，老纳粹罪犯必须赎罪。

柏林有一个清除纳粹化委员会，它中断活动8年后于1979年6月13日恢复了运转。我向该委员会进行交涉。委员会主席在读了有关海姆案的一系列材料，并听了一些证人的揭发之后，认定海姆确实犯了检举中所说的罪行，他的行为完全是残忍的。为此，清除纳粹化委员会决定对他罚款51万马克。

^①巴德尔（1765.3～1841.5），慕尼黑天主教徒、神秘主义神学家、普世教会运动家。——译者

赏付此款的办法是用蒂尔—瓦尔滕贝格大街那幢房子来抵押。施泰纳克尔先生对此提出公诉，结果被法院驳回。

虽没有达到期待中的结果，但我们毕竟切断了海姆医生的生活来源。

尽管电视台在“XY号案卷—非归档案件”节目中用几分钟的时间谈到了他，但谁也没有向我们提供有关他的线索。

应当相信，他有足够的钱逍遥法外，过着舒适的生活。

13. 冥顽不化千秋罪

本章专门谈另一名医生。1984年，这位医生仍然活着，受到众人的尊敬；他生活在奥地利的一个小城里，在那里行医数十年。他在战争中没有犯任何罪行，因此他的事构不成任何司法程序。

关于他，问题不在揭露其某个罪行（何况此罪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很简单，它涉及的是如何按起码的礼仪埋葬1944年5月26日被一支党卫队别动队杀害的14名荷兰抵抗运动战士。死者的家属希望挖出尸体移葬到一个公墓去。

可是谁也不知道死者的遗骨埋在哪里。唯一确切的事是，行刑的地方在荷兰布拉邦特省公爵森林同蒂尔堡之间的德鲁南沙丘地里。这次屠杀的责任者是一个叫赫伯特·富尔克的人，此人早先是名警察，进入党卫队时的头衔是区队长。在这次屠杀时，他还不指挥任何一支党卫队，在他手下的是蒂尔堡警察局的一支别动队。战争结束后，他只被判处10年监禁，因为那次屠杀的命令不是他发布的，只是奉上司之命而已。人们也许认为这10年时间足够他考虑问题，认清自己的所做所为。

但是富尔克没有变化：当沙丘中的被害者的家属前来询问他到哪里去寻找亡灵的遗骨时，他把他们撵出了门，说什

么他要保守秘密，他向元首发过誓，不披露任何情况。

被害者家属大多住在蒂尔堡市内，该市居民并没有气馁。他们在一堆材料里发现，大屠杀之后，警察局一名医生到刑场验明受害者确已都断气。

他们前来我的办事处，请求追寻这位医生。

这并不十分困难，因为察尔特勒大夫就在奥地利嘉奖的医生名单上。我们得知他住在下奥地利摩拉瓦河畔的霍赫瑙。

蒂尔堡的家具商克利斯蒂安·范·赫姆贝格自告奋勇地负责寻找埋葬那些同胞的地方。在我的建议下，他按我给的电话号码联系了一下。接电话的不是察尔特勒大夫，而是他的妻子，她的态度令人扫兴：她丈夫不与任何人谈论“这些事”。

她挂上了电话。

范·赫姆贝格又尝试了一次，这次是采用写信的方式。他在信中向医生解释说，他无意将医生卷入某场诉讼中去，他的唯一考虑是要给死者一个得体的葬礼。

没有任何回音。

范·赫姆贝格先生于是决定于1977年10月10日重新打电话给察尔特勒大夫。我至今仍保存着他们谈话的速记稿。

赫姆贝格：几星期前我给您写了信，现在我决定给您打电话，约一个时间见面。

察尔特勒：我没有任何理由同意跟您谈论这件事。假如您非要同我谈话，我请您叫一下霍赫瑙宪兵司令，问他何时有机参加这次谈话。

赫姆贝格：好极了，可是我用不着警察……

察尔特勒：我需要，我，因为我拒绝跟您罗唆30或35年前的事。更何况您是荷兰人，您的国家践踏联合国宪章，羁押我们3位伙伴，而他们只是行使职务而已。我对您无可奉告，除非是当着警察的面。

赫姆贝格：可是，大夫……

察尔特勒：您听明白我的话，对您我无可奉告。

赫姆贝格：我毕竟给您写了一封彬彬有礼的信……

察尔特勒：有礼也罢，无礼也罢，这都无关紧要。要求奥地利警察在场，自有我的道理。我接到的荷兰人的威胁信太多了。作为前德国军官，我要告诉您，这不会使我无动于衷，我也不怕。很抱歉，可是假如您坚持的话，叫上霍赫瑙的宪兵来会我。我要当着他们的面跟您谈话。我想您不会不知道，在被枪杀的人中间有持枪袭击者，换句话说有罪犯，他们同荷兰抵抗运动毫不相干。

赫姆贝格：除了宪兵外，我可否带别的人同去赴约，比如带一名律师？

察尔特勒：不，我要宪兵，我跟律师不相干。在这个荷兰事件中，我跟奥地利警察和宪兵有过接触，至于私人律师，我不感兴趣。

赫姆贝格：真叫人遗憾……

察尔特勒：我不遗憾。我再说一遍，我不想跟您有任何接触，除非通过奥地利警察或宪兵这个中

间人。

赫姆贝格：好吧，照您的意思办。不过我不理解您对我的信为什么作如此粗暴的反应。

察尔特勒：为什么？您问我为什么？我已经把来自荷兰的威胁要杀死我的信交给了警方。您如果想查看的话，警察局里的档案供您随便看。您只要打听一下就是了。

赫姆贝格：可是我的信毫无威胁之意。

察尔特勒：我不认识您，也对您不感兴趣，我没有任何理由撇开警察同您谈话。我向您提一个我个人的建议。告诉你们的人，释放那3个人，就是克塔拉、菲舍尔和德国军官芬滕，尽管联合国作出过有关决议，但你们拒绝宽宥他们。当那3名德国军官获释之后，我会把当初的情况告诉荷兰人的。

赫姆贝格：可是大夫，您毕竟是位医生，您千万不能把自己同罪犯混同起来……

察尔特勒：我作为前军官，如果不这样做，那才是无耻之徒呢。这3个人跟我一样在荷兰执行使命。

赫姆贝格：但您例外……

察尔特勒：听我说，我可以告诉您很多有关德军撤退的情况和被荷兰杀人集团在乌得勒支杀死的8名士兵的情况。够了。再见，先生。（他挂上了电话）

速记稿到此为止。在翻阅所附的个人材料时，我发现1915年出生的恩斯特·察尔特勒是非法加入纳粹党的，因此

他曾坐过牢。1942年，他是党卫队纵队长，是维也纳党卫队医疗队成员。人们可以把这些视为盲目的年轻人一时的过错。我不理解的是——至今我还不理解——一个有教养的大学毕业生，总之是一个被认为善于思考的人，在希特勒死了32年后竟然还说上面我所转引的那些话。在他看来，诸如他说的那3名德国军官的人，他们将十多万犹太人送进奥斯威辛集中营，也就是说送给死神，居然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他只愿在释放大屠杀的罪犯的条件下，才帮助人们合乎礼仪地殡葬被害的抵抗运动战士……

我写信给奥地利医师公会主席里夏德·皮亚蒂大夫，请求他的帮助，在纳粹统治时期，他自己也受过种种迫害。皮亚蒂大夫给我复了一封长信，表达了每一位有感情的人对此事的看法：察尔特勒医生作为一名大夫，不仅从职业角度，而且从人道主义考虑，有义务说出他所知道的受害者被埋葬的地方。他全然不理解在释放被判刑的罪犯和提供这个情况之间存在什么联系。

尽管医师公会主席表明了这种立场，察尔特勒仍没有被开除出奥地利医师公会。

德国军人冈特·布拉贝克不久又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写信对察尔特勒大夫说，荷兰人民战后对他的处理堪称典范，而且还帮助他找到了德国士兵的坟茔。

察尔特勒依旧不予答复，直到1985年去世，始终没有说出内心的秘密。

14. 道高一尺魔高丈

是伊拉·林根斯告诉我这个故事的。它同样发生在第三帝国时期，主角也是些医生。

女医生林根斯有一个同伴，名叫阿德拉伊德·豪特瓦勒。此人被押进奥斯威辛集中营，专门为犹太人看病。她被分配在第十区，驼背矮子、妇科医生克劳贝格在那里做绝育试验。

豪特瓦勒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当着一名党卫队医生的面拒绝干这类试验。

这是个非同小可的行为，人们叫来了卫戍部队的医生维尔茨，他瞪着慌乱的眼看着阿德拉伊德·豪特瓦勒：“怎么回事？您不愿意给健康人做手术？难道您不明白人与人之间有差别吗？要您去做手术的对象是些犹太人。”

豪特瓦勒医生怒目将维尔茨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冷静地说：“当然，我知道人与人之间有差别。比如您和我之间。”

维尔茨的脸都气白了，砰地一声带上了门，走出了屋子。

阿德拉伊德·豪特瓦勒被处以死刑。有人将她的名字从犯人名单中抹掉，在一片骚乱中她才死里逃生。

15. 花柳病人希特勒

为一个豪情满怀的健康民族而奋斗，这恐怕是许多专制体制内的一大特点。可是第三帝国进行这种斗争所花的力气实在令人吃惊，它甚至成了阿道夫·希特勒个人的一件心头事。这里已不单是将“健康”神化的问题，而是对“疾病”产生了病态性反感。布劳瑙人^①自认为有义务根绝疾病。

人们百思不得其解，这样的反感源自何处？它跟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有没有关系？如果有的话那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希特勒把犹太人视为人类的癌瘤。

令人毛骨悚然的惊险电影几乎都提供了一个十分简单的解释：影片结尾处总是有人发现，使生理残缺者或病人康复的幽灵自己也是个生理残缺者或病人，他竭力向世人掩盖自己的不幸。某些历史研究论著也以此论据来解释希特勒的行为：美国学者阿伦·布洛克的专著《希特勒或暴政机制》有一个基本思想，即希特勒在青年时期就从一名妓女那里染上了梅毒。

可是，这一解释过于浅薄、简单，而且具有明显的“电

^①布劳瑙人指希特勒。布劳瑙为上奥地利州城名，在萨尔茨堡北面。1889年希特勒出生于此。——译者

影”特征，这反而损害了它的可信性：历史学家们不喜欢如此简单的“理论”。

尽管早先存在过许多迹象表明希特勒染上了梅毒，现今人们并无兴趣去查证它是否属实。我认为所有有关人士均受某种心理机制的束缚：也许这个问题可以说明，老纳粹分子们之所以反对人们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元首描绘成患梅毒的偏执狂，是因为这样做会有损于他们所崇拜的偶像。然而，纳粹党徒们的受害者和敌人却采取与老纳粹们相同的态度，始终缄默不语，生怕把整个社会的毛病归结为某个人的病态心理失控的结果。这是我对严肃的历史研究者们对希特勒是否染有梅毒这一课题不感兴趣的唯一解释。

我自己对此发生兴趣也是一种偶然的结果，那是60年代中期的事。在一次演讲会之后，我跟慕尼黑市议员法克勒交谈，话题是希特勒的个性。当我听到法克勒把希特勒称为毋庸置疑的“梅毒患者”时，感到十分震惊。我问他这个结论有何根据，法克勒悄悄告诉我，他认识希特勒20年代的莫逆之交恩斯特·汉夫施滕格尔，此人跟他谈起过希特勒患有梅毒病。那次谈话详细得令人吃惊：据汉夫施滕格尔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在佛兰德兵营，险些被扭送军事法庭判以“故意伤害身体”罪——当时有人认为得了梅毒可以免服兵役。可是希特勒成功地证明他的梅毒是很久前得的，于是取消了诉讼程序。

尽管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但我仍不太在意这个故事。汉夫施滕格尔在他的回忆录里再次叙述了这件事。我宁愿谨慎些好，因为我还记得，所有的人曾一度认为世界上所有伟人，从拿破仑起，几乎都有梅毒症状。

60年代末，我接待了生活在葡萄牙的埃德蒙·罗纳德大夫的来访，他的妻子是维也纳人，是我的一位老友的女儿。他也跟我谈起了希特勒的梅毒。罗纳德掌握着令人吃惊的情况：1952年末或1953年初，他在美国的西雅图一家斯堪的纳维亚医院里工作，结识了格拉茨市的一名奥地利青年医生，此人告诉他，其父亲也是大夫，曾给希特勒看过病——梅毒病。1938年后，德国特务来到他父亲的诊所，搜走了有关希特勒的病历和其他所有材料。年轻的奥地利医生甚至从父亲那里得知，元首的梅毒病是从哪里得的：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维也纳跟一名犹太妓女鬼混时染上的。

罗纳德大夫亲自作过某些调查，发现了一个新的线索：20年代，希特勒在耶拿请一名花柳病专家看过病，这位专家就是施皮托夫教授。应当指出，希特勒在其著作《我的奋斗》中说过，主要的问题是要同性病作斗争。

我认为此事相当重要，便询问阿尔贝特·施佩尔^①。他说从未听说过此事，但他记得希特勒周围的人因他选择莫雷尔教授为私人医生而惊诧。莫雷尔是位皮肤病兼性病专家。他开始为希特勒服务后，将大门上专科门诊铜牌摘掉了。

罗纳德大夫还向我指出，梅毒的说法可以为希特勒外甥女格丽·劳巴勒神秘的死提供说得通的解释：许多人都怀疑，舅舅跟外甥女之间有某种往来。如果希特勒确实患有梅毒，那么完全有理由可以认为格丽·劳巴勒被他染上了这种

^①施佩尔（1905.3～ ），希特勒的主要建筑师、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1945年10月20日受国际军事法庭审判，1946年10月1日被判监禁20年。1966年10月1日被释放。——译者

病，然后寻了短见，或者有人杀人灭口，除掉了她。

同样，官方对希特勒的心理和身体状况所掌握的材料完全可以印证其患有梅毒的推测：他对女人戒心重重；他的右手颤抖不止，这既是梅毒病的一个临床症状，也可以是药物反应。显然，希特勒的偏执狂和任何现实感的渐渐消失，都同一位晚期梅毒病患者的形象相吻合。

我对阿道夫·希特勒的生活肯定了解不够，因而难以得出结论性的看法。汉夫施滕格尔很可能拿想象当现实，轻信道听途说。那位年轻的奥地利医生也可能借用其父亲的神秘角色在罗纳德大夫面前炫耀自己。不过作为刑法专家，我不能不指出，我们从两个方面得到的材料惊人得准确、惊人得吻合。如果这件事关系到一桩罪行的话，我一定会顺着这些材料提供的线索认真地追查到底的。

我只是匆匆地调查了一遍，试图找到罗纳德大夫跟我谈到的那位青年医生（这期间罗纳德不幸去世了）。我的一位合作者发现，这位青年1952年在格拉茨通过博士考试后，立即移居美国了。在美国同他建立联系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不过，在格拉茨的深入调查使我们眼前出现了几缕希望之光。德国的一家杂志与其出钱买一本希特勒的假日记，何不拿出点时间和钱来调查呢？这调查不会迫使人们修改历史教科书的，但教科书可以增加一点新情况。

16. 阴差阳错一场空

1971年5月的一天夜里，已是凌晨两点钟，我在宁静的梦乡中被急促的电话铃惊醒。我在惺忪中摘下电话听筒，是长途电话。一个女人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维森塔尔先生，有从纽约打来的紧急电话。可以给您接过去吗？对方坚持要找您，他要我们立即接通您的电话。有一件极其重要的案子。”

“好吧，”我回答说，“反正我已经被叫醒。把电话接过来。”

电话线另一端，一个男人说话了，他自我介绍说是位医生，纽约一家医院的院长。我简单地问他：“什么事？”他十分尴尬地罗唆了一番开场白：“请原谅，维森塔尔先生，我在深更半夜把您叫醒，打搅您了，真过意不去。我考虑了好几个小时该不该打电话给您。”

我打断他的没完没了的费话：“好啦，好啦，究竟有什么事？”

“昨天上午，我们诊所来了一个男人。他是从阿根廷来的，58岁，德国人。您知道这是个典型的德国人，理着奇特，的发型。我熟悉这种发型，我曾经在德国的美国军队里当军官。”

“后来呢？”

“他想改变他的脸形。我们的诊所专门做美容手术，您也许是知道的。”

“这位德国人认为自己不够漂亮吗？”

“他是这么说的。”

“问题出在哪里？”

“我敢肯定这个人是位纳粹分子，他想改变脸形，掩盖自己的真相。我同我的一位犹太人助手商量了一番，我也是犹太人，我问他有什么看法。他也认为我这么做风险太大。如果走漏了风声，让人知道我泄露职业秘密，把病人的情况告诉了您，那么我不仅会失去诊所里的工作，而且连行医证也会被吊销。我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集中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我首先是个医生，还是首先是个犹太人？”

“那一方占了上风？”不言而喻。

我安慰对方，他不必担心，我会保守秘密的①。

医生告诉了我那位顾客的身份——我们姑且叫他为阿道夫·贝格尔——他的生日、护照号码和住址。护照是在圣罗莎卡拉穆什塔市颁发的。这个地名叫我浑身一怔：我已不是头一次听人说起这个城市了，它简直成了藏匿纳粹罪人的渊薮。据说有人在那里遇到过对格尔尼卡狂轰滥炸的臭名昭著的“神鹰军团②”的飞行员们。

①今天我也不会违背这个诺言，因此我改动了凡有可能暴露与本案有关人士的细节。

②神鹰军团是西班牙内战其间（1936～1939），戈林派到佛朗哥将军的国民军那里执行特殊任务的一支德国空军，包括4个轰炸机中队和4个战斗机中队。它进行过几次袭击。1937年4月27日对格尔尼卡实行地毯式轰炸，造成巨大的破坏和生命的损失。——译者

我力图掩饰吃惊的情绪，询问对方那个人需住院多久。

“8至10天。”

“太短了。恐怕我们需要更多一点时间。”

“好吧，既然如以，可以让他在医院里多呆一段时间。他多付一点钱，仅此而已。”

我将我的私人电话告诉了医生，好让他随时同我联系而无需通过邮电部门。我再次向他担保，他不必担心，谁也不知道我的这个情报来源，其他情报来源也一样。

“您明白，我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他在放下话筒前又强调了一句。

第二天上午，我比平时更早到达我的办公室。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极大好奇，因而挂上电话后合不上眼了。我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待处理的材料。我口授了一批信件，但我办什么事都心不在焉。

上午11时，我又接到来自纽约的电话。一个女人要同我说话。我自我介绍一番之后，她就吞吞吐吐地讲了起来：

“我是护士、印第安人，在这里一所专门做美容手术的医院里工作。我有一位犹太朋友，是他把您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想您应该知道，我们这里有一位病人，他的脸即将接受整形术。我只知道他的姓，叫贝尔格，是位德国人……我必须告诉您这件事，不过我求您不要暴露我。好些年来我一直在这里工作，我喜欢这家诊所。如果让人知道我泄露了病人的情况，我就会被解雇。”

我尽量使自己的嗓音变得激动些，以便使护士觉得我是刚刚知道了这件事。我对那个坏蛋竟敢闯到纽约去，大为震惊。我感谢护士给打电话，并保证为她守口如瓶。

直到那时为止，我对纳粹分子采用整形外科技术来掩盖自己踪迹的故事一向抱极其怀疑的态度。这样的手术太复杂太危险，不可能象多年里人们向我报告的那样在莽林中的医院里进行。另外，就是选择条件好的医院即专门医院做这种手术的话，那也太惹眼，因而也很危险。

当时是1971年，即大战结束后25年，许多顶着假名过日子的人都已纷纷被捕——但其中没有一个人采用过外科手术（除生病开刀例外）。

然而，大量侦探电影常有整形外科的情节，因而这种方法具有越来越明显的诱惑力，我也经常跟路德维希堡情报部门谈论此事。他们也从未听说过纳粹分子运用这种手段。毋庸置疑，确有一些纳粹分子经过整形没有被认出来，也没有落网。

在我对艾希曼进行长时期的调查过程中，常常有人向我报告，他变了脸形。这不是真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我心存疑惑，但我还是开始收集有关“美容院”和其他类似机构的情报。我了解圣保罗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各家大整形医院的情况，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曾有“纳粹时代的”德国人光顾那里。我寻思阿道夫·贝格尔为何选择纽约为自己改变脸形。这个城市大约有200万犹太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受过纳粹的迫害，是死里逃生者。因此，在那里要比在南美更容易被人认出来。

但总该看到，人们并非总是按逻辑行事的，纳粹分子也是如此。

充当大批纳粹分子的祖国的圣罗莎卡拉穆什塔也许能提供这个谜的谜底吧？前不久，我在报纸的讣告栏里看到一则

消息说，一个叫卢多尔夫·冯·阿尔韦斯勒文的人在那里去世。此人在波兰和克里米亚犯过滔天大罪。莫非阿道夫·贝格尔也是这种情况？

我在阿根廷有位合作者，名叫哈利，从前是位律师。我们曾经商定，当我想向他转递一个情报时，我将情报一分为二，分两次递送；我先通过他单位上的电话将第二部分情报告诉他，过两小时后又用他的私人电话把第一部分情报通知他。

这一次我们采取这个办法，请哈利进行合作：我告诉他德国人的名字、在圣罗莎的地址，但没有说明此人眼下在何处。哈利或他的一位朋友必须尽量谨慎地收集有关情报。

两天后，纽约的医生又在电话中找我，问我是否进行了必要的调查。他已经做完了各种医疗检查，并告诉病人他的住院时间比预料的稍长些。他在两天后开始手术，他笑着向我担保，“这肯定不是一次美容术”。

4天匆匆而过。紧张的空气令人难以忍受。给我打电话的不是哈利，而是医生：手术已经做完。一位外表典型的日耳曼女人的金发妇女探望过病人。他请护士告诉来访者，病人十分需要休息，还应当呆在诊所呆些日子。医生想知道我的打算。

我也不知道。又过了一天，我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哈利打电话。电话很模糊，双方只能听清对方的片言只语。哈利似乎对我注意阿道夫·贝格尔一事大为惊诧。他告诉我第二天将给我寄来他的助手的汇报，电话杂音太多，无需在电话里讲。

我有点困惑了。虽然哈利还不了解此事的所有细节，但他认为阿道夫·贝格尔是个微不足道的人，因此决定将报告交邮局寄我，从而丢失许多很可能是十分宝贵的时间。我感到他的做法有些奇怪。

也许到头来会证明这是一只不足挂齿的小猎物。

我给纽约“我的”医生挂电话，试图冲淡一下事情的重要性。我告诉他：“您知道，我们决定等贝格尔先生返回家中后才开始处理这件事。这样，您就不会受牵连，您的诊所更不会有麻烦。您的声誉就不会因为我们采取的行动而蒙受损失。”

他显得很高兴。“上帝保佑您。”他至少一连重复了5遍，“您解除了我的心理负担。一方面我绝对愿意跟您谈这件事——您明白，我妻子有几位远亲死在纳粹的屠刀下——可是另一方面，假如警察闯到诊所里来，我确实会有很大的风险。请设想一下，警察在新闻记者面前逮捕我的一名患者……上帝保佑您，上帝感谢您免除我这些风险。”

3天后，我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寄来的哈利的汇报材料快件。我急不可耐地拆看信件——我差一点仰天倒地。哈利的明友们在圣罗莎得知，阿道夫·贝格尔是……一名德国犹太人。

他携家眷于30年代移居阿根廷。他完全被同化了，在圣罗莎跟其他德国侨民和睦相处，在一家企业里当顾问，丧偶，无后嗣。

认识贝格尔的人说，他跟一名德国姑娘有来往，想娶她为妻。

几个月后，我路过纽约时给“我的”医生打电话，他迫切希

望了解此事的结果，我告他，那位病人是个十分普通的人，我们甚至连他是否参加过纳粹这一点也不明白。乞求整容手术很可能是到诊所去探望他的那个年轻的金发女子的愿望。

我们反正已经大大地泄露了医疗秘密，于是我请医生寄我一张这位非同一般的病人的照片。他给了我两张照片，一张是手术前拍的，一张是手术后拍的。

我看不出有多大的区别。“犹太人”显然作弄了一番医生。

阿道夫·贝格尔为这么一点变化付出了昂贵的手术费，我为他遗憾。我决定把有关老纳粹头目们采用整容术的种种传说永远锁在抽屉里。

应当指出，从外表一看就知道某人是德国纳粹罪犯，这是十分罕见的现象。人们的灵魂很少体现在面孔上。

美国人跟奥地利人和德国人一样，难以在今天诚实的人中识别出从前的魔鬼。我在美国处理的最重要的案子为我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17. 和蔼可亲女魔王

那是1964年1月中，我在以色列的逗留已近尾声。我坐在特拉维夫皇家咖啡厅门前的露天座席上，享受着煦丽阳光的温暖，企图将等待着我的维也纳冬日之严寒驱之记忆之外。我约好跟友人泽夫·泼拉思见面。泽夫曾同我一起在利沃夫念书学建筑，如今他是特拉维夫建筑局副局长。我们将谈论各自的妻子儿女，回忆大学生活——打从青年时期以来光阴荏苒、岁月逝去空悠悠。

我随便翻看着来咖啡厅路上买的一本杂志。泽夫迟迟没来。忽然，我听见扩音喇叭里播放一个通知：“维森塔尔先生，有电话找您。”我迅步朝电话间走去，食客们纷纷扭过头来注视我。一些人认出了我，起立鼓掌，等我从他们面前走过。在维也纳我也曾遇到过这种情况，食客们认出了我，站起身来，但不是给我鼓掌，而是朝我的脚唾吐沫，以示蔑视。泽夫有要事缠身，临时代替一位同伴谈判一项合同，因此不能赴约。我们商定傍晚见面。我回到桌边去取杂志和付款。

可是我的座位不见了：我扫视周围，寻找空着的桌子，但所有桌子都有顾客。最后我终于看到一张桌子上有我的杂志。那里坐着三位妇女，无疑她们以为那张桌子没有人。我

一边做出立即要离去的样子，一边说道：“对不起，我只是要取我的杂志。”可是一位妇女站起身来，用波兰语回答我说：“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不经邀请我们就占了您的桌子。当我们从扩音器里听到您的名字时，我们就决定前来跟您谈谈。我们三人都曾在波兰的马伊达内克呆过。我们有事要问您：毫无疑问，您一定知道‘科比拉’后来的情况，是吗？”

波兰语中的科比拉一词意为“牝兽”，我根本不懂她们三人要说的是什么。

“哦！对不起！我们一直以为人人皆知谁是科比拉。我们给一个女人起的外号，因为在集中营里，她践踏所有的女人。其实她的真名叫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一个奥地利娘们儿。恶劣昭著的女人。”

我的对话者蓦地激动无比。这女人约40岁，一张久经风霜的脸。她的脸颊和脖子胀得通红，呼吸变得急促。“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孩子……孩子……那是个小小孩，您知道……一个男人背上挂着一个口袋，人们看不见里面装的是什么。他偶尔走到布劳恩施泰纳身边。只要有押犯人的车队来，她手里总是拎着一根鞭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抽打。鞭子落在了男人背上的口袋上，我们听到了哭喊声。她命令男人解开口袋，露出了一个孩子。我们就站在近处，看清了孩子的脸：他完全吓坏了，从男人的手中挣脱，开始逃跑。可是，科比拉紧追不放，一把抓住孩子，小孩吼了一声，科比拉开了一枪……”

女人再也说不下去了，泪珠湿润了她的脸。她的两位伙伴跟她一起哭泣。虽然在集中营中熬过多年的人自以为对残

暴行为已是麻木不仁，几乎是无动于衷了，可是这件事犹如烧红了的烙铁一样刻进了记忆里，使人经受了新的考验。“我想等我死后，人们会象我家乡的做法一样在我的眼皮上盖上瓷器碎片，这样我就能重新见到这孩子站在我面前时的脸庞。”女人喃喃絮语，仿佛在寻找托辞，解释自己“这么多年之后”仍情不自禁地想起在她眼前被杀害的孩子。

应当是我们这些难以忘掉……的受害者深感内疚。

三位女人轮流讲着，象大堤决口，江水奔泻不绝。“在犯人队伍中，孩子们总是首当其冲，立即被挑选出来归入死犯队伍。运他们去毒气室的卡车早已备好。母亲们想自己背孩子，但是赫尔米娜不许，她粗暴地将她们驱开。妇女们只好独自爬上卡车，然后赫尔米娜将婴孩扔给她们，象扔包裹一样。一般说来，总是由阿丽斯帮她，那是个贵族女子，大家认为她俩都是党卫队员。阿丽斯身高1米80，金色头发，很漂亮。她专门看管年轻姑娘：她用鞭子抽她们的脸，只要有可能，她总是设法抽她们的眼睛……”

“奥尔洛夫斯基”：这个名字掠过我的脑海。我被关在克拉科夫-普拉斯左夫集中营的时候，熟悉了一位女看守，她跟马伊达内克来的三位妇女描绘的那个女人的模样完全吻合；她叫冯·奥尔洛夫斯基，是个贵族女子。只要见到她打人的样子，你就永远也忘不了她：她以打人为乐，似乎她对自身价值的感觉同她侮辱受害者的程度成正比，她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人。姑娘们经过几个星期的长途跋涉，一个个骨瘦如柴，惶恐不安，甚至变得完全麻木，就是在被押入毒气室时也不想反抗。

阿丽斯·冯·奥尔洛夫斯基的鞭子大概使姑娘们明白，

她们到那里不仅仅是去死：她们应该在凌辱中死去。

“她名叫冯·奥尔洛夫斯基。”三位妇女中的一位说道，“我们永远忘不了她。”

我也忘不了她。

女囚们给第三个女看守起了个绰号，叫“血腥的布丽吉特”。阿丽斯·冯·奥尔洛夫斯基、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和“血腥的布丽吉特”在马伊达内克妇女集中营里实行明显的恐怖统治，其可怕程度就是在最阴森的恶梦中也难以想象得到。

当然不应该认为，集中营里所有的女看守势必都是残忍的魔鬼。许多女人是偶然派到这岗位上去的，她们用冷漠的态度去战胜环境中的恐怖气氛：她们对待女犯就好象处理该装卸、安置在木棚里，或从那里拉出来用卡车廉价运走的货物一样。在这工作过程中出现的意想不到的反应——一名妇女不肯放开其孩子，姐妹俩在走向死亡的道路紧紧搂在一起不愿分离——所造成的混乱都会引起女看守火冒三丈：一条装配线停止运转，那就会破坏计划的落实。这时，女看守们就朝人群开枪或挥舞皮鞭，因为这是使杀人机器恢复运转最简单的办法。她们象牧人抽打离群的或迟迟不肯越过障碍物的羊那样鞭答囚徒们。她们不是为了取乐而打人。

可是奥尔洛夫斯基和布劳恩施泰纳不同。集中营显然刺激了她们内心潜在的暴戾的冲动，她们象屈从于毒品一样屈从于这种冲动。

当一个女人——她很可能将要做母亲，或者已经是位母亲——象扔一包东西似地扔孩子，抽打孩子的眼睛，然后朝孩子的脑袋开一枪，这是件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往往难

以相信这竟会是真事。我亲眼看见过类似的场面，无数份揭发材料诉说过这件事，一些书描写过这些，因此我明白当时的情景。不过，我还是需要亲自核实一下，以便使这理性认识孕育出感情来，只有感情才能把这些抽象的叙述变成确凿的事实。

我只是在会见那三名女囚之后，才对马伊达内克——我在许多书里看到过有关这个地方的描绘，我手头无数材料也常常提到它——有一个确切的概念，那时我才以特有的方式将这个集中营的名字对我个人来说所具有的含义拒之脑后：要晓得，我的妻子琪拉险些同一个车队的囚徒一起被押进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她能免进这个地狱，完全是个奇迹。

那时，琪拉躲在波兰卢布林市我的朋友、工程师施切潘斯基家中，化名为科瓦尔斯卡，怀里揣着未经申报的假护照。

一天，当局颁布法令，命令生活在家中而没有登记的人统统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一页纸上，贴在大门上。看门人必须将这些人名通报盖世太保。两天后，有关人士务必亲自到盖世太保总部去一趟。

在一个楼里，邻里们相互都很熟悉，不进行登记是十分危险的，会立即引起怀疑，您就会被控制在任何一个告密者手里。但是，如果以为交验假证件便可平安无事地进行登记，那同样是极其危险的。

总之，大约有1,000人到了盖世太保总部。先是点名，然后一一登记并接受询问。这样持续了一整天，直到傍晚6时才结束，但是还有40来人没有办完手续。象德国一切行政机构一样，盖世太保严格按规章办事，就连在最疯狂的时期

也是这样。因此，盖世太保在下班时让这些人回家，第二天一早上班时再来。

我妻子就在这40来人之中。

其余的人都被押送到了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关了起来，卡车半个小时往返一趟。

琪拉得知这个情况，连夜逃往利沃夫。从前我俩在那里居住过。在同我有联系的波兰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她在华沙找到了一个新的藏匿处。

我想：“要是盖世太保各办公室晚一刻钟关门下班，他们定会将她装上一辆卡车。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准会脚蹬长靴、手执皮鞭，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等着她。”

时间不早了。一月的太阳不再暖和我们的身子了，但我们还坐在露天席位上，打着寒颤，费力地抑制着波涛汹涌的回忆。招待送来的饮料原封不动地摆在桌子上。

我向那三位妇女告辞时说：“别人外出带回的是一些回忆，而我每次出游带回去的总是一些人名，这一次带回去的是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这个名字。”

回到维也纳后，我把有关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全部材料找了出来。研究的结果如下：德国人于1941年7月21日袭击苏联，一个月后，党卫队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卢布林逗留，他心血来潮，决定在该市附近构筑一个集中营，关押2至3万囚徒。他责成县党卫队和警察头子、奥地利卡林西亚人奥迪洛·格洛博克尼克组织这个集中营。可是，格洛博克尼克的计划更为宏大：他想建立一个能容纳15万名奴隶的集中营，这些奴隶将去党卫队的成衣厂或兵工厂干活。另外，

集中营还要关押约10万名俄国战俘。

然而，建筑材料的奇缺，使如此规模的工程难以落实，于是只得满足于第一期工程，接收5万名囚徒。

这个庞大的机构占地3公顷，四周围以双道电网，由18个岗楼监督。

里边共有7个毒气室：2个在集中营入口处，4个在洗澡间附近，另一个在关押妇女儿童的区段旁的焚化室一侧。

苏军于1944年解放这里的1,000来名囚徒，纳粹分子未来得及将这些人撤走。

死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里的囚徒总计为15万人。

有关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头一次审讯于1944年11月27日在卢布林市开庭，共审讯了一周。在看守集中营的1,300名警卫队员中，80人判了刑。

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不在其中。

令我吃惊的是，我发现她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登记奥地利判处的纳粹罪犯的簿子里：1948年，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在卡林西亚的菲拉赫被捕，送交维也纳的一个法庭受审。从前报纸上刊登过审讯的报道，我从这些简短的文章得知，她被判处3年徒刑，因为她曾拳打脚踢鞭笞过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囚徒们。

人们只一笔带过布劳恩施泰纳在马伊达内克的活动，没有任何具体的揭发材料。

剪报在这方面说明不了问题。

我知道布劳恩施泰纳是维也纳人氏，猜想她刑满出狱后一定会回到故城来。

可是找不到她的踪迹。住所登记处的人员告诉我们，自1946年以来，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始终没有重返她在维也纳第19区卡伦贝格尔街44号的故居。不过，我们可以找到了解她和她家情况的邻居，他们也许会告诉我们她现在的下落。

于是我到了卡伦贝格尔街，那是城边一条蜿蜒曲折的、十分漂亮的小街，附近的葡萄园一直延伸到维也纳森林。

我感到径直去44号不免过于莽撞，于是朝邻近一幢房屋走去。我轻轻叩门，给我开门的是一个男子。我问他是否认识住在附近一所房子里的布劳恩施泰纳小姐，是否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她。一听见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的名字，男子的脸就往下一沉，悻悻吼道：“滚开！”他砰的一声向我关上了门。

我在小街另一侧一幢房子里比较走运。一位慈祥和善的老妪给我开门，显得很愿意跟我聊聊：“问我认识那位小姐吗？当然罗。请进，您想了解她的什么情况？您是记者？”

若用谎话来报答如此热忱的接待，那是不体面的，我愿意照实说：“不，我不是记者。我之所以对布劳恩施泰纳小姐感兴趣，那是因为她有过一次诉讼。”“啊，是的，可怜的女人。”老妪立即上钩，“当然，我听说过此事，我还得知她被判过刑。报上登了许多文章，揭露她在集中营对妇女们做的那些事。我难以相信她会做这样的事。不过，有那么多的人说她确实这么做的。我认识她的父母，那是十分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小时候的样子我至今仍历历在目，她每星期天都同姐姐穿着漂亮的衣裳一起去教堂……”她不说话了，沉浸在回忆之中，几乎把我的存在都忘记了。我慢慢地

将老妇引回现实中，请她再跟我说说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

家庭不十分富有。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14或15岁那年就被送到一家牲口商那里当保姆。她吃住在那里，除此之外挣不到什么钱。她姐姐去了荷兰，也是当佣人。赫尔米娜领了第一次工资后就试图去荷兰找姐姐，希望在那里找一份好工作。可是没有成功：她在边境上被截住，人们把她送回了家。“其中的原因，今天我已不记得了。”老妇人越说越大胆，“在大战期间，她家的一个人告诉我，赫尔米娜在德国一个监狱里当看守，干得不错。1943年，她回到维也纳。我没有看见她，但邻里们告诉我，她曾设法来看我，可惜当时我不在家。首先，邻居们没有认出她：她穿着一身类似军装的衣服。可是战争结束后，是的，我见过她一次，她来看过我，但她不喜欢维也纳，她对我说：‘这里没有什么好吃的。我要到卡林西亚去，我的家人在那里。’警察是在那里抓住她的。她出狱后也许回卡林西亚去了。她家许多人生活在那里。”

一只猫优美地跳上我的膝头：好漂亮的猫，毛色黑白相间，油光闪闪，柔软滑润，一对绿眼睛十分逗人。它趴在我的膝间，舒服地听凭我抚摸。

“嗨，我的小明卡很少让人这样抚摸。平时，来访的陌生人是见不到它的。不过，我接待的客人并不多，明卡是我的唯一伙伴。我同其他住户的人不常见面，我丈夫去世已很久了，两个儿子战后没有回来，人们说他们失踪了。不过您要知道，我仍怀有希望，奇迹始终存在，是吧，先生？”

老妇用疑问的目光看着我：她寄希望于奇迹，我则肯定

地点了点头，说道：“嗯，当然有奇迹。我也一样，是战争结束数月后才找到我的妻子。”

老姬因遇到我这样一位听众而欣喜若狂，于是又开始谈起在她家住过一段时间的外孙女，她当时的年龄几乎跟“小布劳恩施泰纳”相同。

开枪打死一名儿童的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在这位老妇的心目中，一直是邻居的一个迷人的小姑娘，老妇把她同自己的外孙女相比较。如果我把特拉维夫三个妇女对我说的话讲给她听的话，她是不会相信的，她一定会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就好象我若要告诉她，这只安静地躺在我膝间的猫是个穷凶极恶的动物，她是绝对不会相信的一样。

“您能告诉我，布劳恩施泰纳小姐在卡林西亚的亲人的姓名和住址吗？”临别前我问她。她赶紧取过一张纸记下了有关情况，我把纸放进口袋。我的动作惊动了猫，它跳到了地面。

我加紧调查。一位住在格拉茨的朋友，由于工作需要常常到卡林西亚去。他帮我寻找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并随时向我通报情况。

可是毫无结果。谁也没有见过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她并不住在这个地方。只有一个办法了：随便找个借口，直接同她家里人联系。

接下来便是物色能胜任此项任务的人。此人的举止仪表不能引起她家人的疑虑，他们的同情心肯定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应当找一个他们甚至会当成自己人的人前去联系。

我的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人选：一个我称之为“里夏德”的小伙子，大约24岁，学国际贸易，在维也纳一家电子企业里工作。这是个极富魅力的青年，任何一位母亲都希望得到他当女婿。我的女秘书也为他的魅力所动心，开玩笑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阿波罗^①”。

我选用里夏德的角度可不是他的魅力，而是因为他出生于比“民族主义”更民族主义的环境中——他从未否认过这一点。

“我来自一个反犹太人家庭。”我们初次见面他就直言不讳地说，“我喜欢让您听我亲自承认这一点，而不是通过别的什么人。我小的时候，经常听父母亲说，犹太人最好还是滚到巴勒斯坦去过他们的日子。尤其是父亲，他说得更恶毒，要把犹太人绞死。但是您应当相信我，他从来不赞成那些大屠杀。在战争后期那些年里，他常同我母亲讨论这个问题，母亲对我讲过：‘你父亲不喜欢犹太人——这种厌恶情绪在他童年时期就形成了——但他不理解为何将那些人关在集中营里，然后杀戮。’我个人从未能跟父亲谈论过这些，因为他在1944年死在战场上了。不过我肯定，假如他今天仍然活着的话，他会同意我主动为您效劳的。您不要以为我父亲是个坏人。”

我确实没有这个想法。我深知环境对生长其中的人有多大的影响。我尤其懂得，在奥地利这样的国家里，反犹主义

①阿波罗系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主神宙斯和勒托的儿子，主管光明、青春、医药、畜牧、音乐和诗歌。古希腊的雕刻艺术常以阿波罗材，借他的形象表现男性的美。——译者

在许多甚至连犹太人都没有见过的人的脑海里，跟十诫^①一样根深蒂固。其实那些人并不真正了解犹太人。对犹太人的偏见是绝对轻率的，当人们十分自信的时候，就不会说自己产生了偏见。至于说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人是“好”还是“坏”，必须在他正视了对犹太人的迫害现实之后才能作出判断。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认可这些迫害，或者开始思考问题。假如他是个坦诚者，这种思考会叫他拒绝反犹主义。

谁也不能为自己受到反犹主义教育负责——唯一的问题在于，面对犹太人被赶进卡车，或被党卫队员推进运送牲口的货车的情景时，自己是否依然保持反犹立场。

作为“重犯^②”的儿子，里夏德同样面临这样的抉择：盲从父亲的观点给自己留下的记忆，还是面对迄今对民族社会主义体制的认识进行思考，然后形成自己的观点。在我的活动中，我结识过不少这样的“父亲”所生的这样的“儿子”，他们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他们比抵抗运动战士的儿子更加坚决地拒绝民族社会主义。对于抵抗运动战士的儿子来说，拒绝民族社会主义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对于前者来说，那是一次真正的道德胜利。

在这方面，艾希曼的审讯起了重要作用：它使那些没有参与战后漫长的调查的年轻人在几个月里充分了解了事情的真相。谁要是在艾希曼受审之后依然怀疑数百万犹太人被关在

①十诫系《旧约·出埃及记》与《申命记》所载，经过上帝在西奈山启示给摩西，而铭刻在两块石板上的宗教诫条，现成为宗教教材的基本内容。——译者

②战后，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被划分为五个主要等级：“要犯”、“重犯”、“轻犯”、“从犯”和“受宽宥的过失者”。

集中营，最后惨死在毒气室这一事实，谁就不怀好意，就是蓄意拒绝承认事实。

许多人涌向我的办事处，自愿跟我合作，提供帮助，里夏德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想干些什么，随便什么都可以。一定会有办法弥补一下过去的事情。”

是的：象里夏德这样的人使诸如我这样的人深信，他们的服务有一定的意义，他们留在奥地利是对的。

我多么想给他们每个人分配一项工作，来简单地表明我已体会到并钦佩他们的建议后边所饱含的一片心意。一些人在我办事处临时干了一段时日，另一些人接受我的委托干几件小事情，去住所登记处调查，或者只是为我到邮局去寄几封信。一般说来，这些人同我们很快就失去联系，因为我喜欢雇用专业人员和追捕罪犯的行家。不过，在眼下这个特殊案子里，即在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这一案子里，里夏德这样一位业余爱好者也许更理想些：对他来说，踏访卡林西亚无疑是重温一下离他不远的，但业已被拒之脑后的往事。

我打电话叫他，一小时后他到达我的办公室。我对他说：“您曾想帮助我。”他回答说：“我将竭尽全力。”我想他确实已经做好了准备，接受我秘密地派他去南美某个纳粹要犯的农场去。但是我要交给的使命虽不是如此危险，可也不那么方便。里夏德要到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的家人居住的村子里住下，设法同这家人建立联系。一个经过种种考验的办法是，对这家人说，他有一个亲戚也姓布劳恩施泰纳，心里正在怀疑两家是否有亲缘关系。“如果您能同那些人建立一点联系，您就设法在闲聊中脱口说您有一个舅舅，人们因他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活动而控告了他，他得到了应有的

判决。千万不要主动提起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这个人。关键是切勿急躁，要善于等待，让他们自愿向您讲您感兴趣的事。”

里夏德问公司请了假，来我的办公室告辞。接着他便消失在卡林西亚了。

九天过去了，我开始不安起来。突然，他重新出现在我面前，满面春风地告诉我：“我不折不扣地遵照了您的建议。”他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我到达那里后的第三天，就按别人的指点到了那家人住的地方。我敲了门，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前来开门，我对她讲述了我编好的萨尔茨堡地区表亲家的事，表亲跟她同姓。她立即对我说这里边一点关系也没有——她在萨尔茨堡那个方向没有亲戚。我怕她把我关在门外，立即说道：‘也许您丈夫知道点什么。’我竭力装成十分自然的样子。老妇人警惕地打量我，大概我的样子给她以好的印象，于是她让我进了门。为了进一步哄骗她，我告诉她我正在休假，感到她这个地方实在太美，等等。这时，一个我这样年岁的男青年进入屋来，径直朝我走来，向我伸出了手。显然，他乍一见我就对我产生了好感。我们无拘束地聊了一阵，我邀他去我下榻的旅店里吃晚饭。”

翌日，里夏德应邀去男青年家吃午饭。后来几天也在那里用餐。不过，只是在第四天他才听到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的名字。他按照我的建议，讲述了他可怜的舅舅无辜坐牢五年这个杜撰的故事：一群心怀仇恨、垂涎舅舅从法国带回的一批油画的人们诬告他犯了种种暴行，尽管他一再申明无辜，法院还是给他判了刑。

陷阱发挥作用了。

“我家里也有一个人遇到了完全相同的事情。”女主人说道。她突然变得饶舌起来，“她在当监狱的看守时打过两、三个茨岗人的耳光，因而被判了刑。不过这件事已经过去。五年前，她嫁了个美国人，他们去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定居下来。”

为得到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眼下的名字，他费了更大的劲儿。他同这家人的儿子产生了真正的友谊，在一次散步的时候，里夏德把话题引到了午饭时谈过的事情上。

“您不想有一天去拜访您在加拿大的那位亲戚吗？”

“哦，当然愿意，但费用太惊人！”

“我一直梦想着去加拿大。”里夏德居然扮演起环球旅行者来了。“据说那里仍是荒野一片，一个人迹未至的自然景色。也许过一两年我攒足了钱就去那里。我可以去拜访您的那位女亲戚，代您向她问好。”

“她现在姓瑞安，住哈利法克斯市。”

里夏德心想，加拿大同奥地利一样，应该有一个住所登记处，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找到这位瑞安太太。于是他抑制住好奇心，再也没有问下去。

“我希望您对我满意。”他的语气有点洋洋得意。这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这句话仅仅是向另一次谈话的过度，这次谈话无疑比上一次给他的印象更深。“知道吗，工程师，”他急切地说，仿佛担心他一完成使命我就不再对他感兴趣，“您是否知道我为何如此重视您对我的工作满意或不满意吗？您可以看到，象我这样的人是可以做些好事的。”

我向他投去询问的目光，因为我并没有象他怀疑自己那

样怀疑他呀。

说得确切些吧：他感到的是对父亲的烦人的怀疑，这种怀疑已纠缠了他许多年，他苦于难以摆脱它，又难以说出口。“我已经对您说过，我父亲是位反犹主义者，尽管他不愿意消灭犹太人。昨天晚上，我刚从卡林西亚回来，将您交待的任务讲给我母亲听。她讲了一个故事，这可以说是对我最好的报偿。她对我说：你也许还记得，你父亲不太喜欢犹太人。可是在大战期间，当他在东线当兵的时候，他看见过一件可怕的事。他无权叙述此事。可在他死前不久，即在最后一次休假期间，他吞吞吐吐地提到了这件事：‘你知道，’他告诉我，‘我心里萦绕着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我辱骂过犹太人，我向谁请求原谅呢？我们的部队包围犹太人，我亲眼看见这些行动的后果。你们谁也不会宽恕我。’”

里夏德的眼里闪着泪花。

“你可以宽恕他。”我把手放在他的手上。

我们默默地相对坐着，许久不说话。

我跟原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囚犯、家住多伦多的朋友取得联系，扼要地向他介绍了布劳恩施泰纳的情况，并告诉他，她眼下住在哈利法克斯市，请他把她的确切地址搞清楚后告诉我。三星期后，即于1964年6月下旬，盼望已久的回音传来了：“布劳恩施泰纳一瑞安太太已不在哈利法克斯。她到了美国，在纽约州昆斯市马斯佩特区第72街5211号。这是寄到哈利法克斯来的信件转寄给她的地址。”

我原以为布劳恩施泰纳问题已接近尾声了。其实，它只是刚刚开始。

战争结束后的19年中，美国没有组织过一次对纳粹罪犯的审判，也没有引渡过一个此类罪犯。不过，司法形势倒是好的：如果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瑞安已经加入美国籍（要是还没有，那么她就不能受美国法律保护）的话，移民局必定会问过她的犯罪记录。要是她承认在维也纳受到的判决，移民局就很可能拒绝准许她入美国籍；假如象我推测的那样，她没有交待以往的判决，那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叫美国撤销她的美国籍。

要在外国搞清楚上述这些复杂的情况，最好是不同当局打交道，而是乞求于那里的新闻界。在这个案例中，我征求了《纽约时报》驻维也纳的记者克莱德·法恩斯沃思的意见。这位记者在几个月前曾为我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拯救六百万人的侦探》，登在连载版。“可否告诉我哪个部门主管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事件？”我把整个事件讲给他听，然后说，“我想你也不会同意她这个女人逍遥自在地生活在你们那里吧。”

“我不过是个新闻记者。”法恩斯沃思直率地说，“在这些法律细节上，我并不比您懂的多。不过就我所知，美国新闻界的力量是强大的。如果您能向我提供您说的那件事的材料，供我写一篇文章的话，舆论的压力会促使有关当局出面干预。请把人们指责这个女人的罪行用文字写下来给我。我们发一篇通讯，这将是一篇很好的稿子：内容包括您对她的指控和她的辩解。”

他说干就干。十天 后，即1964年7月14日，《纽约时报》刊出了有关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的文章，标题是：《前纳粹集中营女看守成为昆斯市的家庭主妇》。此文立即

引起了轰动。新闻记者约瑟夫·莱利维尔德拿着我提供的地址访问了布劳恩施泰纳—瑞安太太——她正在用淡紫色和黄色颜料粉刷房屋。记者把我汇集的人们对她的指控告诉了她。他一字不落地记录了她的第一个反应：

“我付出的代价已够多的了。你们的电台不断地高喊和平。我也一样，我有权享受和平。这一切难道没有完啦？我干的那些事只是履行职务而已，而且我已付出了代价，蹲了三年监狱。”她问记者，“您能想象得出在监狱呆三年的滋味吗？我在马伊达内克只干了一年。战争结束后，我被英国人监禁了起来，不过他们不得不很快就释放了我，因为没有什么罪名可强加给我。”

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的丈夫拉塞尔·瑞安是建筑工人，他以美国人特有的倔劲为妻子辩护：“这是世上最好的女人，连一只苍蝇也不伤害！”

他不知道（或硬说不知道）妻子在战后坐过三年牢。他也不知道她在马伊达内克和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干过。她曾告诉过他，在纳粹统治时期，她在一家教养院当过看守。

他哪能想象自己的妻子有过——哪怕是一点点——罪呀。

这对夫妻的所有朋友邻里也都表示不相信。瑞安太太是个十分和蔼的女人，一个模范妻子，一个乐意助人的好街坊。她刚来这个街区的时候，拜访过所有邻居，从此便跟大家和睦相处。对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幸存者来说，这个女人是个魔鬼，可是对第72街的家庭主妇来讲，她又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女人”。

这是常有的事，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战后人们往往把

所有党卫队队员——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描绘成青面獠牙的恶魔：皮鞭插在靴统里、见到囚徒就往脸上抽。

诚然，这样的看守确实存在，囚徒和公众眼里留下的就是这些人的形象。可是按照奥地利前奥斯威辛集中营在押犯联盟的谨慎的女主席伊拉·林根斯所说，这种人只占看守人员的10%，其余的都是一些普通人，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持可怕的漠然态度，人们搞不懂他们是天生如此，还是出于自卫心理而在集中营里才有了这种态度的。

这些男男女女在第三帝国这个完全特殊的环境里才开始真正犯罪的。在这方面，他们的犯罪原因有内心的冲动，但更主要的是外界环境。一旦恶梦结束，他们就会交待罪行，脱下军装，在周围人眼里重新成为战前那种人：普通人。

如果说他们从前对自己的配偶子女是那样和蔼可亲、殷勤慈祥的话，那么战后他们是完全可以重新变成这样的。凡了解他们又听说他们在集中营里虐待过妇女儿童的人，不相信他们会干出这等事来，就好象有人指责这些人自己也能干出这种暴行一样不予相信。

我们不同意能干出最残酷罪行的人会跟我们相似的说法。

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不同于普通的和麻木不仁的罪犯。根据我们对她掌握的全部材料来看，她属于上述残忍到有病态心理的10%的恶魔之列：就是在马伊达内克，用皮鞭抽打奔跑中的孩童的脸，这个举动也是不寻常的。应当看到，赫尔米娜心灵里始终骚动着一种伤害别人的强大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不可能在恢复正常生活后完全消失。

不是吗？难道能认为一个人能在其生活的特定阶段，完

全耗尽其暴戾的源泉吗？或者他能够转而采取完全无害于人的、乐善好施的行为吗？

或者说，在集中营那种倒行逆施的环境里所发泄的残暴凶狠的气势，会在人间友好的环境里变成亲和宽厚的态度吗？

难道存在着可被称为正常的精神分裂症这样的病症吗？一个人真的始终有两面性，即永不交汇的暴虐凶恶的一面和慈善热心的一面吗？人会不会由两个截然不同的心灵——一个会用靴子踏烂姑娘的脸，另一个会在邻居家女孩的兜里放进糖果——组成呢？

不知道我们对人的灵魂的认识，将来有一天能否为我们提供解释上述现象的令人满意的答案。应该寄予希望，但我认为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总可以为每一个罪行找到同罪犯心理有关的解释。

尽管如此，罪行的残酷性是改变不了的。

我们应当抓住事实不放。我们掌握着大量控告赫尔米娜的可信的证词，这些材料揭露她鞭挞、脚踢、殴打、杀害过不少人。

邻居们诚实可信的证词一致证明她是本街区最热心的女人，但这一点丝毫改变不了上边那些事实。

这起码是大部分美国人的观点。《纽约时报》的文章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整个纽约都在议论这件事。在出版之前，报社跟移民局联系过，移民局说布劳恩施泰纳太太于1959年4月14日到美国，五年后，即于1963年1月15日，加入美国籍。显然，她在自己的历史方面提供了假情况。《纽约先驱论坛报》一位记者在上述文章出版后的第二天询问移民局局

长P·A·埃斯珀迪，他的部门将有何动作。埃斯珀迪回答说，每年要处理50来人的美国籍问题，但被取消美国籍的仅仅2人。

应当承认，在布劳恩施泰纳问题上，美国当局是有负众望的。记得自从50年代以来，苏联及其卫星国一直在要求引渡居住在美国的纳粹党人，但所有要求都埋葬在冷战期间的相互谩骂之中。因而一大批美国人深信，那篇文章中介绍的罪行不过是一堆由共产党人杜撰的、不值一驳的谎言而已。

可是美国新闻界不肯罢休。他们就布劳恩施泰纳事件询问当局的打算。为平息舆论，移民局指出，它已请求奥地利当局将1949年判处瑞安夫人徒刑的全部材料转来查阅。但此乃多此一举：光是瑞安夫人对移民局隐瞒判刑这一事实——这是毋庸置疑的——就足以使她自动地失去美国籍。

这是件极其简单的事，无需在行政程序上纠缠不清。

赫尔米娜的美国丈夫拉塞尔·瑞安请利奥·巴里律师代表他妻子跟当局交涉。巴里认为有能力使这个家庭放心生活，但此案必将是旷日持久的。他打算将争论引向理论方面：能容忍破坏一个美国家庭，将一位美国人的妻子引渡出去吗？

这就是一个法治国家面对数百万人被关押——被杀害——一事的罪人所采取的慎重态度。

我认为，原籍奥地利的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应当引渡给奥地利，因此我敦请格拉茨的公共事务部（它负责调查马伊达内克集中营）进行有关她的调查。

我等了三年，格拉茨的检察官弗利克才根据我的建议到以色列去调查。

这期间，我们将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的照片散发给

我们知道其地址的所有受害者协会，不久我们就接到许多国家——其中有南美的一个国家——寄来的证词。瑞安家所在的街道成了集会游行的地方，示威者以青年为主，也有好奇者和希望看一看一个被怀疑犯有如此残忍罪行的女人是个啥样的看热闹者。几个冒失鬼自制了一枚爆炸器，结果扔在了别人家的房子上，把无辜者的屋子炸毁。

美国驻维也纳领事朗戈到我的办公室拜访我，带来了1949年审讯布劳恩施泰纳时证人的名单。他希望我将名单上的人的地址搞清楚，因为他得到命令，需要重新询问这些证人。尽管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们还是准备提供帮助。我们并不要求美国法庭重新审理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从前的罪行，只是请求美国收回她的公民资格。她在发暂时撒谎，这一点就足够了。不过，为满足朗戈的要求，我们需要请南斯拉夫的两位证人到维也纳来，他们在1966年都作过证。另两名证人被叫到美国驻华沙大使馆去谈了话。

1968年8月22日，即开始程序辩论四年后，美国司法部终于建议移民局，撤销布劳恩施泰纳—瑞安夫人的美国公民资格。

又过了三年，美国布鲁克林县联邦法院高级律师雅各布·米希勒于1971年9月28日正式宣布这项决定。

同年，德国司法部长通过外交渠道向美国司法部长提交了一份长达300页的引渡申请。不久，波兰通讯社传出消息，波兰也提出了引渡申请：的确，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是在波兰国土上犯罪的，她的受害者大部分是波兰公民。

1973年3月21日，布劳恩施泰纳—瑞安夫人被捕。她的企图用能否撤销美国公民资格这个问题一再阻拦采取行动的

辩护人，在她的要求下停止了此类活动的新的努力。赫尔米娜·瑞安十分害怕引渡到波兰去，同意被交给联邦德国。

只有她丈夫仍在坚定不移地向昆斯市的朋友和邻居们要求征集证词，把他妻子描绘成一个无可指责、谨慎持重、和蔼可亲的人。可是这场签名运动无法阻止司法进程：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于1973年8月6日被驱逐出境，在德国便衣警察的挟持下，坐德国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飞向联邦德国。

1975年11月26日，几乎是30年前在卢布林进行的马伊达内克案开庭的日子里，杜塞尔多夫法院开庭审讯集中营看守成员，10名男性和5名女性。

直至1962年为止，设在路德维希堡的州中央司法行政局，对232名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杀人嫌疑犯进行了调查。1968年，这个数字上升到350。大法院参事施韦德尔斯基于1971年告诉我，杜塞尔多夫调查的人数也有这么多，但他声称杀人嫌疑犯只有32人，而且总数中的300人已经去世。

最后，出庭受审的只有15人。他们的头目是集中营司令赫尔曼·哈克曼，他在战后就被美国一个法庭判处死刑，因为他在好几个集中营里犯过罪。后来他又被减刑为无期徒刑。

1955年，他获赦免而释放。

三名要犯是：被受害者称为“血腥的布丽吉特”的希尔德加德·勒克特、审讯期间死去的阿丽斯·冯·奥尔洛夫斯基和外号叫“牝兽”的赫尔米娜·瑞安。

庭长名叫京特·博登。原告是两名检察官，每位被告有两名律师，律师们已经参加过审讯纳粹的其它诉讼案。人们请

来了历史学家沃尔夫冈·舍夫勒，这立即引起了辩护律师们的强烈反对：在一本叫做《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迫害》的书里，他提到了所谓的“党卫队员们的暴戾”，已经表明了他的倾向。更为糟糕的是，据希尔德加德·勒克特的辩护人路德维希·博克律师说，舍夫勒博士是在一名犹太教授指导下通过博士论文的，因此他必定是满脑子的偏见。

几年前我就注意到了这位博克律师。在曼海曼的一次诉讼案中，他出庭为涉嫌参加了波兰切佐尔特科夫大屠杀的H·帕勒辩护。为此他随同法庭到以色列询问证人——因为一些残废的证人无法到德国来作证。这些听证使博克大发雷霆：博克律师不服协同德国检察官主持听证的以色列法官，说什么这位法官是犹太人，因而不可能持公正立场。

我们的文献中心向检察长和律师协会提出了对博克律师的抗议。博克辩解说，他是应他的当事人的要求行事的，他依然从事着律师业务，并受普遍的尊敬。

在马伊达内克诉讼案期间，博克律师彻底拒绝法庭的判决，说法庭有偏向，在开庭前就将部分罪状在《明镜》周刊上公布。一家轻罪法庭负责调查此事，开庭审讯于是被推迟了两个月。

诸如此类的意外事件在审讯过程中发生了多起。

此外，为被告开脱罪责的证人也登台表演，这些人均来自党卫队。

多亏了他们“有条不紊的工作”，大部分纳粹战犯使得法庭无法证实他们的罪恶勾当。文字材料跑到哪里去了呢？记录屠杀的照片又到哪里去了呢？

就这样，这些党卫队员竟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证人席上，出

来否认人们怀疑他们参与过的种种罪行。他们的证词其分量并不比从前集中营里在押犯的证词重，唯一的区别在于审讯前，法官已向他们指出，如果他们的证词会连累自己的话，他们可以拒绝回答。

一部分党卫队员直言不讳地招认，可是大部分却尽可能地为被告“洗刷”。除个别人外，他们绝大部分都患“记忆紊乱症”。举例说，一名充当过狗腿子头目的家伙，于1943年11月3日指挥了对几个牧场的包围。1943年11月3日这个日子，以“收获节”这样的美名载入了史册：一天内共有1.5万名犹太男人、女人和孩子遭到枪杀。

可是，这位证人竟同其伙伴们一样，对这个日子和这些屠杀一点也记不得了。

他们中只有一个人承认，那一天从早到晚都听到枪声和嘶吼声——可是他又说，他“没有问一下发生了什么事”。

当有人问他，他认为发生了怎样的事时，他回答说：“想我的休假”。

这些证人的“陈述”持续了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

这些党卫队员证人在关键问题上记忆一概出毛病，旁听者很快就讨厌他们作证。记者席几乎是阒无一人，传播媒介得不到什么新闻供读者阅读。

原告的第一位证人出庭，一改这种死沉的局面。那是一位波兰医生，68岁，名叫让·诺瓦克。他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关押了26个月，后来转押到奥斯威辛集中营。他亲眼看到了集中营建筑过程。诺瓦克说，被押进马伊达内克的1万名犹太人在露天过了好几个月，冻死累死的人不计其数。在参

加建营的5,000名苏联战俘中，幸存下来的只有3,500人。

第二个证人是波兰的恩莉卡·奥斯特洛夫斯卡夫人。她曾被从华沙押到了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她陈述说，当她到达集中营时，“老犯人”建议她特别提防两个女看守：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和希尔德加德·勒克特。

奥斯特洛夫斯卡夫人象诺瓦克大夫一样，描述了在集中营的医生布朗克主持下，到华沙犹太人居住区挑选妇女儿童的经过。接着，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在布朗克挑剩下来的人中选一些妇女，她挑得特别“卖劲”，给毒气室额外送进一批受害者。

证人在作证时见到从前对她下过毒手的人，情绪极其激动，嗓音顿然变得嘶哑，最后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法官被迫宣布暂停，在场的诺瓦克大夫给奥斯特洛夫斯卡夫人吞了几片镇静药，她方能继续作证。

由于她懂德语，人们将她派到物资科。那里除堆放被子衣服外，还有整箱整麻袋的人的头发、存储毒气的金属罐、供施放毒气用的死人腿骨和头颅。

毒气室被伪装成淋浴间。“跑腿的”穿梭来往于毒气室和物资科之间。她在头目的命令下将毒气罐交给他们。她曾在上级命令下亲自将毒气罐送到浴室去，收取相应的东西。

讲到这个地方，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两名辩护人中的一位、律师蒙多夫出来说话了，他要求提醒证人，她的证词很可能对她自己不利。

奥斯特洛夫斯卡夫人陈述完之后，博克律师就要求将她羁押起来，不许她返回华沙去：她把毒气罐送到毒气室去，她就成了杀人犯的同谋。

这件罪恶之事一经公布，公众又对马伊达内克案件的审讯兴趣大增，一连持续了几天。

可是不久之后，又是千篇一律的恐怖事件的陈述，显得十分单调：人们可以听取二件、三件，甚至一百件杀人案，并为之而震惊。可是杀人事件数以千计，久而久之，听众就会变得象当初犯罪者和受害者一样麻木，恐怖事件就会变得平淡无奇。

法庭预计要听取250位证人的陈述，其中一半证词必须在头9个月里听完。可是被告一方的辩护人不断从中作梗，日程表被彻底打乱，9个月过去了，只听完16位证人的证词。

对于来自以色列、波兰、美国的证人来说，马伊达内克诉讼案简直是场恶梦。他们无法忍受同从前的刽子手们对质，被告的辩护人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使这场考验变得更加严酷。比如说，当一位证人说到焚烧尸体的臭气笼罩整个集中营时，蒙多夫律师要求兽医和给人看病的医学专家出庭作证：专家们能否区分焚烧死牲口的气味和火化人尸时的气味。

法庭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只好深入辩论方能驳回辩词。

当1981年1月终于开始法庭辩论时，马伊达内克案已审理了五个年头。蒙多夫律师为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瑞安辩护说，他的委托人之所以到马伊达内克去，那是为了寻找一个“轻便可靠的工作”——其余的事，鉴于证据不足，他要求无罪释放她。

1981年6月30日，法庭宣判：赫尔米娜·瑞安是唯一被

判处无期徒刑的被告。她对自己的徒刑十分漠然。过不了多久，当她意识到这种惩罚将意味着什么时，她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了，她掏出手帕，擦着眼泪。

在诉讼案延续五年期间，她从未说一句悔罪的话，也没有为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受害者说一个怜悯之词儿。

她的丈夫拉塞尔·瑞安就坐在旁听席上，他是这样评判法院的判决的：“我很失望，我原先以为会释放她呢。”

美国的约八十个右翼或新纳粹组织同样感到失望。早在赫尔米娜·瑞安被移交给德国司法机关的时候，这些组织就建立了一个辩护团，并在它们的报纸上呼吁大家捐款。最卖力的是《自由警钟报》，它的出版者乔治·P·迪茨在发出呼吁后得到了一大笔赠款，据说他支付了1.7万美元担保金，使得赫尔米娜·瑞安在审讯初期还享受着自由。此外，他希望科隆大学法律系教授伯勒尔博士出来证明，德国法院无权审判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瑞安。（这是有例子的：一般来说，人们总是抗议外国法庭审判德国人和奥地利人。）

但是，美国新纳粹分子的种种努力均为水中捞月。对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瑞安的判决具有执行力，她得永远在牢里服刑。

至于迪茨之流，他们又找到了新的目标：他们在佐治亚州成立了一个“爱国法律基金会”，负责筹集资金，保护生活在南美的纳粹合作者。目前正在进行一系列审判这些家伙的程序（以便实现将这些人驱逐出境的目的），一些人被押解到边境，另一些人（如维约雷勒·特里法大主教、费多伦科和德米亚努克）被引渡出境。

18. 张冠李戴错上错

东方国家真正掀起宣传活动，把联邦德国说成为新纳粹主义的堡垒和纳粹罪犯的天堂，是在冷战时期。动机是昭然若揭的：苏联人用确保对复仇主义德国的防御能力的借口，来为自己在东欧屈从的国家里的军事存在辩护。民主德国则是个特殊的例子。一方面必须用特殊的毅力来扼杀统一的愿望，另一方面又不能否认民主德国曾是希特勒德国的一部分。于是，他们竭力想证明，最凶恶的纳粹罪犯统统都在西德，并占据着各个要害部门。“奥伯伦德尔案件”可以说是证明这一思想状态的最佳例证。

1943年，德国人在卡廷发现1940年春被斯大林的军队杀害——每人脑袋上一颗子弹——的4,000名波兰军官的尸坑。这引起了德国人的深思：德军不是也留下了无数个尸坑吗？从斯大林格勒起，德军且战且退，穷追不放的红军总有一天也会发现德国人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各地挖的堆尸坑的。

于是就建立了一支特别部队，命名为“1005”部队，专门负责查清主要陈尸坑的位置，将尸体掘出来烧掉。指挥这支部队的党卫队大队长布洛贝尔避难就易，采取了习惯做法：叫囚犯挖掘，工作一旦结束，立即处死这些囚犯。

人们在利沃夫同样建立了一支“1005”部队。在利沃夫—雅诺夫斯卡集中营里的在押犯的协助下，该部队清除了集中营内和利沃夫周围的许多尸坑的痕迹。

1943年10月8日，这支部队发现一个从此载入史册的堆尸坑：里边有利沃夫38名教师及其家属的尸骨，在尸体最上层有两具乌克兰警察的尸体。他俩是在完成“使命”后，被党卫队杀人灭口的（今天生活在美国的“1005”特别部队的监督人莱昂·韦尔斯，在他的《死神别动队》一书中详细地描绘了这类事件）。

大战结束以后，利沃夫教师被屠杀一事——它发生在1941年7月4日——引起了历史学家、科学机构、传播媒介，特别是政界的注意。

如同屠杀犹太人和茨岗人一样，这是蓄意灭绝人种的后果，唯一的标准是只要属于某一阶层，不管个人命运如何，统统都在杀戮之列。德国人一占领波兰领土，其政策就有一个重要的目标，那就是消灭波兰知识分子。

早在1940年春起，党卫队中队长布鲁诺·施特雷肯巴赫就策划杀害约5,000名大学教师、艺术家和其他知识分子，美其名曰“AB行动”，即全面绥靖行动。（苏联秘密警察——目前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的一名上校汉斯·弗朗克，当时出任波兰总督，充当苏联的联络官。他不可能不知道“AB行动”，因为苏联人在卡廷干的事跟此行动一模一样，他们杀害了大批波兰军官。）

鉴于纳粹党不愿意——至少是不愿意正式——宣布波兰人跟犹太人和茨岗人一样不受法律保护，因此在屠杀波兰人前总要开庭审讯一番，制造一场闹剧来做做样子以欺世人。

但最终波兰人总是成批成批地被判刑，其罪状名目繁多：什么串通敌人啦，间谍活动啦……不一而足。

战争刚刚结束，波兰和东德就开始调查利沃夫事件。1958年，所谓的元凶受到了大张旗鼓的揭发：此人名叫特奥多尔·奥伯伦德尔，是阿登纳政府的部长。

东柏林组织了一场审讯，最后，奥伯伦德尔于1960年4月29日被缺席判处终身监禁。他被指控亲自命令和指挥杀戮波兰教员。他的问题成了冷战时期反联邦共和国宣传斗争的组成部分：象奥伯伦德尔这样的人都可以在阿登纳总理那里占据部长职位，这充分证明在联邦德国，法西斯分子和复仇主义者早已上台执政。

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因为我认识其中一些受害者。比如说明基维茨教授，我学习工程的时候听过他的课，另外还有我们大家十分敬重的医生兼作家博伊-茨伦斯基教授。

1963年，在准备利沃夫诉讼时，我跟斯图加特检察院始终保持着联系，我曾多次向该检察院院长罗尔夫·西希廷检察长谈起奥伯伦德尔案件。那时我们就对东柏林的说法表示怀疑。奥伯伦德尔在事情发生时确实在利沃夫，但他不是党卫队员，而是德国军队的军官，他指挥的是乌克兰辅助部队，这支部队叫“夜莺”。根据我们手头的 all 情报，屠杀教师的命令来自党卫队。因此我们不明白这同奥伯伦德尔有什么瓜葛。事实上，恰恰因为这一点，1966年汉堡法庭对他的审判最后以无罪告终：没有任何理由把利沃夫屠杀教师一事归罪于特奥多尔·奥伯伦德尔。

不过，有人怀疑这项司法决定是见不得人的政治交易：司法界很可能下不了决心宣判阿登纳总理的一位前部长犯有杀人罪。诚然，调查仍在深入，却仍无证据来支持这些怀疑。民主德国并不为此而收敛其宣传攻势。在它看来，奥伯伦德尔仍然是杀害教员的元凶。

深入调查把我们引向另一条线索。我发现在波兰知识分子被捕与被杀害之间的那段时间里，存在过一个波兰拯救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知识分子问题。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容忍了这个由教会管理的拯救委员会的存在。委员会进行的是纯人道主义的活动，但盖世太保认为——只是这一次它没有看错——这是个潜在的反对派组织，为了安全，务必时常对它清理，以削弱其力量。比如说1942年5月12日，盖世太保逮捕了委员会女积极分子卡罗琳娜·朗科隆斯卡博士。这位波兰女贵族由于姻亲关系是意大利上层贵族成员的亲戚。斯坦尼斯拉夫城的盖世太保头子汉斯·克吕格尔亲自审问卡罗琳娜，企图从她嘴里搞到她跟抵抗组织或游击队协会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等情报。面对朗科隆斯卡夫人顽固的沉默，克吕格尔大发雷霆：如果她仍然不开口，他就要将她送交他的伙伴库契曼处理。她不该抱有幻想，以为作为波兰女人会享受任何保护。库契曼“管理”利沃夫地区所有教师，至于这些教师谁是波兰人谁不是波兰人，他是不管的。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反正卡罗琳娜一进他的监狱就再也别想活着出来。

可是克吕格尔错了：在意大利的亲戚出面干预下——意大利王储的夫人直接找过希姆莱——朗科隆斯卡伯爵夫人从斯坦尼斯拉夫转到了利沃夫，盖世太保特派员瓦尔特·库契

曼认真地听了她的陈词。开庭审讯并不完全如克吕格尔想象的那样。当朗科隆斯卡夫人向库契曼叙述到克吕格尔谈论他的话时，他记录在案，然后揭发其上司违反了保密条例。克吕格尔被召到柏林作出说明。朗科隆斯卡伯爵夫人几乎可以说受到了赦免：她没有被枪杀，“仅仅是”关进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大战结束前几个月，红十字会将她救出了集中营。据说是在希姆莱的过问下，他的代表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下令释放了她——在纽伦堡审讯期间，卡尔滕布鲁纳将自己为此事写给红十字会的信作为证据为自己辩护。

1967年4月，大家所说的斯坦尼斯拉夫案在联邦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的蒙斯特开庭审理，被指控杀害了数千名犹太人的汉斯·克吕格尔出庭受审。朗科隆斯卡博士作为主要的被告证人之一，同她从前的刽子手对质。经过一年的审讯，克吕格尔因多种罪行——人们指控他共杀害了约12万犹太人——而被判处终身监禁。这个案件的材料开始澄清利沃夫教师大屠杀的责任归属问题：这次屠杀是在1941年7月2日由到达利沃夫的党卫队小队长埃贝哈德·舍恩加特医生指挥的，他手下的230名党卫队员组成了治安警察总指挥先遣队突击队。

舍恩加特从柏林带来的命令是清楚的：务必逮捕和处死波兰知识界全体成员。

有关人员的名单早由乌克兰变节分子们拟定。舍恩加特手下的人只要挨门逐户地将教员及其家属驱赶到一起。舍恩加特把他们送到亚伯拉罕穆维奇学校。7月3日至4日夜里，由德国5名党卫队员和乌克兰2名辅助警察组成的一支

别动队开始行动，负责杀戮勾当。

别动队的队长就是党卫队班长瓦尔特·库契曼医生。

1941年7月4日清晨5时，被捕的波兰教师及其妻子儿女被押往维勒卡丘岭；乌克兰辅助警察在那里挖了一个大坑，库契曼下令别动队开枪射杀。

这是个“绝密”行动，因此在杀死教师之后两名乌克兰辅助警察也被毙命。这就是挖掘者在尸体上层找见的两具死尸。

人们曾多次说服关押在蒙斯特的汉斯·克吕格尔说出他的同犯们的名字来，但一切尝试均告失败。根据检察院的一项命令，人们又审问他有关瓦尔特·库契曼的情况，他仍然拒绝交待。

在汉堡审讯奥伯伦德尔期间，人们听取了警察局参事马克斯·德拉海姆的证词。此人亲眼看到过对波兰教师的大屠杀。可惜的是他能忆起的只是一个细节：德国辅助警察是一名党卫队班长指挥的，但他怎么也记不起那人的姓名。

库契曼的另一位上司本来也可以揭发一些他的活动情况，此人就是塔诺波勒诉讼案中的主要被告赫尔曼·米勒。米勒供认，库契曼指挥了布热津卡杀害犹太人的行动，从1942年中期起，他就负责德罗赫皮茨地区犹太人问题。可是米勒对始终没有搞清的利沃夫事件一无所知。

几年后，我们得到一份证明材料，说库契曼在德罗赫皮茨亲手击毙一位犹太姑娘。当时这份材料在我们看来不甚重要——我的工作使我习惯于数以百计的死亡者。可是事实上，只有这个凶杀事件才能引起德国司法当局的注意。

1944年，库契曼离开波兰——因为他的党卫队部队被调

到了法国。大战结束前不久，他在法国开了小差，潜匿在西班牙，这就是为什么他出现在党卫队追捕的人名单上。

库契曼在1940年写的一份履历表证明，他掌握西班牙语。他于1937年去西班牙参加过佛朗哥的摩洛哥军团，被一颗轻机枪子弹击中了他的大腿上部，因而负了重伤，留下了永久的伤疤——后边将详细谈这个伤疤。他学习了西班牙语，后来德国驻萨拉曼卡领事馆把他派到加的斯领事馆当一名译员。

在那里他第一次同盖世太保发生了关系，并递交了加入该组织的申请书。

1939年3月1日，他被召到莱比锡在警察学校接受训练，身份为警察分局见习局长。

这就足以说明，他为什么选择西班牙为逃亡的头一站。他匆匆销声匿迹，这是毫不足怪的：库契曼心里明白，一旦有人知道他在利沃夫干的那些事，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

对一名纳粹罪犯来说，弗朗哥的西班牙是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诚然，弗朗哥在大战中是希特勒的同情者，但从来不成赞成后者的灭绝犹太人政策。不过，两个法西斯政体间的联系足以在战后导致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不会彼此看着先前精神上的兄弟落难而袖手旁观。罪行轻者在西班牙找到了避难所，罪恶累累者在那里得以藏匿。

1943年因释放墨索里尼而出名的奥托·斯科茨尼就是这些逃亡者之一，他在西班牙的存在，在我们的历史上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1966年，我在办公室里接待一个人的来访，他向我叙述了他在西班牙度假时经历的一次奇怪的事。他应邀去一家主要由德国人光顾的俱乐部，其中有一个中年男人

小组，他们都自称是斯科茨尼的朋友和熟人，这确为事实。有一次，已是深夜一点钟，他们象往常一样吹嘘起在党卫队里干过的事，谈起了一个叫库契曼的人：这是个胆小鬼，战争结束前夕开了小差。这家伙伪装成教徒，更名为彼得洛·里卡多·奥尔莫，试图混进他们行列中去。

可是他认错了人，他们不想同逃兵来往。我的访客告诉我，他们甚至一度打算“惩罚”开小差的奥尔莫—库契曼。但是，斯科茨尼坚决反对：“咱们不要对1945年前的事作任何判断！”

我的客人叙述这个故事，目的是引起我对那伙朋友的注意。他没有想到我最感兴趣的是库契曼这个人——我们已寻找他多年，但一直没有成功。

我们立即调查。最初的结果告诉我，奥尔莫—库契曼刚离开西班牙，很明显，他已感到那里不再安全。我几乎深信，他走上了他的许多老伙伴们走过的路，到阿根廷去了，他掌握的德语和西班牙语一定会帮他的大忙的。

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合作者“哈利”，跟阿根廷官方和非官方的各界人士都有极为密切的联系。我既无确切的线索，亦无多大的希望，只是把我得到的情报通知了哈利，准备作一次长时期的等待。可是他很快就答复了我，写信告诉我说，我将去斯特拉斯堡参加一次国际犹太人代表大会，他希望到时候同我面谈。

他告诉我的事完全出乎我最不现实的预料：库契曼是我们的人。

哈利认识一位家电商，此人告诉哈利，他在德国奥斯拉姆电器公司遇到一个人，此人显然是德国人，因为他讲的西

西班牙语带有浓重的条顿口音。家电商问这个人为何有这样的口音，这个自称阿根廷公民的人名叫彼得洛·里卡多·奥尔莫，他说他母亲是德国人，在家里一直讲德语。因此说话带乡音，一直未能改掉。

这种解释不太令人信服。在我们看来，毫无疑问，此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问题在于如何证实这一点。怎样才能证明，名为彼得洛·里卡多·奥尔莫的人不是别人，恰恰就是瓦尔特·库契曼呢？

我在党卫队档案中找到了一张库契曼的照片，寄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哈利。哈利让他的电器商朋友看，后者明确地指出：照片上的人确实是叫奥尔莫的那个人。

不久，哈利搞到了奥尔莫的住址。库契曼同他姐姐一起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奥斯拉姆电器公司任广告部负责人。

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是开动联邦德国笨重的司法机器。

人们所了解的库契曼在德国的最后一个住所在柏林，因此我们将材料寄给柏林检察院。其时是1974年11月中旬。

司空见惯的等待开始了。鉴于杳无音讯，我只好亲自去询问处理情况，人们告诉我，已经决定重新审问亲自目睹利沃夫大屠杀的德国警官马克斯·德拉海姆，但他仍然记不起指挥屠杀的军官的姓名。

监察员们想让德拉海姆看库契曼的照片，但太晚了，德拉海姆老头已经去世了。

1975年2月，我得到消息说，库契曼用假名得到了阿根廷国籍。我们的案子变得更为复杂了。我联系的监察官施蒂夫在4月8日写信告诉我，向阿根廷要求引渡，那将毫无结

果。

至于我，并不想如此快地打退堂鼓。如果司法当局对库契曼无可奈何的话，我可以通过别的途径把他挖出来：我邀请在南美和美国很受欢迎的《视界》报一位编辑来见我，向他介绍了有关库契曼的所有情况。在采访美国与阿根廷电力工业合作问题的幌子下，《视界》报记者成功地拍到了库契曼的一张照片，不久，报纸发表了一篇占几个版面的文章，专门谈库契曼。

1975年6月28日，库契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捕，但是第二天就被释放了。这两次行动的背景至今不明。

奥斯拉姆电器公司立即解雇了库契曼（一位经理甚至从慕尼黑专程来告诉我，他的企业用了这样的人，实在后悔莫及）。化名奥尔莫的库契曼选择了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出路。追寻他踪迹的新闻记者们在附近的火车终点站密阿马尔发现了他。他告诉记者们，他只好逃之夭夭，因为维森塔尔的间谍一直盯着他，试图捉住他。

在这一点上，可惜他高估了我：我只是向德国当局交涉过。

在这个时期，即在1975年5月，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司法部长本德尔博士出访波兰。陪同他的有我的老友、路德维希堡州司法部中央办事处主任阿达尔贝特·吕克尔博士，他的任务是在波兰档案中寻找有关材料。

吕克尔借这个机会同波兰纳粹罪行调查委员会主席切泽斯拉夫·皮里肖夫斯基教授进行了商量，主席先生大胆地告诉他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波兰人几经调查证实，特奥多尔·奥伯伦德尔在利沃夫教师大屠杀中无罪。

吕克尔回到联邦德国后揭露了这一消息，结果掀起了波兰同民主德国间的一场轩然大波。缺席判处奥伯伦德尔终身监禁的东德司法当局怕大丢其脸，这种担心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东德政府一再要求波兰同志向波里肖夫斯基施加压力，让他收回那番话。

尽管皮里肖夫斯基同意这样做了，但为时已晚，因为他同吕克尔的讲话至少还有三位见证人：本德尔博士、他的新闻专员和德国驻华沙大使馆的一位职员。

我利用东柏林跟华沙之间的争执，敦促新闻界要求引渡库契曼。对他的审讯确实可以一劳永逸地澄清利沃夫教师大屠杀的真相。

1975年7月，负责司法事务的柏林市议员赫尔曼·奥克斯福德请联邦政府就库契曼的引渡问题进行必要的交涉。国际抵抗运动和集中营联盟副主席玛丽-玛德莱娜·富卡德表示对这一件事的结果“甚为关注”。

可是这些努力均无下文。于是，我通过在阿根廷的朋友直接对这个国家的政府施加影响：一个集中营余生者代表团请求会见司法部长阿尔贝托·罗卡莫拉，敦促逮捕库契曼，然而毫无成果。阿根廷人无意对一个连德国都没有要求引渡的人采取什么行动。

德国司法当局迟迟不提出引渡要求，这实在令人费解。据说是因为在这方面不存在双边协定。可是这一解释是拙劣的，因为联邦德国已多次请阿根廷引渡经济和其他方面的罪犯。

有一件事不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库契曼知道自己受到追缉，因此提出引渡要求不会打草惊蛇，促使他逃跑。

德国当局为何拒绝行动呢？从下边陈述的种种迹象，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库契曼如果被引渡到西柏林，就会受到审判。在审讯期间，人们不可避免地会谈到布热津卡罪行和在德罗赫皮茨杀害那位姑娘一事，此外还必然会谈到利沃夫教师大屠杀。而3公里以外的东柏林法庭以这些罪名已经判处特奥多尔·奥伯伦德尔无期徒刑。

为避免无罪释放奥伯伦德尔，民主德国司法当局将被迫对库契曼的罪行表示异议。这无疑会引起东柏林同西柏林之间的冲突，不仅如此，还会引起联邦德国同民主德国之间的冲突。起码我是这样推想的：联邦德国考虑到柏林的“过境”问题，会尽可能避免冲突的发生。

一切因素都有利于将库契曼案悄悄地弃置一旁。波兰当局一出面就正式声明，断然否认为奥伯伦德尔恢复名义的任何可能性。8月末，检察官施蒂夫告诉我，库契曼的逮捕证将被吊销，因为经过法律修正后的刑事时效法仍然对他有利（柏林不调查杀人犯，而只调查凶杀犯的同谋，认为下令杀人的人其罪恶比行刑者的要轻）。

奇怪的是施蒂夫又告诉我，人们还没有放弃引渡库契曼的要求，只是因为怕在阿根廷政府那里碰钉子，才没有提出这个要求。

8年匆匆而过，正当库契曼案件被人遗忘的时候，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将阿根廷的军人政权打倒在地；这个国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自己的元首劳尔·阿方辛。反诽谤联盟南美处负责人、犹太教徒莫东·罗森塔尔不久就提请阿根廷总统注意库契曼案件。与此同时，我的朋友、反诽谤联盟驻美

国的纳粹罪行处负责人埃利奥特·韦尔斯宣布准备在访问欧洲期间拜访柏林检察长，询问他面对阿根廷的新局势是否打算提出引渡要求。

过不多久，柏林问我是否知道库契曼的新地址。我将地址和电话号码给了柏林，后来又把《视界》报记者1975年在库契曼办公室拍的照片的原版送给了柏林检察长。

检察院声称，只能指控库契曼杀害了德罗赫皮茨那位16岁的姑娘，因为这是检察院拥有足够见证人的唯一罪状。我不计较这一点，关键在于提出引渡要求，将库契曼交给德国。

1984年11月，即我着手处理此案达20年后，“彼得洛·里卡多·奥尔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他姐姐家被捕，他声辩他同被追捕的瓦尔特·库契曼毫无关系。即使人们告诉他，被他占用其护照和身份证的彼得洛·里卡多·奥尔莫其人早在1969年已去世，他仍然一口咬定自己是奥尔莫。我的一位朋友请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预审法官，建议他做一件不光彩的事：“叫库契曼脱掉裤子，您就会看到他在西班牙战争中挨过子弹的伤痕。”

我始终不知道“彼得洛·里卡多·奥尔莫”是否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鉴于他不良的身体状况，他出了监狱，转到了医院。

他于1985年8月30日死于心脏病。

19. 改头换面罪难逃

希特勒反对一切政治派别，反“布尔什维主义”尤为疯狂。反过来，法国的、德国的和奥地利的共产党人对纳粹主义的抵抗无疑是最顽强的，总之，从他们在民众中所占的位置来看，他们的战斗最坚决。

不过，令人吃惊的是“同志们”竟然能够将希特勒跟斯大林签订的友好条约从记忆中抹掉。这个条约并非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互不侵犯的条约：作为这种联姻的礼物，一定数量的奥地利和德国的犹太共产党人被希特勒逮捕。

毋庸置疑，一大批共产党人被关进了集中营。他们在那里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唯有他们才能组织一个具有假象的政治组织，他们在该组织里担负着大量职务，以便卓有成效地帮助本党同志。

这就是战后他们在集中营囚徒的各种组织里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的诸原因之一。还需补充指出，大部分集中营地处波兰领土，起码有五分之二的波兰人讲过——哪怕是短时期也罢——集中营。因此，集中营里建立起来的友谊在波兰政治生活中起着特殊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波兰政府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支持囚犯们的大的组织，无形中成了这些组织的后盾。

集中营囚犯们的各种协会并没有忘恩负义，它们通过了

坚定不移的左的政治决议：它们决定，共产党认为哪里有法西斯主义和新纳粹主义的苗头，那里就有危险——明确指出，这种危险存在于联邦德国，（受联邦德国的影响）这种危险偶尔也存在于奥地利。

“反法西斯主义”成了共产党宣传的一个重要内容。

艾希曼诉讼案也未能躲过这种宣传：1961年4月，恰好在审讯前夕，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观察员出席审判的弗里德里希·考尔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联邦德国和以色列的阴谋：本·古里安^①和康拉德·阿登纳之所以在是否将艾希曼置于被告席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是因为用对在联邦德国占据要职的其他纳粹分子和战犯保持沉默这一条件换来的。

许多人认为，对这类耸人听闻的话最好是置之不理，让它不攻自破。不过我不这么看。诚然，在场的法官和新闻记者中，谁也不相信这种谎话，可是在60年代，奥地利和德国的左派青年恰恰喜欢听这样的消息。他们一贯把民族社会主义同西德的政治权势集团联系起来，以证明自己欲推翻西德权势集团的意愿的正确。

为此我认为，务必立即对考尔的话作出反应。我问他：

“您是否可以告诉我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何不补偿纳粹主义的受害者们的损失？它不仅不给前集中营的囚犯以补偿，而且对纳粹分子掠夺的别国的大量财物也不予任何补偿。您不会硬着头皮说，劫掠来的所有财物如今都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吧？”

^①本·古里安当时为以色列总理。——译者。

显然，这样的道理对考尔来说并不新鲜，他脑子里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在我们那里，起码可以说老纳粹得不到一官半职。这就是我们理解中的补偿。”

我又一次推想着德国和奥地利的左派青年对这句话会作何种反应。他们也许会说：“是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可能没有必要的钱来换取人们对其罪孽的宽宥，但反过来，它却成功地为自己的过去真正驱了邪：它不给纳粹分子们留有任何希望。”

考尔这样的人喜欢用泛泛之谈来使别人厌倦，因此，必须将这样的人置于明确具体的事实面前。我接着说：“我听说过伦斯基将军的名字。在审判7月20日事件的参与者^①时，他是陪审员，眼下他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院议员；这是个胸前缀满奖章的功臣。”

考尔意识到我在设法引他走上滑坡，他竭力溜走，于是，回答我说：“他很乐意在记者招待会后同我讨论这个问题。”

可是，我坚持要他立即回答，他便环顾左右而言它，在大厅里用激动的声调大声吼道：“只有一个民主国家补偿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受害者，那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您不该把奥斯威辛的亡灵搅乎到你们的政治漩涡中去。”我反驳道。

考尔的脸顿时涨得通红，甩着胳膊，大家以为他随时都可能心脏病发作而栽倒。记者招待会被迫中断。记者们在文

^①1944年7月20日，深知德国必将战败的一些德国军官试图暗杀希特勒。暗杀未遂，反遭可怕的报复。

章里谈到了我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谴责，而考尔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指责，他们却只字未提。

6年后，即1968年9月6日，我在维也纳新闻联合会俱乐部举行记者招待会，我是多么想邀请考尔博士参加啊。我面对50来名外国记者说道：“我请诸位作为舆论的代表光临此地，是要说一说迄今一直纠缠着我们文献中心的问题之外的事。今天不是要对在逃的纳粹罪犯重新谴责一番，也不是要求略感厌烦的当局去惩处在纳粹时期犯下的、终于为我们发现的罪行。这一次，我们认为有义务用我们的材料来说明令人不安的国际事态的背景，指明某些相关的因素，去推动史学家们和政治家们作一些认真的思考和严肃的比较。”

我所说的“令人不安的国际事态”，一方面指的是布拉格之春，几星期前它被俄国坦克碾成了齑粉；另一方面指的是6日战争即第三次中东战争，一年前的这场战争中，以色列坦克再一次捍卫了犹太国家的独立。

这两件事在东方国家里掀起了一场共产党人的宣传运动：人们用几乎千篇一律的道理为阿拉伯人辩护，同时又谴责以色列人，指控他们为捷克事件的同谋。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在谈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①及其支持者时写道：“布拉格笼罩在犹太复国主义中。”一位朋友为我在这句话下画了一条红线，并在一旁注上此话的弦外之音：“犹太人统治着布拉格”。早在1939年，《人民观

^①杜布切克当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苏军入侵捷克后不久，他被解除第一书记职务。——译者

察家报》就用这句话来为德国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一事辩护过。

这个奇特的对比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弄来了东德的一系列报纸仔细阅读，这倒并不是因为报纸办得好。它们的理论同波兰和苏联的报纸毫无二致——当然所用的语言有所不同。东德报纸所用的语汇、观点和思想模式有点象《真理报》，但更多地象《人民观察家报》、《冲锋队员报》和《黑色军团报》。对文章稍加分析便可得出一成不变的结论：只要把东德报纸上的“以色列”3个字换成“犹太人”3个字，把“进步力量”改成“民族社会主义”，就会以为自己眼前的报纸出自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之手。

这不是偶然现象。经过4个月的努力研究，我可以向报界公布一项将永远令人激动的结果：“同一种语言：昨天希特勒用，今天乌布利希^①用。”我将这句话作为一个卷宗的标题，该卷宗证明，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纳粹时期占据要职的39名（1）党员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报纸、电台和其他宣传机构里仍具有相同的影响。

乌布利希政府当时的新闻部门负责人库特·布勒夏便是一例，尽管他吹嘘自己有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党员证，其号码表明他过早地参加了这个党，但他还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在乌布利希政府里搞到了新闻部门的这个职务。在搞“宣传运动”的部门还有一个人，名叫霍斯特·德雷斯勒-安德烈斯，他于1929年加入了法西斯党。作为纳粹党电台的

^①乌布利希（1893. 6～1973. 8），德国共产党领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脑。——译者

创建者，他为“堕落的艺术”的定义下过功夫。东柏林《德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的主编奥斯特先生也是一位纳粹分子，这家杂志的另一名领导、特派员克格尔也是纳粹分子。1937年，克格尔是《布雷斯劳最新消息报》派驻华沙的记者，享受外交官待遇——应当理解他需要这种待遇。最后还要举一下《德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的一名撰稿人为例，此人名叫赫伯特·克勒格尔，从前在党卫队和中央安全局当过官。

记者招待会前夕，我准备了材料，由我的秘书分发给各位记者。材料里除了有普通党员外，还有党卫队员、冲锋队员、盖世太保的心腹、宣传队成员、希特勒电台的合作分子、《人民观察家报》和《黑色军团报》的成员、宣传部成员、党卫队种族和殖民中央局成员以及臭名昭著的神鹰军团的成员。所有这些人都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占据要职——他们在《新德意志报》和《德国外交政策》编辑部组成了真正的纳粹帮，甚至被授予最重要的国家级工人农民奖章。希特勒的战地记者威廉·施蒂勒摇身成了莱比锡市议员，请允许我提一下他当年一句残忍的口头禅：“我们神虎装甲车象碾死跳蚤一样碾死亚洲劣等人。”

另外，我给记者们谈了一系列个人的经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条原则是对任何有关纳粹罪犯的问题讳莫如深，绝对不予回答。有些时候，我的办事处和西德当局披露某些纳粹罪犯的姓名和地址，但东德历来拒绝在国际间法院委托调查的范围内举行审讯。一天，我们调查“骷髅”战斗队一名从前在卢布林犹太人居住区干事的队员，发现他现在是东德人民院的议员。该院另一名议员在希特勒的法院里充任陪审员时曾宣布过多起死刑，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里有

一个委员，从前曾受雇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司令部。

为建立我们的资料库，我们仔细研究了约600个人。我们不敢说这些资料已经十全十美，但它们都是认真调查的结果。上面是我们选择东德政治生活的一个特殊方面作为研究对象所取得的成果，换句话说，是我们研究了那里的新闻和电台后所取得的成果。我相信如果对那里的警察、情报或军事通讯等部门作一分析，很可能也能得出上述结果。

当然，西德也不断有同类情况被披露：《明星》报主编亨利·南宁在历史上当过纳粹宣传员；维尔纳·赫费尔最近被迫辞去《清晨品茗》广播节目主持人职务，因为他“忘记了”自己从前曾写过一系列起码说是令人不快的为纳粹张目的文章；我曾徒劳无益地揭露过海因利希·托特尔，在纳粹横行时期，此人在比利时主编过一份德国占领者的报纸，后来他成了德国公务员联盟新闻部主任。

不过，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战后再也没有重复希特勒时代的语汇。应当承认，联邦共和国丝毫无意掩盖那些事实，相反的是常常主动予以揭露。

然而东德的新闻没有作相应的反应。大约在我的记者招待会6个月后，当有人询问政治局委员阿尔贝特·诺登对我的资料有何想法时，他的回答如果出自联邦德国任何一位政治家之口的话，都会被斥之为“怀有文过饰非的不良用心”。请看他是这样回答的：“所有这些人都变化了；他们如今都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诚实坦荡的公民。在我们那里，任何一个有才华的人都可以找到工作。”

其他国家的老纳粹分子显然是不能改造的。对我的记者招待会作出公开反应的唯一的一位共产党人，不久就再也不

是共产党员了。维也纳改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恩斯特·菲舍尔说：“就是在社会主义内部，自由也有某些不可逾越的限制。反犹太主义必须继续被禁止。”

不久，菲舍尔自食苦果：他公开地把引导苏联坦克结束布拉格“犹太统治”的政策斥之为“坦克共产主义”，他退出了共产党。

20. 托洛茨基死他乡

在布拉格之春以后，一大批在政治舞台上起过某些作用的捷克人躲到了维也纳。其中有布拉格妇女克拉拉·D，她曾长期充当捷克国家总统安托宁·诺沃提尼的秘书。作为秘书，她在国家主席的命令下列席了他未能亲临的各种会议。她负责将会议上的一切谈话速记下来，然后将讨论的情况整理成材料交给他。

据她回忆，诺沃提尼在1963年曾要她参加负责研究为在40年代末因“有损于党的活动”而被捕、审判和开除出党的人恢复名誉的委员会会议。

几乎所有的委员都程度不同地强烈要求，受错误审判的人不仅在法律上应统统恢复名义，而且还必须重新回到党内来。只有一个与会者坚决反对这样的决议，他就是中央委员（前政治局候选人）布鲁诺·克勒。他的做法似乎表明，他个人仿佛要为待纠正的处分负责。至于从前判决时所依据的罪状完全是杜撰的这一事实，他是不予重视的。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坚持己见，且越说越激昂尖刻，最后吵得不可开交：委员会的一名最有威望的成员来到克勒面前站住，说了一句莫测高深的话，克拉拉·D一字不落地记录了下来：“如果在战争中，某个人的行为象我们今天了解的您当初作为

所谓盖世太保的战俘在巴黎的行为一样，今天有权当选为中央委员的话，那么我感到被错误地监禁的人当然可以回到党内来。”

克勒怒不可遏，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委员会中一些人支持他的意见，其他人则开始猛烈地辱骂他。接下来便动起了手，相互打了耳光。有人高喊，克勒同乌布利希向苏联告发了一些无辜的忠诚的同志。克勒气得脸色变白，但没有说什么话。最后大家回到争论的话题上，克勒打了退堂鼓。大家决定恢复所有被平反者的党籍。

克拉拉·D如往常一样整理记录稿，将目睹的那场争吵原原本本地描绘了下来，然后将材料呈交总统。几小时后，诺沃提尼亲自召见她，要她把有关这次会议的所有材料毁掉：事情已无现实意义，争吵不复存在，因为克勒已经让步。

克拉拉·D向我叙述了这件事，因为她怀疑克勒是巴黎盖世太保的眼线——也许我能设法证实她的怀疑。

说来真巧，布鲁诺·克勒这个名字我并不生疏，他是捷克斯洛伐克重要的斯大林分子之一。与克拉拉·D相反，我完全了解他为何如此激烈地反对为那些假审判的受害者恢复名义：这位狂热的反犹分子在准备审讯斯兰斯基、隆东、勒布尔和其他人的过程中，躲在幕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充当了捷克情报部门同苏联情报部门之间的联络官。

同克拉拉·D的那次谈话提醒我查阅《捷克斯洛伐克人名录》，看看有没有克勒这个名字。我得到了如下情况：布鲁诺·克勒，1900年生于诺伊施塔特，接受8年义务教育，后在印刷厂当学徒，接着便当兵。1918年还是社会民主党人，

1921年加入共产党，被选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1926年至1927年间，他在莫斯科党的思想学校念书。1935年成为捷克国会中的共产党议员，同时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局成员。1930年，他匆匆离开捷克斯洛伐克，移居法国，但纳粹分子又抓住了他，将他投入监狱。接着便出现下边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情况：1941年，克勒出现在美国。这年末，他到了莫斯科，出版《捷克斯洛伐克消息》报。

1945年至1947年，克勒充当苏联共产党同捷克共产党之间的联络员，于1947年返回布拉格。1949年，他领导干部局，1952年领导中央委员会第一局，1953年出任中央委员会书记。1960年，他当选为人民议会议员，1961年为政治局候选人。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人的生涯，其中只有一个谜未被解开：被盖世太保关押后立即到了美国。

我决定同1968年事件后也避难到维也纳来的维勒姆·卡汉研究这个问题。我认识他已经很久了，在以往的多次交谈中，我很欣赏他对捷克国内政策的深入了解。在布拉格，他曾是布拉格之春中的关键人物、国会议长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的秘书、顾问和朋友。当时斯姆尔科夫斯基本人不顾俄国入侵仍坚持留在布拉格，但他建议卡汉火速离开这个国家。维勒姆·卡汉是上面那个委员会提到的人中间的一个：他已经被捕坐过一次牢，谁也不知道捷克的新政府对恢复名誉的人持何种态度。

我请卡汉到我的办公室来，把我掌握的有关布鲁诺·克勒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但没有告诉情报的来源。

其实，维勒姆·卡汉完全明白提供情报的人。他远比克

拉拉·D更了解克勒。他还知道克勒移居巴黎后的情况。他告诉我，最初克勒不是被纳粹逮捕的，而是被法国人于1939年抓住的。德国人入侵后，法国人释放了大部分有牵连的政治犯。可是克勒不走运：他所在的监狱办事拖拉，因此他落入了德国占领者的手中。

“可是，”卡汉继续说道，“在苏联人干预下德国人放了他，他便去了里斯本，又从那里出发去了墨西哥。”

把克勒说成是盖世太保的合作者，这显然是站不住脚了。他在苏联人干预下获释，此事本身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我记起了同亚历山大·魏斯贝格-齐布爾斯基的一次谈话，他向我叙述了在希特勒同斯大林达成协议后，他被苏联一个监狱释放，以换取在希特勒监牢里的共产党人的自由。

1940年，德国人手里的一名在押犯很可能由于这种形式的交易而获得自由。

可是，克勒在墨西哥干了些什么呢？

当卡汉回答我这个问题时，我在想为何这个国家的名字没有早一点引起我的注意呢？他用神秘的，甚至是因为比我了解得多而略显得意的口吻对我说：“你不知道在消息灵通人士看来，克勒是在墨西哥组织暗杀莱昂·托洛茨基的人吗？他就是从那里去美国的，1941年他又以功臣的身份去了莫斯科。这是贝利亚最信得过的心腹之一。”（贝利亚长期担任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头目，一度为斯大林死后建立的集体领导成员之一。）

现在我手里抓住了链条的第一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事件一一显现在我的脑子里：我记得杀害托洛茨基的凶手名叫拉蒙·梅尔卡德尔，坐了20年牢后没有留在墨西哥。他也没

有去莫斯科，而是到了布拉格。维勒姆·卡汉向我证实说：

“是的，是的，事情跟你说的一个样，他去找了布鲁诺·克勒，克勒给他弄到一个住所、一笔国家级抚恤金和捷克国籍。布拉格之春期间，梅尔卡德尔搬到莫斯科去了。”

为了搞个水落石出，我又核查了一下这种说法是否符合我们对纳粹分子在巴黎活动所掌握的情况。乍看起来克勒如此快地落入盖世太保之手似乎令人奇怪。其实，公开说来盖世太保并没有紧跟德军进入巴黎。然而对材料作一番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细节：在奥地利被并入德国和德国入侵波兰的时候，党卫队和盖世太保总是同德军同时到达那些地方的，这引起了将领们的抗议。在法国战役期间，大本营命令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等战斗部队到达法国以后，再在那里露面。因此就造成了这样的普遍印象：盖世太保是在1940年6月14日巴黎投降日很久以后才到那里的。

可是这是骗人的表象。被将领们这种“不讲礼貌”的做法激怒了的希姆莱为此组织了一支20人的盖世太保特别小组，他们身穿秘密军警制服，暗地里打入了德国部队，于6月14日跟德军一起进入巴黎市。从第二天起，他们就出现在市警察局，要求看有关德国侨民、共产党人和纳粹主义的重要敌人的全部档案材料。因此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很快就拿到了克勒的案卷，克勒在德苏条约后充当了相互交换的筹码。最后，我的调查证明克勒确实于1941年1月初从墨西哥到了美国。

我发现的一切情况跟卡汉的陈述完全吻合。

据卡汉说，克勒的伙伴们始终惧怕他。就连捷克中央委员会的人也都害怕他。在杜布切克时期，中央委员会在一次

选举中，斯姆尔科夫斯基曾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克勒重新当选。

大家知道他的地位是靠了什么才得来的。

这期间，东方各国的局势稍有了变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破天荒第一次在一个公开演说中提到托洛茨基的名字，没有附加任何辱骂的言词。人们已经开始为他恢复名誉，当然是悄悄进行的，但已在《真理报》上为他正名。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有一天，人们将会看到全面地为这位共产党领袖平反，他也许是知识界最重要的领袖；也许今天在苏联有人会问，托洛茨基究竟是怎样被杀害的呢？

21. 红十字会护凶犯

当苏联政府决定搞清楚一桩岁月久远的罪行时，行政部门的能力是完全令人叹服的：它的安全部门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挖出早已不在共产党国家而深藏于西方的纳粹罪犯。

举一例如下：

事情发生在1971年。一天，我们办事处来了一位年轻人，要求立即见我：他是路过维也纳，而且必须很快就离去。我一改以往的做法，同意接见，因为这个青年看上去文静而严肃。他坐到了我的对面，手里拿着一叠纸，纸张有些地方已经发黄。他有点语无伦次地开始叙述，要说的是他的姨妈，已故的姨妈。她叫汉娜·魏斯，在家里大家历来都认为她是个主动热情、毅力超人的女性。据说1961年，她成功地接近了赫鲁晓夫本人，当时赫鲁晓夫正在维也纳会见肯尼迪。汉娜·魏斯出色地做出了在别人看来绝对办不到的事：她不顾数百名警察和人数更多的便衣在场，向赫鲁晓夫递交了一封信。当时谁也不知道这封信的内容。后来他姨妈去世，他的哥哥负责处理继承问题，发现一只绕满了线头的盒子，看来里面藏着她的私物。他哥哥无暇清理这些材料，便把盒子委托朋友们暂管，这么多年来，朋友们都没有想到要打开盒子看看。我的来访者偶然来到维也纳，那些朋友将盒

子交给了他。出于好奇，更多的是出于情感，他将盒子打开，发现里边尽是一些旧照片、明信片、菜谱、身份证……还有两封俄文信。他给我带来了这两封信及其译文。

第一封信，说得确切些是某封信的复写件，显得相当不一般，倒不是内容重要，而是收信人不同寻常：魏斯夫人直接写给尼基塔·赫鲁晓夫，要求为她申冤。她的丈夫于1942年10月12日被乌克兰警察抓走，同时被捕的有数百名犹太人。她丈夫被押解到波兰的斯坦尼斯拉夫，关在鲁道夫监狱。他被一个叫伊凡·季米特维奇·卡巴蒂纳警官指挥的警察杀害，犹太人同时被杀戮。热爱正义的赫鲁晓夫也许可以帮助她找到季米特维奇·卡巴蒂纳，将他正法。

第二封信显然是封官方函件，它更令人吃惊。苏联内务部告诉迁居维也纳的汉娜·魏斯夫人，内务部在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请求下进行了调查，被追寻的伊凡·季米特维奇·卡巴蒂纳已不在苏联，现住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汉密尔顿大街623号。

这些信件往来是10年前的事。

我默默地听着，对苏联内务部的效率表示钦佩——其效率仅仅表现在追寻逃匿于西方的纳粹罪犯这方面。

.....

苏联人为何会答复魏斯夫人，其中之缘由我就管不着了。我的责任是尽自己的努力，使卡巴蒂纳切切实实地落入法律之手——这是我对汉娜·魏斯及其遇害的丈夫应尽的义务。

当天我就给以色列警察局纳粹罪行处写了一封信，询问是否有关于斯坦尼斯拉夫事件的其他证明材料。同一天我还

给加拿大驻维也纳大使诺曼·伯利斯先生送去一封信，向他说明有人指控卡巴蒂纳的罪行，并把其在加拿大的地址附给了他。

不久我收到两封复信。以色列警方的奥托·利夫中尉给我寄来利博斯曼-米库尔斯基大夫的材料，此人住在以色列的赫德拉，掌握着有关斯坦尼斯拉夫事件的情况；加拿大驻维也纳大使馆在来信中告诉我，它已将我送去的材料转给了加拿大有关部门。那时我已得到消息说，卡巴蒂纳已不住安大略省。我在加拿大的一位合作者经初步寻查后将他的新地址报告了我：卡巴蒂纳已迁居温哥华，在一家工厂工作。这个情报太宝贵了，因为与奥地利不同，加拿大没有规定人们必须进行住所登记，谁要是躲藏起来，那就很难找得到他。

1971年3月8日，在向散居世界各地的斯坦尼斯拉夫事件的幸免者发信要求帮助之后，我们又将材料散发了新闻界。加拿大的《温哥华太阳报》在头版发表长篇文章，报道发现来自乌克兰的杀人犯的经过。这家报纸的记者甚至试图同卡巴蒂纳谈话，但卡巴蒂纳拒绝记者采访，一再声明自己是无辜的。

在此期间，以色列警方在我的要求下调查了4名证人，并把这4个证人的揭发材料转给了加拿大使馆。最后，住在加拿大的一些证人率先起来要求法院听取他们的证词。

单从犯罪学这个角度看，此案似乎已经被受理。

困难在司法程序方面，这是司空见惯的。卡巴蒂纳好些年来已是加拿大公民，加拿大既未同联邦德国，又未跟苏联签订过引渡条约。从这个意义上看，加拿大这个国家对纳粹

分子和其他罪犯来说，比南美一些国家更可靠更安全，因为在南美，为了免遭引渡，犯罪分子往往要贿赂政府官员。加拿大的法律跟美国的差不多：必须由政府亲自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所指控的罪状。委员会最后将报告送交政府审查，最后由政府作出裁决。在此情况下，一大批纳粹罪犯躲到了加拿大，并获得了那里的国籍，以致于加拿大政府不得不于1986年设立德斯切纳斯委员会，其使命就是研究这些人的问题。

可惜的是，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将一份包括218个乌克兰党卫队员的名单交给了政府，但迄今任何一位党卫队员都没有被取消加拿大国籍。1986年12月，在德斯切纳斯委员会最后修改其报告的时候，我们又给它送去了一些材料，证明在1948到1951年间，乌克兰的“加利西亚”党卫队师的8,000名队员移居到了加拿大，尽管在1952年以前，那里的法律原则上禁止党卫队员定居也罢。人们从政治角度回避了这种禁止，认为乌克兰人在党卫队内的处境特殊，因而可以“另当别论”。大家知道，党卫队“加利西亚”师建立于1943年9月，立即吸引了上万名志愿者。人们之所以“自愿”加入，那是因为乌克兰人可以去德国的服务部门效劳，也可以进入党卫队服务。尽管在乌克兰无人不晓这支部队的种种劣迹，但大部分乌克兰人宁愿参加进去，而不想进德国农场或工厂干活。起初，乌克兰的党卫队师没有在后方干那些罪恶勾当的使命，因为前线急需兵员：1944年，该师奉命投入了同苏联人的战争，在布罗迪地区伤亡惨重。

在苏联强大攻势的逼迫下，德国人不得不撤离加利西亚，乌克兰警察也终止了它在加利西亚“维持秩序”的使

命。双手沾满加利西亚犹太人鲜血的主要就是这支警察部队，他们中充斥着最凶恶的杀人犯。

问题在于这支部队被解散之后，几乎统统被编进了新的军事警察团里，到了1944年秋，干脆并入了“加利西亚”党卫队师。

就这样，原先主要由战士组成的师突然间混入了相当数量的杀人犯。

战争末期，这个师在意大利的里米尼地区打仗。英国人在那里将该师人员全部活捉，然后跟苏联人签署协议，规定凡生在苏联国土上的、身穿德国军装为纳粹效劳的士兵统统交还苏联。这条约主要针对哥萨克人。乌克兰人的运气更好，当时英国尚未承认苏联在加利西亚的权利；已经移居加拿大的乌克兰人成立了“乌克兰委员会”，得知大约有8,000名战俘关在英国一些集中营里，于是出面为同胞们的命运进行交涉。适逢幅员浩瀚的加拿大急需人手，弹丸之地的英国求之不得地摆脱这8,000名俘虏的重担——于是，艾德礼政府允许乌克兰人去加拿大。加拿大人不顾法律的禁止，接受了这些俘虏。

德斯切纳斯委员会一开始就处境微妙：它知道加入加拿大国籍的乌克兰人中有许多纳粹战犯，因此声明说，加拿大政府当初对党卫队师的成员的仁慈是个可怕的错误。

国家利益的考虑最后压倒了一切：德斯切纳斯委员会干脆宣布，“加利西亚”党卫队师的全体成员一律摆脱犯罪感。

这批类似卡巴蒂纳的纳粹罪犯理应坐到法庭上受审，但他们逍遥法外，移居到了加拿大。德斯切纳斯委员会总共调

查了700個案子，其中20名罪犯极其凶残，卡巴蒂纳就是其中之一。可是，他没有受到法律制裁，在1980年安然死去。杀死汉娜·魏斯太太丈夫的、起码杀死过600名犹太人的元凶将永远不再受到惩罚。

当然，我的注意力并非集中在卡巴蒂纳身上，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纳粹战犯要追寻。

在迄今仍活着的第三帝国的纳粹罪犯中，阿洛伊斯·布龙纳无疑是最凶恶最残忍的一个。起码我认为他是个十恶不赦的魔鬼。

如果说灭绝犹太人的计划是阿道夫·艾希曼一手策划制定的话，那么将它付诸实施的人便是阿洛伊斯·布龙纳。艾希曼下令逮捕、集中和关押犹太人，布龙纳便亲自率领纳粹分子四出抓捕犹太人，将他们集合起来，关进集中营。发生在法国南方的事充分显示了他扮演的角色。将犹太人“扫地出门”的命令同样适合那个地区。不过，在意大利占领者的默许下，当地的法国人暗中破坏，阻挠命令的执行，因此，把犹太人关押起来的命令一直只停留在纸面上。

在阿洛伊斯·布龙纳到来之前，事情就这样进行着。

我们似乎可以说，艾希曼是大脑，布龙纳是左臂右膀。可是这种说法未免太低估了布龙纳的作用。说得确切些，布龙纳既是头脑，又是臂膀。他的主要“功绩”是发明了犹太人合作这条原则：他软硬兼施，说服一部分犹太人帮助他去逮捕、集合和押送他们的兄弟，这样他就出色地加快了关押犹太人的速度，其成效博得了阿道夫·艾希曼的赞赏。

很难说艾希曼和布龙纳中间谁最暴戾凶恶。他俩的结

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死亡二项式。

唯一的区别在于阿道夫·艾希曼最后落网就擒：人们在半个地球上跟踪追击，终于在南美抓住了他，将他处以绞刑。至于阿洛伊斯·布龙纳，他一直在中东某个国家的别墅里过着悠闲自得的生活。谁都知道他家的地址，也晓得他是怎样将钱送到家人手里的。他偶尔还接受某家重要刊物的采访，为自己未有足够的时间完成使命、将犹太人从地球上彻底消灭干净而遗憾万分。

60年代初我才发现了这个家伙。那是一个奇怪的巧合。当时我正忙于艾希曼案件，我的名字和事业成了举世瞩目的对象，无数希望助我一臂之力的人一下子拥到维也纳来看我。就这样我结识了“亚历克斯”。这位奥地利人40上下，于1958年来到我的办事处，将他的烦恼告诉了我：他的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雅利安人，纳粹分子把他视为半犹太人。父亲为了保护他，从奥德合并起就设法否认自己是他的父亲。他家的一位非犹太人朋友同意承认亚历克斯是他的儿子，并收养了他。为了更好地遮人耳目，不使亲生父亲遭受麻烦，亚历克斯于1940年参加了武装党卫队。他被派往前线跟俄国作战。在那里他得到消息说，盖世太保强迫他母亲同犹太人父亲离了婚。几周后他父亲被捕入狱，关在一座集中营。亚历克斯刚同俄国人交战就当俘虏，一直关到1955年才回到奥地利。他不知所措，更不明白自己的身份究竟是什么：是党卫队员？是犹太人？是刽子手？还是受害者？经过千虑百思，他最后暗自决定利用这个出奇的地位，跟从前的伙伴保持联系，为被杀害的犹太人做点事情。亚历克斯成功地打进了一个以帮助老纳粹要人为己任的组织。可以想见，该组织

的所有成员都是在逃的纳粹罪犯，他们改姓换名，怀里揣着假护照。尽管他们劣迹累累，在此我暂不公布他们的真名。象亚历克斯那样，我在叙述中一律用他们的绰号：他称他们为“胖子”、“矮子”、“干瘪佬”……。该组织的成员并不完全相信亚历克斯，不肯将计划和盘托给他。可是他多次从零星的消息中揣摩出他们策划的阴谋。

1961年3月，亚历克斯突然气喘吁吁地闯进我在林茨的寓所，激动地对我说：“我听到了一点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又是绝对难以相信的。我认为这仅仅是一座大冰山浮在水面的那一小部分。这是一件劫持案，关系到艾希曼。”

“可是他被关在世界上最可靠的监狱里呢！”我显得将信将疑。“他被严密地监视着。他身边时刻都有人，任何一个动作都由人注意。”

“很可能是这样的。”亚历克斯的样子似乎告诉我，他明白艾希曼案的来龙去脉。“不过你想，他们想劫走的恰恰不是艾希曼。当然，要把他抢走是不容易的。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们想劫走另一个人，然后用此人交换艾希曼。”

这个情况如此重要，坦率地说我还不知道如何利用它。一方面，我尚不明白这段叙述中添枝加叶的成份有多重，要知道亚历克斯接触的人们中，故弄玄虚、吹牛说谎是家常便饭。另一方面，即使他的叙述千真万确，又如何提醒所有可能的劫持对象呢？这是不可能的事。

“严密注意他们。”我提醒亚历克斯说：“不过，千万不要让人看出你在关注他们的事。否则你会暴露自己，那就

大祸临头了。”

不久我就飞抵耶路撒冷处理艾希曼案去了。我回到奥地利后，就寻找亚历克斯。当时我在维也纳第十区看中了一套公寓，我们约定在那套公寓附近的南站餐厅见面。亚历克斯刚在我的桌子旁落座，第六感觉就警告我，有人在监视我们。我立即对他小声低语：“有人在注视我们。”亚历克斯立即作出反应，大声道歉说不该占据我的桌子，并站起身来就走。傍晚，他打电话给我确认我的怀疑是对的：“一个朋友看见我同你在一起。他跟我出了餐厅，要我作出解释。他想知道我要告诉维森塔尔什么情况。我对他说，我压根儿没有想到遇见的人是维森塔尔。我只是随便走近一张桌子坐下。坐在那里的家伙立即火冒三丈，命令我赶快滚开：‘这个位置已经有人，先生，我正等待一位朋友的到来。’我连声赔不是，站起来离开了那里。”

万幸的是亚历克斯的朋友们相信了他，显然一如既往地信任他。否则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那年10月，亚历克斯到维也纳来见我，高兴地告诉我：“我对行动的大概情况掌握着可靠的情报来源，可是一切都已完结。”

“亚历克斯，难道所有这些神秘主义都是必不可少的吗？我不想猜谜语。”

“这可不是猜谜语。当然你也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请仔细听下去：主角是阿洛伊斯·布龙纳，他是阿道夫·艾希曼从前的合作者，他自己也大言不惭地说过，他是艾希曼命令的最优秀的实施者。这位布龙纳现今住在大马士革，跟一些公司有生意，其中有一家叫塔默科公司，从事进口业务，从德国购进医疗器械。很明显，他赚着大钱。布龙纳

决定向艾希曼伸出援助之手，也就是说想法叫人释放他。下边就是他的计划：他要绑架一位犹太要人，然后去交换艾希曼。总而言之，‘胖子’，你知道是谁，我向你谈论过他，

‘胖子’谈起一位阿拉伯人，是黎巴嫩阿莱市的雷伊斯，此人到维也纳去给布龙纳家人传消息送钱。有时他俩一起去。显然，雷伊斯负责一切组织工作。他们决定劫持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主席兼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纳乌姆·戈尔德曼。他们知道他常到波恩去同阿登纳总理磋商，一般来说每次都在那里逗留一段时间。他们要利用机会绑架他。”

“谁执行呢？”我问道。

“谁执行了呢。”他纠正我的话说，“因为此事已经告吹。再说，也许正因为没有成功，他们才向我披露此项计划。这件事的影响波及开来了。布龙纳在汉堡有一个朋友，至今我未能发现他的姓名，因为我不好打听，直截了当地问是不行的。布龙纳同那家伙取得了联系，请他组织一支精良的突击队，如果可能的话，找几名原先的‘勃兰登堡师’的军人。果然有一名‘勃兰登堡师’军人同意了，条件是为此次行动付他3万马克。人们一口答应了他提出的全部要求，可是他大概仍抱有戒心，因而要求对方作出保证。隐名的合伙者把事情搁置了起来。那家伙向自己的一位老伙伴披露了此事，那位伙伴很可能是他在‘勃兰登堡师’的老上司，他想听听后者的意见。这位上司觉得事关重大，危险系数极大，因此经过反复斟酌，最后建议他拒绝合作。”

“这么说，由于这个原因，事情方才告吹罗？”我紧接着问道。

“不。”亚历克斯补充解释道：“这不是唯一的原因。”

我想他们大概另外物色了一个人。但我说不准。总之，我是这样想的：那位建议拒绝那笔交易的‘勃兰登堡师’的军官曾经在或现在正在反间谍部门工作。这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值得怀疑的是，他会不会把此事告诉反间谍机构。另外，有两名同此案毫无干系的阿拉伯人受到了德国警方的盘问；我们那位阿拉伯人雷伊斯决定取消整个行动：他说有人出卖了他们，继续执行方案，那将十分危险。”

据亚历克斯说，他们已经布置好了一处隐秘地点，准备用来藏匿戈尔德曼，以避人耳目。布龙纳清楚，在那种时刻没有哪一个阿拉伯国家会同意监禁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主席，然后用他去交换阿道夫·艾希曼。于是他拿定主意，利用雷伊斯跟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的关系。雷伊斯是黎巴嫩派驻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日内瓦办事处的代表。解放阵线当时尚未完全控制阿尔及利亚国家机器，但已经掌握了阿尔及利亚的部分国土：劫持者企图事成后逃到那部分土地上去，将戈尔德曼关在那里，然后提出交换条件。

这个计划之所以夭折，无疑是因为雷伊斯正确地认识到，即使是用纳乌姆·戈尔德曼交换，以色列人也不会同意交出艾希曼。最后，艾希曼的审讯进行得十分顺利，他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使得交换计划在1967年5月31日成为泡影：谁也不会去交换一具尸体。

亚历克斯1961年向我叙述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到此结束了，人们可以在社会党的《工人报》上读到这个事件的大部分内容，显然这家报纸的消息也是很灵通的。

1985年，阿洛伊斯·布龙纳向一名德国记者谈起了这件事的主要情节，大体上同亚历克斯的叙述相吻合的，只有一

点不同：他说此事的主角是一位名叫利汉的叙利亚上尉。

对我来说，整个事件仅仅是一次机会，它很快就使我接触到阿洛伊斯·布龙纳案件：在60年代，我们差一点逮住了他，地点就在欧洲。

世界舆论的注意力移向布龙纳，这是艾希曼受审的必然结果：只是到了那个时候，世人才真正明白布龙纳为何许人。

阿洛伊斯·布龙纳，1912年生，与其说他象阿道夫·艾希曼，倒不如说他是连环画中的一名党卫队员。总之，纳粹们肯定不会送他去“生命之源泉”妓院去改造人种，孕育蓝眼睛、金头发的魁梧的后代。他中等身材，一头黑发，鹰勾鼻子，如果在他的家谱系中找出一两个犹太人或茨岗人的话，那是不足为怪的。他的同伙迪特尔·维斯利斯尼告诉我们，那些讨厌布龙纳的党卫队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聚斯犹太人”。

布龙纳常常吹嘘自己进过格拉斯警察学校。但他只是在那里呆过3个月，这一点他总是避而不谈的。他在警察学校的具体时间是1932年10月至1933年1月。他入党的时间是1931年，当时才19岁，地点是奥地利斯蒂里亚的富尔斯滕费尔德。1933年9月，他已是一个十分秘密的精英圈中的一员：他同卡尔滕布鲁纳、艾希曼、雷德尔和海德尔（耶尔格·海德尔的父亲、奥地利自由党政治家）一起到了慕尼黑，参加完全由奥地利人组成的准军事组织“奥地利军团”，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必要时武装夺取奥地利。

但是，众所周知，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当纳粹们于1938

年3月11日跨过德国边境进入奥地利时，他们长驱直入，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阻碍他们前进的唯一障碍是兴高采烈的百姓，他们纷纷走出夹道欢迎的人群，向德国士兵身上撒花瓣。纳粹们没有必要强迫奥地利人，奥地利人都自告奋勇地投入迫害犹太人的行动：他们中许多人自愿出力，于4月初捣毁犹太人商店的橱窗和寓所的门窗。阿道夫·艾希曼一上来就可以集中精力投身到后来成为他的主要使命的活动中去——流放和关押犹太人。他在前皇宫里设立了“犹太人移民中心”，其实应该称之为灭绝犹太人中心。

他最初的合作者中有一位慕尼黑时代的至交：阿洛伊斯·布龙纳。

他俩旗开得胜，成绩辉煌。在德国人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人们仿照他们的机构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布龙纳一个人就能胜任消灭维也纳犹太人的使命。

这期间荣升安全部门军官的布龙纳奉命出任维也纳犹太人移民中心主任。他以这个身份批准向欧洲和海外国家移民计划，同时负责组织移民车队，当时这些车队都朝一个方向前进——东方，具体的地方是波兰。

布龙纳大显身手，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能。

据初步估计，对一个拥有18万犹太人的城市来说，要慑服全市居民，进行人口普查，然后组织犹太人移民车队，没有一支庞大的保安部队是难以办到的。布龙纳别出心裁，将这些任务交给犹太人自己去办，这样可以节省大批劳动力。他采用硬的一手威吓犹太人，又用软的一手拉拢腐蚀犹太人，结果那些犹太人就变成党卫队手中的愚蠢且又顺从的工具。

在艾希曼的批准下，布龙纳设立了“犹警”（即犹太人警察）这个组织，其成员都是教会团体交他支配的人。他们不穿制服，但身上备有特别证件。布龙纳保证保护他们及其家属不受任何迫害，也不许任何人逮捕和关押他们。

教会组织本身负责调查犹太人。后来，在布龙纳的命令下，教会组织号召全体犹太人自动移居到东方去。有些犹太人为免遭居民中一部分人的日夜骚扰，干脆报名要求“移居”。阿洛伊斯见此情形，便让他的“调查员”宣布，最先报名的人可得到优待，在波兰分配最好的位置。他编造谎言，说什么存在一个“卢布林犹太人保护区”，就这样“志愿者”的车队接连不断地开向东方。

犹太人的最终去处几乎都是一个，即后来的毒气室。

布龙纳执意使自己的理想得到报偿：他住在陈设豪华的希青格别墅里，无论是家具、地毯，还是油画，都是从犹太人家里“偷”来的。觊觎犹太人财物的维也纳其他纳粹头面人物，只要叩门拜访布龙纳便可如愿以偿。他手下的人知道到哪里去找值钱的东西：居住在条件舒适的寓所的犹太人不会主动移居东方的，他们的名字很快就出现在“运输名单”上。布龙纳命令这些人家的门房，不许任何珍贵物品离开他们看守的大楼，他手下的人会来一一接收的。他们窃取其中一部分据为己有，将其余的慷慨地馈赠给纳粹要员。后者之中确有人拒收礼品，愿意出钱“购买”。比如“东进”总指挥巴尔杜尔·冯·席拉赫花500马克买了一幅克拉纳赫^①的油画。“出售者”假惺惺地声称，这个价高得出奇，因为席

^①克拉纳赫（1472~1553），16世纪德国绘画和版画繁盛期重要艺术家之一，留下400多件作品，每一件都价值连城。——译者

拉赫同时还要买进两件荷兰釉陶画。

1941年11月末，布龙纳关闭移民中心，因为那时的工作只是管理开往波兰、里加或明斯克的犹太人车队。他亲自陪同一个（去里加的）车队，途中亲手开枪打死犹太银行家西格蒙德·博塞勒。当然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其余犹太人被直接押往里加附近的隆布拉森林，那里的堆尸坑正在等待他们。

直到1943年2月，布龙纳总共押送了维也纳市的4.7万犹太人。

他的生涯可谓光辉灿烂矣。

他1939年加入党卫队，1940年元首希特勒诞辰纪念日之际^①被擢升为党卫队班长，同年11月9日，他又晋升为党卫队区队长。1942年1月30日在庆祝夺取政权周年的时候，他的军阶升为党卫队纵队长。

帝国中央安全局对他倍加敬重。1942年10月，艾希曼对“中央局”的工作不甚满意，便把阿洛伊斯·布龙纳召到德国首都，叫他向当地的盖世太保传授他的手段。随他一起去的是他的一批犹太助手。

每当艾希曼希望加快押送犹太人的进程时，他总是把阿洛伊斯·布龙纳叫到身边去。比如1943年2月，他把布龙纳派到塞萨洛尼基。犹太人从公元前140年起就在那里定居，亚历山大时期，犹太人将那里视为新的祖国。阿洛伊斯·布龙纳在那里遇到的犹太人，大部分来得较晚，他们主要是15世纪被赶出西班牙的地中海畔的犹太人，在土耳其苏丹统治

^①希特勒生于1889年4月20日。——译者

下的塞萨洛尼基找到了避身处。在这个文化素养极高的居住地，犹太人占据了从脚夫到大学教授的一切岗位。

仅仅几个星期的工夫，布龙纳就把5万名犹太人和8,000名马其顿人装上车，押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或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去。

他在维也纳得到的经验显得十分灵验。他一上任就劫持25名犹太著名人士为人质，扬言如果不执行他的命令，他就处死这25位名人。接下来他强迫犹太人组织自己的居住区。该区设在犹太预言家莫里斯50年前为从沙俄帝国中逃出来的犹太人建立的居民区内。

幸存者们回忆说，布龙纳象个疯子一样奔跑在大街小巷之间，双手挥舞着两支手枪，来维持秩序。

他押走了犹太人居住区的全体居民，只有几千人成功地逃出了塞萨洛尼基，躲到雅典去避难。

除了库特·瓦尔德海姆外，在希腊的所有德国占领军都知道这件事。

艾希曼在塞萨洛尼基只逗留了一天：他用不着给布龙纳这样的人出主意打气，他只是要求后者尽力而为。

当然，在这个地方，窃宝依然是他的活动之一。布龙纳没收了犹太族珠宝雕刻工家里的大理石板，这些石板本来是些墓碑，可是到了他的手以后，便用来装饰党卫队头子们的浴室。1943年，在向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发送了19个车队之后，他在塞萨洛尼基不无道理地认为，犹太公墓已是多余的东西：我们搞到的一张照片照的是德国军官们的游泳池，池内铺的石块就是犹太公墓里的墓碑。

3个月后，艾希曼赠给好朋友布龙纳一片新的猎场——

他把他派到了巴黎。

在布龙纳抵达巴黎之前，法国已经有5万名犹太人 被押往东方，主要是被押往奥斯威辛集中营。押送犹太人车队的主要转运点是巴黎附近的德朗西。可是布龙纳认为德朗西集中营看守不严，于是辞走了法国看守，建立了他自己的守卫队，队员均为犹太人。同时他还设立了一个犹太委员会一类的机构，叫做法国以色列人总联盟。

接着他又做起维也纳游戏来：在法国以色列人总联盟和他的犹警及一小撮党卫队员的协助下，他花了14个月将这个国家的犹太人统统“清扫”出来。

布龙纳善于运用欺诈和恐怖两种手段。为刹住刚刚流传开来的有关车队去处的谣言，他叫人散发了许多明信片，假装是出发到了其他国家的犹太人寄来的，说他们安全抵达某地，且已找到了工作。不过仍有人说，他办公室墙上溅有血迹，而且弹孔累累。

一天，他对犹太人安全队的工作十分不满，把全体成员送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

布龙纳只两次离开德朗西。第一次是同艾希曼一起到奥斯威辛集中营，陪同阿明·侯赛因^①参观集中营。

他第二次离开巴黎纯粹是出于业务考虑：墨索里尼垮台之后，德国人接管的意大利占领区押送犹太人的工作迟缓了下来，布龙纳亲临尼斯附近，去催办押送事项。这工作比坐镇巴黎更艰巨，因此他随身带去了7名党卫队负责人，这些人在维也纳已经大显过身手。

^①阿明·侯赛因是犹太人的不共戴天之仇人。

1943年9月15日，布龙纳带着他那帮人到了尼斯，下榻在爱克斯塞尔齐奥旅馆。

迄至那时为止，在意大利人占领的法国领土上的犹太人，其生活还勉强过得去：当地居民同情他们，意大利占领者并不急于服从希特勒的命令将他们押送了事。意大利人在撤退前甚至把犹太人完整的名单毁掉，名单上的人都是以犹太人身份领取粮食卡的居民。

只有阿洛伊斯·布龙纳这样的人才能对法国南部作一番“清扫”。他的主要助手是名党卫队纵队长，名叫罗尔夫·比尔哈茨，化名为高蒂厄。他搞了一个法国密探队，谁抓住一个犹太人，就奖给谁100法郎。

这笔钱来自于出售从犹太人那里盗窃来的财物之所得。

押送开始了：每3天尼斯—巴黎快车上挂一节装运牲口的车厢，里边塞满了犹太人。仅仅3个星期，科特达祖尔一地就将1,700名犹太人送到了巴黎。这些人从巴黎上路，直接被押往奥斯威辛集中营。

到布龙纳离开法国的时候，他总共押走了2.3万名犹太人。

上司又派他去斯洛伐克施展他的才华。斯洛伐克不是被占领国，而是一个卫星国，它的法律完全从属于德国的法律。因此，斯洛伐克的犹太人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布龙纳抵达斯洛伐克的时候，那里的犹太人起码有三分之二已经被押往集中营，但是机器似乎发生了故障：还有2.5万名犹太人分散在各个劳改营，有待押往集中营。在斯洛伐克人的容忍下，犹太教徒维斯曼德勒和吉西·弗莱希曼领导的一个拯救委员会采取请客送礼、收买贿赂和其他手

段，设法使劳改营里的犹太人能过上尚可忍受的生活。

押送工作不能以正常的速度进行，因此，德国驻斯洛伐克大使卢丁要求派一名专家来。这位专家就是布龙纳。

这个时候，地平线上已经出现了纳粹分子行将覆灭的幽光。红十字会强烈要求查访各个集中营。希姆莱对最后的胜利也失去了信心，开始考虑还能作何种挣扎。他派遣库特·贝歇尔急赴匈牙利，策划一个交换计划：用幸存的犹太人换取外汇和卡车。贝歇尔同匈牙利的以律师雷斯佐·卡斯特纳为首的犹太人谈判。他想通过瑞士的犹太人代表团跟美国犹太人联盟取得联系。希姆莱开列单子，他准备交换的犹太人约为100万，他需要卡车、原材料和钱。

尽管如此，布龙纳仍在加紧押送犹太人的勾当，仿佛贝歇尔的不合时宜的谈判结果会使他失去生活意义似的。

可是，布龙纳的担心是多余的。库特·贝歇尔见到了瑞士犹太人组织主席萨里·梅耶。可惜的是，在瑞士边境的这次会晤没有取得具体的成果。

在这期间，上述拯救委员会派遣其成员耶埃勒·勃兰德去土耳其然后去巴勒斯坦，告诉那里的犹太人有可能拯救他们的教友。可是耶埃勒·勃兰德被英国人抓住，无法履行其使命。

艾希曼这时出来声明，准备“冻结”某几批押送工作，以保持手中的交换资本，等待谈判结果。

布龙纳在这一地区的上司迪特尔·维斯利斯尼知道这种交易，采取“观望态度”，以便进一步行动。但布龙纳被他对犹太人的仇恨冲昏了头脑，根本没有把维斯利斯尼的态度放在眼里。他拒绝听取希姆莱的计划，擅自继续不断地押

运犹太人。

吉西·弗莱希曼约见布龙纳进行磋商。但布龙纳此刻只有一个念头：采用对待维也纳、塞萨洛尼基和巴黎的犹太人代表的办法，软硬兼施，使对方就范。可是这一次他的办法失灵了，他就叫人把吉西抓了起来，关进塞勒德集中营。吉西·弗莱希曼坚强不屈，毫不退让。布龙纳施尽奸计，也未能叫这个女人交待她是如何同国外犹太人组织保持联系的。

尽管党卫队大队长贝歇尔和迪特尔·维斯利斯尼出面干预，狂人布龙纳还是把吉西·弗莱希曼押往奥斯威辛集中营。他交她一封信，让她到达奥斯威辛后交给一名党卫队军官。此信只这样几个字：“不希望遣返。”

吉西·弗莱希曼于1944年10月8日到达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一天被认为就是她被处死的日子。

布龙纳在斯洛伐克的逗留虽很短暂，但他押走的犹太人竟达1.4万。

接下来他到了匈牙利，参与送走押解约1.2万名犹太人的车队，然后去视察特雷西恩城集中营。1945年3月，他回维也纳看望妻子。他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一些幸存者肯定会追寻他。他签署的文件也一定会构成控告他的罪证。于是他又回到捷克斯洛伐克，脱下党卫队制服，在第三帝国土崩瓦解之时，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德国平民。布龙纳随着被逐出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流到了联邦德国，顶着阿洛伊斯·施马尔丁斯特之名在美军当上了一名重型汽车司机。施马尔丁斯特是他的一个远亲，他知道这位亲戚没有人追究。施马尔丁斯特-布龙纳从慕尼黑出发，上了去北方的路。有人认为他到了居特斯洛，也有人说他去了汉堡地区。

布龙纳是个谨慎的人。他知道总有人会弄清楚的，虽然他冒着施马尔丁斯特这个假名藏匿了起来，还是有人会想方设法地伤害他。于是他感到自己必须离开德国。可是他手上唯一的证件是1945年或1946年被驱逐出捷克斯洛伐克的证明，和在美国人那里干过活的证明。他需要一份护照。据说一个名叫格奥尔格·菲舍尔的人给他搞了一份护照。此人后来向一名新闻记者说，布龙纳同他相貌酷似，因而根本就没有变换护照上的照片。菲舍尔将自己的护照给了布龙纳，几星期后他向警察局挂了失。

布龙纳又有了新的名字：格奥尔格·菲舍尔。他于1954年得到埃及的签证，上路去了开罗。布龙纳怀揣新护照，在埃及登记申请就业。50年代初，近东需要大批德国专家。几年后，布龙纳告诉一位记者，他在近东遇见了纳粹鼓动家约翰内斯·范·勒尔斯。

布龙纳后来的生活活象一部普通的间谍小说，其背景是近东战火纷飞的年代。他所到之处都遇上一些老相识，他们都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德国驻大马士革大使馆为布龙纳的假名格奥尔格·菲舍尔换了新的护照，至今我不知道这份护照是否还有用，或是布龙纳得到了叙利亚国籍。

艾希曼的审讯在这种宁静的生活中激起了一点波澜。对艾希曼的指控必然持久地波及到布龙纳。无数证人在法庭中提到了他，艾希曼本人也将部分责任推到他的身上。

那时我们的材料里已经有一系列信件揭发布龙纳的罪行。最令人震惊的一份材料来自我的朋友、维也纳《新路》报出版经理阿尔贝特·韦尔特。在世界大战期间，韦尔特是罗马

尼亚公民，他听说母亲上了布龙纳的“押送名单”。可是1940年，罗马尼亚公民理论上是不能押进集中营去的。于是，韦尔特去总领事馆交涉，馆内有人给他一封有利于他母亲的介绍信，他将此信交给了布龙纳。后者浏览了一遍信的内容，将信撕个粉碎，嚷嚷道：“你母亲已经上了火车，但车还没有开。快回去找领事馆的那位罗马尼亚人，让他发个通行证，你可以跟母亲一起旅行。”

我花了6年时间，才为这个日益加厚的案卷添了一份最新的材料。这份材料本可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1967年9月，亚历克斯在国外久居之后回维也纳找我。

“喔，西蒙，有布龙纳的消息吗？”他一进我的办公室就开门见山地问我。

“什么也没有，真可惜。”我回答道。

他那神秘莫测的微笑足以向我表明，他掌握着某些情况。

“你为何如此看我？”我问他。“你给我带来了布龙纳不成？他在哪里？在门厅？”

“不。可是他就要来啦。”

他的开场白叫我忐忑不安，不过坦率地说，这件事是我未曾始料的。

“哪里？在维也纳？”我尽量装作自然的样子。

“不，不在维也纳，我想不会在这里，但不会离此太远。他身体不好。你知道他拆一封炸弹信时炸瞎了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也发生了麻烦，似乎经常犯病。认识他家的人告诉我，他同瑞士的一位专家取得了联系。很可能他会到

瑞士来看病，甚至会动个手术。”

我再也装不成若无其事的样子了。这是我们抓住布龙纳的唯一机会。但是，千万不能出差错。

亚历克斯认为，可以很快弄到布龙纳到瑞士来的日期。最简单的办法似乎就是在边境上抓住他，因为有三个国家发出了通缉令，争相逮捕他。

可是我仍疑虑重重。因为在处理约瑟夫·门格勒案件时，我领教过瑞士当局的刁难的滋味，我把材料呈交给他们以后，他们满足于将门格勒夫人驱逐出境了事。

因此我得出结论，最好晚一些将布龙纳到来的消息通知瑞士当局，越晚越好。我同路德维希堡纳粹党罪行中央调查局负责人、总检察长阿达尔贝特·吕克尔博士联系，我想跟他讨论此事。这是我认识多年的令人敬佩的朋友，我知道可以开诚布公地同他商量问题。我们如是商定：为避免让人指责我们不人道（在逮捕杀人犯的时候竟要考虑这些问题，真是咄咄怪事），只能在布龙纳接受治疗或手术之后才能考虑下手。在此之前，德国当局应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等他出院返回时将他逮捕。

可是吕克尔博士告诉我另一个问题：我们很难审判布龙纳在法国犯下的全部罪行。这个奇怪现象需要在此作一番解释：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后，解放了的国土，主要是法国领土，开始了对德国人的审判，他们在法国土地上犯下了滔天罪行。司法程序和判决都交给法国军事法庭去办理，因此，大量材料都转到了法国军事法庭。

可是在许多案件中，被告往往是不出庭的，因为最重要的罪犯早就隐藏到德国和奥地利去了，在那里过着隐姓埋名

的生活，或者改姓换名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联邦德国成立共和国后，它同三个西方盟国签署了“交换协议”。这个协议规定，被盟国法庭——不管是纽伦堡国际法庭，还是包括法国法庭在内的盟国军事法庭——审判过的罪犯，不再交德国法庭审判。

这个规定带来了极不合理的结果：在战后被盟国法庭判了重罪的罪犯中，许多人后来被缓刑或提前释放了。因此，他们服刑的时间往往比后来由德国法庭判定的罪犯在狱中的时间短得多，后者的罪刑轻，反而要在狱中服完刑。这种不公正现象在法国犯过罪的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前所述，只有少数几名罪大恶极者在法国出庭受审，大量犯人是缺席审判，其中有一大批党卫队头目，他们跟盖世太保、安全局警探或犹太人情报人员在法国横行霸道。我只想举四个罪行累累、在法国被缺席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人做例子，这些人今天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德国，在狱中一天也没有呆过。

第一位是党卫队区队长库特·利舍卡，55岁，1941至1943年间任治安警察局局长克诺亨的常任代表，一度出任巴黎治安警察司令部治安局长。

第二位是党卫队区队长海因茨·罗特克，55岁，1942至1944年任治安警察司令部犹太事务处处长。

第三位是党卫队分队长赫伯特·哈根，44岁，曾任治安警察司令部处长、党卫队司令长官兼驻法国警察局局长、党卫队联队长奥伯格的私人顾问。

第四位是党卫队区分队长恩斯特·海因里希佐恩，64岁，曾是治安警察司令部犹太事务处合作者。

巴黎军事法庭于1950年9月18日缺席判处利舍卡永久劳动改造，罪名是参与了大量的罪恶活动。罗特克于1949年3月22日被巴黎军事法庭释放，但后来的揭发以及所发现的新的旁证材料大大加重了他的罪名。巴黎军事法庭于1950年9月18日缺席判处哈根终身强迫劳动。至于海因里希佐恩，因为亲自杀死过许多人，他于1956年3月7日被巴黎军事法庭缺席判处死刑。

这四名犯人有一个共同的罪名，即参与了押送犹太人的罪恶活动。加起来总共达7万名法国公民，侥幸活下来的寥寥无几。

尽管如此，利舍卡、罗特克、哈根和海因里希佐恩依然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因为法国司法部门没有要求引渡他们，原因是他们已经受过审判，根据“交换协议”，德国司法部门不能再次传唤他们出庭受审。

公共事务部提出要求，修改这个条约。但是这项要求遭到了联邦德国最高法院的拒绝。

后来，德国司法当局几经交涉，终于同法国就这四名案犯达成一个协议。可惜的是，这项协议直到1974年才被批准生效。

在我同吕克尔博士谈话的时候，问题还原封不动地悬着。在法国被缺席审判的布龙纳不能接受德国法庭的重复审判。不过，只要布龙纳落入我们之手，总有办法解决这一问题的。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只好坐等亚历克斯的消息，他始终坚信，布龙纳马上就要抵达瑞士。一天，亚历克斯终于送来

了消息，可惜不是我们期待的消息。他在电话中对我说：

“你看，林茨老战士协会的新闻公报《林茨钟声》发表了一个10人名单，建议这10个人不要到法国去。布龙纳就在名单上。公报的文章题为《奥地利红十字会的警告》。10个人名后边都有个人情况介绍和出生地，以免同名同姓之混淆。我还有别的事告诉你，这些事是报纸以外的：布龙纳的家属已经接到了警告。总而言之，这个建议不仅适用于法国，而且适用于整个欧洲。”

亚历克斯挂上了电话。我张口结舌，不知所措。翌日，我登门造访奥地利红十字会会长汉斯·泽夫齐克，当面问他：“奥地利红十字会从什么时候起开始保护纳粹时期犯过罪的、受到法律追究的人的？这难道在它的权限范围内吗？您也想保护骗子、贩卖白种女人的家伙和其他‘普通’犯罪分子吗？您的调查机构真的有通过报界和心腹向这些人通风报信的习惯吗？”

在这里我全文引述汉斯·泽夫齐克的回答：“我在荷兰参加红十字会代表大会的时候，德国红十字会负责人在休会时来拜访我。他将一个信封塞在我的上衣口袋里，说是务必解决这件事。那是一个30人名单，那上边的人不应该到法国去，怕是有麻烦。他没有作进一步解释，这个名单上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于是我们通知了凡能找到的名单上的人的家属。”

“名单包括30个人，但《林茨钟声》只公布了10个名字。这是为什么？”我又问道。

“这10个人就是我们没有通知到的人。因此我们要求那个老战士协会公布他们的名字。”

“这没有引起您的疑虑吗？”

“没有，我们的调查部门已习惯于此类做法。”

交给奥地利红十字会的名单除了有各人的生日和出生地外，还有他们在党卫队里或在保安部门的官阶和被判刑的日期；那上边还有一些“绝密”材料。

显然，这是一次大规模行动，它不仅涉及在法国审判过的人，而且还提醒所有劣迹不清的纳粹罪犯。

布龙纳一类的人面临着危险，需要向他们通风报信。

我立即同路德维希堡纳粹党罪行中央调查局的吕克尔博士联系，我坚信这次通风报信不会只局限在奥地利。不出所料，吕克尔回答我说，路德维希堡红十字会没有接到此类名单。他知道的唯一事情是外交部应司法部的要求已同好几个国家交涉，调查在德国人占领的国家里犯过罪的人。据说是要采取司法行动，阻止刑事时效法案的生效。法国就是几个国家中的一个。

至此情况尚不清楚，还需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如果说德国红十字会确实将这份名单交给了奥地利红十字会，那么还应该有一份相同的德国纳粹罪犯的名单，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奥地利没有亲自向法国要这种名单。吕克尔不久就给我打电话，向我通报他调查的结果：波恩外交部合法保护司向德国红十字会递交了这份名单，德国红十字会将名单的摘要转给了奥地利红十字会。

我决定同时铺开几个战场：我给当时德国总理库特·基辛格写信，请他作出解释；我致函波恩检察长，请他研究一下外交部合法保护司的行动可否认为是“保护”罪犯，甚至认为是泄露机密；我向汉堡检察长提出起诉，我认为德国红

十字会犯了“保护罪犯”的罪行。

在奥地利，我向司法部长克勒卡茨基递交了一封长信，并附去一份资料。克勒卡茨基博士请内务部组织一次对红十字会办公室的搜查，要求对方作出报告。

1968年3月27日，我向奥地利和国际新闻界发出紧急呼吁。

反应极为强烈：荷兰国会向政府提出质询，查问荷兰红十字会同德国红十字会保持联系是否合适。美国各大报纸刊登读者来信，威胁说如果美国红十字会不同德国红十字会断绝一切关系的话，就停止对它的捐赠。美国红十字会马上要求德国红十字会说明情况，并转告了读者来信的下述立场：

“法国当局已经承认，有关德国人不知道他们被判刑。法国当局随即将一份被判刑的人的名单交给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德国政府有义务向有关人通报他们被判的徒刑。这份名单上只有他们战前的住址。因此，德国政府按习惯同德国红十字会调查部门取得联系。被判刑的德国人名单包括733名罪犯。德国红十字会调查部门确证其中105人已经去世，311人失踪，能找到的只有294人。这个调查是应德国政府的要求进行的。”

德国总理对我的信的答复是相当荒谬的。他对我说，交给红十字会的名单不是法国政府的官方名单，而只是法国律师们开的单子。一方面，这里边其实没有多大区别，另一方面，这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当时不可能披露真象。科隆和汉堡两市的检察长，还有波恩的联邦检察长在一封简短的信中告诉我，“保护罪犯”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德国方

面对受到警告的人没有采取任何法律程序，而有关保护罪犯的各项法律条款恰恰只能适用于法律程序。

我登上去汉堡的飞机，要求检察长下令搜查红十字会总部，寻找有关文件，也许可以证明红十字会想保护纳粹罪犯这一事实。

检察长不在汉堡，接待我的是他的副手。他彬彬有礼地听我陈述，不时记录我的话，然后给我解释了司法方面的情况。当我谈及搜查红十字会总部的问题时，他简单地回答我：“为何不同时搜查一下大主教的寓所呢？”

这时我主动表示对合法保护司感兴趣。有时偶然性是成事的关键，我发现该司司长、一等公使顾问约翰内斯·加韦利克先生不是别人，恰恰就是1945年至1946年纽伦堡国际法庭上为党卫队员们辩护的那个赫赫有名的加韦利克先生。

在此情况下，我组织了一场向德国政府，特别是向外交部长维利·勃兰特递交抗议信的运动。外交部长的发言人于尔根·鲁富斯博士发表谈话说，联邦政府不仅有权而且有义务公布那些警告。本国的侨民，不管他们是怎样的人，当他们在外国遇到困难的时候，联邦政府应当将情况通知他们。

一位新闻记者不无道理地发问：为何外交部不同时将国际刑警追查之人的名单交给德国红十字会呢？怎能拒绝让走私犯和诈骗犯同样享受纳粹杀人犯享受的权利呢？

鲁富斯博士拒绝回答。当有人问他德国政府的保护权是否适用于诸如阿洛伊斯·布龙纳一类的奥地利杀人凶犯时，他同样保持缄默。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断言这件事就是“对红十字会宗旨本身的亵渎”。德国红十字会调查部主任库特·瓦格纳

博士回答我说，他“问心无愧”。

众所周知，红十字会的宗旨早已受过几次践踏：1933年后，德国红十字会被“查封”，不久就落入党卫队之手。从那以后，全体犹太人和所有被认为是政体的反对者统统被开除出该会救援部。德国红十字会会长、帝国医生恩斯特·罗伯特·格拉维茨博士被破格擢升为党卫队中队长，工作有方，成绩卓著，因而在战争结束前一星期，在波茨坦畏罪自杀了。

如果此人活下来的话，这位参与过在活人身上做试验的医生一定会坐到纽伦堡国际法庭的被告席上去。

畏罪自杀的不独是格拉维茨。帝国总主任大夫、德国红十字会领导局杰出的成员利奥纳德·康蒂博士也畏罪自缢了，怕被判刑，或者是因为他内心“静不下来”的缘故……

在后来的战争中，日内瓦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角色是“体面的”。它认为德国领土上和被德国人占领的国家里存在集中营问题，纯粹是帝国的内政，因此它从未为犹太人的利益向德国政府交涉过，后来也没有阻止用犹太人作试验（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供这种试验用的卡车上都漆着一个红十字）。等到1944年夏在布达佩斯的瓦伦贝里行动时，红十字会才在匈牙利作出某种姿态。国际红十字会只是到了1945年4月，才就集中营问题同德国政府交涉，而它起码在1943年夏天就已经知道了毒气室的存在。

这些先例似乎一点也没有触动红十字会的某些官员们，他们在战后帮助了大批纳粹罪犯逃亡到外国，在胡达勒大主教的密切配合下，为这些逃犯提供假护照。

从这一点看，向阿洛伊斯·布龙纳通风报信，完全是经

过多年形成的传统做法。

外交部合法保护司声称，它曾同时向红十字会和路德维希堡司法当局送去了可疑者的名单。

这种做法真是荒唐之至，更何况这样的声明是不符合实际的：路德维希堡纳粹党罪行中央调查局很晚才收到名单，那上边已经有外交部的批示——一些人名后注有速记符号“已通知”三个字。

面对这个证据，外交部不得不承认它首先将名单交给了红十字会调查部，然后才交给路德维希堡纳粹党罪行中央调查局。

在上述种种明显矛盾的情况下，我全力以赴，掀起一场司法程序。我发出大量信件，最后得到了检察院的明确解释。检察院告诉我，红十字会原先不打算使自己的行动成为“警报”，而是“调查部门的一条必不可少的措施”。

1969年1月1日，官方作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

我提出上诉，指出外交部在司法当局之前通报红十字会的做法，无可否认地违反了他们内部的规章制度。怎么能不怀疑这里边有蓄谋呢？不过我不是不知道此案已经归档了结：人们关押了一位妓女，原因是她通知她的权杆儿，警察来看过她。不过，人们无法向阿洛伊斯·布龙纳这样的人通风报信而不受惩罚。

我们从未有过这么有利的机会抓住布龙纳。

布龙纳生活在叙利亚他的别墅里。法国政府的要求，如同联邦德国和奥地利的要求一样，毫无结果。

一家德国杂志的记者们毫不费力地在布龙纳家里找到了

他，该杂志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材料，还配有照片和采访记。

邮递员同样不费周折就查到了他的住处。1980年7月，邮递员给化名为菲舍尔的布龙纳送来寄自奥地利的一个小包裹，据说里面放的是草药。在随同包裹寄来的信中，署名卡尔斯泰因“草药朋友会”的人们表示歉意，未能寄上《健康神药手册》的活页版书籍。他们准备寄来内容相仿的其他著作。布龙纳打开包裹时，包裹轰隆一声爆炸。布龙纳的左手只剩下一只大拇指。

南斯拉夫出版了一部有关马其顿犹太人悲剧的书。该书指出，布龙纳在艾希曼的命令下，主持了8,000名马其顿犹太人的押送工作。在此书面世之际，我请犹太人协会主席卡德尔堡向友好的叙利亚政府交涉。我自己通过维也纳大使馆向南斯拉夫送去两封信。这些努力均无结果。

1986年3月11日，在开始流放关押犹太人43周年之际，有人邀我在南斯拉夫斯科普里发表演讲。我表示同意，但条件是南斯拉夫人应当进行必要的努力，成功地引渡布龙纳。

结果，我未能去斯科普里演讲。

22. 官司一场枉定罪

事情发生在1973年9月初，恰好在全国议会选举前夕。我刚刚休假归来，感到精力充沛，可以做一件我推迟了好多星期的苦差事：整理办公室。

凡了解我的办公室的人都明白，整理办公室是一个多么勇敢的决定。平时，办公室里堆着两大摞材料，要整理这些东西，必须一页纸一页纸地翻弄，分类归入文件柜里，或剔出来放在手头，以便进一步研究。有一批材料我只是匆匆翻看过一遍，准备抽空再仔细读一下；大批材料需要分类。此外，还有一些年代久远的材料，但在新的形势下具有了意义。如果说我独自能够进行一组专家才能完成的研究工作的话，那是因为我有幸长着一个近乎照相机一般的过目不忘的脑袋，和具有电脑一般迅速联想的能力。因此，筛选材料成了我的主要活动之一，同时也是成果最丰硕的一个方面。仿佛是寻宝一样，我的研究常取得意想之外的成果。

那一天也是如此：在我翻阅的大批材料里，我发现一张党卫队接受军官培训的班长名单。那上面的人都是臭名昭著的“党卫队第一步兵旅”的成员，该旅在苏联横行恣虐、无恶不作，因而留下了骂名。我浏览着一行行人名，突然目光停住了：“弗里德里希·彼得”……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

原因嘛，他是奥地利自由党的主席。

我请女秘书查一下彼得的生日。查得的日子同名单上的相符。这时我明白自己手里掌握了一颗重磅炸弹。

如同大多数了解奥地利政策的人一样，我知道了彼得曾是一名党卫队队员——不过人们历来强调地谈论武装党卫队，即一支实战的部队。战争结束的时候，武装党卫队队员转入党卫队其他机构，卷入了种种罪恶活动，因而纽伦堡国际法庭将武装党卫队列入犯罪组织之中。但是，战后初期，武装党卫队队员普遍认为，自己的罪行不多也不少，同任何一名德国士兵一个样。因此，迄至那时为止，彼得参加武装党卫队一事一直没有引起我特别注意。可是我眼前这份材料披露，彼得不是武装党卫队队员，而在那个时期他已经是一名普通的党卫队队员了。党卫队队员弗里德里希·彼得参加的不是一支随随便便的部队，而是战争中一支有名的死亡旅。

命运真会嘲弄人。维也纳社会党人的欧洲出版社前不久出版了党卫队第一步兵旅的战争日记，这是一份说明杀人机构的典型材料：步兵旅活跃在后方，负责这部分土地的控制和“清扫”工作。换句话说，凡能发现的犹太人和共产党人都被挨门逐户、一个村接一个村地搜查出来，押入附近树林里，格杀勿论。

这样的事后来使我的朋友彼得·米夏埃尔·林根斯卷进了一场诉讼案，审理期间有人说，这支步兵旅周复一周地集体屠杀平民，老人、妇女和儿童均未幸免。

在种种“伟绩”中，弗里德里希·彼得所在的第五连是莱尔切基大屠杀的主要责任者。在步兵旅参谋部的活动报告中有这样的记录：“1941年9月4日，大批侦察部队抵达并攻克

了莱尔切基。我方没有任何损失。战利品：60支步枪、11支冲锋枪、15颗手榴弹、22115颗子弹；另外，抓获俘虏38人，打死1,089名犹太人。”

枪杀的地点就在莱尔切基附近。犹太人自己挖好尸坑后，逐一站立坑边。这样，士兵们就能轻而易举地将他们打死在坑里。联邦德国为这场屠杀组织了一次审判。证人拉弗雷恩茨就屠杀结束时的情形作证说：“当我的班集合之后，我们沿一沙丘前进，沙丘旁站着几名党卫队长官。我看见他们身后有一条沟，部分地方铺满了沙土。我见到党卫队长官用手枪射击用沙土填平了的沟。我们一班人向前跨了几米，我十分清楚地注意到，填在坑里的沙土还在蠕动，显然下边还有活着的東西。这时我明白，这个地方刚刚枪毙了人。一些受害者无疑被活埋在坑底。”

这就是党卫队第一步兵旅的拿手好戏。可是当它投入真正的战斗后，它就一触即溃了，难怪德国武装部队的指挥官要向东方领土总司令部抱怨不迭。总司令部回答说：“党卫队司令（希姆莱）希望，在这支既不是实战又不准备派往前线的部队的行动有令人不满的时候，总司令部予以谅解和给予帮助……”

这句话足以明确告诉我们，党卫队第一步兵旅的性质是什么。至于弗里德里希·彼得，我们只想指出，他得到了该旅的奖章。

当初，大家都认为奥地利社会党在1975年大选中不可能获得多数席位。这样克赖斯基总理就会同自由党结成联盟，届时弗里德里希·彼得自然就成了全国第二号政治人物。

无需作为犹太人或纳粹罪犯的受害者，便可明白这样的

想法是多么难以容忍。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想举行记者招待会，立即向公众揭露事情的真相。可是我又立即想到人们会指责我企图影响选民，反对自由党和社会党，支持奥地利人民党。于是我改变了主意，另作打算：我决定向奥地利联邦共和国总统报告情况。为此，我汇总了描写步兵旅活动的材料。它的战争日记中几篇记录足以给人一个明确的概念。

1975年9月29日，我将材料呈送当时奥地利共和国总统阿道夫·基希施莱格。总统读后十分激动，感谢我只让他看到这份材料，而没有交给新闻界：大选依然围绕着具体问题进行，同政治家们的历史无关。基希施莱格马上将材料的复印件分送给了彼得和克赖斯基。维尔弗里德·格德勒大使这样描写他们的反应：彼得极其震惊，克赖斯基则明确表示，维森塔尔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他可不在乎。

我从未象这一次那样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大选。我深信基希施莱格将拒绝任命彼得为副总理，当然我也料到布鲁诺·克赖斯基会大发雷霆。

命运作了另一种安排。克赖斯基勉强拯救了本党的绝对多数党的地位，可以同自由党联合组阁。彼得出任副总理的幻想破灭了。于是，他只能继续当他的国会议员。

10月9日，我在法兰西大旅社举行记者招待会，将准备好的材料公布给与会记者。我同时向记者们指出，早在大选前我就将材料交给了共和国总统，如果选举结果使彼得有可能出任副总理的话，请总统拒绝授权。

中午，电台就播发了这条爆炸性新闻，接着，大批记者蜂拥而至，纷纷索要有关彼得的文件，我的办公室一连数小

时来不及复印材料。

彼得没有作过多的说明。他只是说，他曾是一名普通士兵，从未参与过任何枪杀活动。如果曾有这样的活动，那无疑是在他休假期间发生的。另外，他的同伴谁也没有跟他谈起过此类罪行。

应当指出，一般说来，彼得在党卫队第一步兵旅那段时间里，东部前线没有任何假期。弗里德里希所在的那个连没有单独进行过屠杀，而这类勾当是该连日常活动之一。

10月9日晚，奥地利电视台报道了我的记者招待会。彼得和我接到邀请，前去发表评论。彼得只同意通过电话发表谈话。他的话还是老一套：“我没有参与那些活动，我只是履行了一名士兵的义务。”

翌日，登场的不是弗里德里希·彼得，而是刚从国外访问归来的布鲁诺·克赖斯基。他面对数百万电视观众，说我的态度是“令人愤慨的”，其实矛头是针对他的，旨在毁坏他的名誉。说什么弗里德里希·彼得不过充当了我的借口，另外，他同彼得是多年至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彼得的真诚为人。彼得曾向他保证，他从未犯过罪，这一点就足以叫他克赖斯基放心，云云。

弗里德里希·彼得对他参加党卫队第一步兵旅一事闭口不谈，总理显然对此无动于衷。

彼得·米夏埃尔·林根斯在《侧面报》撰文描写克赖斯基的谈话对舆论的影响：

“西蒙·维森塔尔在电视台披露了弗里德里希·彼得的历史的第二天，我就驱车去寻找我的朋友们的一位工人。他50上下，是位老兵，社会民主党人，但对政治无特殊的兴

趣。

“他的自动反应叫我惊讶不已：‘但愿他不会对我们说，那是正常的战斗活动。人家死了1,000人，而他们却只死了2人，这是为什么？他把我们当成了白痴，可我们都当过兵的嘛……不过我想现在他要滚蛋了。他毕竟不能继续占据议会的席位了。再说，他也没有这个必要。’”

第二天晚上，布鲁诺·克赖斯基在电视台谈彼得事件。第三天上午林根斯又同那名工人闲聊，这位工人已改变了看法：“我弄不懂维森塔尔这家伙为何现在抛出这一切来，他应该拿出证据来。”

林根斯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个细节，那是因为它充分说明了人民对彼得事件的看法是多么犹豫、多么动摇和多么善变啊。布鲁诺·克赖斯基在天平的一端投下了自己人格的全部赌注，企图使舆论朝既定的方向倾斜：“必须尽快结束这一切——另外，为何继续允许维森塔尔这家伙住在我们这里……”

总理也是犹太人，面对横行的纳粹们他躲藏过，他的家属在第三帝国时期惨遭杀害。总理他知道怎样将既定的准则强加给百姓，使他们对他的过去产生一定的看法。多年来他一直是这样做的。有条不紊地这样做，持之以恒地这样做着：他废除禁止自由党存在的法律，选举得胜后同该党订立协议，来加强他的少数派政府，他无条件地支持他的昙花一现的农业部长奥林格尔，后者原来是党卫队某个组织的成员；最后他还说，弗里德里希·彼得在第一旅里20个月所干的事可同杰出的政治活动相比拟。

克赖斯基采取这样的行动路线，值得深入探讨。这种态度肯定于他有利：明确地把“这位维森塔尔先生”说成是“黑手党徒”，少说也能为他争取到数十万张选票。有人喜欢听这样的话：党卫队员们也是某种命运的悲惨的受害者；集中营其实并不象人们所说的那么令人恐怖；死亡旅是普通的战斗队伍，等等。

真正该杀的罪人是另一个人：“冒牌工程师”西蒙·维森塔尔。

坦率地说，后来6个星期是战后我度过的最艰难的日子。

应当知道，布鲁诺·克赖斯基对百姓具有神秘的影响，他是人民的父亲、皇帝和上帝。甚至连略有批判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是口口声声称他为“太阳王”，等待他的启示。全国所有新闻记者，除极个别外，都靠他吃饭。

我的敌手不是无名小卒，而是布鲁诺·克赖斯基，他也出生于犹太家庭。他称我为冒牌工程师维森塔尔先生，责问我凭什么在维也纳没一个“办事处”。

这位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不断向我进攻，1975年11月10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对外国记者们说：“我跟维森塔尔先生毫无共同之处，他最好不要依此炫耀自己。请明白我的意思。我向诸位担保，维森塔尔先生同盖世太保的关系跟我的关系根本不一样。是的，我有证据。要问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吗？法庭上见。我跟盖世太保的关系是一清二白的。我是它的俘虏，它的囚犯。我受过审讯。据我所知，维森塔尔的情况绝非如此。不过这一切很快就会弄个水落石出的。我暗示的问题十分严重，他用对新闻界散布谎言的做法是洗刷不了

自己的。将会有一场重大的诉讼。”

克赖斯基的谈话在整个文明世界引起了轰动。联邦德国的首席检查长罗尔夫·西希廷对我的历史是清楚的，他请《侧面报》一字不落地发表他的谈话：“西蒙·维森塔尔受到的指责旨在把他诬蔑为盖世太保的合作者，这是下流的诽谤。只能作这样的评价。我准备为他担保。”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总理信誓旦旦，“重大的诉讼”迟迟没有进行。我当然要控告克赖斯基，但他是议员，受到“议员不受控告”的保护。

此外，我同弗里德里希·彼得的“重大诉讼案”也没有进行。他的党内同仁曾催促他对我提出起诉，因为我曾说过，我们“尚无”证据证明他亲手杀过人。因此彼得作出结论，我硬说他有可能犯此罪行。

然而，法庭拿出了数不清的证据——德国一系列审讯中指控第一步兵旅的所有证词都转给了彼得——被害者人数越调查越多。突然，彼得在该旅的时间缩短了：他说他在那里不是20个月，而是14个月。1968年，第一次审讯期间他还承认20个月，1943年写的简历中也是20个月。彼得的律师布罗西希克夫人有气无力地说：“显然，彼得先生搞错了两次。”

当第一步兵旅的受害者人数统计到3.6万人的时候，司法程序被推迟了。我们不时送去一些新的材料，等待着重新开庭。

我们一等就是7年……一天，弗里德里希·彼得的律师写信告诉我的律师，她的委托者想撤回对我的起诉——这场官司他不再感兴趣了。

这就是布鲁诺·克赖斯基倾其全部身价、荣誉保护的弗里德里希·彼得。总理还打算让他出来当副总理，舍不得将他撵出国会呢。

总理倒是想把我撵出奥地利，要是将此问题提交议会表决的话，可以会得到半数票或百分之百的票的赞同。

然而，克赖斯基并不满足于此，他还想争取最坚定的反犹分子。一名荷兰记者大胆提醒他说，他的话很可能会激怒他的犹太同胞，他回答说：“我没有犹太同胞，只有奥地利同胞。”

以色列记者泽夫·巴尔特提醒他，否定自己属于犹太人种，那会使自己处境困难的。可是总理大人立即失去冷静，回驳说：“犹太人不成其为一个人种。如果是的话，那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种。”

《明镜》周刊发表了克赖斯基的这番话，他给“读者来信”写了封信，辩解说：他并不把犹太人当成一个人种，也不把他们当成一个令人讨厌的人种。

不存在犹太人种这个提法是克赖斯基的一句口头禅。他喜欢就此问题发表长篇演说，尤其喜欢在新闻记者面前口若悬河地谈论这个问题，反正彬彬有礼的记者们不会打断他的话。他说他的这一观点早就为科学所证明，只是犹太人死不承认。他准备日后就此写一部书……当以色列记者奥伯鲍姆问他，作为联邦总理、多年的外交部长，怎么能够就犹太人和以色列问题说那些不负责任的骂人话时，他坦率地说：“我一听见维森塔尔的名字，就按捺不住。”

在克赖斯基看来，我们是“东方犹太人”，人们把他归入犹太人种，这已经够他头疼的了，他无论如何不想同我们

有什么瓜葛。

我常常思索，克赖斯基为何要否认自己属于犹太人。在奥地利，大概只有他一个人不把他视为犹太人。我以为最说得通的解释是彼得·米夏埃尔·林根斯在《侧面报》中说的一段话：奥地利的反犹主义甚嚣尘上，一名犹太青年只有两种抉择：要么反其道而行之，用咄咄逼人的方式强调自己的犹太身份，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使他被封闭在类似犹太区这样的狭小天地里；要么力图躲避外界的压力，不断证明自己同大家没有什么区别。维也纳始终有一些杰出的犹太人，他们把自己装扮得比奥地利人还要奥地利化。硬要打扮成奥地利人的做法本身就包含着反犹主义倾向，在“东方犹太人”问题上，这种倾向变成了切实的憎恶。一名唯恐不能同化的犹太人必然会把对犹太人的仇恨接过去，越发疯狂地反对犹太人。

当诸如我这样的人提醒克赖斯基，他的出身是犹太家庭时，他感到被揭露了隐私，甚至觉得被人嘲弄了。因此他对我怀恨在心——而我们的政治分歧仅仅是表面的东西而已。

这种仇恨发展得太远了：奥地利社会党议会党团主席海因茨·菲舍尔公开扬言，要让议会组织一个针对我的调查委员会，宗旨是向舆论揭露我的有害的活动。

宪法规定，议会可组织此类委员会，对国家机关，比如某个部的可疑活动进行调查。在奥地利，人们很少援引这一规定，因为各党派并不把调查结果放在眼里。举例说吧，财政部长汉纳斯·安德罗施对自己进行偷税漏税调查，立即得出结论说这种指责毫无根据，社会党拒绝对这件事责成议会

调查。

需要认真调查的倒是我的“黑手党徒”的活动。真是咄咄怪事。

形势变得对我十分不利。发行量极大的奥地利《皇冠报》几乎每天都在攻击我。它公布我在一些完全不同的背景下说的话，甚至几年前的话也不放过，目的是证明我给国家带来了祸害。读者来信不仅强烈要求立即关闭我的办事处，而且呼吁撤销我的奥地利国籍。我们设在鲁道夫广场的文献中心接到大量充满谩骂的信。不久，我的寓所入口处贴出了威胁性的字条，大楼主人跑来要我行行好赶快搬走：这座公寓住着许多上了年纪的人，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他们害怕再次见到窗子被砸破。

我完全理解房东的心理，于是搬到我们中心今天的所在地萨尔茨托大街的办公室里去住。

在维也纳的全体犹太人处境越来越困难，因为矛头针对我的攻击是通过第三者向我袭来的。

维也纳的犹太人已经明白，对我的仇恨很快就会殃及到他们，因此他们十分恐慌。甚至连以色列人也害怕起来：维也纳当时是来自苏联的犹太人转道去以色列的中转站，以色列人担心克赖斯基向逃民们关上大门。在此情况下，我的维也纳和以色列的朋友们纷纷敦促我赶快让步，跟布鲁诺·克赖斯基实行任何形式的停火。我妻子琪拉也这样劝我，她认为在暮年应该有权象其他女人一样过平静的生活：去剧院看戏，上咖啡馆喝咖啡，到美丽的公园去散步。

可是，路上遇到的行人向我们吐唾沫，辱骂我们。这是

促使我接受妥协的主要原因。克赖斯基在议会宣布，他从未指责我同纳粹狼狈为奸；我撤回对他的起诉——这就是双方达成的协议。

可是，法庭还是要抓这件事：我在前面数次提到的彼得·米夏埃尔·林根斯曾在他主编的《侧面报》上撰文，谴责克赖斯基的态度是“不道德的”、“令人厌恶的”和“可悲的”。克赖斯基批准检察院追究林根斯的刑事责任；他攻击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联邦总理。

审讯过程是相当奇怪的。克赖斯基不谴责林根斯的任何话和任何行动。尽管他已多次声明从未指责过我同纳粹勾结，但在法庭上一再说我跟纳粹狼狈为奸。他证明说我跟纳粹一起干过事，这方面有不少材料，如果有人想看的话，他可以提供。

法庭没有受他的纠缠。但是，克赖斯基的话很快就照登在新纳粹主义报纸上。我对这家报纸提出起诉，主编要求克赖斯基出来证实他的话。

这场次要的官司以新纳粹主义报纸的失败而告终。法庭不费吹灰之力就查清，并证实我在第三帝国时期受过的种种迫害是众所周知的，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我同纳粹分子勾结。

布鲁诺·克赖斯基曾提起过他收到来自南美的一封信。一名因诈骗罪而受到警方缉捕的老党卫队员在这封信里声称认识我，并且说我是盖世太保派在布加勒斯特的密探。

布加勒斯特，无论是战争期间还是战后，我从未到过这个城市。

尽管克赖斯基承认自己的话是不道德的、令人讨厌的，但法庭还是认为林根斯犯了诽谤罪，最高法院确认了这个结论。林根斯上诉到斯特拉斯堡欧洲人权法庭，该法庭的法官们一致认定，这样的判决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联邦共和国判了林根斯的徒刑，但10年后，它为此赔偿了林根斯的损失，归还了他一切诉讼费。从此人们终于有权说，克赖斯基在彼得案件中的态度是“不道德的”、“令人厌恶的”和“可悲的”。

可是毋庸讳言，这场官司对克赖斯基和彼得均无损害。“太阳王”继续照耀他的臣民，彼得依然稳坐自由党主席的位置，仍然进出国会大厦。1983年，他的党主席的职务为比较年轻的诺贝特·施特格尔所接替，但他还是自由党议会党团的主席。他无力克服奥地利的经济困难，在新的大选中只得放弃候选资格。1983年，他因年事已高而退出了议会。

Figure 1. The proposed model for the effect of the perceived effort on the perceived exertion. The perceived effort is the perceived effort of the subject, and the perceived exertion is the perceived exertion of the subject. The perceived effort is the perceived effort of the subject, and the perceived exertion is the perceived exertion of the subject.

译 者 的 话

前些日子，我们从英国报刊上看到，英国议会以348票对123票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对定居在英国的老纳粹战犯进行审判。此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未及甄别，一大批纳粹战犯伪装成难民，混入欧洲各国，有的涉洋逃匿到南美，逍遥法外几十年，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沉渣时有泛起的祸源。

看到英国议会的上述决议，我们不禁产生将追捕老纳粹的著名“猎手”西蒙·维森塔尔轰动世界的近作《追捕老纳粹纪实》译成汉文，推荐给中国读者的想法。感谢北岳文艺出版社欣然采纳了这个选题。

这部书详细地记录了作者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追踪逃匿的纳粹战犯，将他们一一缉拿归案的经过，情节生动曲折，富有传奇色彩。这部书出版于西欧响起为法西斯辩护的喧闹，史学界出现修正二次大战史的“修正史学派”黑潮之际，因此无疑具有更为深刻的教育意义和政治意义。它无情地揭露了纳粹分子的滔天罪行，抨击了在西欧蠢蠢欲动为老纳粹翻案的极右翼和新纳粹势力。

作者出于阶级偏见，在叙述某些与东欧各国和苏联有关的历史事件时，他的分析和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诚望读者鉴别。

原著篇幅过大，我们在翻译时作了适当删节。谬误之处，请读者批评。

淑 琴 张 峤

1989年12月 北京肖家河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EwNTQ1MDcuemlw",
  "filename_decoded": "11054507.zip",
  "filesize": 19892789,
  "md5": "3bad945737add877746980717b20bc4",
  "header_md5": "2bb72ace15ae62a89c90f05d4cc87c7f",
  "sha1": "51dc1d5cdf079271d726ec55ccd93c40e3958aa",
  "sha256": "746b6518d43e8356f9ff18e2528352ddf6eef3c61aee0c8210616d1d1d315e7d",
  "crc32": 4193738005,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19995592,
  "pdg_dir_name": "\u00ed\u2562\u256b\u2556\u2593\u2562\u2514\u2567\u2500\u2554\u2524\u0393\u255d\u2550\u2569\u2561\u00ed\u2556_11054507",
  "pdg_main_pages_found": 280,
  "pdg_main_pages_max": 280,
  "total_pages": 325,
  "total_pixels": 1063653376,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